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密特朗传



引 言

1996年1月8日10时55分，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灯火辉煌，挤满了来自各方的记者。法国新总统雅克·希拉克上任以来第一次会见新闻界的新年团拜即将开始。

希拉克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大厅入口处。他沉着脸，快步穿过人群，抓起麦克风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今天早晨离开了我们。我刚刚向他的遗体告别。我也向他的家属和全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一位伟人逝世了，我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向他致以敬意。”

新年团拜竟成了讣告发布会。记者们急速散去，闹哄哄的节日大厅顿时变得空荡荡了。电台和电视台立即中断原定节目，播放前总统密特朗的死讯。

密特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治人物。他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接连创造了好几项新记录。1947年1月，他出任退伍军人部长，年方30，成为1804年第一帝国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部长。这项记录迄今尚无人打破。他连任两届总统，在爱丽舍宫足足度过了14个春秋，是法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首次当选总统不久，即1981年11月，密特朗被确诊身患癌症，几乎全部总统任期都是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病夫治国”达13年半。这在法国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自1944年8月任戴高乐临时政府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到1995年5月离开总统府，驰骋法国政坛长达半个世纪，算得上是战后法国政治寿命最长的风云人物。

噩耗传出后，法国报刊评介密特朗生平的专刊均被抢购一空。密特朗逝世前后，法国出版界出现一股“密特朗热”。有关他的书籍多达百余种，或披露其隐秘，或评说其业绩，或记述其趣闻逸事，本本畅销。足见法国人对密特朗非同寻常的一生怀有强烈的兴趣。

作者的话

认识密特朗是 35 年前的事了。1961 年 1 月，密特朗以参议员身份首次单独访华，毛主席曾予接见。那时，除了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外，还没有一个法国政界人士获此殊荣。在历时三周的访问中，我作为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曾全程陪同，朝夕相处，对密特朗开始有所了解。在他担任法国总统 14 年间（1981—1994 年）中的头八年，我一直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在此期间，我作为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曾有机会多次会见密特朗。他于 1965 年、1981 年和 1988 年竞选总统时，我正巧均在使馆工作，实地观察研究了总统选举的全过程。正是对法国政治风云变幻和密特朗其人其事的亲身感受 and 了解，促使我提笔撰写这部《密特朗传》。

密特朗的一生，犹如一部情节曲折离奇、处处充满悬念的小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密特朗的一生，扑朔迷离，法国人喻为“密特朗之谜”，直至人土埋葬的最后一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迷雾才逐渐消散。

长时间内，密特朗生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一直疑团未释。捕风捉影、恶意中伤者有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者有之；讳莫如深、文过饰非者亦有之。本书在掌握最新材料的基础上，力求去伪存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对一个政治人物的青年时代，一般本无需多费笔墨，但密特朗情况特殊。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动乱和战争的年代，世事纷繁，诡谲多变。长期以来，这段历史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若明若暗。他的政敌借以非难、攻讦；密特朗本人则躲躲闪闪。直至晚年，这些历史问题才得到清理。密特朗临终前撰写的《未完成的回忆录》，还以极大的篇幅予以澄清。本书自当不惜浓墨重笔对此加以描述。

密特朗的一生，经历了右—中间—“左”的曲折历程。本书紧紧抓住这条主线，力求融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勾画他的生平、业绩。他的漫长的政治生涯，犹如潮汐一般，高低交替，起落无常，仿佛命运故意捉弄他似的：每当他春风得意之际，莫名其妙的麻烦便纷至沓来；每当他好不容易攀上高山之顶，顷刻之间又跌入万丈深渊；每当他似乎一蹶不振之时，转眼间却又东山再起。密特朗是个坚忍不拔、处逆境不馁的人，是个善于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善于化不利为有利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实现了他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登上国家权力的顶峰。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国内外友人的多方协助。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密特朗生前挚友罗朗·迪马先生寄来评说密特朗之死的全套欧美报刊和论述密特朗生平的最新图书，包括密特朗身后发表的两部著作：《未完成的回忆录》和《论德国和法国》；国内诸多同事和朋友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宝贵的启示和指点，并慨然提供新书资料，特别是蒙梁志菲、王绍新等同志热忱相助，谨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本书之所以能问世，还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朋友们的支持。

1996 年 12 月于北京

密特朗传

第一章

动乱年代

“我不是天生的左派”

“我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那时我觉得友谊是长存的，爱是永恒的，人生来就是为了相爱。”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这段话，是他那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的生动写照。1916年10月26日，当密特朗来到人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凡尔登会战尚在激烈进行。不过，密特朗的出生地雅尔纳克位于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夏朗德省，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当地人多少有偏安一隅之感。等密特朗记事时，战火早已熄灭。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自然不会有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残杀的印象。

“我不是天生的左派，更不是生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我的童年仿佛是在上一个世纪度过的，我得费好大劲才跳到本世纪来。”¹这是密特朗对他的出身和童年的社会环境的言简意赅的概括。

雅尔纳克是一个仅有几千人口的小城，附近地区盛产葡萄，当地居民大体分成三等：做自产自销的大买卖的是头等，那多半是经营科涅克酒的；小商人是二等；最低一等是工薪人员。密特朗的父亲约瑟夫·密特朗本人在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当了30年员工，做过检票员，在密特朗出生那年当上了昂古莱姆城的车站站长；他又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份制醋的产业。在当地，经营科涅克酒算是一流买卖，醋是科涅克酒的副产品，制醋业就等而下之了。密特朗出生三年后，父亲提前退休，经营家庭产业。他虽不喜欢这行当，但经营有方。密特朗家的醋颇有名气，直到如今人们还记得曾经风行一时的广告语：“密特朗香醋，货真价实。”约瑟夫·密特朗还当上了法国制醋同业公会主席。按密特朗的说法，他家“很难归属于哪一等”。不管怎么说，密特朗出身于比较殷实的外省资产阶级家庭。

当地人喜欢子孙满堂。密特朗的母亲伊冯娜·密特朗是科涅克地区一个富有的乡绅的女儿。她结婚时，家庭医生告诫过她：“您有心脏病，别多生孩子，否则，您会受不了的。”但她还是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密特朗排行第五。密特朗说：“这是一种古罗马精神。”1936年，即密特朗20岁时，伊冯娜因心脏病发作，不治去世。

夏朗德省盛行天主教，望不望弥撒，乃是区别良莠的标准，密特朗家族

¹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69年版，第17、163页。

科涅克酒系烈性葡萄酒，以产地得名。英国人称之为“白兰地”。目前充斥中国市场的“人头马”，即科涅克酒的一种。

也都信奉天主教。伊冯娜·密特朗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清晨头一件大事，不是做祷告，就是望弥撒。白天，除了忙于操持家务和教育孩子，还要挤出时间参加教会的济贫活动，晚上则在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古典名著和浪漫派小说。她思想开通却不激进，崇尚民主自由。密特朗十分敬重母亲。1981年6月24日，密特朗就任总统不久，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布什时，谈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热爱自由，她不喜欢革命。她培养我崇敬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

密特朗的舅父罗贝尔·洛朗是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宗教事业，给密特朗留下了深刻影响。密特朗说过：“当时最流行的是我的一位舅父传下来的教义。”

少年密特朗虔诚不亚于其母。用他自己的话说：“《圣经》给我的童年带来精神食粮。”每天一大早，他就去圣·皮埃尔教堂望弥撒，小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弥撒经本。人们以为他长大了会当神父。不过，这未免太小看了他。密特朗小小年纪竟口吐狂言：“我要当国王，或者当教皇。”结果他并没有选择神职，去争当教皇，而是作为左翼领袖，最终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当上了第五共和国的总统。60年代，密特朗曾指责戴高乐“把第五共和国变成地地道道的君主政体”，“抓起别人献在他面前的王冠戴在自己头上”。无独有偶。1988年11月21日，巴黎《问题》周刊封面刊出大幅漫画，把密特朗总统画作路易十四。密特朗幼时狂言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应验了。

9岁那年，密特朗去昂古莱姆城的圣保罗学校当寄宿生。这是一所管教很严的教会学校，密特朗一读就是9年，他文科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数理化成绩平平。他自幼养成爱读书的癖好。他会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哲学、古典文学名著、当代小说均在他的涉猎之列。他个性倔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最怕口试。有一次口试竟不及格，补考后才算过关。他暗暗下定决心，改掉这个天生的毛病。1934年，在波尔多天主教学生演讲比赛中，他名列前茅。在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密特朗竟以口才过人著称。

总之，密特朗是在天主教的熏陶下成长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候，在外省的一个小城市里，天主教徒就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右翼。”

1986年4月密特朗对法国《环球》月刊记者的谈话。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15页。

右翼青年

把子弟送往巴黎深造，是外省殷实人家的心愿。1934年，密特朗18岁那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来到巴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攻读法律，同时在巴黎大学注册。战前，巴黎政治学院是一所名牌学校，是总理、部长和高级文官的摇篮。密特朗的穿着打扮、举止谈吐显得土里土气，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当了总统以后，密特朗这样描绘当年在巴黎求学时的心境：“当我发觉自己是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一个学生时，我的感觉是：‘巴黎不属于我。’在一座必须攀登的高山脚下，我有失落感，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这个“简陋、狭小的房间”，坐落在沃吉拉尔街104号。这是一所由圣母会教士管理的大学生公寓。寄宿的学生多半是资产阶级子弟，信奉天主教，思想保守。老同学中出了不少知名人士。有几个后来当了部长，在密特朗的政治生涯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每年同窗旧友都要在巴黎拉丁区饭馆里叙旧聚会，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密特朗当了总统之后，也年年如此。“104”的老同学还个个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

在大学里，密特朗过从较密的大抵是些思想情趣相近的同学。据他自己说，社会党同学使他惶惶不安，很少交往。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子”，他躲得远远地。他讥讽他们“讲得满口从德语翻译过来的法语”，“我听来觉得很别扭”，“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觉得很刺耳”。

30年代中期，正是动乱频仍的年代。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于1930年11月波及法国。持续的危机猛烈冲击法国社会，激化了阶级矛盾，政局动荡不定。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国的法西斯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极右和右翼组织也蠢蠢欲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爱国青年团”、“法兰西行动”、“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火十字团”等。

由于密特朗同其中一些组织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时招致非议和抨击。为便于说明问题，需要对有关组织作一简略介绍。

“法兰西行动”建立于19世纪末，原是个保皇组织，出版《法兰西行动报》，蛊惑人心。该报卖报人的组织“国王的报贩”很快演变成准军事组织，在街头进行暴力活动。“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俗称蒙面党）系由“法兰西行动”成员欧仁·德隆克尔创建于1935年，以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为目标。这个组织不惜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与墨索里尼的情报机构合谋，暗杀居留在法国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罗塞利兄弟，在法国臭名昭著。

“火十字团”成立于1928年，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组织，在拉罗克上校领导下，演变成右翼政治组织。拉罗克上校以“劳动、家庭、祖

国”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相号召，主张建立以传统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井然、正直诚实、崇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法国社会。拉罗克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传统右翼的代表，反共反议会，富于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火十字团”的主张迎合那些企望社会安定、民族复兴和对某些社会问题忧心忡忡的人们的心理，成员很快扩展到社会各界，在中间阶层中影响尤大，并拥有“国民志愿军”等外围组织，人多势众。

1934年2月6日，“法兰西行动”、“爱国青年团”、“法兰西团结”、“火十字团”等出动4万人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冲击国民议会，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酿成17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震动法国。拉罗克上校带领的“火十字团”4000余人的队伍，悬崖勒马，未参与冲击议会，未卷入流血冲突。有人甚至说，第三共和国之所以没有垮台，多亏了“火十字团”。事后，“火十字团”成员急剧增加，从1934年的3.5万人增至10万余人。1936年初达到45万人，成为人数最多的右翼组织。

法国政坛长期流传一种说法：密特朗曾加入“法兰西行动”，甚至曾是“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在密特朗政治生涯的一些重要时刻，他的政敌往往翻历史老账，丑化密特朗。有的政界头面人物甚至在议会讲坛上指名道姓地指责他。

对这类传闻和指责，密特朗一概不予置理。他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写道：“受到谴责的人应如何回答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不作任何回答。出面否认，那就降低了身份。再说，干吗要回答呢？假如我年轻时真是极右分子，那么，我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今天的我，我会感到更加光荣。”

关于密特朗历史污点的传闻如此之广，以致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信以为真。有一回，密特朗在一家饭馆用餐，一个陌生人笑容可掬地递给他一支香味诱人的高级雪前烟。密特朗不会抽烟，谢谢他的好意。但那人却凑到他耳边说：“我曾经是‘法兰西行动’的成员。”接着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像您一样。”原来此人如此热情，是出于知己相逢的心情，弄得密特朗啼笑皆非。

正如密特朗所说，巴黎政治学院是“社会的缩影”。从极右组织到共产主义青联都在校园内建立组织展开活动，而右翼势力占上风。本来一心读书、笃信天主教、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密特朗，也被卷入政治旋涡中去。他在给他最敬重的中学老师若比神父的信中写道：“天主教行动并不排斥政治行动，但是，政治行动不应压倒天主教行动。”应当“把我们的教义和原则灌输到有必要参加的政治组织中去”。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只有“教会认可”的政治组织方可参加。

密特朗对“法兰西行动”宣扬的某些思想颇感兴趣，并曾多次与“104”

《我的历史真相》于1969年问世，当时密特朗已是左翼的代表人物。

的同学一起去“法兰西行动协会”听讲演，对《法兰西行动报》的笔杆子、作家夏尔·莫拉斯的文章颇为赞赏。不过，密特朗并没有加入“法兰西行动”，因为它不是教会认可的组织。早在1926、1927和1928年，教皇就一再谴责过这个极右组织，甚至宣布不准“法兰西行动”成员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和葬礼。还有一个原因，“法兰西行动”毕竟是个保皇主义组织。密特朗说过：“我不是保皇分子。”“我一直认为，恢复君主制度是不现实的。”

密特朗由于亲属或朋友关系同“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乃至领导成员有交往，有的甚至过从甚密。他的哥哥罗贝尔·密特朗是该组织头头欧仁·德隆克尔的连襟。密特朗本人同参与暗杀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罗塞利兄弟的罪犯、布维埃家的大儿子让·布维埃很熟，因为他在巴黎学习期间是这家的常客。在让·布维埃家里，他同这个组织的一些重要成员见过面。让·布维埃被缉拿归案后，他还常去探监。战后，密特朗还为从轻发落让·布维埃奔走效力。1947年6月，此人终于假释出狱。

密特朗同“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头面人物、该组织同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联系入弗朗索瓦·梅泰尼埃是好朋友。此人因曾参与1937年袭击法国雇主协会事件，战后被判处监禁。1947年由于密特朗出面干预，他被减刑并保释出狱，理由是他身患癌症。1950年，梅泰尼埃前往海外领地部去见密特朗。他笑吟吟地对密特朗说：“让我在你的办公椅子上坐一坐，尝尝当部长是什么滋味。”说着，他果然大模大样地坐了上去，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1942年，密特朗在维希政府供职期间，又结识一些与维希合作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成员。其中，同“法兰西国家”元首贝当办公室特派员、维希官方刊物《法兰西》主编加布里埃尔·让泰（前“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学生部负责人）关系尤为密切。

后来，密特朗的政敌利用诸如此类的社会关系散布流言蜚语，甚至说密特朗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事实上，密特朗并未参加这个法西斯色彩的秘密组织。经多方查证，这个组织的花名册中从无弗朗索瓦·密特朗其人。

密特朗同“火十字团”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过去长时期内一直是含糊不清的。“104”的同学们都记得，密特朗是公开支持“火十字团”的。有的同学甚至劝他收敛些，不然共产党人会砸烂他的脑袋。雅克·马罗（后来成了法新社记者）在“104”自办刊物《蒙塔朗贝尔》上评述1935年密特朗发表过的文章时说：“密特朗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火十字团’。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想，一种切实可行的、非常人道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它是为人们所广泛了解的、非常伟大的理想，因为它就是法兰西。密特朗在本来很容易变成纯政治性的辩论中保持一个正直的人的声音，这一点尤属难能可贵。”至于密特朗是不是“火十字团”的成员，谁也说不太清。一直到1994年9月，密特朗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他一度加入过“火十字团”。

密特朗也是“火十字团”青年组织“国民志愿军”的成员，参加过这个

组织在咖啡馆举行的几次集会。他还参加了1934年11月11日“火十字团”的示威游行。这年2月6日骚乱后上台的加斯东·杜梅尔格总理于11月初辞职。极右和右翼组织决定在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闹事，表示对杜梅尔格右翼政府垮台的不满。但各组织未能取得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只好各自分散活动。拉罗克上校率领“火十字团”和“国民志愿军”3万人向凯旋门无名战士墓献花后，队伍直奔杜梅尔格住宅，向他欢呼致意，停留数小时方散。

密特朗到巴黎求学不到4个月，就成了巴黎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1935年2月2日，巴黎报纸刊出大幅照片，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密特朗站在正中的显眼位置，腋下夹着笔记本，面带笑容，似乎正在同他身边的几个警察说些什么，这是巴黎右翼大学生“反对外国佬流入”的种族主义示威。这场示威是由“法兰西行动”策动的，企图在2月6日事件一周年之际制造某种紧张“气氛”。“国王的报贩”、“爱国青年团”和“国民志愿军”等组织的大学生也参与其事。示威学生高喊：“打倒外国佬！”“法国是法国人的！”等种族主义口号，并同反对示威的学生发生冲突。

密特朗在这场种族主义示威中崭露头角，受到母校老师和家人的称道。若比神父在校刊上写道：“他参加了（而不是仅仅作壁上观）学生示威。他的家人在一家大报上认出站在学生前列的弗朗索瓦的面容，不胜惊讶。他一直恪守天主教青年学生会的传统。”

密特朗在报纸上抛头露面，也招致一些麻烦。3月的一天，他胸前佩戴“国民志愿军”的菱形徽章，同“104”的一个同学去逛百货商店，几个共产主义青联的成员遇见他，把他当作“危险人物”，动手就揍。他的同学连忙上前劝解，但密特朗已饱尝老拳。密特朗的姐姐开玩笑地说：这是火的洗礼。

这年复活节，密特朗回家度假。4月16日，中学同学和老师聚会，以《政治行动与修养》为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会后，若比神父要学生们书面描绘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密特朗很快交了卷。他写道：“在巴黎，形形色色的政党分为两大派：民族阵线和共同阵线。在学生中间，‘爱国青年团’、‘国王的报贩’和‘法兰西主义’组成民族阵线。‘国民志愿军’人数最多（38万人），未参加民族阵线。‘国民志愿军’并不是一个政党，也艰难将它划为‘右翼’或‘左翼’。同‘火十字团’一样，它主张建立一个纯正而强大的法国。为此目的，它力求再现‘火线’精神：勇敢、互助、荣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青联、青年激进党人则隶属于共同阵线……”

密特朗这段话清晰地勾画出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况。

密特朗的大学生活是不平静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初，巴黎政治学院法律系发生了“热泽教授事件”，震动巴黎，震动法国。事件是从意大利1935年10月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开始的。法国极右和右翼势力支持墨索里尼的侵略行动，反对法国声援阿比西尼亚。一大批知名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公然为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张目。惟有巴黎政治学院法律系

教授加斯东·热泽挺身而出，同意担任阿比西尼亚皇帝的法律顾问，向海牙国际法庭控告意大利的入侵，为阿比西尼亚辩护。法国极右和右翼组织群起而攻之，“法兰西行动”尤为起劲，辱骂热泽教授是“叛徒”、“英国和阿比西尼亚的走狗”。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左翼学生到处陪伴着他，保护他。

掌握法律系学生会领导权的“法兰西行动”学生，伙同包括“国民志愿军”、“爱国青年团”在内的右翼学生闹事。1936年1月10日，热泽教授来到课堂，右翼学生大叫大嚷：“热泽滚出去！热泽辞职！”课堂一片混乱，讲课被迫中断。第二天，院长决定关闭法律系。右翼学生串连其他系的学生举行罢课，要求热泽辞职。罢课期间，反对和拥护热泽的两派学生不断发生斗殴。双方混战中，甚至院长也受了误伤。

热泽事件反映了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助纣为虐？还是伸张正义？围绕热泽事件的斗争很快越出校园的范围，发展成为全国性重大政治事件，形成全国范围的两大派对立局面：极右翼和右翼政党、派别和退伍军人反对热泽；组成“人民阵线”的各左翼政党（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工人群众支持热泽。热泽事件成为左右翼力量较量的焦点。

密特朗站在哪一边呢？以往密特朗的传记都说他是拥护热泽派，而且把这一点说成是密特朗倾向左翼的开端。事实恰恰相反。密特朗参加了反对热泽的示威。1936年7月4日，他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文章，把反热泽示威称之为“光荣的日子”。不仅如此，后来在一个旧日同学的相册里发现一张1936年3月5日拍摄的示威照片，密特朗的面容清晰可辨。照片中站在他旁边的“104”同学贝尔纳·达尔（曾任莱雅香水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回忆说：“是的，如同大多数法律系的学生一样，我们参加了反热泽示威。要知道，当年殖民事业是受欢迎的。我们干吗要阻止墨索里尼并吞阿比西尼亚呢？”

在3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中，在德意法西斯崛起和国内极右和右翼势力嚣张的背景下，左翼力量加强团结，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4年7月27日，法共与社会党结成反法西斯“人民联盟”。不久，激进党也参加进来。1935年7月14日国庆节，“人民联盟”三党和几十个左翼团体的1万名代表举行盛大集会，“决心为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斗争”。当天下午，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联合组织50万人的大规模游行。

三党领袖多列士、勃鲁姆、达拉第并肩走在队伍的前列。接着，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宣告成立。至此，法国人民阵线正式形成。1936年1月，参加人民阵线的98个党派团体公布了《人民阵线纲领》，为行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奠定胜利的基础。

20来岁的密特朗，思想远未定型。在政治风暴中，他在思考，在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说：“事实上，最初我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我在慢慢摸索，

但多少还是停留在理论上。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已属于哪一边。我更多是直觉地作出反应，而不是根据某些不可改变的思想……我犹如一个寻找出路的新教徒，怀着极大兴趣，满腔热忱地去了解情况，参加各种倾向的政治集会。”

他兴致勃勃地聆听拉罗克上校、多里奥和多列士、勃鲁姆的演讲。他既参加“国民志愿军”的活动，也经常到“争取真理联盟”待上几小时。他也参加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集会，聆听马尔罗等人慷慨陈词。他回忆说：“马尔罗讲得多精彩呀！怎么能不相信呢？”

1936年4月26日和5月3日议会选举结果，人民阵线三党取得重大胜利，在议会559席中获得337席。6月5日，有社会党、激进党参加和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组成，社会党领袖勃鲁姆任总理，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党总理。

人民阵线的胜利对密特朗震动颇大。他在30多年后回忆当年激动人心的情景时说：“我还记得大选之夜巴黎街头欢腾的情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欢呼声响彻夜空……在一片欢乐声中，我重新看到了昔日奔走相告的热情。我发觉还有一些事业值得用生命为之奋斗。我为自己在20岁时看到一个新世界的露头而欣喜，这个世界的新生使我兴高采烈……虽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能分清正义和公正在哪一边。”

不过，人民阵线的胜利对密特朗的思想影响究竟是否如此之大，似尚属疑问。那时，欢庆人民阵线胜利的游行频繁，但是他的同窗和朋友都不记得他参加过，哪怕是一次。他们只看到他从窗口远远望着游行队伍，显得并不热情。主管“104”学生宿舍的奥雷伊神父回忆道：“在‘104’寄宿的学生都是很保守的，激烈反对人民阵线。希望左翼获胜的人为数甚少，弗朗索瓦·密特朗不在其内。”再说，那个时期，他经常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文章。1936年11月他担任该报文艺部主任，并当选为该报副刊《学生生活之友》主席，该报还一再刊登他的照片。而这家报纸被左翼称为法兰西银行的喉舌，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人民阵线政府和反苏反共的文章。

1938年这一年，欧洲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密特朗的注意力日益为战争的阴影所吸引。3月11日深夜，纳粹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并前往维也纳接管奥地利。事先，希特勒就获悉英国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法国正处于内阁危机，看守政府表示：“法国将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结果，英法除一纸空头抗议外，别无反应。

同《挚友密特朗》一书作者夏尔·穆兰的谈话，见该书第30—31页，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82年版。

雅克·多里奥（1893—1945年）：法西斯性质的法国人民党创始人，后与纳粹德国合作。

安德烈·马尔罗：法国著名作家，1959年戴高乐再度执政后，任文化部长。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19页。

密特朗对德国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4月，他在“104”学生公寓的刊物《蒙塔朗贝尔》上发表题为《到此为止，下不为例！》的长文，痛斥英法绥靖主义者。这是他的第一篇政论。几十年之后，密特朗自己高度评价这篇处女作，称之为他一生“写作的起点”。

“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沉醉于往日的胜利，躲在由战后签署的条约搭成的纸糊的要塞后面高枕无忧，忘记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主持正义的人若要介入世界事务，那就必须比强者更强。这样。每当往日的战败国推倒、损毁或焚烧碉堡，并扬言这一切都是基于生死攸关的需要和良好的愿望时，人们总是对他说：‘好吧，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他尖锐地指出，侵略者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到此为止，下不为例！”无异于“左脸挨打后又送上右脸”。

“无论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还是每个人的一生中，任何退缩都意味着败了一仗，战略退却，往往掩盖着溃败。意在掩饰错误、推卸责任的种种遁词丝毫改变不了铁的事实：人一旦倒下，就等于自我宣判；女子一旦失节，有何贞洁可言？一旦屈膝，有何意志可言？一旦丧失自由，有何自由可言？”

文章的结束语，是对希特勒将蹂躏整个欧洲的不祥的预言：“眼看着拜罗伊特之神得意洋洋来到莫扎特的国土上，我知道何等严重的亵渎行为正在孕育之中。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某种耻辱，仿佛我自己也负有一定责任。”当时，很多法国人还沉湎在绥靖主义者散布的和平幻想之中，而密特朗则预见到步步退让的结果将是一场遍及欧洲战争。这确实不失为真知灼见之作。

事隔近40年之后，密特朗自己对战前的生活和思想作了精辟的小结：“当时我没有私人生活，我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反映。我更多是作出本能的反应，而不是理智的反应。谈不上什么精神创新，有的只是感情的反应……在晚些时候我才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那就是我在俘虏营的日子里。”“当时我尚未作出抉择；我的思想的2/3是我的出身的反映，那是属于右翼的。我是一瘸一拐往前走。一只脚，是与我的出身俱来的因循守旧；另一只脚，是某种倔强的本能，反抗习俗成规。那个时期，人们爱说‘跟谁走’、‘对某某如何’，对这种说法我是很反感的。”

这篇早期代表作已收入密特朗：《政论集》第1卷，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7年版。

拜罗伊特系著名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故乡。

1994年3月21日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作者皮埃尔·佩昂的谈话，见该书，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虎口余生

1938年7月，密特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法学和文学双学士，以及公法高等教育毕业文凭。同年9月底，他开始服兵役，编入驻扎在巴黎近郊伊夫里的第23殖民步兵团。军营生活单调乏味，密特朗常偷偷溜出来找乐会友。“白天我过军人生活，晚上我仍是老百姓。”一年过去了，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3日，英法先后与德国宣战。二等兵密特朗随第23殖民步兵团立即开赴赫赫有名的马奇诺防线。

出乎密特朗的意料，他竟投入一场“奇怪的战争”。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宣而不战。且不说巴黎依旧歌舞升平，一派太平景象，连前线也宁静如常，不闻枪炮声。马奇诺防线与德国境内的齐格菲防线遥遥相望，两军互不交锋。法国大兵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的地下太平世界里，听音乐，看小说，写情书，睡大觉，顶多是在阵地前挖反坦克壕。密特朗在家书中开玩笑说：这是一次“公费旅行”，让他见识见识“对面的邻居”。他埋怨整天听老一套的通俗音乐，既没有贝多芬，也没有莫扎特。

不过，毕竟身在前沿，战争的阴影一直在他心头索回。他憎恨战争。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战争是愚蠢的、可怕的事情。战争就是毁灭生命，破坏幸福，战争就是退化……但愿野蛮人将被消灭；文明人将生存下去，这就算是我唯一的遗愿。”“为了我自己并不信奉的价值去送死，我将感到苦恼。我决意活下去，如果这是上帝的安排。”

1940年5月10日拂晓，希特勒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入侵荷兰、比利时，终于打破了“西线无战事”的平静局面。接着，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色当要塞发动进攻。法军总司令部墨守成规，昏聩无能，指挥连连失误，德军长驱直入。

密特朗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凡尔登附近有名的304高地上。敌军的炸弹、炮弹不断倾泻在阵地上。在轰炸和炮击的间歇，密特朗匆匆写上几行家书：“要是我受伤，请通知玛丽一路易丝……又来了一两架敌机，我只好搁笔了。飞机是很可怕的武器，我正在挖一个小小的掩体。但愿明天我还活着。”

6月14日，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不设防城市”巴黎。同一天，一颗炮弹在密特朗身边开花，他右肋被弹片击中（弹片很深，一直未能取出），身负重伤，顿时昏迷过去，倒在血泊之中。战友们把他放在一辆手推车上，随着部队和难民一起后撤。遇上敌机轰炸、扫射，周围的人纷纷往路旁的沟壑、树丛里隐蔽，他却躺在车上动弹不得，只好仰望青天，祈求上帝保佑。密特朗最后辗转来到布鲁耶雷。

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东部法德边境修筑的防御阵地体系。因在陆军部长马奇诺任内开始兴建，故名。1929年始建，1934年基本建成。

他热恋中的未婚妻。请参见本章《照片缘与不了情》一节。

18日，德国军队来了，把所有伤员都送往距德国边境不远的吕内维尔的一所医院。密特朗向护士让娜·迪雷吐露：“我要离开这里。我要逃跑。”另一个伤员打算同他一起逃跑。然而，正当两人紧张地进行准备时，德国人突然将伤员全部装上运载牲口的车皮送往德国，逃跑计划落空了。密特朗懊丧地说：“我是一个不光彩的军队里的一名战败的士兵。我痛恨所有使法国落到这般地步的人——那些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我经历了这场骗人的战争……我所见到的濒临灭亡的第三共和国教育了我，使我懂得这个共和国既不值得热爱，也无任何希望。”

6月16日晚，雷诺内阁倒台，法国主和派代表人物贝当元帅出任总理，次日宣布“战斗必须停止”，向德国求和。短短35天时间，法国便猝然溃败，惨遭沦亡。

在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走英国的戴高乐将军18日在伦敦电台发出继续抗德的号召：“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听到这次讲话的法国人并不多。当时，有200万士兵在战场上，有五六百万难民在颠沛流离中，无法收听广播。这一天，密特朗躺在手推车上，在战乱中转移，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没有听到戴高乐的声音。在被押送到德国战俘营之前，他才从一名难友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在伦敦发表讲话，不承认失败。那人还说：“戴高乐这个名字多响亮，同美好的历史倒很相称。”密特朗也有同感，但他“茫然不知戴高乐究竟预示着什么”。

6月24日，贝当政府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战俘们满以为这下可以遣返回家了。殊不知，根据停战协定，150余万战俘（占法国男性劳动人口的1/3）仍将被关押在德国。密特朗随同大批战俘被押送到德国中部卡塞尔附近的9A战俘营。这段战俘生活是他终生难忘的。3万名战俘被胡乱圈禁在一个小山坡上，头顶苍天，露宿山野。密特朗的名字消失了，变成了21716号。德国人只在每天中午送来一些菜汤和黑面包。饥肠辘辘的战俘们像饿狼一样猛扑上去，你抢我夺。争吵殴斗不断发生。谁会抢，谁就能吃饱喝足。抢不上的，只好喝几口剩下的混浊的汤水，聊以充饥。战俘们犹如丛林中厮杀的野兽，强者为王。不过，这种混乱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几名代表，在难友们目光的监督下，把每一块黑面包几乎是按毫米计算，均匀地切成六片，平均分配。这真是罕见的富有教益的场面。密特朗每一忆及，总爱说：“我算是亲眼目睹卢梭的社会契约诞生了。”

10月，密特朗被转运到德国东部图林根附近沙拉的9C战俘营，编入由

1852年拿破仑三世恢复君主政体，建立第二帝国。1870年9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第二帝国覆亡，第三共和国诞生。1940年6月贝当向德国投降，7月废除1875年宪法，第三共和国告终。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是人民主权思想。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就是由全体公民根据自身利益所制定的社会契约。

250名战俘组成的劳动队，其中大多是教师、神父、律师、学生，因而有“知识分子突击队”之称，主要劳役是捆干草和稻草、修公路、保养铁路。整个冬天，这支队伍多半被派去修路。这里靠近东欧，离法国很远，冬天比法国冷得多。朔风凛冽，战俘们穿着薄薄的短大衣，脚上缠着布条，默默地服苦役。当队伍穿过城镇时，战俘们无权走只供德国人走的人行道。一路上，有几个人冲出队伍，到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或是去捡德国人嘻笑着扔过来的烟头。密特朗很不以为然，认为有失人的尊严。

求生的欲望，求生的意志，支撑着每一个战俘。难友之间的互助友爱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密特朗一度几乎死去，幸得难友相助，才捡了一条命。他永远不能忘记帕特里斯·佩拉的帮助。“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战俘营了。”佩拉工人出身，曾参加过法共青年组织，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反对佛朗哥。他与密特朗是患难之交，成为终身挚友。

战俘过着非人的生活，肉体横遭折磨，但精神没有被摧垮。密特朗清楚地记得，7月13日，当午夜钟声敲响时，法国国庆节来临了。一种奇特的歌声响彻德国上空：法国战俘引吭高歌《马赛曲》。德国兵的吆喝声、叫骂声全都淹没在这气壮山河的歌声之中。密特朗在《战俘的政治抉择》一书中动情地回顾道：“争吵、怨恨和斤斤计较都烟消云散了。现在只看到法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缅怀祖国的光荣和辉煌，共同向战胜者挑战。德国哨兵们在过道里紧张地来回走动，军官们嚷着叫人住口，但《马赛曲》的歌声越来越嘹亮，这是明天的解放之声。”

战俘营里屈辱的日子是不好熬的。密特朗从被俘的第一天起，就想逃跑。逃跑的念头日夜在他脑海里翻滚。事隔多年后他回忆道：“任何俘虏都渴望自由。但敢于冒险赢得自由的人却不多。我平生干过成败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只有两三件事。头一件就是逃离德国。”

密特朗何以敢于冒险以赢得自由？一是出于个人原因。战争把他同心爱的未婚妻分开，他切盼早日同她重聚，以免夜长梦多。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丧失自由犹如身心交瘁的病痛，使他无法忍受。加之他向往罗曼蒂克的冒险行动，喜欢向不可捉摸的前景迈进。在他看来，逃跑与否不是有无勇气的问题，而是“血液中有无逃跑的因子。而我，我的血液中有这种因子”。

逃跑谈何容易。战俘营距中立国瑞士边境足有620公里。密特朗虽然伤已痊愈，但身体仍十分虚弱，无法承受长途逃亡之苦。经过一个冬天的精心筹划，1941年3月5日清晨，密特朗同难友勒克莱尔神父乘天色朦胧，利用战俘出营劳动的机会逃跑。到晚上集合点名时，德国人才发觉，但两人早已逃之夭夭。两人昼伏夜行，绕开村庄和城镇，冒着寒风雨雪，在荒僻的小路

关于这次逃亡的经过，说法不尽一致。本书参照密特朗身后问世的《未完成的回忆录》一书中的最新材料。

上足足走了 21 个夜晚，好不容易到达离瑞士边境仅 4 公里的埃格谢村，胜利在望。可是，勒克莱尔神父病得不轻，密特朗也已精疲力竭，加之干粮已尽，赶路心切，于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天已破晓，两人仍继续前进，穿越面前的村庄。这是个星期天，路经教堂附近，遇到一些去望弥撒的善男信女。两人在十字路口又认错了路，于是折回教堂方向。此时，村民们越来越多，见他们衣衫褴褛、神情异常，就起了疑心。男男女女手持棍棒，一面叫嚷，一面紧追而来。勒克莱尔神父叫喊道：“快跑！边界近在咫尺，还有希望。”他咬着牙使劲往前跑，密特朗也撒腿就跑。但身强力壮的村民们很快就追上了，经过 6 个月精心策划的冒险行动顿时落空了。两人被关押在市政府的一个阁楼里。市长是个好心人，见两人又累又饿，便差他的妹妹送来热汤给他们充饥。一个拿着手枪、佩戴纳粹臂章的大汉负责看守。此人凶相毕露，不时咒骂他们。不多久，从外地派来的德国宪兵把他们押回俘虏营。

事后，有个小插曲。1947 年，密特朗作为法国政府退伍军人部长前往德国巴登—巴登出席军事检阅，他顺便重返这座村庄。村民们列队在市政府前欢迎他。市政府成员一一同他见面。事有凑巧，新任市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看守密特朗的那个态度蛮横的大汉。对方顿时颇为尴尬。密特朗则大惑不解：纳粹分子摇身一变当了市长，而好心的老市长却遭到清洗。

1980 年，密特朗由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陪同，沿第一次逃跑路线驱车旧地重游。终点就是这个坐落在瑞士边境的小村庄。村里少不得欢迎一番。密特朗从人群中认出当年偷偷来到阁楼给他送书送报的两位姑娘，这时已两鬓成霜了。战争年代的异国友情是多么珍贵啊！一切感慨尽在不言之中。

第一次逃跑功亏一篑，密特朗并不灰心。不过，从此德国兵对他严加看管，不让外出劳动，而俘虏营戒备森严，围着双层铁丝网，还有望哨、探照灯和巡逻队，真可谓插翅难飞。密特朗毫不气馁，悉心寻找突破口。8 个月之后，1941 年 11 月 28 日，他再次出逃。夜深了，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探照灯光不时掠过高达 4 米的铁丝网。密特朗事先探明，有一处铁丝网近旁新近安装的变压器正好遮住探照灯的光柱。于是，趁两次巡逻的间隙，他和两个难友飞快地藏到变压器的阴影里，架好木板，爬越铁丝网。警报响了，机枪声大作，探照灯把地面照得通亮。德国兵驾驶摩托车，带着警犬，四出追捕。一个战俘很快被抓了回去，另一个失去联系。密特朗藏在桥洞下，水深过膝，连狗也嗅不列他的踪迹，总算躲过了追赶的德国兵。

黎明时，他伪装成意大利工人，登上运载劳工的火车，逃到摩泽尔省首府梅斯。但他仍在德国境内，因为自 1940 年法国战败后，地处洛林大区内的摩泽尔省被划为第三帝国的领土。密特朗几次试图偷越边境，都因遇上德国巡逻队未果，只得析回梅斯。由于天寒地冻，密特朗不想再在野地露宿，决定冒险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投宿。多少个月来，他第一次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睡了个好觉。不料，旅馆老板告发了他。德国警察把正在梦乡中的密特

朗抓走，关进离梅斯不远的布莱战俘营。

这是一座专门关押不服管教的战俘的集中营，德国人称之为“惯犯之家”。在这里，战俘们一个个都换上印有特大“战俘”字样的衣服。密特朗说：“我们像是化了装的演员。”他们只有一个前途：不久被运往波兰。密特朗知道，一旦去了波兰，就再也无法逃跑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作最后一次尝试。

1941年12月10日凌晨，天色昏暗，大雾迷漫。密特朗混在一批劳工队伍里，冲出营地大门，飞奔向前。德国兵紧追不舍。子弹在他耳边嗖嗖作响。他急中生智，躲到附近一家医院里。好心的护士们把他隐藏起来。但医院非久留之地，因为德国医务长是个坏家伙。护士们知道附近有位卖报女郎玛丽·巴隆曾经帮助过逃亡的战俘，就把密特朗托付给她。巴隆小姐把他藏了起来。可是她自己也受到盖世太保的注意，不宜久留，于是很快带他去施滕格尔家中暂避。密特朗在这家躲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巴隆小姐同密特朗装作走亲戚的未婚夫妻乘火车前往梅斯。她把密特朗交给一个专门帮助逃亡战俘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埃莱娜修女。密特朗在教堂里同其他两名战俘一起，被送往梅斯车站。地下联络人员把他们偷偷带上开往法国边境的火车。巴隆小姐至今还记得，密特朗上了火车最后说的一句话：“洛林的姑娘们真了不起！”

火车驶离梅斯15公里处，在地下联络员的指点下，密特朗等三人在火车拐弯放慢速度时跳车，趁着夜色朦胧、细雨之际，分头偷越边境，进入德国占领区。密特朗在铁路工人接应下，乘汽车前往南锡。到达南锡后，他给巴隆小姐发了一张明信片：“包裹业已收到。”密特朗同埃莱娜修女领导的地下组织的一位修士接上了头。修士给他一份神职人员的假身份证，并指明南行的路线。

12月16日，密特朗顺利越过德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分界线，安全返回祖国，重新获得自由。

一年多以后，1943年4月，密特朗在分界线附近的一家地方报纸上发表题为《走在通向法国的道路上》的长篇文章，细腻地描述了他踏上祖国半壁河山那一刹那的心情和感受。文章一开头写道：“那天清晨，法国天气晴朗。太阳驱散了浓雾。山谷还没有为南方耀眼的阳光照亮。我忘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劳累与困顿，直奔收容中心。前面还有八公里，那又算得了什么！”回到了“几乎被遗忘了的我的祖国”，“我使劲呼吸祖国的空气，细细聆听同胞用法语谈话；我要凭听觉、视觉和感觉来辨认展现在我面前的祖国”。

1942年元旦刚过，密特朗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阔别数载的故乡雅尔纳克。家人意外团聚，使新年的盛餐格外喜气洋洋。密特朗却一言不发。战

对这次逃跑的经过，有好几种说法。1947年2月27日，密特朗出任退伍军人部长不久，就隐姓埋名前往布莱寻访恩人，表示感谢。本书采用密特朗当年的自述和知情人的回忆。

争和俘虏营的生活似乎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在 1947 年发表的文章中解释道：“此时此刻，自由就是意识到不知有多少话要对自己诉说，结果只好沉默，因为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一切都超乎一个人的想象；还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自由也许就是最后的归宿，说与不说，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一年半的战俘生活是密特朗一生的重大转折。战俘营是个特殊的学校，在那里，他目睹以往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旧日的等级划分消失殆尽，一个新世界、新社会出现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想，我从这伙与世隔绝的战俘身上所学到的东西，比我青少年时代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要多得多。”在铁丝网后面，他生平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

在战俘营里，他知道什么是一无所有，懂得什么是团结友爱，体会到什么是无等级的社会。他在回顾这段终生难忘的生活时说：“我们都穿着一样的战俘服，都干着同样的体力活，都服从德国的纪律。因此，我们可以做乌托邦的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岂不很好吗？……这种集体生活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原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可是我从这种生活中找到乐趣。不过，我思想上震动最大的是，我忽然意识到：在我一度生活过的社会里——战俘营的社会里——天生的智力和体力的等级之分与我在青年时代经历的等级之分全然不同……授勋的等级、文凭的等级、财富的等级，全都毫无价值可言。真正有价值的档次之分在别处。今天整个法国社会的等级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这种等级之分是虚假的。从此，我开始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的社会。”

否定旧的社会，否定旧的价值观，并不等于转向左翼。密特朗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仍然是很反感的，他在为战俘营内部刊物《朝花夕拾》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对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令人肃然起敬或令人不知所云的词儿，谁都觉得腻烦。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如何使一个人不去欺凌另一个人（或者，如何驱使一个人去欺凌另一个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努力改善自我，才能改善社会。”

战俘生活又是通向密特朗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的桥梁。

在战俘营里的那些日子里，密特朗不仅向往个人的自由，而且设想在逃离虎口后建立某种战俘组织。他曾对生死之交的佩拉吐露过：“战争结束之后，政客们得听我们的。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

必须建立某种组织，以期有朝一日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战俘们如果聚集在一个组织里，就会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我们大家都经受过战俘营的艰苦生活的磨炼，我们决心战斗到底。这个组织将策划越狱行动和协调各级破坏活动。一旦越狱成功，我们就建立组织，对吗？”密特朗确实这样做了。战俘组织进而成为他政治上起家的资本。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维希岁月

在战俘营里日夜思念法兰西，而今法兰西已国破山河碎。根据贝当同德国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国被肢解成两部分：占领区和自由区。北部主要工业区、巴黎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由德国占领；经济相对落后的南部和西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实际上听命于德国。军队被解除武装，只保留 10 万“停战军”维持“治安”。

停战协定签订后，贝当政府从波尔多迁往维希。7 月 10 日，法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以 569 票赞成、80 票反对和 17 票弃权授权贝当制定新宪法。国民议会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呼吁：“值此民族危亡的时刻，全国人民都聚集在人人尊敬的贝当元帅周围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去破坏以他的威望所建立起来的举国一致。”次日，贝当宣布成立“法兰西国家”，由他担任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埋葬了存在 70 年之久的第三共和国。前法军总司令魏刚恬不知耻地说：“我没有打败德国人，但我打败了共和国。”

贝当和维希头面人物把法国惨败归咎于议会制共和国，鼓吹“民族革命”，建立比已经崩溃的旧体制“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新秩序”；用“劳动、家庭、祖国”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取代“自由、平等、博爱”，宣称法兰西国家的目的就是“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正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格弗里德所说：“元帅好比一块磁石，他把所有受到第三共和国打击和对该制度不满、不安或者失望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了。”

密特朗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对重返法国后的经历轻轻一笔带过：“回到法国，我成了抵抗战士，内心并无痛苦的斗争。”这句高度概括的话，远不足以反映历史真相。

贝当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宿将，曾以指挥凡尔登战役获胜，威震一时。他在宣布“战斗必须停止”的广播讲话中宣告：“我把我自己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像大多数被 1940 年的溃败弄得不知所措的法国人那样，密特朗认为法国已彻底崩溃，继续对德作战是徒劳无益的。他把贝当当作法国的救星，满以为贝当声誉卓著，只有这位老元帅能顶住德国的非分要求，保障法国人的安全和利益。贝当强烈谴责第三共和国，鼓吹建立新秩序，对此，密特朗在战俘营时就有所闻，并在心头引起某种共鸣，何况维希政府不失为一个根据完全正常的合法程序成立的政府，并且得到美国、苏联等多数国家的外交承认。至于戴高乐，他认为：“从德国看，贝当和戴高乐并不代表两种相互矛盾的政策。”“贝当和戴高乐以各自的方式为法国效劳。”

密特朗的家乡靠近大西洋沿岸，属德国占领区，逃亡战俘自不宜久留，且生计无着，总得找个安身立命的去处。于是，他投奔维希。在维希政府中找个差使谋生，他心安理得。

1942 年 3 月，法弗尔·德蒂埃朗少校要密特朗到他领导的情报处工作。他以神秘的口吻对密特朗说：“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想请您做以假乱真的

工作。”密特朗作为合同雇员，在情报处工作，薪金还不如现在的最低工资，主要是抄抄写写，制作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的卡片。他当时并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停战军”内部的反德秘密情报组织掌握的一个机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不满的情绪：“现在这份工作使我不心为生计发愁。但是，我觉得这总非长久之计。”

3月的一天，他在剧院里头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贝当，心情颇为激动。他在信中描写当时的情景：“我在剧院里见到了元帅。我正好坐在他的包厢对面，我有机会从从容容地仔细端详他。他气度不凡，面孔犹如大理石的雕像。”

1942年4月18日，贝当在德国的压力下，重新召请一度被他清除出政府的皮埃尔·赖伐尔出任总理。赖伐尔是臭名昭著的法奸，他重返政坛后被正式授予“法国内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成了维希政府的首要人物，贝当被架空。从此，维希政权更加明目张胆地奉行卖国求荣的对德“合作”政策。

赖伐尔上台四天后，密特朗提出辞职。不过，他之所以辞职，并非由于反对维希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反对赖伐尔重新上台，而是如他自己所说，仅仅由于工作枯燥乏味，感到自己“毫无用处”，不想再干了。

事实上，他对赖伐尔并不特别反感。他在1942年4月22日给友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德国和俄国无论谁胜谁负，只要我们自己挺得住，别人终将好好对待我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对政府更迭感到担忧是不必要的。赖伐尔肯定决意要使我们摆脱困境。”

我们是否觉得他的方法不好？难道我们真正知道他将采取什么方法吗？只要这种方法能使我们支撑下去，那就是好的。”

密特朗在维希待业期间，同一些从德国逃回的战俘一起，运用在战俘营里学会的制作假证件的本领，为自己伪造身份证、通行证，以便随意出入德国占领区，并为亲友和一些抵抗战士提供假证件，最后发展到向战俘营递送假证件、图章、地图、越狱工具和联络名单，从事营救在押战俘和帮助回国战俘安排生计的活动。这主要是出于战俘对战俘的同情和关怀，是自发的、分散的，还谈不上是有组织的地下抵抗活动。密特朗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志同道合的逃亡回国的战俘一起行动。我们的活动无疑是基于自身的经历。但是，或是出于信念，或是由于亲身感受，对我们来说，亡国是无法忍受的。”“这种活动还谈不上是抵抗活动，但是，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同抵抗人士的活动融合存一起了。”

1942年6月12—15日，由安托万·莫迪等发起，各地战俘小团体的一

赖伐尔曾于1931年1月和1935年6月两度出任总理，是法国绥靖政策的鼻祖，后为维希政府实权人物。1945年10月以叛国罪被处决。

皮埃尔·佩昂：《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88页。

些代表利用圣灵降临节假日，在上阿尔卑斯省的蒙莫尔古堡聚会，酝酿成立某种大规模的战俘组织。6月16日，密特朗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一座十分舒适的15世纪的古堡里成立了一个组织，我认为，这个组织会有辉煌的前程。”与会者后来都成了出色的抵抗战士，有不少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以说是密特朗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开端。

古堡会议后不几天，密特朗经负责安置逃亡战俘的友人让—阿尔贝·鲁塞尔介绍，进入维希政府战俘署工作，任非占领区新闻处长的副手。这使他不时有机会出差到非占领区各地与当地报刊打交道，便于掩护地下活动。他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他在同友人的通信中与道：“看来，我担负着一项有益的宣传使命。战俘署的情况是好的。有几个聪明能干的人物，负责非占领区工作的领导人尤为出色。同他们一道工作，可能会有好结果。”

战俘署署长莫里斯·皮诺是钢铁巨头的儿子，本人也曾是战俘。他拥护贝当，但反对德国。他统管所有官方和私人的战俘安置机构。战俘署总部设在巴黎，在维希设有分署，管辖非占领区，并同贝当办公室保持联系。

战俘问题牵动着法国千万人的心。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子弟亲友不幸当了俘虏。当时回归祖国的战俘约35万人，多半生活无着，流落各地。关押在战俘营的尚有120万人，相当于服役适龄青年的一半。皮诺在各地建立“战俘之家”和战俘“互助中心”，收容和安置战俘。这是明的一手。暗的一手是，听任手下人员在战俘署和红十字会送往德国战俘营的包裹中夹带假证件、越狱工具和现款，组织战俘逃跑，并在战俘营设置情报网。他的部门成了某种营救战俘脱险的组织。皮诺对密特朗颇为赏识，委派他担任阿列省战俘互助中心副主任。

密特朗在战俘署工作，非常贴近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俘。他竭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他在“互助中心”的工作卓有成效。1942年10月15日下午5时，密特朗一生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发生了。贝当接见了阿列省“互助中心”的四名负责人，密特朗也在其内，历时20分钟。密特朗向贝当表示忠诚和敬意，并向贝当汇报了阿列省互助中心为归国战俘募集寒衣的情况。50多年后，贝当接见密特朗的照片公之于众，在法国引起不小的震动。

1942年11月，美国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正酣、法西斯德国在北非和地中海兵力空虚的机会，决定以北非作为它参加对德作战的头一个大规模行动目标。8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在当时由贝当政府管辖的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1月11日，希特勒为防止盟军进而从北非攻取法国南部，命令德意军队开进法国非占领区，10万停战军也被解散。11月26日晚，德军一个装甲师包围地中海主要军港土伦，企图夺取停泊在港内的法国舰队。舰队司令下令将全部舰只（包括31艘水面舰只和12艘潜艇）自行凿沉，以免落入德国之手。至此，所谓“自由区”已不再存在，维希卖国政府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11月13日，赖伐尔以“形势变化”为由解除战俘署署长莫里斯·皮诺的职务，由臭名远扬的法奸安德烈·马松继任。次日，原“自由区”战俘署主要工作人员10余人聚会，决定集体辞职，密特朗也在其内，从而结束了他在维希政府供职9个月的历史。12天后，他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皮诺被马松所取代，‘这是一桩相当重大的事件，其中原由你不难想见。至于我，我是同皮诺共进退的，我已经辞职。我对未来毫不担心。相反，在某些方面，未来将是美好的’。他不便明说：他的新生活开始了。”

不过，密特朗和他的战俘署的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反对德国占领法国南部，反对赖伐尔，但不反对贝当。密特朗辞职后，仍同维希政权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当时，有的抵抗人士怀疑密特朗脚踏两条船。有些瓜葛甚至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招致种种非议。

头一桩是勋章事件。

1943年，维希政府授予密特朗“法兰克战斧”勋章。这是维希的最高勋章。“法兰克战斧”勋章得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战前参加过符合‘民族革命’原则的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是“战争爆发以来，积极拥护贝当元帅的事业和爱戴元帅本人”；三是“军职或文职人员服务成绩显著者”。实际上，条件并不那么严格。维希政府为了拉拢军政人员，授勋范围甚广。几乎战俘署的所有人员都获得过这种勋章。“法兰克战斧”勋章得主要有两人推荐。密特朗的推荐人，一个是维希政府新闻局长西蒙·阿尔贝洛；另一个是贝当办公室特派员、维希官方刊物《法兰西》主编加布里埃尔·让泰。

过去，有些传记对授勋事说得比较轻巧，说密特朗自己并未设法取得这枚勋章，只是根据抵抗人士的意见没有拒绝接受。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推荐人之一西蒙·阿尔贝洛于1965年撰文，为此事作证：“有一天，他（密特朗）请我和加布里埃尔·让泰为他申请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结果获得授勋委员会一致通过。”他认为，当时密特朗虽已从事地下抵抗活动，但仍敬仰贝当，深信贝当为了祖国不惜自我牺牲。

对密特朗的授勋决定是在1943年2、3月间作出的。授勋仪式则在同年11月举行，当时密特朗已秘密前往伦敦，未出席授勋仪式，但事后还是得到这枚勋章，并不时佩戴过。

密特朗接受“法兰克战斧”勋章，犹如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战后长时期内受到左右翼夹攻。

早在1945年4月全国战俘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共产党人皮埃尔·韦里埃就对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密特朗进行过猛烈的攻击：“我看到密特朗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要是取消一位在维希时期被授予贝当元帅的‘法兰克战斧’勋章的难友的道义资格，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密特朗先生可能自有道理，但是，我要求有类似情况的每个人都应听候清洗委员会处理。”密特朗没有正面回答。他巧妙地反驳道：“我曾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负责战俘事务

的秘书长。他必定是个善于识别人的人，因为他是抵抗运动的创始人。”这回，戴高乐成了密特朗的保护伞。

1948年11月14日，法共《人道报星期日报》点名指责当时任新闻国务秘书的密特朗：“这位国务秘书是法国最早的维希分子之一，因此，他被列入那份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的达官贵人的名单。”1954年12月3日，戴高乐派议员雷蒙·德罗纳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指着坐在部长席上的内政部长密特朗高声嚷道：“内政部长先生，我根本不信任您，这点您是清楚的……您以伟大的共和人士自居，可是您历史上太反复无常，无法使人产生信任感……我不想指责您先后佩戴过‘百合花徽’和‘法兰克战斧’勋章。”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密特朗作为左翼头面人物进行反戴活动。社会党涅夫勒省委机关报《中部社会进步报》讥讽他说：“从‘法兰克战斧’勋章到极左，可谓历尽艰辛。‘不忠实的密特朗’真是卑鄙之至。传奇之说虽已不攻自破，但此人仍然是个危险分子。”1965年密特朗作为左翼共同候选人竞选总统时，左翼内部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吉勒·马蒂内曾到处散发揭露密特朗被授予“法兰克战斧”勋章的材料，以败坏他的声誉。1972年，一些参加过“自由法国”的戴高乐派议员发表公报，指责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在纳粹占领时期曾参与维希政府的活动，直至荣获‘法兰克战斧’勋章。这是为了报偿他的功劳而授予他的一枚最高勋章”。

对诸如此类的攻讦，密特朗长期置之不理。直到1972年，他才在对法国《发展》月刊记者的谈话中作了一点解释：“对于像我这样站在另一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绝妙的掩护，是‘互助中心’这种掩护的补充。我们大家都说：‘法兰克战斧’勋章还是要的。”

另一件事，是密特朗曾为维希官方刊物撰文，为贝当大事宣扬的“民族革命”张目。

密特朗酷爱文学，喜好写作。从大学生公寓、战俘营的小报一直到社会上的报刊，他都经常投稿。在维希，他也不甘寂寞。通过同乡友人关系，他结识了维希政权官方刊物《新国家杂志：法兰西》主编让泰。这家刊物是以鼓吹贝当的“民族革命”为宗旨的。密特朗于1942年12月和1943年3月在该刊发表两篇文章。

他的大名同贝当元帅和维希头面人物赫然并列。这也成为日后政敌们指责密特朗与维希政权沆瀣一气的把柄。

两篇文章本身并无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文章的情调和某些论点同贝当散布的“民族革命”和“新秩序”不乏相通之处。

头一篇题为《图林根之行》，详细描写从吕内维尔一路辗转押运至图林根战俘营的苦难历程，悲愤、伤感之余，发了一通议论。

密特朗不仅把法国的溃败归咎于第三共和国“软弱无力的体制、毫不中

“百合花徽”系法国王朝的标志。

用的人物和形同虚设的政治机构”，而且一直追溯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抨击“150 年积累的错误”。在他看来，受苦受难的战俘们走过的漫长的通往德国战俘营的道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法国年青一代乃是“150 年积累的错误的继承者”和受害者。

贝当、戴高乐和密特朗都一再谴责第三共和国，把 1940 年法国的溃败归咎于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无能。但三者的出发点和目的性是不完全相同的。贝当否定和摧毁第三共和国，是为建立所谓“新秩序”服务的：“我们所遭受的重大灾难不能容许应对这种灾难负责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戴高乐严厉谴责第三共和国以议会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斥之为徒劳无益的政治游戏和毫无权威可言的党派政治，是为他日后力争建立以总统权力为中心的新政治体制服务的。而密特朗抨击第三共和国以至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弊端，主要是莫名其妙地遭到惨败和备受屈辱的战俘的痛楚和愤恨的流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亲眼目睹奄奄一息的第三共和国，我认识到，第三共和国没有任何可爱之处，而且无可救药……我早就想，它总有一天会自行崩溃……”不过，他在维希官方刊物上发表这种议论，客观上附和了维希政权竭力鼓吹的“民族革命”和“新秩序”。

1943 年 3 月，密特朗在《法兰西》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奥拉塔尔的木匠》的散文，记述他在沙拉战俘营时为一个德国木匠帮工时的对话。此人十分崇拜拿破仑，向密特朗出示他珍藏多年的拿破仑和约瑟芬的画像。他和密特朗一样，也在凡尔登负过伤，不过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拿破仑和凡尔登在我们两人之间凝成一条红线，是使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线，而不是使两国人民分离的线。”

法国解放后的新闻法规定，凡在 1942 年 11 月德军进入非占领区后继续出版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不问其内容如何，都将被视为同敌人合作。密特朗的政敌运用这一条攻击他。不过，这是很牵强的，因为这时密特朗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有的传记则说成是密特朗有意以此为其地下活动打掩护。这恐怕并非密特朗的本意。且看密特朗本人如何看待这件事。

密特朗不否认他同前“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成员让泰的关系，也不否认他为《法兰西》杂志撰稿有考虑欠周之处。“是的，我在维希认识他……他为人和善，可以说，他抓住我的弱点：有点好虚荣。我渴望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他是《新国家杂志：法兰西》的主编。我既没有考虑这家杂志所宣扬的思想，也没有考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是些什么人，而这些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这家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我不认为有什么罪过。也许，我本该小心谨慎才是。”

这篇文章已收入密特朗《政论集》第 1 卷。

密特朗 1994 年 5 月 26 日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作者皮埃尔·佩昂的谈话，见该书第 185 页。

密特朗在转入地下之后，仍申请和接受“法兰克战斧”勋章，又不止一次地在维希官方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两件事说明，密特朗在从事抵抗活动的同时，与维希政权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同贝当周围的人续有来往；另一方面，即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同贝当宣扬的“民族革命”和“新秩序”的思想体系尚有共鸣，对贝当本人既敬仰又同情。这在当年的法国并不奇怪，不少人既是抗德战士、又是贝当分子，他们认定，一切坏事都是赖伐尔干的，贝当则无可厚非。密特朗正是许多法国人中间的一个。1951年贝当病死狱中后，密特朗不是每年还差人去贝当墓前献花吗？

出生入死

1940年6月戴高乐只身出走伦敦时，根本没有想到在法国本土还有进行抵抗的可能。他在“六一八”号召中高举“抵抗”的旗帜，但并没有在本土组织抵抗运动的想法。本土抵抗运动是在自发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贝当投降不久，法国本土就出现爱国志士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抵抗活动。后来，抵抗的火焰越烧越旺，在斗争中逐渐发展成地区性的抵抗组织，有不同党派、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参加。在贝当政府管辖的南部（非占领区），最早的抵抗组织是职业军官亨利·弗雷内上尉于1940年夏创建的“自由”运动。1941年底、1942年初，这个组织同皮社尔（后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领导的天主教民主人士的“真理”运动合并，成为南部最大的抵抗组织之一——“战斗”。1940年11月建立的“法国自由”（后改名为“狙击兵”）到1942年也发展成为南部最大的抵抗组织之一，有很多知名的教授和记者参加其领导机构。南部另一个较大的抵抗组织——“解放”，是在1942年由一些分散的组织合并而成的，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内政委员的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等著名人士以及社会党、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会人士。1942年，贝当政府替德国大量强征劳力，成立“强迫劳动局”，愈来愈多的法国青壮年被“逼上梁山”，逃入深山老林，成了“马基”游击队。北部（占领区）抵抗组织规模较小，更为分散，斗争也更为残酷。最早的抵抗组织大致是在1940年11—12月间出现的。1940年11月由社会党和总工会人士建立的“解放—北方”，后来成为扩及整个北部地区的重要抵抗组织。1940年12月由一个军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小组合并而成的“军民组织”，随后发展成为在北部各省都有分支的抵抗组织。

法共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抵抗运动较晚。很多党员和基层骨干早就以个人身份进行了抵抗活动，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法共才全力以赴地投入抵抗运动的组织工作。“民族阵线”广泛吸收各阶层、各种政治倾向的爱国抗德人士参加，并包括法共领导的“义勇军和游击队”这一地下武装组织。“民族阵线”成为唯一地跨南北两区、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抵抗组织。

戴高乐先后分别统一南部和北部地区的抵抗组织，并进而于1943年5月成立包括全国各地抵抗组织的“全国抵抗委员会”，把抵抗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轨道。

密特朗是逐步走上抵抗运动的道路的。他真正投入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是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地区之后，为时较晚。他主要通过战俘组织进行抵抗活动，活动范围在法国中、南部，特别是巴黎、维希、里昂等地。

1942年10月，蒙莫尔古堡与会者创建了“战俘抵抗运动”，由安托万·莫迪、德蒙儒瓦和密特朗组成指导委员会。这一行动得到战俘署署长皮诺的支

持。密特朗在 1943 年 11 月 26 日给伦敦的报告中，对该组织的性质和宗旨作了说明：（一）防止德国警察追捕逃回法国的战俘；（二）互助共济，安排前战俘重新就业；（三）帮助尚被扣押的难友逃离德国；（四）竭尽全力同占领者作斗争。实际上，创始人对前三项是一致同意的，第四项一开始并未提上活动日程。“战俘抵抗运动”初创时，只是搭起架子，组织松散，成员仅数百人，还算不上是一个以对德斗争为己任的真正的抵抗组织。

1943 年 2 月，蒙莫尔古堡聚会决定扩大“战俘抵抗运动”，吸收其他战俘抵抗团体，使之成为全国性的战俘组织。会议还改组了领导机构，成立了“战俘斗争全国委员会”，密特朗为主要成员之一。后来，人们惯于称呼这个改称为“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的抵抗组织为“皮诺—密特朗”地下网。

在如何进行抵抗活动的问题上，与会者意见分歧。以戴高乐的外甥米歇尔·加约为首的一派，主张把这个组织的活动纳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轨道；而以密特朗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开展独立的斗争，迎接法国解放。这就为日后密特朗与戴高乐的冲突埋下了引线。

此外，密特朗同战俘署辞职人员聚会，商议展开反对“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斗争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少数人员仍回马松控制的战俘署工作，作为内线；加强各战俘“互助中心”的独立性；开展情报和破坏活动。密特朗成为辞职人员同“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的联系的桥梁。

密特朗的地下活动不局限于“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的范围，而是想方设法同其他有影响的抵抗组织建立联系，特别是同“至队抵抗组织”挂钩。

德军进入“非占领区”后，“停战军”解散，部分人员转入地下，建立了以弗雷尔将军为首的“军队抵抗组织”。此前，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在“停战军”情报部门协助下，于 1942 年 4 月从德国越狱逃往瑞士，希特勒德国悬赏 10 万马克奖金捉拿。此人军阶高于戴高乐，在军队中颇有声望，且以无政治野心著称，马上被美国人看中。美国与吉罗商定：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吉罗号召维希政府北非驻军停火，其后由他出面主持北非局面。美英登陆北非前夕，按照预定计划，一艘英国潜艇将吉罗从法国南部海岸接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待命。盟军在北非站住脚跟后，吉罗出任法军总司令。12 月 24 日，美国扶植的北非高级专员、原维希政府外交部长、海军上将达尔朗被刺殒命后，吉罗出任北非高级专员兼法军总司令。戴高乐被美国撇在一边。吉罗企图以“停战军”军官为骨干培植一支本土抵抗部队，以期来日配合他所掌握的海外法国部队，将德国占领军赶出法国。“军队抵抗组织”以法国海外部队的前锋为己任，认定吉罗将军为唯一首领，决意为吉罗效劳。1943 年 1、2 月间，皮诺和密特朗同亲吉罗的原“停战军”将领和高级军官接上头，并表示他们所掌握的战俘组织愿为“军队抵抗组织”效力。从此，密特朗就同吉罗这条线搭上了关系。

密特朗多次同包括弗雷尔将军在内的“军队抵抗组织”的高级军官会面，以确定该组织同“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的合作方式和具体办法。1943 年 2 月

底，勒热纳少校携带吉罗手令从阿尔及尔潜回法国，为密特朗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军队抵抗组织”决定负担密特朗及其工作班子的全部活动经费，并吸收他为“军队抵抗组织”的固走成员，这在战俘抵抗团体领导人中还是第一个，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密特朗的地位。随后，“皮诺—密特朗地下网”同“军队抵抗组织”进一步实行有机合作，参与后者的某些军事行动。“军队抵抗组织”的“行动处”（隶属吉罗情报机构）把密特朗看作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当时，法国南部地区存在着另一支地下武装组织，即由南方三个主要抵抗组织——“战斗”、“解放”和“狙击兵”所属军事组织合并而成的“秘密军”，由戴高乐委派的德莱斯特兰将军任司令。“皮诺—密特朗地下网”的某些领导人主张加入“秘密军”，密特朗坚决反对：“‘秘密军’是倾向戴高乐的，是接受伦敦的命令的。我们的组织应当保持独立性，不然，宁可倾向吉罗。”

“皮诺—密特朗地下网”不光抓“军队抵抗组织”这一头，而且多方伸出触角。皮诺因曾在维希政府担任要职，有时不便出面联系，往往由密特朗代他行事。从此，密特朗就以前战俘署署长的替身的身份广泛开展同其他抵抗组织的联系，身价百倍。

1943年3月，密特朗同法国南部三大抵抗组织合并组成的“统一抵抗运动”领导人亨利·弗雷内秘密会面，谈话比较投机。密特朗认为，“弗雷内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弗雷内对密特朗印象不错，认为是个决意战斗的年轻人。他在回忆录《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中写道，“此人聪明而有教养。身材瘦削，穿著讲究，目光炯炯。”只是密特朗的微笑令他不安，觉得他城府很深。密特朗向他说明开展战俘抵抗活动的基本考虑：“我利用维希政府设置的机构如战俘署、‘战俘之家’和战俘团体同逃回本土和遣返回国的战俘接触，将他们纳入地下抵抗活动的轨道，吸收这些人来扩大现存的战俘抵抗组织。”弗雷内听了很感兴趣，赞同这种做法。

·弗雷内知道密特朗与另立门户的、戴高乐的外甥加约不和，他本人倒倾向于密特朗。6月底，弗雷内分别约请密特朗和加约参加“统一抵抗运动”指导委员会会议，希望促使两人和解，推动各自领导的战俘抵抗组织紧密合作。加约大骂密特朗与维希政权勾结，会见不欢而散。在弗雷内影响下，指导委员会倾向于支持密特朗。这样，加约只有戴高乐这张牌可打了。不久，他离开本土前往阿尔及尔，向他舅舅告密特朗的状。

从伦敦到阿尔及尔，加约到处散布说，密特朗“同维希仍保持着联系。他的手下人都以吉罗分子自居……密特朗表示，他是反盟国的，甚至是反戴高乐的……他一直想以吉罗将军为后台搞军事斗争，同时决心拒绝同戴高乐分子进行任何合作。”不过，这些话倒不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

到1943年中，密特朗既同贝当周围的人建立了联系并在战俘署布置了内线，又同国内主要抵抗组织挂上钩，特别同吉罗倾向的“军队秘密组织”紧

密合作，在战俘抵抗组织中声望剧增。“皮诺—密特朗地下网”成员虽视皮诺为当然首领，但皮诺本人宁愿退居幕后，密特朗俨然成为第一把手。

这个地下网很快发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在 52 个省建立了组织，同德国境内 20 个战俘营保持联系。密特朗还搜罗逃回国内的战俘，编成好多准军事小组。他还掌握一个有效的情报网。法国南部主要抵抗组织之一“战斗”的负责人之一、密特朗的老同学皮埃尔·德贝努维尔说过：“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德国的战俘营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情报网。多亏了战俘，我们才获得有关边界那边动态的情报，有时是一些具有决走意义的情报。”

从 1943 年 2、3 月间开始，密特朗隐姓埋名，过起东躲西藏的地下斗争生活。他不断改换姓名，用过莫尔朗、皮尔贡、莫尼埃、拉罗什、弗朗索瓦上尉、阿尔诺、阿尔贝等等化名。最常用的是莫尔朗，这是借用一个巴黎地铁站的名称。他年纪轻轻（才 26 岁）就蓄了两撮小胡子，显得大了好几岁。他不仅经常更名换姓，而且不断变更职业。他的一位战友还记得，他化装成画商模样，手臂下面夹着几幅油画到处奔走。

1984 年 6 月，密特朗同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在巴黎街头散步时，谈及抵抗运动时期改名换姓的逸事。“我用过 36 个假名。莫尔朗这个假名是人们所熟知的。我在伦敦时，自由法国给我起的名字是莫尼埃。战后我至少找到 40 张假身份证。我填的出生地都是迪埃普，因为那里的户籍档案在轰炸中已被付之一炬，无案可查。有一段时间，我冒名比斯利，此人早已过世。这些假名都是随手捡来的。我是个制作假身份证的能手，可说是到了真伪莫辨的地步。”

密特朗喜欢这种新生活，尽管时时面临艰难险阻。他在家信中隐约有所流露：“我过着一种艰难的，也许是危险的生活。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生活。我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我喜欢这种生活。结局会如何呢？我有预感，但我并不害怕。在完结之前，我将会完成我想做的大部分事情。未来的年月将是富有成果的，不会两手空空。能维持多久？那无关紧要。你我都认为，生命不是以活多久来衡量的。”

1943 年 7 月 10 日，密特朗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庭广众之中采取了头一个公开的抵抗行动，赢得了“勇敢的爱国者”的名声，在本土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

这天，战俘署新任署长安德烈·马松在巴黎召开战俘运动全国大会。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法兰西国家”的财政部长、农业部长等出席。从全国各地前来与会的 3500 名代表聚集在瓦格朗大厅。密特朗拿着别人的请帖溜进会场。会场周围的街道上警察密布；“战俘纠察队”人员不停地在会场内来回走动，严密监视。

赖伐尔厚颜无耻地宣称：“德国向法国伸出援助之手，让法国走上复兴之路，这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要求法国人“为对德友好合作政策作出牺牲”。马松紧跟着大放厥词，宣扬同法西斯德国“合作”。当他谴责“戴高乐叛国

和吉罗变节”时，忽然一个人站在椅子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事实！你在撒谎！战俘们决不会跟你走”。全场先是惊讶不已，继而议论纷纷，掌声四起。密特朗继续厉声怒斥道：“我们也决不同意你们所谓‘替换’的可耻交易。这无异于把至今被扣押在德国的战友当作讹诈的筹码，来为流放法国人打掩护。”这个人就是密特朗。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台上的维希要人一时目瞪口呆。马松抓起麦克风嚷道：“我要把你揪到贝当元帅和赖伐尔那里去！”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会场乱作一团，会议被迫中断。密特朗在几位朋友保护下离开会场。两旁不知所措的警察木然不动，密特朗扬长而去。“战斗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在伦敦电台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赞扬密特朗是“勇敢的爱国者”，敢于在巴黎的心脏向卖国贼公开挑战，发扬了“真正的战俘精神”。

事后，密特朗并未受到维希当局的追究。倒是贝当的助手利用这一事件向赖伐尔施压，要他撤换马松。在贝当和赖伐尔的手下要员反复会商后，马松于7月15日被迫辞职。贝当秘书处建议让密特朗接替马松。据知情人回忆，密特朗一度动心，最后经地下组织讨论，认为此时出任战俘署署长不妥。事隔多年后，密特朗被问及此事，起先他一口否认。经过一番思索，他不排除贝当的助手曾属意于他。

1943年7月13日瓦格朗大厅事件后一星期，密特朗在家信中流露出踌躇满志的心情和未来的雄心壮志：“我很有见地，很有预见。我有一种感觉，在风云变幻中，我每次都觉得看得很准。我只能作为整体来热爱人和对人施加影响。对每个人的细节，我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会使我目光短浅，只顾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但是，如果我把目光放远些，看到一群人乃至一个国家的人民，我就能发现他们的真谛，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力量。事情就是这样。不过，这还很不完全，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伟大的人物必须爱每个人，并且从这种友爱中汲取榜样和领导的品德……我要成为领袖，只能使用权术或恐怖手段，或者借助于无情的地下网。”

密特朗在抵抗运动中开始冒尖，成为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黑名单中的人物。他时时面临着遭搜捕的危险。

1943年11月初，盖世太保发现了“皮诺—密特朗地下网”伪造证件的场所，先后有五人被捕。这是地下网第一次遭到破坏。盖世太保顺藤摸瓜，很快找到密特朗在维希的住所——国民路20号。11月10日凌晨，德国秘密警察破门而入。睡在密特朗床上的却是另一个人（里昂地区负责人波尔·皮尔旺）。原来密特朗去巴黎未回。皮尔旺和房东被捕。当时作贮藏室用的小房间里还睡着密特朗的秘书吉内特·卡亚尔小姐，她躲在壁柜里没有被发现。“皮诺—密特朗地下网”领导成员之一、密特朗的战俘营难友让·米尼埃则

维希政府强行征调劳工去德国，以三名劳工换回一名战俘。

皮埃尔·佩昂：《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第322—323页。

从二楼跳窗逃跑。秘密警察离去后，卡亚尔小姐和米尼埃赶紧组织一些可靠的人在住宅周围放哨，免得别的地下人员自投罗网，特别是不能让预定那天将从巴黎返回维希的密特朗进门。

在维希火车站，一边是德国盖世太保等着密特朗到来；另一边是密特朗的几位朋友前来接应，其中有“军队抵抗组织”领导成员普菲斯特上校的夫人。盖世太保死盯着下车的旅客；抵抗人员则装作旅客疾步登上火车，分头进车厢找密特朗。密特朗刚要跨下车门，迎面碰上普菲斯特上校夫人。她连忙一把将他推回车厢，上气不接下气他说：“别下车！别下车！盖世太保要抓您。”密特朗赶紧回到座位上，直奔克莱蒙费朗，才得以幸免。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国民路 20 号住所。

盖世太保严刑审问皮尔旺和房东，主要是问“莫尔朗”的下落。两人坚贞不屈，不吐真情，被流放到德国，未见生还。密特朗知道德国人是冲着他来的，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从此，维希这条线断了，密特朗越来越难以用公开身份作掩护，只好更多转入地下活动。日后还有更加惊险的场面在等待着他。

密特朗与七颗星

在法国抵抗人士中，会见过贝当、吉罗和戴高乐这三个主要人物的为数不多。年轻的密特朗却是其中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复杂的经历。

吉罗作为北非高级专员和法军总司令，北非军政大权在握，一时身价百倍；戴高乐栖居伦敦，在北非并无根底，且被美国撇在一边，处境窘迫。在与戴高乐的较量中，吉罗在各方面都拥有不少优越条件。吉罗本人一直反德，军阶又高于戴高乐（吉罗是五星上将而戴高乐只是二星准将），维希 10 万停战军官兵多数倾向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比戴高乐惨淡经营数年的兵力多得多。特别是吉罗有美国撑腰，并得到英同一定程度的支持以及苏联的认可。

然而，戴高乐在政治上、道义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六一八”号召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和声望。这一点戴高乐充分意识到并加以利用。他曾向劝他接受吉罗领导的人说：“如果吉罗 1940 年 6 月 18 日就在北非负起责任，拒绝贝当和魏刚的命令而把战争打下去的话，我本来是可以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是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其次，戴高乐有“自由法国”作后盾并得到国内抵抗运动的支持。由法国本土各大抵抗组织组成的“全国抵抗委员会”一致决议，承认戴高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

在吉罗和戴高乐之间，密特朗一开始就选择了吉罗。密特朗本人和“皮诺—密特朗地下网”同吉罗影响下的“军队抵抗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后者向地下网源源不断地提供经费和进行破坏活动的装备、器材，帮助训练从事情报和军事行动的人员。两个组织往往共同商定行动计划，由地下网负责实施。地下网将获取的情报送交“军队抵抗组织”。

戴高乐的外甥加约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甚至断言：“密特朗的战俘组织就是吉罗分子的组织”。

密特朗同戴高乐从来是格格不入。如果说，密特朗一生中有什么贯彻始终的东西，那就是反戴高乐，反戴高乐主义。他自己说得最清楚不过了：

“我从来不是戴高乐分子……自由法国的领袖的独特的形象吸引了我，但又使我寒心。我认为，我们在自己国土进行的、无时无刻不面临酷刑和死亡的危险的抵抗运动，与国外的抵抗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我不承认后者具有它自封的优越地位。我不认为抵抗一词适用于在伦敦和阿尔及尔进行的斗争，那不过是传统战争的插曲……国内抵抗运动并非出自戴高乐；抵抗运动的发展往往同他毫不相干。”

密特朗对戴高乐把手伸向国内抵抗运动，千方百计把国内抵抗运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统一起来并将其纳入“自由法国”的轨道，尤为切齿痛恨。他说过，“在我看来，把自主权拱手让与这位伙伴（指戴高乐），那是最可耻

的了。”戴高乐十分巧妙地“吞并”本土的抵抗运动。“这表明，自由法国的领袖如何把在黑暗中战斗的地下抵抗战士用生命、苦难和尊严积累起来的资本据为己有。……在搞掉所有竞争者之后，戴高乐主义得以把独家占有的爱国主义变成财源茂盛的资本，长时期内受用不尽。”

不过，玩弄政治权术，吉罗远不是戴高乐的对手，不免节节败退。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的总部从伦敦转移到阿尔及尔。戴高乐与吉罗达成协议，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两人同任主席，吉罗兼任法军总司令。委员会作为法国唯一的中央权力机构行使法国的最高主权，并领导各地的法国军事力量。戴高乐一向不容别人分享权力，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把委员会称之为“纯粹过渡性的东西”。在他心目中，两主席制度只是“暂时必须忍受的怪现象”。第二步，戴高乐便着手削弱吉罗的政治权力，以至最终取消吉罗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力图限制和削弱吉罗的军权。戴高乐在委员会其他成员支持下，援引文职控制军职的传统原则，坚持吉罗不得身任总司令又兼两主席之一，并坚持军事问题应受中央政权管辖。

军权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美国总统罗斯福遂插手干预，指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阻止戴高乐“亲自或通过其党羽”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当着戴高乐和吉罗的面斩钉截铁地说明：“法国在北非现有的军事统帅和组织不得作任何变更。特别是吉罗将军必须保持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并仍保留他处理军队、交通、港口和机场的全权。应该由他一个人同我商讨北非的一切军事问题。”6月20日，盟军总部正式照会戴高乐和吉罗，重申不得触动吉罗军权的要求。戴高乐对美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美国的干预反而加速了戴高乐削弱吉罗军权的步骤。根据戴高乐的建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他自己担任主席。在执行问题上，暂时分设两个临时统帅：吉罗负责北非的武装力量，戴高乐负责法兰西其余海外领地和法国本土地下武装力量。

7月2日，吉罗去美国访问。戴高乐乘吉罗不在，扩大自己在民族解放委员会内的势力，掌握了实权。待7月31日吉罗回到阿尔及尔，只得面对既成事实，同意就权力分配问题达成有利于戴高乐的妥协。由戴高乐单独主持委员会会议并领导其工作，吉罗仍保留主席名义和副署文件和法令的权力，但纯粹是形式而已，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治领导权。同时，所有法国部队统一整编，由吉罗任总司令，戴高乐则担任负责军事问题的“国防委员会”主席。9月，法共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在科西嘉岛举行武装起义获得成功，吉罗从中提供了军事支援。戴高乐以吉罗背着民族解放委员会参与解放科西嘉战役为由，要求取消两主席制度，代之以一位“握有实权”的主席。10月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命令。这样就最终结束了“双头领导”的局面。

戴高乐为了使委员会转变为名符其实的临时政府，以便为他在战后掌握

政权铺平道路，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排挤吉罗，设法进一步扩大委员会的政治基础，积极争取各党派抗德势力的支持。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召开了有102名成员（包括40名抵抗运动代表、27名法共代表）参加的咨询议会。会议推选戴高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随后戴高乐改组了委员会，将吉罗排斥在外。

密特朗对地中海彼岸的吉罗—戴高乐之争自然十分关注。眼看戴高乐越来越占上风，他觉得有必要同“自由法国”挂钩，决意亲自前往阿尔及尔这个决定未来的政治中心进行游说，不然，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戴高乐的外甥米歇尔·加约的伦敦、阿尔及尔之行更使他坐立不安。在阿尔及尔，加约老在戴高乐耳边说“皮诺—密特朗地下网”的坏话，吹嘘他自己的战俘抵抗组织——“夏雷特网”在战俘中间起着首要作用。戴高乐原则同意他的地下网派代表参加咨询议会，并向它提供经费和武器。这样，“夏雷特网”就成了唯一获得阿尔及尔当局承认的战俘抵抗组织。10月27日，加约趾高气扬返回法国。密特朗认为阿尔及尔之行已刻不容缓。

他在给亲人的信中，透露了他近期前往伦敦转赴阿尔及尔的打算：“我密切注视着未来，我在全心全力地进行准备，使我得以在本世纪有一席之地……几个月以来，我走遍了法国。我们在玩捉迷藏……必须选择一个大好时机走出地下，以便出现在条条道路通向的地方（指阿尔及尔）。显而易见，我玩的游戏是有风险的。有些人信赖我，而我为他们提心吊胆。我不相信任何人，这使我为自己担心。但是，走这条路是富于激情的，进步是巨大的，特别是这是我自己的探索，其中有所谓战略、策略，即人事游戏和对待事物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对我很有吸引力，并使我兴奋不已。……我过着双重的，甚至三重的生活。”事实上，密特朗此行纯系自行其是，是一次着眼于未来的重大行动。连“全国战俘抵抗联盟”主要负责人皮诺也蒙在鼓里。他很不高兴地对人说：“直到他1944年2月26日回来为止，我们对此行一无所知。”密特朗私下向戴派人士表示，他希望能会见戴高乐，“全国战俘抵抗联盟”愿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联系。

1943年11月15日深夜，在“军队抵抗组织”的情报机构安排下，密特朗同两个同行者在巴黎西南三百多公里的昂热附近的一片草地等候飞机到来。忽然，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三人赶忙把手电照向漆黑的天空，构成“V”字形。飞机降落了。这是一架单引擎的莱桑德式英国飞机。不一会儿，小飞机腾空而起，趁着夜色飞越英伦海峡前往伦敦。

自由法国的官员对密特朗十分冷淡。“您还可以用莫尼埃这个名字。不过，您将获得上尉军衔，领取上尉军响。但是，首先您必须签字参加自由法国部队。”密特朗气鼓鼓地回答：“要我签字？没有门儿！”他解释说：“我在法国许多事情要做。我是一个抵抗组织的负责人，经全国抵抗委员会同

意，我要去见戴高乐将军……”由于密特朗拒绝参加自由法国部队，他被安置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他脚上的皮鞋沾满了昂热草地上的泥土，衬衣有三星期没有更换了。最后，密特朗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参加自由法国部队，成了莫尼埃上尉。事隔 50 多年后，密特朗以玩笑的口吻说：“我是没有领取自由法国部队军响的少有的两个人之一。多少年下来，利息倒很可观哩！现在，我倒满可以领取一大笔退役金！”

这时，密特朗有了双重军衔：在吉罗的军事组织内，他是莫尔朗少校；在戴高乐的部队里，他是莫尼埃上尉。11 月 29 日，情报首脑帕西上校签署一项命令，派莫尼埃上尉前往阿尔及尔执行使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要在那里召见他”。本来明明是密特朗想求见戴高乐，怎么成了戴高乐召见密特朗呢？原来，同密特朗有一面之交的、原法国南部三大抵抗组织的“统一抵抗运动”领导人弗雷内从中帮了忙。此人当时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负责战俘事务的委员（相当于部长）。

密特朗乘坐一架道格拉斯式英国飞机离开伦敦。到达阿尔及尔后二三天（据密特朗回忆大约是 1943 年 12 月 3 或 4 日），戴高乐就在紫藤别墅的办公室里接见他。弗雷内和戴高乐的副官陪见。这次会见对密特朗日后的政治生涯极为重要。然而，戴高乐和弗雷内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述这次会见的情况。密特朗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到过，有的情节略有出入。

戴高乐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并没有像见到传奇式人物的感觉，倒是觉得此人长相有点古怪：“身材高大，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头显得太小了。亮堂的雇佣兵式的脸倒有点像父辈。两条长腿在桌子底下没法伸展。这就是我过去左思右想的人。我不由得想起斯汤达尔。不过，毋庸置疑，在我面前的正是戴高乐。他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然而，戴高乐一开口，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告诉我，您是乘英国飞机来的。”密特朗听出弦外之音。他知道，这与戴高乐分子传说他是英国间谍有关，于是便顶了他一句：“上飞机前，我倒没有想到该看看飞机的标记。”两人并非一见如故。在几秒钟之内，两人便知道，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以后也不会融洽相处。戴高乐询问了国内抵抗运动的状况，表示他非常重视逃回本土的战俘的抵抗活动和在德国战俘营开展宣传攻势。他认为，现在就必须着手研究 150 万战俘重返家园将带来的问题。密特朗趁势为自己和“全国战俘抵抗联盟”说话。强调该联盟成员全系从德国逃回的战俘，最了解德国人，是组织最为严密的战俘抵抗组织。他特别对供职维希一事作了申辩：“法国的悲剧使得好多正直和无私的人在一段时间内仰慕和信赖贝当。也许这些人受了骗，但他们是真心诚意地受骗的；如果说他们犯了错误，那么，这也不能说是一种罪过。”戴高乐认为，这种

法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老人与死者》，加利玛出版社，1996 年版。

斯汤达尔（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著有《红与黑》等文学名著。

说法有一定道理。

接着，会谈转入正题：统一战俘抵抗组织。戴高乐强调：密特朗的地下网同米歇尔·加约的战俘组织应当合并，“还有第三个战俘组织也应当合并”。

密特朗问：“哪个组织？”“共产党的‘民族阵线’。”

“我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

“统一要在夏雷特（米歇尔·加约的化名）的领导下进行。”

密特朗故意刺他一下：“您指的是您的外甥？”

“正是。我认为，他担任统一的战俘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是最合适的。”

密特朗表示，加约为人冒矢，不宜担此重任。他同意统一战俘抵抗组织，但强调必须让有关组织的代表来选择统一组织的领导人。

历时三刻钟的会见行将结束时，戴高乐提出“最后通牒”：

“密特朗，我下了命令。您必须执行纪律。要是您不同意，您就得不到经费和军事装备。”密特朗毫不示弱，回敬道：“要是我不同意，您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尽管纪律是很管用的，但是国内抵抗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不只是执行外来的命令。”两人话不投机，会见不欢而散。戴高乐站起来彬彬有礼地与密特朗握手告别。

这次会谈之所以话不投机，直接原因固然是密特朗拒绝在统一战俘抵抗组织问题上就范，根本原因则在于密特朗是个吉罗分子。密特朗的弟弟雅克·密特朗在基地设在摩洛哥的轰炸机部队里当中尉，当时正在阿尔及尔。他的看法可谓鞭辟入里。“弗朗索瓦在阿尔及尔的靠山是吉罗将军。这是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尤其是戴高乐当时已经明显占了上风。因此，阿尔及尔的上层人士都认为，弗朗索瓦是个吉罗分子。他没有马上明白自己的过失。……

我认为，正是他的莫须有的‘吉罗主义，使戴高乐大发雷霆。”不过，雅克·密特朗对哥哥既有所了解，又不完全了解。说密特朗是个吉罗分子，倒并不冤枉他。这一点他弟弟并不清楚。

这次不愉快的会见，埋下了密特朗一生同戴高乐势不两立的种子。密特朗意识到，来日他休想在戴高乐的势力范围内谋得一席之地。50多年后，密特朗还耿耿于怀。“戴高乐主义有真正爱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控制一切、统治一切的一面。”“我同戴高乐将军的冲突始于阿尔及尔。”“我们国内抵抗人士，我们不能同国外抵抗人士、同戴高乐分子取得谅解。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

既然密特朗不肯改换门庭，戴高乐方面不仅阻止他返回本土，而且处处

主要材料来源：密特朗：《战俘的政治抉择》，巴黎隆普安出版社，1945年版；《我的历史真相》；《未完成的回忆录》；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作者皮埃尔·佩昂的谈话。

法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或历史的诱惑》，巴黎瑟伊出版社，1977年版，第60页。

法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老人与死者》。

刁难，甚至想方设法整他。

戴高乐手下的人，先是建议密特朗当咨询议会议员，条件是他必须留在阿尔及尔，“调虎离山”。密特朗拒绝了。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密特朗犹未能释然。1990年6月18日，正值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六一八”抗德号召50周年大庆，密特朗拒绝参加庆典。他气鼓鼓他说：“戴高乐想尽办法把著名的国内抵抗人士排除掉，或者在伦敦加官进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干脆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我嘛，我在阿尔及尔时，他要我当咨询议会议员，以便阻止我回法国。我当然拒绝了。他打击国内抵抗运动比打击德国人还起劲。”

当时，戴高乐分子就设法暗算他。事后，密特朗得到一份文件（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其中写道，他在阿尔及尔期间，戴高乐的一位亲人曾向将军建议，把这个“没有什么戴高乐主义信念的人打发到意大利前线去”，以免放虎归山。“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内政副委员让·皮埃尔·布洛赫在战后向密特朗透露，当时他看到过这样一份命令：“命令：作为安全措施，将化名为莫尔朗的密特朗在非洲或英国的某一部队里看管起来。”据密特朗的朋友皮埃尔·梅利（战后任国民议会议员）说，密特朗从阿尔及尔回国后曾向他谈及戴高乐会见的内情。实际情况比后来公开披露的更糟。由于密特朗不同意让米歇尔·加约领导统一的战俘抵抗组织，戴高乐几乎将其撵出门外。“戴高乐一度打算让情报部门把密特朗干掉。最后决定把他调往意大利前线服役。”梅利是个有心人，当时曾将密特朗所谈形成文字留存。密特朗出任总统后，他把这份记录面呈总统过目。密特朗签字认可，但叮嘱他在总统任期内切勿向外人泄露。

阿尔及尔—伦敦的正常交通渠道控制在戴高乐分子手里，只有吉罗的情报部门能设法通过特殊安排帮他离开阿尔及尔这个是非之地。于是，密特朗求助于吉罗办公室和吉罗情报部门的重要成员德拉歇纳利埃上尉，请他协助安排去伦敦。他满口答应，要他乘次口一架运送邮包的飞机先飞往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再设法转赴伦敦。密特朗正打算告辞，忽然进来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军人。此人就是戴高乐的对头吉罗将军。是吉罗无意闯进来的？还是上尉有意如此安排？这就不得而知了。德拉歇纳利埃上尉向他说明原委后，吉罗爽朗地笑着说：“我毫不感到意外。玩弄政治，那是伦敦那帮人的拿手好戏。朋友，我会帮您的忙。至于我，我关心的只是抗战胜利。”

密特朗27岁这一年，先后会见了贝当元帅、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这是不寻常的。同吉罗的会见似纯属偶然，其实并非完全意外。因为阿尔及尔之行系吉罗手下的“军队抵抗组织”参谋部和勒韦尔将军一手安排。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三卷（1988—1991），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皮埃尔·佩昂：《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第363—374页。

密特朗：《秸秆与谷粒》，第165页。

德拉歇纳利埃上尉为密特朗订好机座，并向他提供了吉罗情报机构的几个联络点，以便在摩洛哥落脚，并解决转赴伦敦的交通问题。密特朗一下飞机，情报官员帕约少校就派人将他接往若斯菲娜·巴克尔的宅第。这是一座天方夜谭式的宫殿。巴克尔具有双重身份：著名歌唱家和帕约手下的间谍。不几天，密特朗搭乘蒙哥马利将军返回英国的专机离开马拉喀什。飞机抵达英国上空时，蒙哥马利将军把密特朗请到他的座舱，说道：“我不知道您是何人，也不知道您怎么会搭乘这架飞机。为了避免您我的麻烦，您还是不在伦敦降落为好。您得在普雷斯特韦奇下飞机，然后，您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下机后，密特朗跳上一列开往伦敦的火车，连车票也没有买。

在伦敦，密特朗同“军队抵抗组织”的朋友们住在一起。从英国返回法国，只有空投或海上秘密航行两种办法。由于气候恶劣，一时无法成行。密特朗急不可耐。不过，滞留伦敦倒给密特朗一个意外的成功机会。弗雷内十分赏识密特朗，认为要完成统一全国战俘运动的使命，非倚重密特朗不可。他来伦敦同密特朗商讨统一战俘抵抗组织的具体办法，并给予相应的详尽指示。这无异于给密特朗一笔政治资本。在“自由法国”情报首脑帕西上校协助下，密特朗于1944年2月26日深夜从达特默思乘一艘英国海军的鱼雷快艇驶抵法国西部海滨，换乘火车返回巴黎。

从阿尔及尔到巴黎，一路历尽艰辛，所幸未遇险情。不料，在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下车却遇到了麻烦。密特朗刚要出站就被拦住了：“手提箱里装的什么？”密特朗回答说：“随身衣物。”那人非要把箱子打开不可。密特朗一边慢吞吞地打开箱子，一边察看四周有什么遁逃之处。箱子打开了，上面是一件风雨衣，下面露出一支手枪。密特朗正打算逃跑，那人一边把箱子递还给他，一边说道：“没有黄油？没有鸡蛋？经济检查完了。你走吧！”谢天谢地，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

密特朗安全回到巴黎。他并非空手而归。在阿尔及尔同戴高乐和其他重要人士的会见，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他还随身带来戴高乐的指令，特别是阿尔及尔方面要皮诺引退，更增添了密特朗脱颖而出的机会。

密特朗向“皮诺—密特朗地下网”的主要成员传达了戴高乐关于统一战俘抵抗运动的指令。统一势在必行，关键是由谁担任统一组织的第一把手。两个劲敌挡住密特朗的去路：有戴高乐撑腰的米歇尔·加约和资格比他老、地位比他高的皮诺。在这场争当第一把手的较量中，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负责战俘事务的委员（部长）弗雷内帮了他的大忙。

密特朗离开阿尔及尔时，弗雷内要他捎一封信给皮诺。弗雷内在信中敦促皮诺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统一战俘运动作出努力。至于他个人的安排，“有人对您有某种保留，希望您不要在第一线位置。对此，您大概不会感到意外。显而易见，这是由于前不久您所担任的职务的缘故”。弗雷内强调，信中所

蒙哥马利（1887—1976年），英国元帅。在北非阿拉曼击溃德国名将“非洲之狐”隆美尔，一举成名。

述具有“命令的含义”。密特朗回巴黎后，同皮诺、雅克·贝内等地下网领导人共进午餐。他将弗雷内的信交给皮诺，冷冰冰地表示：“阿尔及尔方面要您引退。”密特朗对此未加评论，也没有对这项决定表示遗憾，弄得皮诺简直下不了台，只是喃喃自语：“那当然，那当然……”贝内在一旁目睹此情景，对密特朗的态度很不以为然，多少年后他还清楚记得当时尴尬的情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皮诺就不再成为密特朗的竞争对手了。

按照弗雷内拟定、经戴高乐批准的统一方案，第一步，“全国战俘抵抗联盟”与加约的“战俘与流放人员抵抗运动”合并，由密特朗、雅克·贝内和米歇尔·加约等三人组成指导委员会。加约分管尚在德国的战俘和流放人员；密特朗分管已逃回和遣返回国的战俘；贝内分管战俘互助中心和战俘的宣传工作。密特朗在指导委员会中居于二对一的优势。

加约对这种安排十分不满。1944年2月1日，他上书戴高乐告状。他吹嘘自己领导的战俘组织是“人数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他表示赞同三个战俘组织的合并，但有三项前提：（一）肃清从维希政权派生出来的组织（指“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的维希思想；（二）清除前维希战俘署长皮诺；（三）排除密特朗。此人“比皮诺更危险”，“他通过吉罗分子的渠道去伦敦和阿尔及尔，以便获得指示（天晓得是谁的指示？）。密特朗讲的话多半是无中生有。他借口甚多，谎话连篇。他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皮诺—密特朗地下网’既对贝当仰慕之至，又投靠吉罗将军”。他明确表示：

“拒绝服从弗雷内关于三位委员分工的决定，并向您提出申诉。”他表示决不能同意让不久前还在维希供职的人来领导他的组织和处置全国战俘问题。

1944年3月18日，弗雷内给加约的信中着重指出：“建立三人委员会的决定是由戴高乐将军亲自主持的法国行动委员会作出的，因而是不能更改的”，劝说他以大局为重，真心诚意地促成战俘抵抗组织的统一。如果他一意孤行，“您将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严重责任，而且同戴高乐将军的意志背道而驰。”弗雷内在信中还为密特朗说了很多好话：“我绝不能同意您关于莫尔朗对维希的态度的看法。……况且，戴高乐将军在作出关于三人委员会的决定之前对莫尔朗的思想和行动已有清楚的了解……”弗雷内最后写道：皮诺因在维希担任过要职，不宜出面，而“我们的朋友莫尔朗则是另一码事，而且，关于他的人品，我可以亲自担保。”

1944年3月12日，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代表安托万·阿维南主持下，三个战俘组织：全国战俘抵抗联盟、“夏雷特网”（战俘与流放人员抵抗运动）和全国战俘委员会的代表在巴黎举行协商会议，加约由于与密特朗不和，未出席会议。

会上，三方代表进行了激烈交锋。密特朗首先发言，反对将全国战俘委

员会纳入统一的战俘组织。因为他事先已经发现，加约早就同全国战俘委员会酝酿合并，以便利用法共的力量来平衡和制约密特朗。他强调，全国战俘委员会没有多少力量，在阿尔及尔和伦敦谁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他问道：全国战俘委员会受谁的资助？后台是谁？那还不是靠一个政党吗？他还说，他刚从阿尔及尔回来，受命统一夏雷特运动和他自己的战俘组织，根本没有包括全国战俘委员会这一说。法共战俘组织的代表详尽介绍了该组织的力量和活动情况，并对密特朗反唇相讥：“您说您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哩！因为在地下活动条件下，不可能相互沟通。”

经过一番争论，夏雷特网和全国抵抗委员会代表都赞成将全国战俘委员会纳入统一的战俘抵抗组织。密特朗作了让步。全体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三个组织合并，新组织定名为“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全国战俘抵抗联盟人多势众，在领导机构中获得半数席位，其他两个组织各占四分之一。指导委员会成员如下：

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贝内（代表全国战俘抵抗联盟）；

菲利普·德夏特（代表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

罗贝尔·波米埃（代表全国战俘委员会）。

密特朗一跃而为统一的全国战俘组织的领袖。这乃是密特朗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的起点。

密特朗的对手米歇尔·加约为“促成统一”而引退，但他对密特朗的怨恨一直未能冰释。30年后，他还翻历史老帐。1974年4月15日，他在极右派背景的周刊《一分钟》上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密特朗：“所谓密特朗组织战俘抵抗运动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既不是运动的创始人，也不是领袖。这是由他和某几个人虚构出来的传奇故事……我并不要指责密特朗在战争行将结束和德国人全线崩溃之际才转向抵抗运动。要说他从1944年3月中旬直到巴黎解放共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才真正参加过抵抗运动，那就算很不错了。”

戴高乐虽对密特朗不满，但在密特朗一加约之争中，他还是作了有利于密特朗的裁决，表明了一个不徇私情的政治家风度。他在50年代发表的《战争回忆录》中只有一处提到密特朗，把他列为往返阿尔及尔和本土之间的九名本土抵抗运动负责人之一，从而一笔勾销了密特朗供职维希的经历，肯定了他作为本土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地位。

照片缘与不了情

随着法西斯德国的末日日益迫近和法国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地下抵抗活动的环境越来越险恶。战俘抵抗组织的统一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也越来越成为盖世太保打击的对象。加之叛徒出卖，抵抗战士被捕事件不断发生。密特朗不得不三天两天改换住宿处所，频频改名换姓，以免遭盖世太保毒手。

1944年6月1日上午，“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领导人员12人在巴黎一所相当豪华的住宅开全体会议。密特朗又经历了一个惊险场面。据他自述，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密特朗前去开门。一个穿便服、带金丝边眼镜的法国人要求见让·贝纳尔。他回头到客厅去找贝纳尔，埋怨说：“有人找你。怎么能在这里跟人约会呢？”他陪同贝纳尔走到门口。这时来人把手枪顶住贝纳尔的胸口：“跟我走！”密特朗赶紧转身去告诉与会者：“让被抓走了，快逃！”他匆匆销毁文件后。透过窗户，他看见有两个人守候在对面的房子跟前。他从背后的一个窗口跳出，拼命往附近的地铁站跑，正好迎面遇上迟到的萨维（原卡约战俘组织的领导成员）：“别去了！”两人一起钻进地铁逃跑了。事后得知，盖世太保要抓的正是莫尔朗（密特朗的化名），误以为贝纳尔是莫尔朗的新化名，后来发觉抓错了人，便把贝纳尔流放到德国。而向敌人告密的，正是萨维这个叛徒。这一回，密特朗与死神擦肩而过。

同一天下午，在迪潘路五号又有一次重要的会议。让·米尼埃（密特朗战俘营难友）很机灵，在等待与会者陆续到来时，他心里有点嘀咕：这里开会的次数太多了，会不会出事？他就溜出去看看动静。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家伙走上前来，要他出示证件。他假装掏证件，一拳把对方打倒在地，撒腿就跑。两个德国人紧追不舍。他转了好几个弯，躲进了帕特里斯·佩拉（密特朗挚友）的住所，甩掉了德国人。两人商量：一定要设法防止密特朗落网。佩拉马上给迪潘路打电话，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我是夏尔……”事情很清楚，德国人已经控制了这所住宅。米尼埃换上佩拉的衣服到路口放风，给赴会同伴打招呼。不一会儿，另一个人替换他，以免引起德国人的注意。

密特朗到了路口，按事先约定的办法，先在邮局打电话给女主人，照例问道：“平安无事？未见异常？”回答竟是，“先生，您拨错了号码。”密特朗以为自己真拨错了号码，又重打一遍。对方仍然回答：“先生，您错了，别打了！”密特朗这下意识到事情不妙，回头就溜之大吉。事后密特朗了解到，德国人把枪顶着女主人的太阳穴，命令她：“说，要他上来！”这位女主人不依，遭到流放，死在德国。多亏了她，密特朗得以再次逃脱魔掌。

出生入死的地下抵抗活动，不光有刀光剑影的场景，也不乏罗曼蒂克的插曲。抵抗活动给密特朗的私人生活带来了意外的机缘。

他通过朋友关系结识了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古兹的年轻妇女。她在巴

黎电影发行处工作。她并非密特朗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但常为他们秘密传递信息。1944年3月的一天，应这位女主人的邀请，密特朗和几位朋友在她家里聚会。古兹小姐弹起钢琴，与她同居的男朋友帕特里斯·佩拉一展美妙歌喉，唱起《采珍珠的人》这首歌。密特朗无意间看到钢琴上放着一张少女的照片。看上去貌不惊人，但端庄大方，纯真无邪，楚楚动人。密特朗一时竟看呆了。接着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密特朗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问道：“她是谁呀？”

“我妹妹达尼埃尔。”

“她多大了？”

“照片上18岁，现在19岁了。”

“她长得挺甜。我要娶她。”

这段话活像一部艳情片中的对白。可是，这并非虚构。达尼埃尔在密特朗去世后发表的回忆录《自由谈》中复述了这段佳话。密特朗在他的《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则说得不太肯定。“也许我说过要娶她的话，但是，不是那么斩钉截铁。”

一见钟情往往传为美谈。未见而钟情尤为稀罕。克丽斯蒂娜·古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密特朗却一脸正经，不像是开玩笑。她对密特朗的为人和才干深有了了解，又是她的男朋友佩拉的挚友，她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只是不知她妹妹心意如何。于是，她赶紧写信给妹妹：“给你找了个对象！复活节快到了，你务必来巴黎住几天，当面相一相。”

达尼埃尔果然应约而来。她姐姐带她到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家饭馆里同密特朗会面，共进午餐。姊妹俩事先商定：要是一见倾心，达尼埃尔就点头示意；要是不中意，就转过脸去。密特朗进来了。他穿着一件棕褐色风雨衣，一顶宽边帽子一直压到眼睛上。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他故意蓄髭化装。他这副模样与达尼埃尔想象中的意中人相去甚远。她连忙转过脸去。密特朗倒很满意，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达尼埃尔则漫不经心。密特朗说话尖刻，心眼儿很多，也不讨她的喜欢。送走密特朗之后，达尼埃尔对姐姐说：“他模样一点不帅，活像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人。”她断言：“我不会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她姐姐摸不着头脑，吃惊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回答很有意思：“我喜欢男孩子。”密特朗这边却一片痴情，决心非她不娶。

古兹家实际上是抵抗战士的“堡垒户”。达尼埃尔的父亲安托万·古兹信仰社会主义，本是中学校长，因拒绝交出犹太学生名单被维希政府解职，回老家赋闲。后来全家迁居克吕尼消夏别墅。他以“出租”住房为名，收留、掩护当地的抵抗运动人士，法国南方主要抵抗组织之一“战斗”领导人亨利·弗雷内（后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负责战俘事务的委员）曾在他家住过。弗雷内在回忆录《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中这样描绘安托万·古兹：“中等身材，有点瘦削，浅棕色头发，近视眼，戴一副眼镜。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培养出来的那一代教员。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坚持共和人士和无神论者

的信念。”弗雷内来古兹家不久，伯蒂·奥尔布雷克特小姐前来同弗雷内会合。她是“战斗”的一位杰出女将。1943年5月28日，她外出接头，误入敌人圈套，遭盖世太保逮捕和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尸体也被焚毁。古兹家被搜查，全家都被传讯。幸而达尼埃尔的母亲冷静应付，事先销毁文件，德国人查无实据，全家免遭毒手。事隔多年后，密特朗认为，这可能是盖世太保有意放长线钓大鱼。

这位女战士的英勇牺牲使达尼埃尔永志难忘。那天早晨，伯蒂出门时曾对达尼埃尔说：“昨晚我没睡好。我做了一个恶梦。我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里出不来了。这是不祥之兆。”说着她从上衣取下一个岩羚羊形状的金别针，送给达尼埃尔留作纪念。这枚别针一直珍藏在达尼埃尔的床头。不久，达尼埃尔常悄悄到附近丛林的游击队那里去，护理伤员，参加到抵抗运动的行列之中。

达尼埃尔回顾这段经历时说道：“1944年初，我本是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我与双亲一起生活，同外界很少来往，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整天乐呵呵。”巴黎之行，与密特朗会面，加上伯蒂的壮烈牺牲，“从此，我再也无法平静。”

无论是谈恋爱还是搞政治，密特朗都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

1944年5月底，密特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达尼埃尔家同她会面。

有时密特朗只好藏在树林里，达尼埃尔偷偷给他送吃送喝。达尼埃尔终于动了心，答应嫁给他。她追忆说：“在地下抵抗活动的日子里，早晨起来，不知晚上会睡在自己床上，还是下了监狱，再不然就是长眠地下了。”“当死神在您头上游荡时，不免痴情骤增。”

于是，两人合影留念，作为互许终身的见证。没料到，这张照片竟惹出一场风波。

密特朗在巴黎的秘密住所突遭德国盖世太保搜查，这张照片连同一些信件和文件落到德国人手里。密特朗怕连累达尼埃尔，请两位朋友火速前往里昂，守候在达尼埃尔的学校门口，把她接到巴黎同他会合。在巴黎只任了一天，两人决定乘火车前往布尔戈尼暂避。火车上尽是德国兵。一个德国兵给达尼埃尔让了座，密特朗则站在过道里。火车在一个小站停车时，这个德国兵下去买了一盒樱桃，请达尼埃尔和密特朗分享。火车在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的分界线上停了下来，德国当局一一检查旅客身份。达尼埃尔出示证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轮到密特朗时，检查员在黑名单上找“M”开头的姓名，莫尔朗（MORLAND）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达尼埃尔和密特朗眼前，两人出了一身冷汗。正在这关键的一刹那，那个德国兵向检查人员喊道：“放行，放行！他们同我是一起的！”他俩终于遇难呈祥。难怪密特朗的哥哥罗贝尔·密特朗要说：“弗朗索瓦总是福星高照。”

1944年10月27日，在达尼埃尔20周岁生日的前两天，两人在解放了的巴黎结婚。密特朗是天主教徒，达尼埃尔一家是不信教的。结果还得按天

主教传统，在巴黎圣—塞弗兰教堂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证婚人是战俘事务部长弗雷内和帕特里斯上校。婚礼刚结束，密特朗就急忙拉着穿着结婚礼服的新娘参加集会去了。

密特朗和达尼埃尔从复活节初次见面到当年10月结婚，前后不过半年，可谓进展神速。但这并不奇怪。50多年后，达尼埃尔回顾道：“这短短六个月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呵！简直像过了一辈子！至少也顶得上和平时订婚10年。再说，当时类似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战前，密特朗有过一段颇富浪漫色彩的恋情，结局却是不幸的，使密特朗抱憾终生。过去，密特朗的一些传记对此事只是寥寥几笔带过。直到1994年，这段罗曼史公诸报端，才广为人知。

1938年2月28日，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在巴黎一家名牌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的舞会上巧遇一位窈窕淑女。这位男士就是密特朗。他曾对一位友人这样描绘相见的那一瞬间的动人情景：“我见到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人。开始，她背对着我。当她转身望着我时，我怔住了。你懂得一见钟情吗？”

密特朗鼓足勇气请她跳舞，对方同意了。整个晚上，他们几乎一曲接一曲地跳个不停。可是俩人相互尚一无所知。曲终人散时，密特朗问她：“请问尊姓大名？”

对方回答：“妈妈不许我告诉任何人。”她名叫玛丽—路易丝·泰拉斯。

密特朗竟单刀直入：“您会成为我的美丽女神的。”他指的是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诗中的女主人翁，是永恒的爱情的象征。接着又问：“您多大了？”

“16岁。”其实她还不足15岁。

“您在干什么？”

“上费内洛中学，正准备毕业会考。”其实，她才上四年级。

“您家住那里？”

“奥尔良街，离卢森堡宫不远。”

“我能同您再见面吗？”

“妈妈不让我同男孩子会面。”

对密特朗来说，这点线索就足够了。每天中学放学时，密特朗就在校门口等着。有一天，密特朗终于见到了她。从此，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了。晚上，有时他带着同学到她的住处跟前，指着一个窗户说：“她就住在那儿。她就在那里睡觉。”

密特朗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子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每天至少给这位意中人写两封情书，每封信都编上了号。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很快堕入爱河。后来玛丽—路易丝对友人吐露：“最使我着迷的是他满腹经纶，能说会道。他谈什么都很在行，谈爵士音乐，谈政治，纵论天下大事……加之他富有想象力，海阔天空，有话可说，还不时开开玩笑。他聪慧过人，非常风趣。”

在热恋中，六个月过去了。他一再要求同她订婚，可是对方总是犹豫不

决。有一天，密特朗同她会面时，穿著特别讲究，西装笔挺，手持玫瑰。女方感到很奇怪，一再追问缘由，密特朗却故意一字不吐。等玛丽—路易丝回到家门，她母亲马上告诉她说：“刚才有一个年青人来求过婚。我对他说：‘我女儿年纪还太小，她才16岁。’”他回答说：“我的两个姐姐都是16岁结婚的。”我训斥他一顿：“您别做梦！您连兵役都还没有服哩！”他只说了一句：

“那很好。我这就去服兵役。”密特朗虽然求婚未成，但泰拉斯夫人对他印象不错，日后允许他不时上门，并同意他与玛丽—路易丝正式交往。

1938年9月，密特朗大学刚毕业就去服兵役。作为大学生，他本可派到外省当后备役士官生，但他留恋巴黎，尤其不愿离开玛丽—路易丝，宁愿在巴黎近郊当普通一兵。他经常从兵营溜出来在咖啡馆、舞厅或教堂里同女友幽会。他仍三天两头给她写情书。

一年后，法国对德国宣战。1939年9月4日，密特朗便随部队开赴前线。临别时，两人山盟海誓。密特朗躲在马奇诺防线里，每天至少写一封情书。

1940年3月，密特朗从前线回巴黎休假，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苦恋，终于在3月3日订了婚。各人都戴上一枚订婚戒指。玛丽—路易丝后来说过：“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不过，订婚仪式并非洋溢欢乐的气氛，因为战争阴云越来越浓重了。密特朗本打算在第二次获准休假时结婚，一场真正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两个月之后，德军大举进攻法国，密特朗受伤被俘，关进了战俘营。

玛丽—路易丝等着他回来。她在人前说起密特朗：“我的未婚夫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我要求很严，对自己同样要求很严。他不是教士，他是个神秘的人。他对上帝的信仰，他的使命感，都使得他非同寻常。他必定会逃回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远离我，远离未来。”

确实如此，密特朗在战俘营度日如年。为了与意中人相会，他千方百计筹划早日逃回巴黎。特别是未婚妻的来信渐渐稀疏了，他更是忧心如焚。他意识到事情不妙。在第一次逃跑失败后半年，他给哥哥罗贝尔·密特朗的信中说：他打算在三个月后逃跑回国，因为他对未婚妻越来越放心不下。他托哥哥去看她，尽力劝阻她作出断然决定。泰拉斯家既是书香门第，亦是仕宦之家。玛丽—路易丝的父亲是作家乔治·迪梅尔的朋友，又是前外交部长皮埃尔—艾蒂安·费朗丹的亲密助手。密特朗要他哥哥设法让她父亲对他未婚妻施加影响，“他老人家是个非常正直，非常善良的人”。信中还流露出他的矛盾心理：“也许你认为，对我来说，不如吹了痛快。但是，我完全信赖你，请你按我说的去做，即便你内心并不同意。我不想拖住她，也不想使她为我苦恼……要是你觉得她懦弱，觉得她对给我造成的痛苦无关痛痒，那你得知道，她内心是多么痛苦呵！痛苦之大是你难以想象的。她亟需人们的谅解和友谊……”

在密特朗和玛丽—路易丝之间传递信息的安托瓦内特·布维埃小姐也力

求稳住玛丽—路易丝。她约请几个朋友与玛丽—路易丝一起商量，采取一种使密特朗不致过于痛苦的办法。结果一致认为，以“装得若无其事”为好。事实上，玛丽—路易丝已经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位波兰伯爵。

密特朗从战俘营逃回法国后，赶紧前往巴黎。1941年圣诞前夜，泰拉斯一家像往年一样，在圣·多米尼克教堂做圣诞弥撒。子夜降临，密特朗等着玛丽—路易丝出来。他指望面对面恳谈也许能破镜重圆。不料，没谈几句，事情已无可挽回了。次年一月初，两人长时间漫步在巴黎街头，最后玛丽—路易丝明确告诉他，她不再爱他了，并把订婚戒指退还给他，两人抱头痛哭一场。传说，密特朗绝望之余，当场把这枚钻石戒指扔进塞纳河里。不过，他的挚友另有说法：密特朗去阿尔及尔时，还把订婚戒指小心翼翼地藏在手提箱里。至亲好友一致的看法是：密特朗受此打击几乎痛不欲生。一连几个月都沉浸在忧伤之中。然而，他对抛弃他的人却毫无怨言。

有人认为，密特朗后来之所以甘冒生命危险参加抵抗运动，同失恋大有关联。他的一些亲友甚至说：弗朗索瓦之所以如此轻生冒险，无疑是因为他自以为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丧失的了。乍一看，这种说法几乎是有道理的。其实，密特朗是个意志坚强和胸怀大志的人，并非如此浅薄、轻生和感情用事。他出生入死抗击德国占领者，自有他深邃的思想。这就是他对法国的“激情”。这对了解密特朗生平思想十分重要。“法国是围绕着四大河流和一些山脉建立起来的。这些山川都不构成真正的边界。法国首先是土地、河流和几何图形的女儿，尔后她才赋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和谐的形象。在欧洲各国中，唯有法国称得上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不是人的野心和想象力的产物。破坏如此完美之作，使我痛心疾首，使我震惊不已。倒不是因为我对法国的热爱——首先是从美学观点出发的，而是因为像德意志这样一个不讲礼仪的民族居然占领了法国，把她一口吞噬下去。在我看来，这是亵读神明。这些家伙在我的祖国干什么勾当？德国人讲话的口音比坦克的隆隆声更使我忿恨不已。德国还不到两百年历史，它凭什么向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发号施令……我们这一代人受这样的罪，我是无法容忍的。我们这一代法国人生来不是为了受这种罪，我们是在热爱自由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听不得仇恨的声音，听不得在阴暗的血腥冒险中自封高人一等的说法。”这段话同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开宗明义宣称“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密特朗走上抗德斗争的道路是势所必然的。尽管晚了些，他终究参加了抵抗运动。而时间晚了些，正好说明他投身于抵抗运动并非出于因失恋而引起的一时冲动。

密特朗对玛丽—路易丝·泰拉斯一往情深。从1938年到1941年，给她的情书竟达2400封之多。玛丽—路易丝至今仍全部保存，完整无缺。不久前，她公开表示：这些情书构成了一部“精彩的爱情故事”。她同意予以公开发

表，不过，要等到两人部过世后才可以这样做。

玛丽一路易丝同波兰伯爵结婚没几年就分手了。后来，她当了电视节目播音员，改名卡特琳·朗热。1954年改嫁法国著名电视制作人皮埃尔·萨巴格。从50年代到60年代，她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露面。有一次，她同密特朗差一点一起出现在电视上了。那是1965年总统选举时，她用清脆的声音播讲：“现在，作为总统选举节目的一部分，请听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讲话。”她那依然楚楚动人的面容刚刚消失，密特朗就在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密特朗尽管情感上受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对这段恋情仍终生难忘。每年3月3日订婚纪念日，他总是差人给卡特琳送去一束玫瑰花，半个世纪如一日。1987年，密特朗以总统身份亲自把一枚荣誉勋位勋章佩戴在她胸前，表彰法国第一位女电视播音员的业绩，这是他对昔日恋人的最崇高、最公开的赞美。在密特朗去世前几年，两人关系越发密切，定期互通电话问候。

对密特朗来说，这是一段痛苦万分而又至死不渝的恋情。

巴黎的解放

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此，希特勒德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美英鉴于欧洲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决定开辟拖延已久的第二战场。1944年6月6日凌晨，美、英、加联军浩浩荡荡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海滩登陆。8月5日，戴高乐王牌军——勒克莱尔第二坦克师随着登陆，向东挺进，直指巴黎。8月15日，盟军又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沿岸大规模登陆。随行的塔西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20余万人向北疾进。解放法兰西的战役开始了。法兰西的英雄儿女奋起打击德军解放自己的国土。50万法国内地军以多种方式积极配合盟军作战，从提供情报、破坏交通、牵制德军直至直接打击敌军。全国90个省中有40个省爆发了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盟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西向东推进，解放巴黎指日可待。

法国务派抵抗力量及其头面人物都在盘算两件大事：一是如何迅速解放法国全境，首先是如何尽量依靠法国自己的力量解放国土，尤其是解放首都巴黎；二是如何在未来权力的再分配中定位？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谁在解放巴黎的斗争中出力多、贡献大，谁就可能在未来的政权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随着法国和巴黎解放的迫近，战后权力分配问题十分尖锐地提上议事日程。

掌握军权对控制未来法国局面至关重要。在盟军登陆诺曼底前两个月，1944年4月4日，戴高乐解除吉罗的总司令职务，剥夺他的军权，改任军队总监的挂名差使。吉罗表示：“要么当总司令，要么就什么都不当”，决定退休。至此，戴高乐—吉罗之争以戴高乐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戴高乐进一步确立了作为国内外抗德力量的唯一领袖的地位。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就是如何驾驭国内强大的抵抗力量，特别是如何防止法共夺取政权。

盟军登陆诺曼底后，法国内地军纷纷占领敌后城镇，各地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事态急剧发展。8月18日，巴黎爆发了总罢工。由共产党人安德烈·托莱任主席的巴黎起义委员会决定：19日举行武装起义。戴高乐充分意识到，能否控制巴黎这个政治中心，是他能否掌握全国政权的关键。他担心，如果法共“能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并能指挥巴黎的军队，他们很可能建立一个由他们实际领导的政府……最后建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巴黎起义是在没有得到戴高乐指令的情况下决定的，但戴高乐的总代表无法反对。

驻守巴黎的德军约2万人，其中1.5万人防守外围环形防线，市内约有5000人。起义军民与德军在市区展开激烈争夺，攻克战略据点和公共建筑多处，在市区街道筑起600多个街垒。德军卫戍部队陷于起义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

19日，瑞典总领事诺尔德林出面斡旋。戴高乐方面也担心巴黎落在起义者手里。戴高乐的总代表帕罗迪和临时政府军事委员沙邦—戴尔马同德国卫

戍司令达成休战协定。休战协定受到抵抗运动组织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20—21日，全国抵抗委员会会议上，大多数代表拒绝这一协定。21日下午5时，巴黎起义委员会发出继续战斗的号召。当晚，起义者解放了巴黎市区的大部分和郊区的3/4。德军龟缩到九个据点困守。

希特勒命令卫戍司令冯·肖尔蒂茨死守巴黎，不然就将巴黎化为废墟。卫戍司令的通信官冯·布雷森斯乌夫中尉扣压了希特勒8月22日发来的紧急命令。他在50年后追忆说：“电传打字机上传来绝密命令。我破译后知道是希特勒下令炸毁巴黎所有的公共建筑物、桥梁和工业设施。我把命令扣压了12个小时，因为我热爱法国。”冯·肖尔蒂茨接到命令后拒不执行。他认为，毁掉巴黎的命令是不人道的，愚蠢的，只能在法德之间造成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他个人也不愿承担毁坏这座美丽城市的历史罪责。

早在6月3日，即盟军登陆诺曼底前三天，戴高乐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造成法国已存在能够行使全权的政府的既成事实。为了控制本土，特别是巴黎的局面，戴高乐还任命各部部长在本土的相应代表——秘书长组成过渡性的权力机构。经战俘事务部长弗雷内推荐和戴高乐批准，密特朗成为19名秘书长之一。戴高乐的总代表帕罗迪通知密特朗担任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国内不会有任何政府。现在要组织一个十几个人的班子，代表合法政权，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行使各自的权力。”

此时密特朗年方27岁，竟与一批老资格的政界人士平起平坐，出任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一职，也洗刷了他供职维希的经历，以一杰出的抵抗战士的姿态出现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密特朗在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密特朗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说，由于他同戴高乐关系不好，这项任命出乎他的意料。“不过，这样做，很符合戴高乐将军的性格。我对他给予的信任感到高兴。”

密特朗充分意识到，300万战俘和流放人员将是影响法国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战俘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佳，似乎战俘对1940年的惨败负有一定责任。这就需要通过手执武器积极参加解放首都的战斗来改变形象，显示力量。他确定了只参与武装起义而避免表明政治立场的策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曾经同老上司皮诺商量过在解放斗争中的行动方针。他主张占领所有（维希政府）战俘机关所在地，但不正式表明政治立场。我认为这是巧妙的做法。”

在巴黎武装起义中，密特朗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是帕特里斯上校（即挚友帕特里斯·佩拉），另一个是罗丹少校（即让·米尼埃，亦系难友），帕特里斯上校的指挥部设在巴黎市中心香榭丽舍大街巴黎邮政总局；罗丹少校则指挥密特朗的突击队。8月19日，六七千爱国者在总起义命令发出前就率先占领了巴黎警察总署。满载德国兵的卡车由坦克开路进行反击，企图夺回警察总署。密特朗率领突击队投入防御战，同德国兵猛烈交火。同一天，

战俘突击队另部还占领了巴黎近郊的四个市政府。次日，密特朗所部又相继攻取社会行动总署、战俘营事务大厦、战俘互助中心总部和警察局等据点。其中位于巴黎歌剧院近旁的警察局尤具战略意义，因为它居高临下，俯视战俘署大厦。20日晨，密特朗带领10余名助手持枪进入战俘署署长办公室。莫罗署长站起来问道：“你们想干什么？”密特朗厉声喝道：“要你滚蛋！”莫罗慢条斯理地说：“我抗议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密特朗火了：“先生，这是革命！没有商量余地，你得让位！”

离战俘署大厦不远，还有德国“虎式”坦克布防，德国兵还在不停地巡逻。密特朗秘书长马上开始正式办公，身边放着两箱炸药瓶，以防万一。在巴黎起义的高潮中，年轻的密特朗居然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部长级要员。

密特朗正聚精会神处理公务，忽然门卫跑来报告：德国人闯进来了，要见负责人。密特朗一跃而起，拿着手枪往楼下走，一名助手持枪紧随。走到底层时，密特朗对助手说：“准备射击”。事有凑巧，这时，一辆满载起义人员的卡车正好开过门口，往站在门洞里的德国兵猛烈射击。德国兵一面回击，一面纷纷冲出大门，前去追赶那辆卡车，丢下了屋里的人。密特朗遂避免了一场寡不敌众的遭遇战。

20日，密特朗所部摧毁德军电话中心；捣毁盖世太保巢穴数处，消灭德国秘密警察百余名；攻取德军军火库多处，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特别是帕特里斯上校攻占《日报》大厦，接收了一家印刷厂。“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机关报《自由人报》开始在巴黎出版。

密特朗在社论中热情洋溢地为“战俘”正名：“三天来，巴黎在战斗；三天来，每个街区，每一条街，一支支部队奋起赶走侵略者，争取生存的权利……胜利属于所有为它付出苦难和生命的重大代价的人们。在我们终于能够公开欢呼胜利的时刻，我认为，我们不能忘记，有多少看不见的战斗，多少亲友的悲欢离合。在德国，如同在法国，战俘们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是在层层铁丝网后面，还是逃离战俘营参加地下抵抗组织，他们都没有玷污‘战俘’这个高尚的字眼。‘战俘’不再意味着放弃战斗。应当为此大声疾呼。1940年的战俘开辟了真正的第二战场，那是在德国境内。在法国战场上，他们仍然战斗在第一线……”

密特朗还接见《自由人报》记者，首次以政治人物的面目亮相。记者不遗余力为密特朗评功摆好：“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之所以选中您，因为您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人。”“在我面前的患难兄弟，是一位年青有为的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以其头脑灵敏、聪明过人而令人折服。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法学博士所受的教育恰恰是一个‘自由人’的教育。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充满自信和很有见地。他表现冷静坚决，这本身就是领袖的品质。”密特朗在答记者问中则宣扬“新人道主义”，“我们将超越社会阶层的障碍。成千上万的人具有同一个心灵，构成崭新的、健康的、年轻的精神，这就是法兰西的新精神。”最后，他还是落脚到战俘问题：“共同的苦难使我们成

为战友和兄弟。那边（指尚在德国的战俘），他们指望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指望着他们。”

8月22日，巴黎尚在激战中，密特朗召集“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代表及维希战俘互助中心代表开会，双方一致同意合并。一个抵抗组织与原属维希内政部的互助中心合而为一，乍看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其实正体现了密特朗的行动方针：把全部战俘和流放人员组织都抓在自己手里。维希所属互助中心在全国有1.2万个分支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话分两头。巴黎人民武装起义的节节胜利，使戴高乐坐立不安。他毫不掩饰：法共可能夺取政权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抵抗运动的某些政治人物为取得政权而制定的计划在我看来则比较有希望。我知道这些人想利用群众激昂的情绪或首都的斗争所形成的无政府状态，在我没有抓住操纵杆以前抓住它，这当然是共产党人的意图。等我返回首都的时候，这个‘人民’政府已经大权在握。”

形势紧迫。戴高乐一再催促艾森豪威尔赶紧向巴黎进军，特别是要艾森豪威尔保证，让勒克莱尔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首先进入巴黎，因为此举对法国的未来关系重大，要是盟军迟迟不下命令，他准备亲自把这个师开往巴黎。22日晚，艾森豪威尔终于命令勒克莱尔率部向巴黎挺进。24日傍晚，第二装甲师主力进抵巴黎近郊。次日，该师在起义军民配合下拔除了德军最后据点，守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宣布投降。巴黎解放了。

8月25日下午四时，戴高乐在群众欢呼声中胜利回到巴黎。他故意不去全国抵抗委员会和巴黎起义委员会所在的巴黎市府大厦，避免给人以起义委员会授权于他的印象，而径直前往他政治上的起家之地——国防部。他认为此地“应该作为法国政府和指挥部的中心”。

七时许，戴高乐在震天的欢呼声中穿过挤得水泄不通的巴黎市府大厦广场来到市政府。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早已在那儿恭候，密特朗也在其中。戴高乐向聚集在市府大厅的欢腾的人们发表简短讲话。他宣告：“法兰西回巴黎来了！法兰西打回老家了！”他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国家不容许破坏它的统一”。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奠基于伦敦、成长于阿尔及尔、完成于巴黎的统一的象征。言外之意，全法国都要服从他的领导。

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戴高乐为了向聚集在市府大厦广场上的群众致意，转身向窗前走去，一脚跨过窗口的栏杆（市府没有阳台），伸开双臂作V字形，高呼：“巴黎自由了，战争尚未结束！”人群中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围在窗户跟前的人一个劲儿往前挤，差点把戴高乐挤出窗外。戴高乐回过头来高声嚷道：“别挤！别挤！我的老天爷！”在将军身后的密特朗和德谢维涅上校连忙一把抱住他的双腿。在这个有趣的场合，密特朗跟戴高乐又见面了。不过，闹哄哄之中，戴高乐没认出密特朗来，并没有察觉到。

8月27日，密特朗第三次同戴高乐见面。这天，戴高乐主持在法国本土

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戴高乐同秘书长们——握手，最后一个是最年轻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戴高乐面带微笑说了一句：“又是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密特朗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这话很风趣，而且他面露笑容。不过，也可能包含这样的意思：‘看来，要把你搞下去不是那么容易’。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倒说对了！”这是密特朗参加的仅有的一次内阁会议。9月2日，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齐集巴黎，密特朗代行部长职务的日子结束了。

战俘事务部长弗雷内来到前战俘署大厦上任。他在回忆录《漫漫长夜总有尽头》中这样描述他同密特朗相见的情景：“我对重逢感到高兴，但是，他仿佛不太开心。有人跟我说，他原本希望我担任别的部长职务，这样，他就能当上战俘事务部部长。如果他真的抱有这种希望，那显然会大失所望。”弗雷内想把密特朗留在战俘部当他的助手，因为密特朗在战俘中有影响力，而且掌握着一大批人。”于是，我建议他留在我身边担任秘书长这一重要职务，既掌管全盘行政工作，又负责协调六个局的工作。这是最高行政职位。在我看来，对于他这样年纪和教育程度的人来说，这个职位是诱人的，几乎是连想也都不敢想的。但是，他谢绝了。因为密特朗的雄心不止于此。他雄心勃勃：利用他在战俘中间的影响和他所掌握的战俘组织作为跳板，他孜孜以求的是政治生涯，他可以从中大显身手。”

弗雷内确实看透了密特朗的心思。事隔半个世纪后，密特朗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承认：“当时我只有27岁。我的志向不是当一名文官。从1940年6月18日以来的四年中，我学到了好多东西。在战俘营，在抵抗运动中，我学会了同法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我还不是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明确的见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要在政治生涯中我行我素。”

9月9日，戴高乐改组临时政府，自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吸收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参加，其中包括两名法共部长。密特朗不再是临时政府成员，回到“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总部办公。他心怀凌云壮志，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密特朗在《自由人报》上一再大声疾呼：人数众多、受尽苦难的战俘“有权要求在决定国家命运的人们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如何运用150多万战俘这笔巨大的政治资本？组织战俘党？建立战俘群众团体？密特朗倾向于后者。1945年4月，容纳法国形形色色的战俘组织的“全国战俘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人数仅次于法国全国总工会的群众团体，密特朗当选为全国领导委员会的副主席。

安置归国战俘是个严重的问题。1945年6月1日，遣返工作刚开始三个星期，就有100万被俘人员回国。战后法国满目疮痍，民穷财尽，救济和安置像潮水般涌来的被俘人员，往往不尽人意。他们多年被关押在德国，本来就有被祖国遗弃的情绪，好不容易熬到回国，遇到的又往往是忧伤和失望。

法国政府各部通常不设副职。在一定意义上，秘书长的实权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但只是最高文官职位，不属政坛人物。

这同他们往日在铁丝网后面所苦苦期待的很不一样。于是，失落感油然而生，对政府当局失望、不满的情绪迅速滋长。

法共《人道报》首先发难，指责战俘事务部长弗雷内处置失当。“全国战俘联合会”内部法共控制的塞纳省联合会领导人要求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让政府当局听听被俘人员的不满的声音。密特朗起先为弗雷内辩护，继而担心脱离广大被俘人员，还是同意举行游行。

1945年6月2日，密特朗等领导成员率领队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浩浩荡荡往凯旋门进发。游行人群高呼：“弗雷内辞职！”“绞死弗雷内！”有的还特意穿着战俘营中的囚服招摇过市。当密特朗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时，队伍的末尾还远在协和广场。参加人数之多不难想见，估计达10万人。接着，游行队伍又向福煦路战俘事务部行进，有些人竟然冲进战俘事务部大楼。这时，巴黎警察署长宣布，戴高乐将军将接见战俘代表团，游行队伍这才平静下来。

密特朗等五名代表前往戴高乐办公的国防部大楼，等了25分钟未见动静。密特朗急得不耐烦了：“我要走了。我的尊严不能容忍我再等下去。”此时，戴高乐的助手前来通知：将军将另择时间接见。原来，当众宣布接见代表团不过是缓兵之计。

戴高乐直到6月6日才接见战俘代表。代表团由密特朗、让·科尼奥（塞纳省战俘联合会主席、全国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和乔治·特夫南（塞纳省战俘联合会秘书长）三人组成。密特朗同戴高乐的第四次见面气氛更紧张，更不愉快。戴高乐将他们狠狠训斥一顿。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追述了接见经过，但没有点密特朗的名。“我告诉他们说：‘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动，而且要由你们替我负责。’他们承认说：‘这是被俘人员的正当愤怒的表现。我们也阻止不了。’我向他们声明：‘公共秩序必须维持。你们如果管理不了自己人，那就当场给我写脱离运动的声明。如果你们确实是他们的领导人，你们就得立刻向我作出今天就停止全部骚动的正式保证，如果你们在离开以前不给我写出书面保证或者诺言，你们出了接待室后就要被扣留起来。我可以给你们三分钟的考虑时间。’他们在一个窗口互相商量了一下，立刻回来向我说：‘我们明白了。一定照办！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停止游行示威。’当天就这样做了。”

1965年12月10日，在戴高乐—密特朗对垒的总统选举中，戴高乐在电视谈话中旧事重提，说得比《战争回忆录》更具体、细腻，指名道姓，故意出密特朗的丑。

“我在圣·多米尼克街（即国防部）召见那个名叫密特朗的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我劈头就对他说：‘搞什么名堂？战争时期在大街上大

叫大嚷……’密特朗表示歉意。我又对他说：‘好吧，要是您不同意这么胡闹，您就给我写个书面保证。喏，纸张、桌子、笔都是现成的。您写吧！’密特朗回答说：‘将军，这需要时间考虑。’我说：‘有道理。要是您在三分钟之后不作书面保证，那您一走出办公室就要被扣留起来。’于是，他同两个同伴站了起来，走到一个窗口商量一番，回到我面前说：‘将军，我们明白了。我签字。’”

战俘事务部长弗雷内的回忆接近戴高乐的这种说法：“大概是第二天，将军对我说起这次会见的经过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将军告诉我，他要求代表们制止示威活动，否则，他们将被逮捕。将军说，他们照办了。”

密特朗是不爱打笔墨官司的人。对戴高乐的两次说法一直未作任何反应。他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否认戴高乐曾以扣押相威胁。“会见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未进行威胁。要是以扣押相威胁，我们也决不会听从。”参加接见的全国领导委员会副主席让·科尼奥的说法与他相近。“我有把握说，将军所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发雷霆倒是事实，半个小时的谈话气氛一直很紧张，这也是事实。”他否认密特朗曾当面写过书面保证。据查考，有关档案中亦未找到这份书面保证。据戴高乐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说，战俘组织的几位代表确实按戴高乐的要求立下了书面保证，但是将军没有保存这个文件，因为上面有不少错别字。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这次不愉快的会见更加深了密特朗和戴高乐之间的鸿沟。戴高乐确信，他不能信任年轻的密特朗；密特朗则认为，他对戴高乐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密特朗写道：在伦敦和阿尔及尔，戴高乐周围都有一帮拥护他的人。”

戴高乐只信任这帮人，而不信任任何其他。回巴黎后，他的信条就是排斥法国本土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认定，这些人竟然在他控制之外、在没有获得他许可的情况下为祖国服务，准是不可靠的。在他看来，没有洛林十字印记的爱国主义是最危险的。”13年后，密特朗同戴高乐再次见面时进行了更为激烈交锋，也就不足为怪了。

密特朗离开政府后，政治上不得意，生活也颇为艰难。密特朗夫妇住在巴黎郊区一个很小的套房里。达尼埃尔操持家务，装帧书籍，打打毛线。她不喜欢这套房子：“既不在巴黎，又不在乡下”。密特朗除了把主要精力灌注在“全国战俘联合会”的工作上，还得为一家生计操心。经友人推荐，密特朗到莱雅香水集团控制的巴黎现代出版社任社长兼该社妇女杂志《美容》主编。月薪颇丰，生活还过得去。

1945年底，达尼埃尔怀孕了。但是，第一个儿子帕斯卡尔出生才三个月就夭折了。密特朗非常悲伤。达尼埃尔心力交瘁，久久未能复原，密特朗情

洛林十字系“自由法国”的标志。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23页。

绪低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不禁自问：“工作有什么用？”他觉得自己忙于工作，而对私人生活漫不经心，对达尼埃尔照顾太不够，甚感内疚。达尼埃尔后来对亲近的人说：“对我来说，我们结婚后的最初年月是很难熬的。弗朗索瓦老在外面开会、约会，忙着战俘运动的事，还有《自由人报》和《美容》杂志等等。再说，他还保持着抵抗运动时期养成的守口如瓶的习惯，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过，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两年半的地下活动养成的谨慎小心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

密特朗赖以维持生活的那份工作也遇到麻烦，密特朗满心想在出版界干一番事业，想把《美容》杂志改为文学刊物，经理不赞成。他想把巴黎现代出版社发展成为一流出版社，老板不同意。不仅如此，老板批评他管战俘的事太多，办刊物的时间太少；还指责刊物政治性太强，以致销路锐减，赔钱。密特朗则表示：《美容》杂志的编辑方针同他的文学见解相悖，他担任主编是“作了牺牲的”，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双方意见分歧愈来愈大，密特朗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从而失去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段在莱雅香水集团的工作经历，后来也成了政敌指责他同战前法西斯组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口实。因为莱雅集团的老板欧仁·舒勒曾资助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

巴黎解放两年多了。密特朗却落到政治上未能定位、工作上没有着落的地步。前途未卜。

第二章

平步青云

最年轻的部长

战争岁月对密特朗的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俘营的苦难和出生入死的斗争的磨炼，使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被俘、随后是抗敌，这给我展示了我当时不曾知道的世界。”他从一个腼腆的天主教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的政治人物。他虽失去了临时政府中的职位，但他仍一心想在法国政坛大显身手。

对他这样的新手来说，该从何入手？根据法国政治生活的特点，一个新人要想步入政界，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具备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有一个政党作为支撑；二是在议会有一席之地。参加哪个党？到哪个选区竞选？这就是密特朗首先面临的问题。

经过战争的洗礼，法国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戴高乐临时政府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旧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消亡了，新的政治体制尚待建立。战前曾经执政、战时曾经支持贝当的旧政党声誉扫地，力图重整旗鼓；新的政治派别，主要是抵抗运动中派生出来的力量，正在分化组合，酝酿建立新党，登上政治舞台。法国正处在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新旧政治制度交替，新旧日政治力量交织，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法共对导致 1940 年战败的事态没有任何牵连，在抵抗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力量急剧上升。党员人数从 1936 年的 32 万增至 1945 年底的 100 多万。正如著名学者戈盖尔所说，抵抗运动使法共进入了舆论“公认的、全国性的大党的行列”。法共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而且一度拥有可观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各地爱国民警队。

社会党战前曾多次掌权，对战备和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时该党绝大多数议员曾投票赞成授予贝当全权。但广大党员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社会党领袖勃鲁姆一直被关在德国集中营里。社会党最早纯洁内部，着手重建。1944 年 11 月代表大会将投票支持贝当的 90 名议员全部清除出党。勃鲁姆回国后，社会党更趋活跃。党员人数由战前的 28 万增至 1945 年的近 34 万人。

激进社会党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曾是主要执政党。对法国战败负有重大责任。该党领袖达拉第曾签订慕尼黑协定，臭名昭彰。1944 年 12 月全国代表大会只开除 34 名投票支持贝当的议员，而当时投赞成票的议员达 170 名之多，清洗很不彻底。战后力量和影响大大下降。

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的新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人民共和党。这是个发迹于里昂的天主教堂，因为里昂一向是天主教势力的重要

基地，又是抵抗运动的中心。1944年11月由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创建，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相标榜。1945年党员达23.5万人，多数是天主教徒。

另一个新党是由一些知名的抵抗人士发起组成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人数少，能量大。自命是一个超越传统左、右翼界线的党。实际上是一个中间政党，一部分成员中间偏左，一部分成员中间偏右。成员的共同特点是，对传统政党都怀有一定敌意。

密特朗憎恨对1940年战败负有罪责的旧政党，当然不可能参加这些党。他说过：“由于1938年慕尼黑的奇耻大辱，我是不可能加入激进党的。”加入社会党如何？“加入社会党也难，在那里，我马上会受到党内头面人物的压制。”再说，当时他也还没有“左”到足以参加社会党的地步。按理，多年受天主教熏陶的密特朗应当加入人民共和党。然而，经过战俘营的磨难和抵抗运动的洗礼，他对天主教已不那么笃信和虔诚了。“现在只剩下‘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了。”他意识到，在这个新建的小党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树立自己的威信，很快将成为党的领袖。这是一个小小的、然而唾手可得的工具。就这样，密特朗选择了“民主社会抵抗联盟”。

密特朗回到母校圣—保罗学校。老师劈头就问道：“怎么搞的？你成了社会党人？”原来，“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原文有着“社会主义”字样。密特朗连忙解释道：“神父，别急，我选择了国民议会中最右的党派。”这自然是言过其实。不过，当时把密特朗视为极右的倒不乏其人。当他加入“民主社会抵抗联盟”时，一些社会党议员对该党主席普利文说：“您发疯了，怎么接纳他？他可是个极右分子！”其实，当年密特朗既非左，亦非极右，而是中间偏右。

下一步，必须设法当上议员。但是，密特朗在政界还是个无名小卒，也没有在任何地区扎过根，竞选谈何容易！

1945年10月，法国举行第一届制宪议会选举，密特朗没有赶上。选举结果，法共获得将近1/4的选票和586个席位中的160个议席，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分别获得152席和142席。三党鼎立。制宪议会宣布“戴高乐确实有功于祖国”，一致推举他为总理，并组成以三大党为主体的新的临时政府。戴高乐因受党派政治掣肘，无法主宰政府，更无法控制议会，并被排除在制宪的工作之外。如同他自己所说，“如果戴高乐选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求保住自己的职位直到各党派同他断绝关系，或者给他安排一个体面而不起作用的职务，他的威望就要付诸东流了。”于是只好挂冠而去，于1946年1月20日宣布引退。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党这三个最大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来填补因戴高乐突然离职而出现的政治真空。

1946年6月举行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议席有限，粥少僧多，密特朗到处争取提名。他的挚友帕特里斯·佩拉上校为他多方游说，碰了不少钉子。

“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头头们对他说：“密特朗没有什么名气，你不是不知道。”最后，密特朗总算挤进了巴黎近郊塞纳省第五选区“左翼共和联盟”（包括激进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等）的候选人名单。事有凑巧，左翼共和联盟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恰恰是臭名昭彰的爱德华·达拉第。密特朗只得饥不择食了。选举结果，他仅仅得到6%的选票，遭到惨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失败了。这是意料中事。下次选举再作道理。”

1946年10月23日，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第四共和国诞生了。密特朗投票反对新宪法，认为这部宪法不过是招致法国战败的第三共和国宪法的翻版，必将导致政局动荡和无政府状态。

确实，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与第三共和国相同，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是共和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政府由国民议会中拥有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对议会负责。总理人选和政府施政纲领必须经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票批准。国民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推翻政府。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争当国民会议员是在政界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密特朗尽管不同意新宪法，但一心想在第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1946年11月10日，第四共和国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密特朗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为竞选预作准备，首先主动求见塞纳省第五选区的竞争对手、老资格的右翼政治人物埃德蒙·巴拉香。密特朗开门见山表示：“这次议会选举我还要在原来的选区同您对阵，特意事先打个招呼。”其实，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进为退，想要让这位神通广大的政客给他找个合适的选区。对方很不客气地问道：“密特朗先生，您究竟想干什么？是想跟我过不去，还是想当议员？如果您想呆在巴黎，那您决无当选的可能，您只能妨害我当选。”密特朗表示无意同他过不去，而是一心想当议员。对方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是您愿意到涅夫勒省去竞选，我倒可以帮您的忙。”密特朗回答说：“我到那里竞选，谁也不认识，不会有任何当选的希望。”

巴拉香笑道：“正因为谁都不认识您，您才有当选的希望。因为您在那边没有树敌。”他当着密特朗的面，给涅夫勒省的竞选班子打电话，对方同意支持密特朗作为中间党派候选人竞选，同三大党联盟抗衡。

另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亨利·克耶（后三度出任总理）也劝密特朗去涅夫勒省竞选，并且给他鼓气：“人们给您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机会。不过，您不妨去碰碰运气。如果您能听取大家的意见，而又能自行其是，您会成功的。”密特朗在候选人登记截止的那一天才到达涅夫勒。巴拉香没有食言，一切早已筹划定当了。

涅夫勒是个天主教势力强大、右翼力量占优势的省份，唯大富豪德鲁阿尔侯爵马首是瞻。巴拉香给他打了招呼：“有一位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在我的选区里捣乱，请您务必给他找个适当的安身之所，不胜感激。”侯爵的儿子回忆道：“家父对省里的政治生活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他正想物色一个右翼

候选人同三党联盟对抗。

由于他的朋友巴拉香推荐，他同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天主教青年接触。我见到他多次到我家来。家父在财政上鼎力相助，而且把他介绍给好多右翼人士。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

密特朗列在“共和行动与团结”联合竞选名单之首。他的竞选纲领是：“保护私有财产，不要国有化！保障（教会）办学自由！不要共产党掌权！”他对亲近的人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让步。”结果，在当地企业主和天主教会以及右翼政党大力支持下，1946年11月10日，密特朗终于首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他驰骋政坛的开端。

密特朗自己说过：“我承认，我是在没有右翼对手的情况下，靠杂七杂八的选票当选的。因此，有些右翼选民也投了我的票。这就是传说我是右翼人士的由来。”还应该补充一句，极右翼也帮了他的忙。涅夫勒省的极有势力在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为了击败三大党联盟的候选人，也投了他的票。要是没有以尚波侯爵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影响下的1.6万张选票，密特朗当选本是无望的。

从此，“空投”到涅夫勒省的密特朗就在当地扎了根。他不仅得到以旧贵族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青睐，而且博得教会的好感。戴高乐派元老莱昂·诺埃尔（后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回忆道：“我们在1951年大选中曾争取该省教会的支持，而涅夫勒主教回答说：‘可是我们已经有了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热情的年轻人。我们对他很满意。他守护我们的信念。’”

1947年1月，是密特朗长达10年的部长生涯的起点。22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组成第四共和国首届政府。有两个人对密特朗的政治前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克洛迪斯—珀蒂和乔治·博尚。拉马迪埃总理请前者担任退伍军人部长，他嫌没有多少实权，推辞了。他表示，他没有“当摆设的天性”。他竭力推荐密特朗：“这个年轻人在战俘圈子里交游很广。如果您想太平无事，您就让他当退伍军人部长。”乔治·博尚是密特朗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老朋友，当过社会党青年团负责人，同拉马迪埃相熟。他也竭力推荐密特朗担任此职。事后他说起此事：“我打电话告诉密特朗，他要当部长了，他还不信。”果然，密特朗被任命为拉马迪埃内阁退伍军人部长，年方30，成为是自1804年第一帝国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部长。这项记录迄今尚无人打破。

1950年7月，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勒内·普利文组阁。他本打算让密特朗继续担任退伍军人部长或新闻国务秘书，但密特朗想闯一闯新天地，要求担任海外领地部长，主管非洲事务。普利文同意了。在海外领地部长任内，密特朗主张采取某些有别于老殖民主义的政策，试图以某些无伤大局的政治让步软化正在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殖民主义集团指责他把非洲拱手让与黑人。1951年8月普利文再次组阁时，密特朗受到来自殖民主义集团的压力，未能入阁。他利用普利文忙于政府事务的机会，专心致志地经营民主社

会抵抗联盟。首先把戴高乐分子逐出党外，尔后纠集抵抗运动时期的旧部、特别是前战俘势力，扩大自己在党内的影响，以期夺取领导权。1951年11月党代表大会上，密特朗已处于多数派地位，名义上仍由普利文担任主席。1953年11月，密特朗取代普利文出任主席。从此，民主社会抵抗联盟成为密特朗在各党之间纵横捭阖的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

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2年中，国民议会由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政党组成。这些政党时分时合，变化无常。各党之间矛盾重重，争吵不休；政党内部分派林立，勾心斗角。一旦参加政府的各党意见分歧或发生分裂，就会导致政府危机。内阁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府短命，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已。从1947年1月拉马迪埃内阁组成到1958年5月28日弗林姆兰内阁在阿尔及尔暴乱中垮台，第四共和国经历了12个年头，更换了20届政府。寿命最长的不过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三天。

从30岁到40岁（1947—1957）10年间，密特朗先后在11届政治色彩不同的内阁中历任退伍军人部长、新闻国务秘书、海外领地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等职，任期总共达七年之久。在走马灯式的内阁更迭中，他被称为“稳定的部长”。其中奥妙何在？密特朗是一个中间小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重要成员和领袖，这个党通常只有20来个议席。但第四共和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单独掌握议会多数，政府往往由几个政见不同、利益各异的政党依靠政治交易或暂时妥协勉强拼凑而成。中间小党往往左右逢源，对拼凑左的或右的政府多数派都能沾上边，甚至有时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的形象的说法：“在这块10米见方的园地上，‘部长’生产率已打破最高记录。”意即党小、部长多。加之密特朗八面玲珑，善于玩弄权术，得以充分发挥中间小党的特殊作用。这正是密特朗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奥妙所在。不过，第四共和国声名狼藉，因而，密特朗多次出任部长的经历在政治上并不光彩。密特朗竞选第五共和国总统时，不得不设法洗刷第四共和国遗老的恶名。1980年他在所著《此时此地》一书中为自己开脱道：“30岁时，我当上第一帝国以来最年轻的部长——至今仍然如此。难道我错就错在比别人年轻就进入政坛吗？错就错在任凭时光流逝和备受艰难困苦，我却依然拥有选民对我的信任吗？我请那些对此感到不快的人予以谅解。”最后他强调，“我与法国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言外之意，谁想把他赶出政坛是绝对办不到的。

从印支到北非

法国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殖民帝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将“法兰西帝国”易名为“法兰西联邦”，宣称法国与殖民地在“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但这不过是新瓶装陈酒，殖民帝国的性质依然如故。战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连接不断的殖民地危机震撼了法兰西殖民帝国。法国统治集团逆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而动，力图以大规模军事镇压维持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结果法国陷于连绵不断的殖民战争而不能自拔。

最先是旷日持久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河内宣布成立。日本投降后，法国远征军重新控制了越南南方。1946年11月23日，法国舰队大肆炮轰海防（越南北方），随着陆军和伞兵扫荡海防一周之久，揭开了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序幕。头三年，即到1949年底，印支战争尚置身于东西方冷战之外，战争是由法国单独进行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印支战争变成由法国出人、美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战争。法国竟然把这场殖民战争说成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奥里奥尔总统1952年5月6日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我们是东南亚西方防务的中流砥柱。如果这根柱石倒塌，新加坡、马来亚、印度等均将成为毛泽东的猎获物。”

但是，美援无助于挽回殖民战争的败局。法军六易主帅，屡战屡败。到1953年，除了红河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几乎整个越南北方都在越南人民军控制之下，越南中部很大一部分地区以及南方的若干地区也在越方手里。在法国本土，广大人民开展了要求结束这场“肮脏战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法国政界的有识之士也感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法国都难以长期打下去，主张早日从印支战争中脱身。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此人曾任戴高乐临时政府经济部长。因在经济政策上与戴高乐意见不合而辞职。此后一直赋闲，同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政策并无牵连。他双手比较自由，思想比较开放，在政策调整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通观全局，认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和民族独立的关键在于国力之振兴。他主张在殖民地问题上实行一定收缩，把重点放在加强法国本身实力和在欧洲的地位。他宣称，印支战争是法国无法承受的负担，结束战争有助于发展法国经济，改善财政状况和摆脱外交上的困境。只有痛下决心舍弃局部方能保住全局，以免满盘皆输。他一再大声疾呼：“必须善于抉择：除了军事解决，除了使用武力，只有一个办法：和谈。”他指责政府谋求美国直接干涉有导致全面战争甚至原子战争的危险。

密特朗与孟戴斯—弗朗斯于1951—1952年间开始交往。两人志同道合，见地相近，过从甚密。密特朗自视甚高，对当时的政坛人物瞧得起的并不多，唯独对孟戴斯—弗朗斯推崇备至。他认为，保全法兰西帝国的最好办法是“截

去烂肢，保住主体”，遥远的远东不值得法国倾注全力，确保非洲才是“整个国家的第一需要”。因此，他全力支持孟戴斯—弗朗斯早日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主张。

1953年6月初，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他提出“治理国家在于选择”这句名言。在法国面临的种种难题中，他选择印度支那战争作为突破口，宣布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声称，他不能向各个政党屈膝投降；他要不通过政党而自己挑选内阁成员，以贯彻执行他的政策主张；他要摆脱政党掣肘，建立个人领导班子。孟戴斯—弗朗斯必须得到314票方能当上总理，结果只得到301票，组阁宣告失败。

6月9日，密特朗在《战斗报》撰文公开赞扬孟戴斯—弗朗斯：他的“讲话、态度和语调令人钦佩地表达了改革我们被危机气氛扰乱了的议会风尚的需要……有了他，法兰西的政治改变了风格。”他认为，孟戴斯—弗朗斯之组阁失败，原因在于“法国式的麦卡锡主义”。

同月，密特朗论述殖民地问题的著作《在法兰西联邦的疆界内》问世。这部专著显示了密特朗对法兰西帝国的前途的关注，发挥了有别于老殖民主义的观点，并对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提出了真知的见。他写道：“煽动亚洲战争的做法，歪曲了爱国主义的内容。”他指出，“既然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就有责任在那里呆下去”的殖民主义观点是荒谬的，“如果说有好几种办法能使我们从印度支那脱身，那么，我看不出哪怕有一种办法能使我们呆下去。”孟戴斯—弗朗斯为这本书作序，对密特朗大加赞许：“我很欣赏您对法兰西联邦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明智而精辟的分析。”“我多么赞赏您为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政治勇气。”

他强调，“同您一样，我深信必须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两人互相推崇，互相呼应，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大造舆论。

1953年6月27日，右翼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出任总理。新政府不仅变本加厉强化印支战争，而且谋求从印支战争国际化中寻找出路，指望把美国拖入其中。密特朗任拉尼埃政府驻欧洲委员会的部长级代表。他在内阁会议上激烈抨击拉尼埃总理和皮杜尔外长制订的扩大印支战争的政策。在7月22日内阁会议上，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为什么不直接同胡志明和毛泽东谈判？”这使内阁成员大吃一惊。1953年11月，密特朗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停止印度支那敌对行动。”

历时56天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抗法战争的决定性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于3月13日拉开序幕，1.6万多名法国精锐部队陷入重重包围。拉尼埃政府下令守军困守顽抗，以利于加强在即将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

麦卡锡主义。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以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麦卡锡为代表，50年代上半期曾猖獗一时。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法西斯手段大肆迫害和摧残美国的民主和进步力量。

会议上的谈判地位，同时加紧谋求美国直接干涉，以期挽回败局。法、美军方拟定了“秃鹫行动”干预计划，准备使用第七舰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袭击奠边府周围越军阵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鼓吹美、英、法对印支进行“联合干涉”，并向中国提出警告，如果中国不停止援越，就要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行动。美国国会对直接干预印度支那战争有保留；英国强调别毁了日内瓦谈判机会；法国主要想以美国空中袭击解奠边府之围，对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动也有所顾虑。于是，美国军事干预计划告吹。5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守军全军覆灭。奠边府惨败被看作是法兰西民族的又一次屈辱，犹如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投下一枚原子弹。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法国政局陷于一片混乱。

军事上一败涂地使得法国统治集团内部主和派抬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主张迅速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于6月17日被推选为新总理。他向国民议会下了一个破天荒的赌注：一个月内和平解决延续近八年之久的印支战争，否则，政府就辞职。

1954年6月18日晚，孟戴斯—弗朗斯同几个亲信在寓所会商政府名单。密特朗当场草拟了一份名单，随即又增删了一些名字。根据密特朗的建议，孟戴斯—弗朗斯确定了29人的内阁名单。他自己兼任外交部长，直接参与日内瓦谈判。密特朗任内政部长，实际上是孟戴斯—弗朗斯的左右手。

密特朗不仅在确定内阁入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利用他多年在议会和政府的种种关系，为孟戴斯—弗朗斯组阁寻求支持。密特朗对组阁的重要影响，新总理直言不讳：“没有人比密特朗更了解议员，了解他们的能力和弱点，目前的表现和过去的情况，他们的秘而不宣的抱负以及幕后交易。事事人人他全知道。他犹如一位专家对议会了如指掌。”“当时我对议会一无所知。国民议会中有好多议会党团，它们的领袖我都不认识。因此，就任伊始密特朗是我的向导。”孟戴斯—弗朗斯十分赏识密特朗的政治才干，认为他很快会当总理。

7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日内瓦会议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全部达成协议。法国国民议会的大钟“停摆”了几个小时，孟戴斯—弗朗斯果真在7月20日前实现了和平解决印支战争的许诺。

在孟戴斯—弗朗斯心目中，从印支战争脱身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就腾出手来，处理棘手的北非局势。他首先着手解决最富爆炸性的突尼斯局势。他先秘密派遣使者同被监禁的突尼斯民族主义领袖布尔吉巴会谈并取得妥协，旋即于7月31日，即日内瓦协定签字后仅10天，亲自赴突尼斯，宣布允许突尼斯“内部自治”，瓦解和平息武装斗争，稳住局面。接着，孟戴斯—弗朗斯准备对摩洛哥作出政治让步，以缓和由于摩洛哥苏丹（国王）因要求独立而被法国废黜和流放而引起的动乱局势。密特朗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处理北非局势的方针，因为这同他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不谋而合。

早在1950年7月出任海外领地部长时，密特朗产生了某种模糊的改革法

国同非洲殖民地关系的念头。他认为，法国要想保持在非洲的势力和避免爆炸性局势，必须对老殖民主义政策实行某种革新，变一味的武力镇压为有限的政治让步，从直接的殖民统治过渡到非洲人内部自治。他在任内通过同“接近共产主义”的跨国组织——非洲民主联盟领导人的谈判，以同意黑人与白人同工同酬、黑人可进入地方行政机关工作以及允许非洲民主联盟公开合法活动、释放被监禁的七名联盟领袖（后来都当了有关国家的总统），换取非洲民主联盟承认法兰西联邦，促使联盟成员走出丛林，结束同法国殖民当局的地下斗争，缓和了黑非洲局势。他还把黑人议员、非洲民主联盟主席乌弗埃—博瓦尼等人从法共议会党团拉到“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会党团之内。他在1953年发表的《在法兰西联邦的疆界内》一书中，明确主张让黑非洲国家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仍归法国掌管。

那时他所设想的改革还是很有限的。一方面，密特朗本人的思想还不能跳出殖民主义的框框。他不但认为法兰西联邦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且希望法兰西殖民帝国在地图上大些、更大些。另一方面，他考虑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稳定黑非洲局势、防止法兰西两帝国瓦解，而不是实行非殖民化。他强调：“我们需要我们的殖民地。放弃这些殖民地就是抛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方法是有害的，让我们换一换方法。”但是，在当时，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即便是换一换维护殖民利益的方法，也会招致殖民主义集团的猛烈反对。

殖民主义分子公开指责密特朗部长：“你把非洲拱手让给黑人，除了黑人共产党，就数你的政策最反法国了，你出卖了我们。”一些国民议会议员，作为殖民集团的代言人，甚至联名致电法国总统奥里奥尔，要求解除“把黑非洲拱手让与‘国际共产主义’的部长——密特朗的职务。”总统在爱丽舍宫召见密特朗，对他说：“您是对的，但是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抗议。”果然，1951年8月，密特朗的同党普利文组阁时，没有吸收他参加新政府。

在密特朗看来，法属黑非洲幅员辽阔，固然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本土隔地中海相望的北非（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战略地位尤为重要。1953年9月5日，他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强调指出：“在我看来，维护法国在北非的存在，即从比塞大（突尼斯）到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的存在，是我国任何政策的第一需要。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1954年5月22日，他还断言：“丧失北非，也就没有法兰西的历史前途。”他主张对突尼斯、摩洛哥采取某些灵活的做法，以利于稳定局势。

1952年1月，密特朗在短命的埃德加·富尔内阁（1952年1月20日—2月29日）中任负责突尼斯事务的国务部长。当时突尼斯局势异常紧张。前届政府于1951年12月15日拒绝突尼斯政府要求实现“内部自治”的要求，并解散突尼斯政府，宣布执政党新宪政党为非法，将该党大部分领导人逮捕入狱。突尼斯人民展开大规模武装斗争，法国派兵7万前往镇压，仍无法控制局势。密特朗主张使用软的一手，制定了一项改革计划，规定成立一个全部

由突尼斯人组成的政府和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议会，法国只控制突尼斯的国防、外交和经济命脉。密特朗没有使用“内部自治”的提法，实质与此相仿。这在当时可算得是相当大胆的方案了。由于内阁很快垮台，这项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53年6月，密特朗在拉尼埃政府中担任驻欧洲委员会部长级代表，但仍非常关注北非局势的发展。8月24日，法国驻摩洛哥总督纪尧姆将军在军队和当地殖民集团的支持下，废黜了要求独立的摩洛哥苏丹（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扶植傀儡本·阿拉法为新苏丹，密特朗不能容忍这种老殖民主义行径，于9月4日提出辞职。他明确表示：“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诚实就是当他不同意某种政策时辞职不干。”殖民主义分子造谣说，密特朗是被赶出政府的。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在议会两院正式宣布，密特朗是自动辞职的。

9月5日，密特朗同《快报》记者谈话，说明辞职的原因。结论是：“我相信，坚定是一种美德，威信也是可贵的。然而，必须使坚定和威信为演变服务，而这种演变如果不是同我们一起进行，那就会对我们不利。”意思是说，对殖民地的演变，必须因势利导，而不是与之敌对。

26年后，他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道：“废黜苏丹是总督和当地官员勾结两名部长背着政府干的。新苏丹已经登基，而爱丽舍宫还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一句话，国家已不成其为国家……我辞职了。我看到一家报纸用大字标题报导我辞职的消息：‘密特朗逃出正在下沉的船’。”确实，这次辞职提高了密特朗作为殖民地问题上的“鸽”派的声誉。正因为密特朗一直主张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并以有限的政治让步熄灭黑非洲和突尼斯、摩洛哥的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同孟戴斯—弗朗斯合作默契，关系融洽，互相倚重，从印支到北非，共同推行了有别于老殖民主义的政策，开创了新局面。

谁泄漏了国防机密？

1954年7月2日早晨，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刚进办公室坐定，电话铃响了：突尼斯与摩洛哥事务部长克里斯蒂昂·伏歇紧急求见，有要事禀报。几分钟后，伏歇急冲冲地进来，嚷道：“出大事了！”说着，把一个卷宗递给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打开卷宗一看，不免大吃一惊：6月28日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纪要竟然出现在法共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里。据说，文件内容已由法共转告正在同法国作战的越南当局。

伏歇解释道：这份文件是一个专门调查共产党活动的主要警官让·迪德亲手交给他的。过去他在为戴高乐将军外出旅行做保卫工作时认识此人。在这份文件里，共产党人自己说出了情报来源：“幸而一位政府部长给我们提供了情报”。据迪德称，他的眼线告诉他，是财政经济部长埃德加·富尔泄的密，而他认为是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把这份文件交给内政部长。

孟戴斯—弗朗斯感到事情既严重又复杂，要伏歇守口如瓶，由他直接处理此案。他马上把总理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佩拉邦请来。此人曾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是个行家。总理交代说：“我们两人设法破这个案。眼下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显然，孟戴斯—弗朗斯不愿让主要涉嫌人与闻。因而，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主管部长密特朗竟一直被蒙在鼓里。

会议纪要是根据速记稿整理的。孟戴斯—弗朗斯首先从会议记录着手追查罪犯线索。他向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让·蒙斯查问会议原始记录的保存和使用有无漏洞。蒙斯声称：记录妥善存放在保险柜里，决无问题。工作人员也是可靠的。他无意中提供了一个意外情况：5月份那次国防委员会会议纪要也曾泄漏出去。当时除总理外，只有两位主管部长——国防部长勒内·普利文和内政部长马蒂诺—戴普拉知情。前总理拉尼埃向孟戴斯—弗朗斯移交权力时却只字未提。孟戴斯—弗朗斯意识到，两次泄密案很可能系同一人所为。要是果真如此，则此人必定是两届政府的两次会议的与会者。这一来，嫌疑人员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出席过这两次会议的人员除了政府秘书长安德烈·塞加拉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让·蒙斯两位文职人员外，只有科蒂总统、富尔以及朱安元帅、总统卫队长加纳瓦尔将军。密特朗早在1953年9月就辞去部长职务，自然不在其内。孟戴斯—弗朗斯认为，这几个人都不可能涉嫌泄密，会不会有人在爱丽舍宫会议室里安装了窃听器？

于是，孟戴斯—弗朗斯前往爱丽舍宫晋见科蒂总统。他劈头就对科蒂说：“总统先生，我有非常机密的事情向您报告。”科蒂立即把他引到总统私人餐厅去谈。孟戴斯—弗朗斯不知其中奥妙，误以为是为了防止窃听。总统解释道：“前任总统奥里奥尔留给我一部小小的录音设备。在这里谈重要问题，以后整理记录就方便多了。”孟戴斯—弗朗斯说明案情后，请求总统允许对会议室进行全面检查。总统欣然同意。但专家对爱丽舍宫会议室的墙壁和电

话机仔细检测一通，一无所获。

孟戴斯—弗朗斯及其办公室主任悄悄追查两个多月，毫无进展。而泄漏国防机密的传闻在巴黎政界和舆论界却不胫而走。在议会走廊里，盛传政府里出了“叛徒”；右翼独立党议员让—路易·维吉埃对有影响的《世界报》著名评论家雅克·福韦等人透露，他有证据证明，是密特朗向法共泄漏了国防委员会会议秘密。密特朗乃是法共秘密党员的谣言也在巴黎流传开了。一些戴高乐派议员甚至要求将密特朗交付最高法院审讯。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使密特朗怒火中烧。更使他恼火的是，身为内政部长竟未能从政府渠道得知泄密案的实情。

9月8日，孟戴斯—弗朗斯指示领土安全局（国内反间谍机构）局长罗歇·瓦兰（人们惯于沿用他在抵抗运动中使用的名字：罗歇·维博）侦破泄密案。维博立即向顶头上司密特朗报告。在这个事关他的前程和名誉的问题上，孟戴斯—弗朗斯竟长时间瞒着他。他感到孟戴斯—弗朗斯对他不信任，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他向孟戴斯—弗朗斯大兴问罪之师。一对政见相似，配合默契的政治搭档从此产生隔阂，关系冷淡了。在以后的年代里，两人虽也还有这样那样的联合行动，但那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两人之间的裂痕难以弥合。

当时，孟戴斯—弗朗斯放不下总理架子，没有请求密特朗谅解。事隔20年后，他对密特朗的传记作者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吐露道：“这是一个误会，我从不认为密特朗会是泄密案的主犯，一分钟也没有这样想过。的确，我当即决定不要马上把这件事透露出去，因此，密特朗同所有其他政府成员一样，没有得悉此事。我要领土安全局长罗歇·维博破案，而不同他的顶头上司内政部长打招呼，我承认，这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领土安全局属内政部管辖，这也是个客观原因。一旦总理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佩拉邦向我指出这一点之后，我就立即通知了密特朗。于是，他对自己被撇在一边感到非常不快。我向他说明事实真相，显然他不相信。我对此感到遗憾。”不管怎么说，密特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从9月8日起，由密特朗直接领导和部署侦破行动。他觉得法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很蹊跷，无疑是一桩针对政府和他本人的阴谋。他深知唯有将泄密案查个水落石出，方能推倒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但侦查工作障碍重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泄密者的线索一出现，一只无形的手就把这条线索掐断了。”

9月10日，国防委员会再次开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个诱饵，密特朗指望从中找到破案的突破口。在爱丽舍宫四周岗哨密布，监视附近的汽车是否进行远距离窃听；会议室内，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个人的神色和行动。只见部长和将军们个个正襟危坐，只有政府和国防委员会

的两位秘书长在作记录，这是他们的正常工作。宫墙之外，亦未发现任何异常。

但是，三天以后，巴黎盛传国防委员会会议情况又被泄漏出去，谣传甚至指名道姓断定系内政部长密特朗所为。密特朗没有作出反应，他说：“我毋需为自己辩护。”9月18日，迪德警官又来到克里斯蒂昂·伏歇家里，面交一份国防委员会会议的很不完整的摘要。按照密特朗的命令，领土安全局的特工人员在途中截住了迪德，从他的公文包里搜出两份文件，其中之一就是尚未完成的9月10日会议记要手稿。接着，顺藤摸瓜，搜查了向他提供文件的安德烈·巴拉内的住宅，从壁炉里查获几页尚未写完的会议记要手稿。巴拉内系法共巴黎第九区区委委员，左翼《解放报》记者。他躲到一位巴黎议员的乡间住宅，还是被追捕归案。他拒不交代文件来源，诡称他是从瓦尔德克·罗歇主办的《土地报》办公室偷来的。经查证，纯系捏造。

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蒙斯将巴拉内的会议记录手稿与会议原始记录核对，除少数细节外，两者没有什么出入。由此断定，案犯必定是有机会接触存放记录的保险柜的人。经追查，案犯果然是国防委员会的两名工作人员。一个是秘书处主任勒内·蒂尔潘，一个是国家保安处长罗歇·拉布律斯。前者从保险柜里取出会议原始记录，由后者转交给巴拉内，改头换面写成记要。

如同多数大案要案一样，泄密案也只能抓住几个浮在面上的案犯，幕后操纵者则逍遥法外。但是，无论如何，密特朗总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侦破此案，本可暂告一段落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密特朗的政敌还紧紧缠住他不放。

1954年12月3日，国民议会辩论泄密案。戴高乐派（法兰西人民联盟）企图借此挑起政府危机。平时稀稀拉拉的会场，这天却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戴派议员雷蒙·德罗纳首先发难。他指着端坐在政府席上的密特朗说道：“国家机关，甚至要害部门，都因共产党人的渗透而被腐蚀，尤其是警察机构的最高层也遭到有特殊经验的人的腐蚀……内政部长先生，您不应该忘记，这种人的缺点使得他们在您安排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容易出毛病。”另一名右翼议员让·勒让德尔则影射攻击密特朗1953年不得不辞去部长职务是因为他泄漏了国防机密。他甚至暗示，奠边府惨败同密特朗泄漏国防机密有关。“奠边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数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吃了败仗？因为军队在巴黎被出卖了。”他强调，1953年7月国防委员会会议情况被公诸报端，等于是把我们的作战计划告诉敌人。他不知道当时拉尼埃政府何以没有追查泄密案犯，“但是，密特朗先生可以告诉我们。他当时是政府成员，并且参加了1953年8月5日的内阁会议。在会上樊尚·奥里奥尔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先生们，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叛徒。’三周之后，密特朗先生离开了政府。”

当时任法共政治局委员，以农民问题见长。1964年多列士逝世后，继任法共总书记。

全场愕然。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气愤不已，厉声嚷道：“你在影射什么？”他竭力为密特朗辩护：“我把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委托给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我从不后悔，一分一秒也没有后悔过。在我的政府里有这样一位成员，我感到自豪。不幸的是，政治人物的荣誉受到攻击是屡见不鲜的，在左翼人士中间尤其如此。”

密特朗面色苍白，但镇静自若。他缓步走上讲台，平心静气地说明最近这次泄密事件的经过，然后直接对付勒让德尔的挑战：“我想谁都不怀疑勒让德尔先生想说明，我在1953年7月有不可告人之处，也可以称之为叛国。”

“好在拉尼埃政府的不少部长就在我们中间。我想，他们还记得，我之所以辞职是由于我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假如有哪位我以前的同僚同意勒让德尔先生的意见，他就应该说出来。如若没有，那么，勒让德尔先生凭什么血口喷人？”会场长时间的沉默，议员们的目光投向拉尼埃政府的成员。没有一个站起来附和勒让德尔的指责。突然，人民共和党元老、拉尼埃政府的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站了起来。前一天，他在预审法官面前宣誓作证：密特朗曾经不慎泄漏过国防委员会某次会议的情况，因而在政府成员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会在国民议会扔下一枚政治炸弹吗？人们屏息以待。他细声细气地说：“部长先生，您刚才解释了您离开政府的原因，我证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至于我自己，我曾经在发誓的情况下作证20分钟。但是，我现在不想重复当时我说过的话。”密特朗赢了。

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在国民议会讲坛上郑重宣布：密特朗“是个爱国者，是珍惜荣誉的人。他是有权在法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人士之一”。法国知名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快报》周刊的札记中赞许道：密特朗“异常沉着地进行抗击。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善于击中对方要害的拳击手。”他进一步总结道：“如果说他同德雷菲斯一样无辜，那他比德雷菲斯精明得多。”当年对密特朗并不宽容的《世界报》著名评论员雅克·福韦后来在其所著《第四共和国》一书中作了公允评价：“泄密确有其事，而且层出不穷，如同审讯所证实的那样。但是，应该肯定地说，密特朗没有丝毫牵连。”

这起无中生有的政治丑闻仅仅是针对密特朗个人的吗？当然不是。密特朗是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的得力助手，事实上是政府第二号人物。通过扳倒密特朗搞垮孟戴斯—弗朗斯政府，这才是这起阴谋的要害所在。

阴谋出笼的时间是1954年7月初，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一位政府要人向法共提供军事机密，无异于在法国远征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耸人听闻的叛国行为岂不是搞垮政府的绝好借口吗？一旦孟戴

法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或历史的诱惑》，第150—151页。

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雷菲斯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德雷菲斯蒙冤达12年之久，几经曲折才获平反。

斯—弗朗斯政府垮台，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自然将半途而废。而破坏日内瓦会议、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正是法国主战派势力处心积虑追求的目标。无怪乎美国对泄密案也极感兴趣，不惜高价收买有关情报。事隔数月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同孟戴斯—弗朗斯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可以作为这起阴谋的绝妙脚注。

杜勒斯说：“您知道，有人向我提供了反对您的见不得人的材料。不过，我们的专家认为，这不是真的。”

孟戴斯—弗朗斯说：“但愿您没有化太多的钱……”

杜勒斯笑着说：“哦！比情报本身的价值要高得多！”

孟戴斯—弗朗斯以莫大的政治勇气冲破重重阻力果断地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后，立即着手处理棘手的北非局势，宣布允许突尼斯“内部自治”，接着准备对摩洛哥作出政治让步。这一切都不合右翼势力和殖民主义集团的口味，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围绕泄密事件的政治较量拖延时日的原因所在。

当然，泄密案也有针对密特朗的一面。这是因为密特朗年轻有为，是第四共和国政坛上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是中间偏左势力的新兴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在殖民地问题上不同死硬派亦步亦趋，为极右和右翼势力所不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指出：“密特朗的对手对他的刻骨仇恨表明，他是法国左翼的一位领袖人物。左翼需要好几个领袖人物，左翼终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时，把密特朗视为左翼领袖人物，似为时过早。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预见倒是符合实际的。

“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

1954年10月16—22日，孟戴斯—弗朗斯内阁的内政部长密特朗到阿尔及利亚正式访问，宣布“改革”计划。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国时，他宣称：“我看到，阿尔及利亚三个法国省份平静而繁荣。我满怀乐观情绪离去。”

1954年11月1日，这天是亡灵日，全国放假。法国人手捧菊花，络绎不绝前往扫墓。到处是一片肃穆和宁静。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在家里悠闲地浏览报章杂志。忽然电话铃响了，传来内政部长密特朗的急促的声音：“我刚接到驻阿尔及利亚总督莱奥纳尔的电报。昨天深夜阿尔及利亚全境发生一系列袭击和暗杀事件……孤立起来看，每起暴力行动似乎规模不大，但是各地同时行动，这非同寻常。这是新现象，是个危险的信号。”

殖民地危机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这一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奥雷斯山区和君士坦丁地区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随即迅速扩散到阿尔及利亚各地。

密特朗对阿尔及利亚出现突发事件既感到几分意外，又不完全出乎意料。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时问过他何以选择内政部，他回答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出现爆炸性局势，那就必须立即着手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对人说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局势已十分紧张，具有爆炸性。而密特朗已经看到了。头一个提醒我提防出事的人，是密特朗。”密特朗当内政部长才几天，就悄悄告诉总理：“阿尔及利亚局势很不妙。”10月，密特朗从阿尔及利亚访问归来，对外表态对局势渲染乐观情绪，向总理汇报却是另一码事。他说：驻阿尔及利亚总督和军方比较乐观，但情报部门表现不安。情报首脑预计“可能发生全面的暴力行动”。在发生武装起义前两天，密特朗在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代表大会上声称：阿尔及利亚“确实有一帮武装叛乱分子，他们是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必须用武力消灭他们。”

密特朗作为内政部长，直接管辖阿尔及利亚三省（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他的职责就是维持治安。他立即会同国防部长调兵遣将，火速派去增援部队，特别是从印度支那撤回的伞兵和共和国保安部队，实行血腥镇压。11月底，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密特朗在国民议会宣称：“军队在那里不是为了进行镇压，而是为恢复和平、秩序和对法国的信心。”他信心十足地预言：这场“叛乱”必败无疑。他没有料想到，另一场持续八年之久、影响更为深远的殖民战争在他任内开始了。

1834年法国强行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1871年，阿尔及利亚被划为法国的三个省，由法国派总督直接统治。100多年来，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在1000万人口中，有150万法裔居民，即所谓“黑脚”。他们同本土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多数家庭都有亲友在阿尔及利亚，因而，阿尔及利亚的前途牵动着法国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成为法国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密特朗因袭传统的殖民主义观念，而且竭力卫护这种陈腐观念。10月19日，他在阿尔及利亚议会发表的一篇“纲领性讲话”

中，把阿尔及利亚定位在辽阔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中心：“什么是法兰西共和国？根据宪法，它由法国本土、阿尔及利亚各省和海外领地组成。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国土上——它仅次于从列宁格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国土，但大于从华盛顿到旧金山的国土——到处都飘扬着我们的国旗。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阿尔及利亚位于何方？位于中央，位于共和国力量集中的地方。”

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起义，密特朗认为唯有武力镇压一途。11月5日，他在国民议会内政委员会杀气腾腾地宣布：“无论如何不能设想同叛乱分子进行谈判。”“只能有一种解决办法：战争，因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密特朗这篇“战争宣言”博得阿尔及利亚极端殖民主义集团的喝彩。这个集团的喉舌《阿尔及尔回声报》称赞密特朗的讲话“给听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954年11月12日，孟戴斯—弗朗斯在国民议会宣称：“法国对突尼斯的政策与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是我们所保护的国家。”“任何人不能指望我们对叛乱采取宽容态度。”内政部长密特朗同总理一唱一和，斩钉截铁地说，“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各省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省份。”这就是法国政策的信条。他在议会讲坛上问道：“为了卫护法国，有谁会不愿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呢？”他宣布将对阿尔及利亚的“不法分子”进行“严厉镇压”。

密特朗主张和平解决印支战争和突尼斯、摩洛哥问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他是倾向于非殖民化政策的，至少是主张以谈判代替镇压的。其实，他还不能真正脱出老殖民主义的窠臼，而有很大的局限性。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这种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

1965年9月29日，密特朗对法国《新观察家》周报谈话中，为自己的立场开脱：“当年如果我作为管辖阿尔及利亚诸省的内政部长不这样表态，那就会促使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垮台。”事实上，尽管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大力推行“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在围绕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吵嚷声中未能获得议会信任票而于1955年2月6日倒台了。

1956年1月，议会改选，由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等组成的“共和阵线”获得多数。密特朗反对激进社会党领袖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支持社会党总书记摩勒任总理。密特朗在摩勒内阁中任司法国务部长，地位仅次于孟戴斯—弗朗斯，成为内阁第三号人物。摩勒变本加厉地进行军事镇压，派驻阿尔及利亚的总兵力从上台初期的20万骤增至7月间的40万人。密特朗虽对某些具体做法持不同意见，但总体是积极支持强化军事镇压的政策，甚至在孟戴斯—弗朗斯因反对强化军事镇压而辞职后，他仍留在政府内。他宣称：“我同意在阿尔及利亚使用武力，因为这是争取谈判空间的

最后手段。”在他看来，军事镇压是任何政治解决的前提。他只是不同意摩勒让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戈斯特和阿尔及利亚驻军放手去干，认为政府自动放弃领导是无法容忍的。

作为司法部长，他授予军人以司法权，实行“刑事紧急判决”。他上任不久就发布一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凡犯有诸如反对国家内部安全、进行武装暴动、策划或参加犯罪集团、妨害公路交通、杀人或预谋杀人和拘禁人员”等罪行者，均交付当地军事法庭审理，对阿尔及利亚居民横加迫害和镇压。当时，阿尔及利亚滥捕、滥杀、严刑拷打成风，招致法国舆论界的非议和谴责。

摩勒政府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绑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事件。1956年10月22日，民族解放阵线主要领导人本·贝拉等五人从开罗飞抵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同国王会谈，然后国王安排一架专机送代表团去突尼斯会见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法国军方情报机构获悉后，策划空中劫持，命令专机机长（系受雇于摩洛哥航空公司的法国驾驶员）飞往阿尔及尔。航空小姐也是法国人，她设法转移代表团人员的注意力，飞机不知不觉转道向阿尔及利亚飞去。飞机着陆，代表团五人立即被扣留监禁。法方的目的在于使民族解放阵线群龙无首，以利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

密特朗获悉这一惊人消息后，怒不可遏：“这是犯罪！”司法部长办公厅主任说：“密特朗暴跳如雷。谁也不敢同他说话。我们得躲得远远的。”密特朗随即怒气冲冲地前往总理府，责问摩勒。摩勒推说这事是驻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戈斯特和国防国务秘书勒热纳背着他干的。他承认这是件“蠢事”，但他强调“我们无法后退，否则就会被人耻笑”。密特朗表示异议：“这是法国的耻辱。坦率地说，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摩勒生怕密特朗提出辞职，惴惴不安地问道：“您也许不至于像萨瓦里这个流氓那样给我来一下子吧？”密特朗摇摇头说：“您和我一样，都是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我仍然支持您。”摩勒高兴地说：“我将永志不忘。”

密特朗在殖民地政策上同摩勒存在某些做法上的分歧，在政府内部不时表示不同意见。但是，密特朗为什么不像孟戴斯—弗朗斯或萨瓦里那样辞职以示抗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坚持“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为自己的政治前程着想。他自己承认，“我不想把自己置于经常闹辞职的地位。”1977年他同《巴黎日报》记者谈话中回顾道，他在拉尼埃内阁中已辞职过一回，如果再退出摩勒政府，那就只好永远当反对派了。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密特朗觊觎总理职位已非一日。他早就说过，“对政治家来说，唯一的雄心就是执政。那些满足于当国务秘书的人，只不过是

负责摩洛哥和突尼斯事务的国务秘书萨瓦里愤而辞职。

店主的心态，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对至亲好友表示：“任何傻瓜都能在50岁当上总理。至于我，我40岁就能当总理。”按说，在第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当过国务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这样的政治人物是满可以当总理的，但密特朗却一直未能如愿。他曾向一位亲近的女记者吐露过：“1956年议会选举中，谁都觉得我疲惫不堪，甚至以为我病了。其实，我是在强行压制我还没有当上总理的怒火。”因为这一年他正好40岁。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当然不能轻易辞职，以免使对他颇有好感的科蒂总统不悦，也免得同组阁活动的关键人物——社会党权势人物摩勒闹翻。

1957年5月摩勒政府倒台后，密特朗不再参加政府，但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1957年6月，《巴黎新闻》问及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策主张时，回答是：“保持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问及法国著名评论家雷蒙·阿隆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一书中提出的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主张时，密特朗说，“我个人认为，这未免过于悲观。”1958年3月，他在《涅夫勒邮报》撰文称：“放弃阿尔及利亚，那将是犯罪。”直到1959年，与反对戴高乐和“向左转”相吻合，密特朗才公开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探索非殖民化的道路。然而，密特朗过去一再宣扬“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唯一的谈判就是战争”之类的论调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左翼人士中间尤其如此。1959年6月25日，他在参议院的发言中公开承认错误：“我曾经支持过现在看来后果非常糟糕的政策。我谨向国人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他在同《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提出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主张。他说，如果他是政府成员的话，他无疑会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他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也表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这种说法“当时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因为阿尔及利亚是由三个法国省份组成的。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还承认，当年作为司法部长，将司法权交给军方“显然是错误的”。

“ 不许 ‘ 慕尼黑 ’ 重演 ”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扼地中海与红海的交通咽喉，是从大西洋、地中海到红海、印度洋、太平洋的国际海上航运的要道。埃及的行动震撼了西方世界，对法、英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法国占有运河公司股份的一半以上，英国占45%。法国总理摩勒把纳赛尔比作希特勒，强调不应该像对希特勒那样对纳赛尔让步。他宣称，法国将奉行强硬政策，决不能同意埃及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内政部长密特朗叫嚷：“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侵占苏伊士运河，如同纳粹德国染指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不许“慕尼黑”重演。摩勒政府积极策划军事冒险，为挽救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残局不惜孤注一掷。英国认为，苏伊士运河是英帝国的“大动脉”，不惜使用武力以维护其在埃及和中东的传统势力。法英勾结以色列借机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

法国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控制运河还是第二位的，实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一个插曲。法国政府认为，纳赛尔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重要后盾，为其训练军事人员、提供军事装备，企图利用运河事件进军埃及，搞垮纳赛尔，切断这条供应线，从而促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早日胜利结束，或者至少能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早在7月29日，法国外交部长皮诺就对英国外相劳埃德说过：“在埃及打一个胜仗，胜过在北非打10个胜仗。”联系到10月22日绑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五名领导人事件，法国的意图就更加清楚了。

按照三国秘密商定的安排，10月29日以色列大举进攻西奈半岛。次日，英法政府借口保护运河正常通航，分别向埃、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将各自部队撤至运河两侧10英里以外，由英法军队暂时进驻运河沿岸的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以保证航行畅通。以色列立即接受最后通牒，埃及断然拒绝。这样，英法联军就师出有名了。

10月30日，摩勒总理和英国首相艾登分别通知本国议会，宣布两国将出兵占领运河要地。密特朗作为政府第二号人物在议会讲话中强调，支持政府立场就是“支持和平”。他不安地指出，“国民议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可能造成分裂的争论”，而今“事关法国利益，全国都应支持政府”。他呼吁：“赶快行动起来！这是法国利益攸关的大事！”这一天，法国国民议会以368票对182票支持英、法出兵苏伊士。

11月5日，英、法不顾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不顾联合国大会要求各方立即停火的决议，悍然出动伞兵占领塞得港，次日海运后续部队登陆。英国首相艾登在美国和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于6日中午宣布接受停火。入侵部队系由英国统一指挥，摩勒独力难支，不得不在7日凌晨作出同样决定。英、法于12月22日将全部入侵部队撤出运河地区。欧洲老殖民主义者最后一次军事冒险以失败告终，敲响了某些巴黎左翼人士称之为“摩勒式的民族主义”

的丧钟。“炮舰政策”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密特朗事后表示，他在“既成事实面前又一次犯了顺从的错误”。据消息灵通的记者报导，他希望政府“与其掩盖失败，倒不如作一次全面的总结”。不过，他没有这样公开表态。

摩勒政府军事冒险失败，威信扫地。阿尔及利亚战火愈烧愈旺，浩大的战争开支加剧了法国财政困难。1957年5月21日，摩勒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政策问题上倒台，实质上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导致政府垮台。与此同时，密特朗也结束了在第四共和国青云直上的历史，开始了漫长的在野生涯。不过，这并非他的本意。

摩勒下台后，内阁危机频繁，拖延日久，密特朗企望乘法国政坛烟云迷乱、诡谲多变之际脱颖而出，实现组阁的宿愿。接替摩勒组阁的布尔热—莫努里组成政府后执政才三个半月，即于1957年9月30日倒台。政府危机延续达35天之久。费利克斯·加亚尔好不容易拼凑了一个所谓“全国团结内阁”，又于1958年4月15日倒台。政府危机持续28天。政府短命与内阁难产交织，政局极度混乱。

密特朗没有参加这两届短命内阁，他在等待观望。他日夜企盼的是：攀登上第四共和国的内阁总理高位。法国驻联合国代表、“民主社会抵抗联盟”成员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说：“密特朗急不可耐……他要我作好准备，一旦他受命组阁，要我立即同他一起工作。”密特朗整天守在电话机旁，等候爱丽舍宫的召唤。他的挚友乔治·达扬看他坐立不定的样子，开玩笑说：“让我们去找老头子（指科蒂总统），摸摸他的底。”

事实上，科蒂总统对人说过，他“非常赏识密特朗的政治家才能”，在旷日持久的内阁危机中确实考虑过授命密特朗组阁，但考虑到密特朗未必能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始终未作此尝试。1958年5月31日，国民议会讨论授权戴高乐组阁那天，科蒂总统接见各议会党团代表做说服工作。他见到密特朗时，拉住他的手说道：“唉！我老是想要请您出来解救危机，但是，您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您也许会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我怕阿尔及尔会闹事！”密特朗故意说道：“确实，共产党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有益的。”科蒂总统听了十分惊讶。密特朗认为，科蒂未必真想请他组阁，只不过是作多种设想而已。他提到请共产党人入阁，也就断了总统的念头。

无论怎么说，密特朗当了11任部长，最终未能入主总理府，这也许是美中不足吧。不过，20多年后他竟一步登天，入主爱丽舍宫，也就无需抱憾了。

第三章

反戴高乐的旗手

向戴高乐说“不！”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和军队中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尔发动了一场针对第四共和国的军事暴乱，阿尔及尔全市罢工、罢市、罢课。10万人示威游行，占领总督府大厦，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马絮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向巴黎施加压力，要求“在巴黎成立一个救国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作为本土不可分割的领土保持下来”。这时，法国尚陷于政府危机，国民议会正在吵吵嚷嚷地辩论授权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组阁问题。14日凌晨3时半，弗林姆兰内阁才勉强组成。巴黎合法政府与阿尔及尔救国委员会两个政权紧张对峙，犹如两个拳击老手彼此紧紧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参加军事暴乱的殖民军队将领制定了向本土和巴黎进军的“复活”行动计划，暴乱伞兵随时准备去巴黎着陆。整个法国处于军事政变的威胁之下。

5月15日，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在总督府阳台上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高呼：“戴高乐万岁！”这表明了军队拥护戴高乐上台的意向。四小时之后，在科隆贝双教堂隐居了12年的戴高乐登场了。他打破多年来的沉默，向报界散发了一份寥寥数行而字斟句酌的声明：“我已作好了执掌共和国权力的准备”。戴高乐的声明无异于一颗超级政治炸弹，震动了全国朝野。主张戴高乐复出的势力更加振振有词，同时也招致一片反对声和抗议声。密特朗跻身于强烈反对者之列。

5月24日，军事暴乱扩及科西嘉岛，本土岌岌可危。政府束手无策，戴高乐顿时成了法国统治集团唯一可能解救危局的王牌。戴高乐力争依靠阿尔及利亚军事暴乱，通过合法途径上台。然而，同各党派的幕后磋商进展迟缓。

5月28日整整一天，巴黎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人们仿佛坐在火药桶上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被炸得粉身碎骨。弗林姆兰内阁于这天凌晨辞职，法国处于可怕的政治真空之中。暴乱分子将在巴黎空降伞兵的消息频频传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长莫克向看守内阁报告，科西嘉式的叛乱行动有可能在27日至28日晚间在法国本土重演。

巴黎街头却另有一番景象。由激进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和某些社会党人以及法国总工会等团体组成的“保卫共和行动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有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孟戴斯—弗朗斯、密特朗、法共第二把手杜克洛等各党派代表人物，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前列。示威游行既反对军事暴乱，也反对戴高乐上台。游行人群高呼：“不许法西斯得逞！”“绞死马絮！”“把戴高乐扔进历史博物馆！”

5月29日，科蒂总统孤注一掷，采取特别程序，向议会两院发表总统咨文，召请戴高乐组阁。总统私下动情地吐露心声：“咨文是我打的最后一张牌了。如果议会不听从我，如果他们不投票支持最伟大的法国人（指戴高乐），我寻思我是否应该奉献我的生命以感化他们。”当晚，科蒂在爱丽舍宫接见戴高乐，商谈组阁程序。

戴高乐通过合法途径重新上台几乎已成定局，但最后还必须过国民议会批准这一关。31日，戴高乐在他经常落脚的巴黎拉佩鲁斯旅馆会见除法共以外的各政党领导人共26人，宣布他的施政纲领，挨个儿征询意见，争取支持：“您倒说说看，当我出席国民议会会议时，您有什么重大的反对意见？”第四共和国的元老们无人表示异议，唯独密特朗一人强烈反对。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记述道：“除弗朗索瓦·密特朗大肆指责借以泄愤外，所有出席的代表——他们几乎全部是12年来一直公开攻击我的一一对我将从事的工作的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密特朗斩钉截铁地声明：“将军，只要您不公开谴责阿尔及尔救国委员会和军事暴乱，我就不会投票支持您。共和政体不可能从军事政变中产生。”接着，两人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

密特朗以挑衅性的口吻说道：“将军，您出现在这里，是各种非同寻常的事件的巧合。您本可以不到这里来。您本可以不用出生或者早早死掉才好。”

戴高乐反问道：“此话怎讲？密特朗，您倒给我解释解释看。”

密特朗毫不示弱：“我的意见是：我们刚刚走上一条异乎寻常的、危险的军事政变的道路，如同南美一些共和国曾经发生过的。在您看来，为了对付这种有可能导致法国崩溃的悲剧，除了求助于您，别无他途。将军，但您终究是要死的呀……”

戴高乐打断了密特朗的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巴不得我死，是不是？”说罢，拂袖而去。这是密特朗与戴高乐的最后一次会见，会见以“决裂”告终。从此，密特朗开始了与戴高乐的公开较量。

6月1日，国民议会讨论授权戴高乐组阁问题。戴高乐能否通过合法途径上台，这是关键的一天；对密特朗来说，这也是政治前程攸关的决定性的一天。他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追述当时忧心如焚的情景：“我独自一人沿着塞纳河左岸来回踱来踱去达数小时之久。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时隐时现，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左思右想，焦虑不安。应当捍卫那个已不能使法国恢复它的地位的（第四共和国）政治制度呢？还是应当参与行将摧毁那个政治制度的阴谋（指捧戴高乐上台）？……一切都促使我赞成推倒奄奄一息的第四共和国和游手好闲的达官贵人。同时，一切也都促使我

密特朗：《未完成的回忆录》，第189—190页。弗朗兹—奥利继埃·吉埃斯贝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或历史的诱惑》。第176—177页。

反对那种佯装宽厚、实则是赤裸裸的专制独裁。”“当我回到波旁宫（国民议会）时，我已拿定主意：唯一的办法是维护一个人的荣誉。”

这一天，戴高乐正式出席国民议会，发表总理候选人的例行演说，只是比通常简短得多。他宴求议会授予政府六个月全权，委托政府制订新宪法，议会从此休会。戴高乐随即退席。戴高乐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议员们经历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授权辩论，而这一次却不同往常。大家都很清楚，同意授权组阁意味着第四共和国的末日。

在激烈的辩论中，密特朗慷慨陈词：“当1944年9月10日戴高乐将军出席咨询议会——这个议会是国外的战斗与国内抵抗运动的产物——的时候，他身旁有两位伙伴：荣誉与祖国。但今天他另有两个伙伴相随：……暴力和叛乱。”“被指定组阁的戴高乐将军首先是由叛乱军队召请出山的。他要求授予的权力，他已经通过政变拿到手了。”

在表决的关键时刻，议员们脑海里浮现出历史的回忆。1940年7月10日两院联席会议将权力移交给贝当，断送了第三共和国。当时有80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后来，投赞成票的议员声名狼藉，投反对票的则被推崇备至。因此，议员们的心情极为沉重。

密特朗听到一位前总理低声说道：“要是我父亲看到我，必定会给我一记耳光。”因为他投了赞成票。密特朗离开议员席走向主席台投票时，一位年轻议员拉住他的两只胳膊说道：“至少，您该顶住。”密特朗给他看了看手里捏着的蓝票（反对票）。过了一回儿，这位年轻议员投了弃权票。有22位议员当场倡议发表保卫共和国的呼吁书，当向报界分发呼吁书时，上面少了一个签名。这第22名议员的名字到哪里去了？第二天，人们在政府名单上找到了他。

表决结果，国民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投反对票的包括141名法共议员，49名社会党议员，18名激进党议员，4名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员。密特朗投了反对票。这样，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了。

9月4日，戴高乐向全国正式提出新宪法草案。戴高乐设计新宪法的基本思想，是革除从第三共和国到第四共和国延续80多年之久的议会制的弊病，削弱议会权力，降低总理和内阁的作用，建立以集大权于一身的总统为核心的新体制。新宪法的根本点是：由总统来体现一切权力和做出一切重大决定。总理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经议会表决，完全听命于总统。总统可以越过议会就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撇开议会，行使“非常权力”。当时法国知名政治学家戈盖尔称之为“没有议会权力的议会制度”。密特朗领导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与法共、激进党孟戴斯—弗朗斯派和一些左翼团体组成“民主力量联盟”，联合反对新宪法。密特

朗谴责新宪法集“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罪恶之大成”。1958年9月28日，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诞生，第四共和国覆亡。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戴高乐重新执政，不仅是战后法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密特朗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第四共和国的显要们像换乘地铁一样，纷纷登上第五共和国的车厢，当上戴高乐的部长了，密特朗领导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也发生分裂，大多数成员攀附戴高乐去了，他自己则选择了同戴高乐分庭抗礼的坎坷道路。

反对派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密特朗的个人处境愈来愈困难。1958年11月国民议会改选中，他丢掉了连选连任11年之久的议员席位。据戴高乐的亲密助手莱昂·诺埃尔透露：大选前夕，戴高乐问他：那些反对派头面人物将败北？他回答：“孟戴斯—弗朗斯”。将军叹息道：“太可惜了”。他又说：“弗朗索瓦·密特朗也选不上”。将军得意地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密特朗在政坛消失后，不得不重操律师旧业。前司法部长作为辩护律师出庭，倒有助于活跃法庭的气氛。有时他感到百般无聊。他对友人说：“我得好好思考，或是旅游一番，或是听听音乐。”但他不甘寂寞，念念不忘卷土重来。1959年4月，他总算当选为参议员，但政治影响就小多了。不料，半年之后，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参见下小节）好似雪上加霜，进一步把密特朗推进政治生涯的谷底。

密特朗何以不惜一切同戴高乐势不两立呢？

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自然是密特朗反对戴高乐利用阿尔及尔军事暴乱重新上台，建立以总统权力为中心的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密特朗知道，“五·一三”军事暴乱不是戴高乐组织的，也不是戴高乐挑起的，而是阿尔及利亚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搞的。但是戴高乐是知情的，并充分利用、依靠军事暴乱通过合法途径上台。这是密特朗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戴高乐一手制定的第五共和国个人专权的政治体制，无异于戴氏王朝，称之为“君主制的第五共和国”，他把夏尔·戴高乐称之为“夏尔大帝”。

密特朗与戴高乐对立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根子是“自由法国”与本土抵抗运动之间的斗争。密特朗自己说过：“我同戴高乐将军的冲突始于阿尔及尔。”这种冲突，决非个人恩怨，而是反映了国外抵抗运动与国内抵抗运动之间的冲突。他对戴高乐“吞并”抵抗力量尤其耿耿于怀。他写道：“打个比方，在南斯拉夫，是铁托，是国内抵抗运动压倒国外抵抗运动。于是，战后国内抵抗运动掌握了政权。在法国，情况

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但革命果实为大资产阶级所窃取。8月7日，议会两院通过1830年宪章，宣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为国王。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次年1月14日颁布总统独揽大权的新宪法。此处密特朗把戴高乐重新执政比作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黄袍加身。

恰恰相反，解放时，国外抵抗运动扼杀了国内抵抗运动。”从此，两种抵抗运动之间的牛争从未停止过。他本人同戴高乐的冲突也从未止息。他说得很明确：“（本土）抵抗运动与戴高乐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从来没有改变这种想法。从这一点出发，我同戴高乐主义一直格格不入。”

还有一个密特朗不能摆在桌面上的、更为深刻的缘由。戴高乐复出，既置密特朗于困境，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机遇。密特朗志在从反戴高乐起家，借以积聚力量，积累政治资本，最终取戴高乐而代之，登上法国权力的顶峰。戴高乐复出时已 67 岁，他能掌权多久？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那一天，密特朗召集亲信们说：“得等上 10 年”。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已隐约可见。后来多年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94 年密特朗总统回顾 30 余年走过的历程时，直言不讳：“一般说来，政治家是很喜欢掌权的。但是，从 40 到 64 岁（1957—1980 年），我与政权无缘。相反，我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组织工作。我不怕失败。在头 10 年里，尽是失败。但失败愈来愈小。1974 年我们得票 49.4%。再往前一跃，那就是 1981 年。”终于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老人与死者》。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 21—22 页。

1994 年 12 月 14 日同《新经济学家》编辑部人员的谈话。

天文台公园的枪声

1959年10月15日，《巴黎新闻》头版头条披露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悲剧有可能在明天发生。杀人凶犯别动队已经越过西班牙边境。黑名单已经确定。”

第二天，巴黎各报以头版头条报导：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昨日深夜在天文台公园遭暴徒枪击，幸免于难。谁都以为密特朗名列黑名单之首。声援和慰问信件雪片似地飞来。密特朗顿时成了“英雄”。记者纷纷上门采访。密特朗只简单表示：“同我的政界朋友一样，我是个爱国者。我只是想为法国效劳。据说，现在掀起了一股煽动法国人反对法国人的浪潮。”他不愿谈论枪击事件的细节。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10月15日，子夜时分，夜巴黎开始沉静下来了。密特朗同几个朋友用过晚餐后驱车回家。几分钟后，他发觉有辆黑色轿车在跟踪他。他故意开车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这辆车。他急中生智，快速开到参议院南边的天文台公园，急忙弃车，翻过铁栅栏，趴在花草丛中。这时，背后响起一阵枪声，座车连中七弹。那时是零时45分。

密特朗夫人还没有睡。像往常那样，她在等密特朗回家。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

“密特朗夫人？”

“是的。”

“我是巴黎警察署长莫里斯·帕蓬。您丈夫遭到袭击，但您尽管放心，他平安无事。”

密特朗夫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转而一想，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几个星期来她连接不断地接到恐吓电话：“如果黑色对你合适的话，那么你可以准备一个装黑色服装的衣柜。不久，你就得认领你丈夫的尸体了，……”接着是一阵谩骂声。

此案在巴黎轰动一时。不料，一周之后却成了政治丑闻。22日，前右翼议员罗贝尔·佩斯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这起枪击案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由他一手执行的。他是在核实密特朗确已不在车内之后才让他的同谋阿贝尔·达于龙开枪的。会场闹轰起来。这简直太难以令人置信了。这时，他不慌不忙地当场提出预谋证据。事发前几小时，他特意给自己写了两封信，一封以“待取邮件”方式寄巴黎；一封是寄往卡尔瓦多斯的挂号信。均有邮戳为凭。工作人员当场拆开，信中描绘的情景同15日晚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他还说明，行动前，他曾于10月7日、14日和15日三次会见密特朗，共同策划，商定行动路线和方式方法。他把此案说成是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舆论大哗。

事实上，事前佩斯凯确实三次悄悄见过密特朗，告诉他：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拟定了一份暗杀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人士的名单，密特朗名列榜首，要他小心提防。佩斯凯还出谋划策：一旦发现汽车被钉梢，要他千万别往家门口开，那里无处躲藏，还是逃往天文台公园比较安全。佩斯凯要密特朗严守秘密，也别向警察局报告，尤其不能泄漏他的姓名，因为“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您的”。密特朗信守诺言，真的为他保密，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后也没有报告警察方面。

佩斯凯说得活龙活现，而密特朗除了矢口否认，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反证。密特朗顿时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政治骗子。不仅成了政敌攻讦的目标，甚至许多朋友也嗤之以鼻，纷纷离他而去。戴高乐复出后，密特朗的政治处境本来就十分困难，天文台公园枪击案更使他走投无路。

戴高乐的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要在打倒在地的密特朗身上再踩上一只脚，建议参议院取消密特朗的议员豁免权。10月27日，检察院以亵渎法院罪要求取消密特朗的豁免权，因为密特朗故意向警方隐瞒了他与佩斯凯的关系这一重要情节，影响了警方的侦破工作。

11月25日，参议院讨论此案时，密特朗指责政府“不是自己拿一个政敌的名誉当儿戏，就是听任别人拿一个政敌的名誉当儿戏。”他援引前总理布尔热—莫努里的类似事件为自己辩护。一个月前，佩斯凯也曾悄悄告诉布尔热—莫努里，有人要暗害他，甚至说，第四共和国的一些元老将倒在血泊之中。这位前总理将信将疑，还是报告了国家安全局长，但没有说出佩斯凯的名字。此后，佩斯凯就不再纠缠他了。天文台公园事件发生后，布尔热—莫努里曾向内政部旧案重提，政府却把这一重要旁证久久束之高阁。密特朗强调指出：他“同布尔热—莫努里的遭遇一模一样，使用的是同一手法，捣鬼的不是别人，正巧也是佩斯凯。”他指责政府生怕“暴露自己是这桩丑事的主谋或帮凶。”然而，参议院仍以175对27票通过暂停密特朗议员豁免权的议案。这又加重了对密特朗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打击。

密特朗并不认输，他决意一步一步东山再起。他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刻画当年的心态：“面对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全仗着自尊心在起作用。我一心一意要恢复自我。在让别人信服之前，先得使自己信服——只要有坚定的决心，任何事情总能办成。”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36年过去了，这起奇离古怪的天文台公园枪击案，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密特朗有自己的说法。他被传讯后步出司法部大楼时，宣称：“极端主义组织造成的激动的政治气氛可以解释这次谋杀事件。”“有人即便不想置我于死地，至少是想要使我名誉扫地。”他在1959年10月30日巴黎《快报》撰文，又作了这样的解释：“的确，我受骗上当了。五年前，他们就盯上我

指1954年的“泄密事件”。

了。五年来，我一直走在布满陷阱和圈套的道路上。10月15日晚间我落入了陷阱。”

密特朗逝世后，密特朗夫人对《快报》记者旧事重提。她说，她一辈子有两件事真正使她心碎。一件是1941年她父亲被维希当局解除中学校长职务；另一件就是天文台公园事件。“1959年那一次，弗朗索瓦确实被打倒了。人们本想把他从肉体上消灭，结果，他在精神上被搞垮了。他寻思：‘怎么搞的？谁对我有这样的深仇大恨，非得把我弄到这般田地？’这个圈套确实布置得太周密了，以致无法逃脱……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才认清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们对弗朗索瓦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结论是：

“在这起事件中，历史证明，他太天真了。”

佩斯凯也没有好下场。1959年11月29日，他被指控参与1958年2月5日议会爆炸案遭逮捕。1959年12月4日，因健康原因被假释，后逃亡国外。几年后，他改口了，说此案的幕后策划者是戴高乐派头面人物。1975年1月8日，他又在极右翼《一分钟》周刊撰文，点了两个人的名字：当年的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和克里斯蒂昂·德拉马莱纳。1995年，他在就此案撰写的书中，又一次点了德勃雷的名。不过，他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没有人轻信他的说法。还有一种比较广泛流传的说法：此案是戴高乐派的情报部门操纵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消灭第四共和国时期留下来的最危险的对手。

总之，这桩无头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向左转

密特朗是个异常坚强的人。他处逆境而不馁，被打倒在地又慢慢爬了起来。

1962年10月，戴高乐提出宪法修正案：共和国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意味着，总统的极大权力将直接来源于“全体选民”，而不是来源于“选民代表”，从而使总统得以进一步摆脱政党和议会的掣肘。同时，当时戴高乐多次遭暗杀幸免，由普选直接产生总统也从体制上为戴高乐身后的继承问题预作准备。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些针对我的密谋和暗杀，使我有义务尽我所能保证在我身后有一个巩固的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共和国要有牢靠的最高领导。”10月28日，公民投票通过全民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法案。

全民选举总统，扩大了密特朗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他预感到一个走向权力顶峰的新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了。“从1962年起，即决定全民选举总统后，我知道，我将成为总统候选人。何时？以何种方式竞选？我无法预见。”1962年11月国民议会改选，密特朗在涅夫勒省原选区中击败对手戴高乐派候选人，重新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同时也就在事实上恢复了名誉。密特朗在政治上重新崛起了。

密特朗的目标很明确：坚持反戴高乐，取而代之。可是，戴高乐声誉卓著而又大权在握，密特朗孑然一身，无权无势，如何与之分庭抗礼，并最终取而代之呢？密特朗的战略方针是：变他与戴高乐的对立为左、有翼的对立，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左翼，以左抗右，战而胜之。

密特朗对法国政治形势有一个基本估计：“从社会构成看，左翼是多数；而在政治上，由于分裂的缘故，左翼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一旦实现以他为核心的左翼力量的团结，即可将左翼的社会构成上的多数转化为全国范围的政治上的多数。那时，左翼将压倒右翼，取得政权。密特朗也就大功告成了。

反对戴高乐和左翼联盟战略促成密特朗政治上、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密特朗急剧向左转，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出于政治需要。很显然，要实施以左抗右的战略，首先密特朗本人必须向左转；摇身一变而为左翼的代表人物。有人讽刺说，密特朗为了搞垮戴高乐，“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1963年12月，密特朗在一次法国社会党组织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大步向“社会主义”靠拢：“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折不扣地接受社会党人在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他还风趣地说：“对你们的党代会多年来通过的所有决定（至少从我成年的时候算起），我没有异议，我们之间不存在分歧。”

他进而明确表示：“我全心全意地相信，社会主义抉择是对付戴高乐政权的唯一办法。这就是我的基本信念。”

人们对密特朗“左”的表现，将信将疑。多年担任社会党总书记的居伊·摩勒对密特朗的种种社会主义议论不以为然。他说：“密特朗不是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而是学着谈论社会主义。这中间有着微妙的区别！”针对种种怀疑和嘲讽，密特朗强调：“我并不期待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考试。”言外之意，他的社会主义信仰用不着别人来鉴定、认可。

密特朗向左转的另一手，是加强抨击戴高乐政权的力度，使自己俨然成为反戴高乐的旗手和左翼的代言人。密特朗的口才和文采都是十分出众的。他充分施展他滔滔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笔锋向戴高乐挑战。1962年7月17日，他在参议院发言中断言：戴高乐政权乃是“独裁政权”。1963年7月17日，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中，强烈谴责戴高乐政府是“设置特别法庭的政府，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政府，是个人自由权利的死敌”。

1964年问世的《不断的政变》一书，既是声讨戴高乐政权的檄文，也是密特朗政治上冒尖的宣言书。他不仅猛烈攻击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而且对戴高乐的各项内外政策统统大加抨击。他指责“戴高乐将军在1958年5月13日至6月3日之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政变……推翻了摇摇欲坠的、但毕竟是合法的共和国。”他把戴高乐上台比作拿破仑称帝，“把第五共和国变成地地道道的君主政体。”“唯有共和国总统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宪法只不过是废纸一张。”结论是：戴高乐政权是“专制独裁”，戴高乐是个“独裁者”。“我很想用更亲切的字眼来称呼这位独裁者：（古罗马的）执政官、（中世纪的意大利的）最高行政官，无冕之王。可是，我觉得，这么一来，独裁者反而显得更可怕了。”结尾与书名相呼应：“依靠暴乱夺取政权的戴高乐主义是什么货色？政变乃是家常便饭。”

密特朗生前发表过13部著作。他自己认为，《不断的政变》是他的得意杰作，这部书好就好在提高了密特朗在全国的名望，提高了他在左翼力量内部的地位。

如果说，密特朗本人向左转还比较容易，那么要实现以他为核心的左翼力量的团结，难度就要大得多。当时法国左翼力量处于四分五裂，法共与其他左翼政党、团体之间的鸿沟尤深，反对戴高乐这一共同点远不足以促进联合。密特朗决定先易后难，从联合非共产党的左翼力量入手。1962年议会选举中，密特朗领导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与激进党组成民主联盟。1963年5月，左翼社团“雅各宾俱乐部”同“争取共和战斗同盟”组成“政治体制行动中心”，以“实现民主理想”为目标。密特朗担任这个小小的政党雏型的主席。同年9月15日，由这两个政治俱乐部出面，仿效19

世纪 70 年代共和派人士甘必大反对麦克马洪 的做法，在密特朗的选区举办一次“千人午宴”，以联络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人士，壮大反戴声势。1964 年 6 月，密特朗把 54 个政治俱乐部与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联合组成“共和制度大会党”。这还算不上是扎根基层和组织严密的政党，更多是一个非共产党左翼人士和政治团体的集合体，但不失为密特朗进一步联合左翼力量的一大笔政治资本。1964 年 9 月 10 日，共和制度大会党与社会党、激进党联合组成“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各党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密特朗担任主席。

1959 年天文台公园事件后，密特朗一度销声匿迹。几乎从零开始，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东山再起，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初步确立了非共产党左翼力量的领导人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密特朗的一大成功，同时也显示了他的非凡的政治才能。

甘必大（1838—1882 年），1879 年任众议院议长，1881 年任内阁总理。麦克马洪（1808—1893 年），法兰西元帅。1871 年镇压巴黎公社。1873—1879 年任法国总统，敌视共和派。

虽败犹荣

1965年，戴高乐第一任期届满，将进行总统改选。以往，总统由议会两院、省议会、海外领地议会、市议会的代表76000人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这回将根据1962年的宪法修改条款，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第五共和国的新事物，给这场总统角逐注入了新的复杂因素。

当时戴高乐政权正处于全盛时期。历时近八年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已告结束；战后拖延18年之久的非殖民化进程终于完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的1/4世纪里，法国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战争状态，取得了在国际上自行其是的行动自由。法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外债全部偿还，法郎坚挺。戴高乐派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在法国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一个稳定的执政多数派。抗美独立上升到新的高度，在全球范围、在各个领域向美国霸主地位挑战，法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有谁敢与戴高乐较量？一些反对派政党和报刊议论纷纷，说是要有一位“X先生”出马方可。此人必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但又不是第四共和国的显赫人物；必须擅长管理国家事务；政治上应是左翼和中右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其实，这位“X先生”的条件正是为社会党元老、马赛市长加斯东·德费尔设计的。此人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当过几任部长，在殖民地问题态度比较开明；他担任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市长多年，管理有方，成绩斐然，他也自称是“一位擅长行政管理的国务活动家”；作为社会党元老，他属于左翼，但又不太左；他一直担任社会党国民议会党团主席，在政界交游甚广。早在1963年12月，德费尔就宣布他将充当总统候选人。他主张建立非共产党左翼、中间和中右势力的“大联合”，同戴高乐抗衡。

德费尔出马，成为密特朗竞选总统的拦路虎。不过，密特朗为了显示顾大局、识大体，还是表示支持：“反对个人专权的法兰西战船，需要有一位领航的舵手。我赞成加斯东·德费尔的決定，我向他表示，我们许多人将团结在他周围。”

德费尔经多方努力拼凑“大联合”失败，于1965年6月宣布退出竞选。没有一个反对党愿意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为担心同戴高乐对垒得票将低于通常议会选举的水平，徒然损伤本党的声望。孟戴斯—弗朗斯德高望重，本可与戴高乐较量一番，但他无意参加竞选，因为他曾激烈反对全民选举总统，不能出尔反尔。右翼独立党元老比内是一个潜在的、有实力的候选人，但他迟迟不表态。激进党主席、密特朗的好朋友莫里斯·富尔作为中左候选人的呼声甚高。密特朗亲自找上门去探听虚实。他对莫里斯·富尔说：“我们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是，如果您出来竞选，我就不当候选人。”那天富尔正要前往希腊度假。他说得很干脆：“我不想参加竞选。这是我赴雅典的机票。我要去度假两周。我的意图不是很清楚吗？”事后密特朗才了解到，原

来莫里斯·富尔曾会见社会党总书记摩勒寻求支持，但摩勒一口回绝，表示他不能指望得到社会党的支持，因为他的政见与社会党不同。对密特朗来说，机会终于来了。“比内和莫里斯·富尔迟疑不决，给我以抢先行动的时间。”

9月9日，会见莫里斯·富尔的当天，密特朗就奔赴社会党总书记办公室，向竞选的关键人物摩勒打招呼。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据我了解，现在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所以，我决定当候选人！”摩勒好像遭受突然袭击一般，吞吞吐吐地回答：“好哇！无论如何，这个可以研究。不过，您总得让我召集党的领导人商量一下。”密特朗说道：“怕来不及了，因为我打算马上公开宣布。”

摩勒大吃一惊，问道：“什么时候？”回答竟是：“今天下午。”摩勒叫了起来：“您疯了！您不该冒这样的风险！同法共达成协议还差得远哩！您知道，社会党对同法共的任何协议都有严重保留。”

其实，对待法共的问题，密特朗早已胸有成竹。他汲取德费尔排斥法共拼凑“大联合”失败的教训，悟出一条道理：要突破老框框，置社会党的反对于不顾，联合整个左翼，包括法共在内，争取当左翼的共同候选人。

为了争取法共支持，密特朗早已多次会见法共总书记罗歇。罗歇对密特朗印象不错。他说：“我们没有忘记，1958年以来密特朗始终同我们一道同戴高乐的个人权力进行斗争。”还表示，法共无意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一是担心得票率过低；二是怕妨碍左翼联合的势头。法共倾向于左翼各党推举共同候选人，亦属意密特朗本人。

万事俱备，密特朗赶紧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左翼的共同候选人。他选择了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同一时间，于9月9日下午正式宣布参加竞选。竞选宣言强调，他之所以决定竞选总统，“不仅是为了反对旧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与个人独裁、民族沙文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相反，我主张尊重法律和自由。我号召一切不愿放弃公民职责的男女公民们为新的希望而战斗。”

密特朗是这次总统竞选中骤然出现的“黑马”。此前没有任何报刊或政党人士提到过他是一位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天文台公园事件的阴影也尚未完全消除。政界和舆论界对密特朗竞选反应冷淡。有影响的《世界报》只刊登一条简要消息。有的显贵要人说：“他不是出色的候选人。”有的甚至说：“说实在，这是最糟糕的候选人。”接近左翼的《快报》悲观地预言：密特朗有获得自第二帝国（1852年）以来左派得到的最少的选票的危险。

密特朗为了制造竞选声势，于9月2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各左翼政党领导人出席，包括法共总书记罗歇。密特朗刚刚一脚踏上讲台，社会党副书记克洛德·菲齐埃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我有个重要信息要告诉您……”

您不要说您希望同共产党人联合，否则，社会党就不支持您。”密特朗不以为然：“那怎么行，这是我的行动的基础。”对方强调说：“您听着，是居伊·摩勒总书记要我来告诉您的。”密特朗不予理会：“我将按我的决定行事。”说着，他挣脱菲齐埃，大踏步走上讲台。

过不了几天，摩勒果然节外生枝，向报界发表谈话，推出比内：“我们不会抛弃密特朗。我们决定支持他。不过，我希望比内出来竞选，因为只有他才能在民主自由人士中间赢得最多的选票。”密特朗马上邀请比内共进午餐，竭力说服他不要出马：“您在第一轮就会遭到淘汰。这只会损害您的名望和威信。”比内却不这么想。他说：“我同摩勒等人谈过，他们都答应支持我，我可以进入第二轮同戴高乐将军对垒。”密特朗强调：“不会的。我将绰绰有余地处在第二位。同戴高乐将军对阵的将是我。您没有基层的支持，只是那些上层领导支持您。当然，您完全有自由参加竞选，但是，我仍坚持竞选。很抱歉，我将把您远远抛在后面，因为我会有左翼的选票。”不知是密特朗这席话打动了比内，还是出于别的原因，不久，比内表示无意参加竞选。密特朗终于排除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最初的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得票率仅 11%，而戴高乐的支持率高达 63%。戴高乐倒没有等闲视之。他对是否亲自竞选一直秘而不宣。戴高乐没有把德费尔放在眼里，认为由他的总理蓬皮杜出面就足够对付了；对密特朗，则非亲自出马不可了，因为密特朗是现政权的最凶猛、最出色的对手，况且他玩弄左翼联合这一手，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戴高乐不能再保持沉默，于 10 月 26 日向内阁会议透露了参加竞选的意向。11 月 4 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密特朗在里昂群众集会上兴奋地宣称：“既然我反对个人专权的政权，我就要同这个政权的代表人物较量。”在竞选运动中，戴高乐分子企图利用天文台公园枪击案大做文章，搞臭密特朗，戴高乐不同意。他说：“我们绝不能污辱一个将来可能当总统的人的人格。”

事隔 15 年后，密特朗在《此时此地》一书中回首当年时说过：“我那时不可能当选。这我是知道的。我甚至没有想到会有可能进入第二轮。当时戴高乐声望如日中天，他的地位是牢靠的。”

密特朗明知决非戴高乐的对手，为何处心积虑地参加竞选呢？一是为了促进他孜孜以求的左翼团结；更重要的，是为了确立他作为左翼力量集结的核心地位，为日后登上权力顶峰铺平道路。

且看密特朗自己的说法。“我深信，只有左翼团结一致才能产生动员效应，才能打乱各党领导机构的盘算。”“只有一项大胆的行动方能震动左翼的结构。我作为候选人，就有这样的好处。”他对竞选班子的人表示：“我是形势的产物。我既不是领袖，也不是导师，而是同突击队一起冲向城头的人。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我要唤醒左翼，重新赋予共和人士以使命感，

并设法同各位一道创建新的社会党。”

他自己说得比较谦逊，而冷眼旁观的社会党总书记摩勒早就看透了他想当“领袖”和“导师”的用心。摩勒在陪同密特朗访问他任市长的阿拉斯市府后对他说：“我的愿望是社会主义永存。如果现存的社会党结构已不再适应保持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需要，那么，我同意创建一个新党。根本的一条是，新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今天您是我们的领袖，明天仍然是我们的领袖。”摩勒这番话在六年后果然应验了。密特朗出任新社会党第一书记，摩勒甘拜下风。

密特朗充当总统候选人对促进左翼团结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宣布竞选次日，共和制度大会党、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松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由密特朗担任主席。这无疑加强了密特朗竞选的实力。社会党担心密特朗竞选失败（这是必然的）殃及新生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强调不要把两者联系起来。于是，密特朗发表公告，声明他竞选总统与左翼联盟的诞生无关。

密特朗在竞选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法共达成谅解，取得法共支持，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左翼共同候选人。当时，在左翼内部，同法共合作是个“禁区”。无论是社会党、统一社会党、激进党还是孟戴斯—弗朗斯，都是坚决排斥法共的。密特朗则力排众议。他认为，同戴高乐抗衡必须争取法共选民的选票。他强调，“一切有助于反对个人独裁的力量都是好的。忽视四五百万张法共的选票，那将是罪过，而且是愚蠢的。”他声明：“虽然没有谈判，也不存在共同纲领，但我将向法共提供一切情况。”密特朗的挚友罗朗·迪马（后任密特朗的外交部长）向法共总部递交了密特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文本，并附有一封短信。法共中央对这一姿态表示欢迎，并认为密特朗“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同我党历来的主张是一致的”。法共元老杜克洛说：“密特朗好就好在消除了反共的障碍。”于是，法共改变过去以制订左翼共同纲领为前提的立场，表示支持密特朗竞选。不久，另一左翼小党——统一社会党也表示支持。这样，密特朗正式以左翼共同候选人的资格参加总统角逐了，声势大振。

总统候选人共有六名，主要的争夺在戴高乐、密特朗和中右候选人勒卡尼埃之间展开。戴高乐满以为稳操胜券，不屑于进行竞选活动。他甚至没有充分使用分配给每个候选人的电视、广播时间。爱丽舍宫发表公告称：“分配给戴高乐将军的广播时间将用于播放文娱节目。”他的竞选口号很简单：“要么选我，要么大乱”。

按总统选举法规定，第一轮选举，得票过半数者方能当选；如无人

皮埃尔·莫鲁瓦（后任密特朗首任总理）回忆录：《未来的接班人》，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77年版，第174页。

皮埃尔·莫鲁瓦回忆录：《未来的接班人》，第177页。

轮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参加决胜的第二轮。12月5日第一轮选举结果，戴高乐仅得到有效票的43.7%的选票，离法定多数甚远；密特朗得32.2%，居第二位；勒卡尼埃得15.8%，居第三位。戴高乐蒙受了未能一次过关的屈辱，得票数不到登记选民总数的37%。一个以法兰西的化身自居的人竟被将近2/3的法国人所抛弃，这显然是令人难堪的。戴高乐的自尊心受到损伤，威信蒙受不小的打击，情绪消沉，一度考虑像1946年那样，自动引退。事隔多年后，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海军上将证实确有此事。他曾竭力劝说父亲打消辞职的念头：“如果您下台，那么在您离职后举行的磋商中将会把乔治·蓬皮杜（当时任内阁总理）请出来，而蓬皮杜是当选不了的。结果当选的将会是密特朗。人家当选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葬送你的事业，也就是废止您为法国制订的宪法。”是儿子的一席话打动了，或是戴高乐本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戴高乐决心重整旗鼓，竞选蝉联。

12月19日第二轮选举，戴高乐与密特朗对垒。戴高乐这回不敢掉以轻心了，只好放下架子，积极展开竞选活动。结果，戴高乐得票54.51%，连任总统；密特朗得45.49%，虽败犹荣。密特朗的得票率比左翼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时的1962年议会选举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密特朗得分之高，还说明一个重要现象：戴高乐再度执政时取得的一部分工人和劳动人民的选票，现在又重新转向左翼。

这次总统选举结果，标志着左翼作为一支政治力量重新崛起，左右翼对峙开始取代了左右翼力量悬殊的局面。密特朗则一跃而为左翼力量集结的核心，左翼头号人物和反对派的当然领袖。

历史笑柄

密特朗竞选相对成功，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全部政治抉择的基本思想——包括法共在内的左翼联盟，确信自己作为左翼联盟的带头人终将率领左翼战胜右翼，取得全国政权。

总统选举结果也进一步促进了左翼联合的势头。1966年5月，根据密特朗的建议，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仿效英国反对党的做法，成立“影子内阁”，由密特朗任影子内阁总理，为接替戴高乐政权预作准备。密特朗还积极推动非共产党左翼与法共的联合。他说，“在我看来，没有左翼联盟就将一事无成。当然，我是把共产党包括在左翼联盟之内的。”1966年12月11日，法共与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首次会晤，并迅速达成结成选举联盟的协议。自1935年“人民阵线”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协议谴责了戴高乐“个人专权”的制度，同意在所有选区第二轮投票中共同支持第一轮得票领先的左翼候选人，并且商定选举结束后商讨双方进一步的合作。这是左翼联盟的开端，尽管以后还有曲折、反复，但左翼联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1967年3月议会选举中，左翼选举联盟初见成效。左翼获得46.4%的选票，议席比上届议会增加63席。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获得121席，成为仅次于戴高乐派的第二大党；法共获得73席。

戴高乐派丧失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只是同右翼小党——独立共和党的议席加在一起，才勉强维持多数地位。

1968年2月，法共与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再次会晤，由密特朗和法共总书记轮流担任会议主席。2月24日，双方进一步就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协议。这是从选举协议走向共同执政纲领的过渡性协议。

正当左翼联合一步步向前发展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五月风暴”震撼了第五共和国，打乱了法国的政治生活。

1968年春天，从北美到西欧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蔓延到法国。巴黎近郊农泰尔文学院（现为巴黎第十大学）学生首先发难，于3月22日占领了学校。骚动很快波及巴黎大学。5月3日，法国几百年来第一次警察进驻巴黎大学，驱赶集会学生，封闭学校。巴黎拉丁区开始筑起街垒。5月10日深夜，学生与向街垒冲锋的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360余人受伤，500多人被捕，100多辆汽车被焚毁。骚动很快波及外省城市。5月11日，蓬皮杜总理出访回国，力主用软的一手平息运动：宣布赦免令，释放部分被捕学生，决定13日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但未能平息事态。各工会组织决定5月13日举行总罢工。在导致戴高乐上台的阿尔及尔暴乱10周年之际，六七十万人上街游行，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10年太长了！”“戴高乐辞职！”矛头直指象征现行制度的戴高乐。学生与警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不断发生。5月20日以后，罢工人数已近1000万，整个法国陷于瘫痪。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发展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戴高乐几乎要被这场五月龙卷风刮

跑了。

五月风暴是自发性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权落在极左分子、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青年、学生团体手中。工人声援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发的。以占领工厂为特点的罢工斗争，是在违抗全国性工会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各左翼政党初期都处于运动之外。随着政治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这些政党都想利用五月运动达到各自的目的。反对派头面人物也纷纷出场，为角逐“戴高乐之后”的政权大肆活动。在他们看来，当时的形势用得着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的那句口头禅：“政权已用不着去夺取，随手去捡就是了。”

前总理、左翼头面人物孟戴斯—弗朗斯态度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据说，他是可以不必担心自身安全进入拉丁区和巴黎大学的少有的政界人物。当时，不少议员，甚至一些戴高乐派人士，都敦促蓬皮杜总理辞职，由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政府以平息运动。要求他出山执掌政府权力的函电纷至沓来。5月27日下午，他在巴黎夏莱蒂体育场举行的、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公开露面，表明非共产党左翼试图取代戴高乐政权的行动开始了。

密特朗也不甘落后。他是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他领导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联盟在五月风暴中无所作为。他静观运动的发展。当他看到斗争如火如荼，戴高乐政权摇摇欲坠时，就急急忙忙出来收拾残局，以摘取群众斗争的胜利果实。他满以为取戴高乐而代之的时机已经到来，匆匆登场亮相。

5月24日，他宣称：“政府既无信誉，又无权威，实际上已不存在。总理必须做出表率：辞职。一个新的进程行将开始。在这个进程的尽头，一切都会圆满解决……戴高乐将军必须接受一切都已完蛋的事实。”结论不言而喻：戴高乐必须下台。

5月28日，在五月危机的高潮中，密特朗进而仿效戴高乐复出前夕的做法，在巴黎市中心大陆旅馆举行有300多名记者出席的记者招待会，以收拾残局的姿态提出“接替戴高乐政权的日程和程序”。他宣称：“自1968年5月3日以来，国家在法国已不复存在。”现政府无力解决危机，已日暮途穷。现在已出现“政权空缺”，必须迅速加以填补。一旦戴高乐下台，政府和总理也将理所当然地随之垮台。他建议立即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谁来当政府总理？他推举孟戴斯—弗朗斯担任。谁来当总统？这要通过全民选举来决定。不过，他毫不客气地当场宣布：“我将是总统候选人。”

这番话非同寻常。因为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出缺时，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务，而总理和政府继续行使职责，代总统无权更换。那么，密特朗建议组织“临时政府”的根据何在？

“我是从一种合情合理的假设出发考虑问题的：一旦戴高乐为法国人民所抛弃，仅仅依靠他的权威而存在的政府将与他一起垮台。……总之，在我看来，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日子里，政府的命运事实上是同国家元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有必要组织临时政府，以便在大约一个月的过渡时期

内保证行政机构的连续性，直至选出新的共和国总统。为了显示政府的临时性质，10 位部长应在反对戴高乐的有代表性的共和人士中挑选，不排斥任何党派，也不搞按比例分配。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处理日常事务，同工会和学生对话，筹备总统选举。所谓不排斥任何党派，这意味着自 1947 年以来，共产党人将第一次重新参政，而中间派共和民主人士亦可参加政府。不搞按比例分配，意味着临时政府总理可以完全自由地作出决定。”

为何建议孟戴斯—弗朗斯当总理？

“社会上有一股敦请孟戴斯—弗朗斯出山的舆论；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激进党、社会党以及法国民主工会等都支持他。加之，他为闹事学生所信赖，他在出席巴黎夏莱蒂体育场的集会后，威望进一步提高。他的正统派的财政经济思想会使温和派放心。

‘民主中心’领袖阿布兰要求戴高乐将军委托孟戴斯—弗朗斯设法解决危机，就反映了这一派的情绪。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掌握更多的王牌来团结绝大部分公众舆论和促使法国人重新和解，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自从 1954 年泄密事件后，密特朗同孟戴斯—弗朗斯的关系一直极为冷淡。事先，密特朗根本没有同孟戴斯—弗朗斯商量，也没有将记者招待会的内容通知他。不过，孟戴斯—弗朗斯还是迅速予以响应，于 29 日发表声明：“不拒绝左翼力量可能赋予的重托。”他甚至着手组织临时政府班子。30 日，他并会见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他心目中即将走马上任的代总统），商谈临时政府所涉及的宪法问题。不过，事后孟戴斯—弗朗斯对密特朗的做法啧有烦言。他抱怨说：“太晚了，而且是临时仓促行事。既没有很好准备，也没有进行协商，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事先没有同我通气。我不能说，我同意他所说的一切。无论如何，太晚了。”密特朗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我本该事先同孟戴斯—弗朗斯打招呼。我这种做法无疑使他很难堪。”

密特朗为何迫不及待地宣布充当总统候选人呢？

“自从 1967 年大选以来，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曾两度确认我这一资格。我主持影子内阁，正是为了准备取代现政权的班子。法共无意改变左翼共同候选人的主张，而且仍然认为我是合适的候选人。人们指责我有个人野心。盼望领导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乃是高尚的雄心壮志，无可非议。”

鉴于戴高乐政权已危在旦夕，反对派主要人物公然准备取而代之，法共也积极参与“戴高乐之后”的争夺。28 日，法共总书记罗歇发表谈话，公开宣称：“现在应该赶快结束现行政权，促进能够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 104 页。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 105 页。

孟戴斯—弗朗斯著：《抉择》，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74 年版，第 137 页。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 103 页。

真正民主。现在应该考虑组织一个民主团结的人民政府了。”他并致函密特朗，要求立即就组织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团结的人民政府”接替戴高乐政权而在当晚进行紧急磋商。法共领导还决定，由总工会出面于29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显示力量，以便在今后的政权角逐中处于有利地位。

密特朗接到法共的会晤邀请信后，马上征询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领导人摩勒等人的意见，并表示他本人倾向于拒绝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不过，几天前正好约定当晚在密特朗寓所会见法共一、二把手罗歇和马歇。于是，密特朗用电话通知罗歇，他无意取消原定约会以免引起误解，但这次会见不研究来信提出的问题，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不能接受“最后通牒”。结果，约会照常进行，但未讨论“人民政府”问题，也未商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只决定两党在次日正式会谈。

5月28日傍晚，两党正式会谈。法共指责密特朗事先未将记者招待会讲话要点通知它。会谈中心是成立临时政府问题。法共表示原则上并不反对成立临时政府，但对孟戴斯—弗朗斯任总理表示严重保留。罗歇强调，“我作为两大党之一的领袖，应由我担任政府首脑。”密特朗表示不能收回他的建议。罗歇问道：“临时政府中将有几名法共成员？”密特朗回答，“至少一名。”罗歇表示，“那太少了。”密特朗解释说：“公众舆论对法共参政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双方商定，在法共政治局研究会谈结果并作出决定后再次会晤。

但是，戴高乐神秘莫测的行动打乱了左翼企图接管政权的如意算盘。5月29日，星期三，正是每周例行的内阁会议的日子。按照传统，这可是雷打不动的。本该主持内阁会议的戴高乐突然“下落不明”。消息传出后，巴黎惶惶不安。好多人以为戴高乐要下野了。密特朗与孟戴斯—弗朗斯紧急会晤，加速组织临时政府的步伐。但对政府的组成，两人意见不一。密特朗先打了“法共牌”：“共产党人不同意您担任总理，也许他们会让您当教育部长。”孟戴斯—弗朗斯则主张政府应向“工厂和大学的新生力量”开放，密特朗极力反对，强调“这样一来，那就会乱套了”。孟戴斯—弗朗斯坚持己见。他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仍强调，不应该把参加五月运动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

原来戴高乐瞒着总理和内阁成员，秘密前往德国的巴登—巴登，会见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马絮将军。戴高乐劈头就对马絮说：“全完了！共产党人搞得全国陷于一片瘫痪，我什么都指挥不动了，所以，我就走了。在法国，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安全感，于是我到您这儿来找个藏身之所，以便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马絮鼓起勇气进言：“为了您自己，也为了国家，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要不然，您会威信扫地，黯然失色，不能让10年来的建树在10天之内丧失殆尽。”“干下去，干下去！您的战场在法国、在巴黎。”马絮坚定地表示：如果发生武力较量，他和他手下的部队是忠于戴高乐将军的。

两人密谈 45 分钟之后，戴高乐突然站起来说：“我回去！”

第二天，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以信心十足的口气郑重宣布：“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引退的。人民委托于我的职权，我将行使到底。”他还宣布留任总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与戴高乐的广播讲话相配合，当晚，戴高乐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示威，60 多万人上街支持戴高乐。

形势急转直下。处在高潮中的学潮、工潮似乎顿时失去了势头，工人陆续复工，警察重新控制了拉丁区和巴黎大学。来势凶猛、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就这样平息下去了。密特朗紧锣密鼓策划接管政权的行动成了历史笑柄。密特朗迫不及待地企图取代戴高乐的表现，在法国人心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认为他似乎想“乱中夺权”，不惜以违反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用密特朗自己的话来说，“我当时好像成了企图杀死家长、杀死监护人、杀死益友的凶手。”五月风暴刚刚平息，密特朗在他巴黎寓所附近的圣·米歇尔大街露面，一群学生认出他来了，围上去把他臭骂一顿，指责他是个机会主义政客。据说，有的学生还往他身上吐唾沫。

法国政治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议会改选。对左翼各党来说，提前选举无异于突然袭击，只得仓促上阵，被动应战，内部意见纷纭。6 月议会选举结果，戴高乐派取得空前胜利。在国民议会中单独占了绝对多数。反对派遭到惨败。法共与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各丧失半数席位。孟戴斯—弗朗斯名落孙山。密特朗勉强连任。密特朗在五月风暴中的举措失当，招致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内部的种种非议，不得不于 11 月辞去主席职务。但他强调：“我不放弃斗争。”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随之分崩离析，各成员党派恢复各自的行动自由。密特朗众叛亲离，按他自己的说法，“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作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坐在“不属任何党团”的席位上。法国政界几乎把他遗忘了。不过，未来的总统蓬皮杜却没有小看他。他对亲近的人说：“当一个对手处在低谷时，那是最危险的。我可不把他从我的对手名单中删去。”

密特朗漫长的政治生涯犹如潮汐一洋，高低互替，起落无常。向爱丽舍宫进军的反戴高乐旗手密特朗，一下子又从高峰坠入万丈深渊。有人嘲笑说：密特朗是个“天生的输家”，“永远也进不了爱丽舍宫”。密特朗自己一时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在法国，我是最受人憎恨的人。”不过，他并不泄气，马上补充一句：“不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最受人爱戴的人。”“我等待着人们后悔莫及的那一天！”

第四章

通向爱丽舍宫之路

第一书记

戴高乐虽然勉强渡过五月风暴的难关，不过，戴高乐已不再是往日的戴高乐了。在法国人心中，戴高乐的形象和声誉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谁都明白，将军掌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为了重振一落千丈的威望，戴高乐决心孤注一掷，就区域改革和参议院改革进行公民投票。这两项改革本身是无关宏旨的，本来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采取公民投票的形式作出决定。这次公民投票，实质上是要不要戴高乐的信任投票。其结果，要么戴高乐重新获得失去的人民信任，起死回生；要么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失。1969年4月27日公民投票结果，反对票占52.42%。戴高乐于28日零时11分发表公告，宣布“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再一次戏剧性地引退。于是，法国在戴高乐任期未滿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戴高乐下台，大体应验了密特朗“不出10年”的预言。不过，并没有给密特朗带来大展鸿图的好运。当时左翼团结涣散，各自为政。密特朗声誉不佳，难以再次毛遂自荐。法共对密特朗评价极低。法共元老杜克洛说：“密特朗不代表任何组织。此人只是为野心所驱使，把左翼看作西班牙式的小旅馆。”法共正式通知密特朗，不希望他参加竞选。摩勒控制的社会党也不愿让密特朗再次利用总统选举捞取政治资本。他派亲信向法共领袖表明：社会党反对密特朗当候选人。密特朗领导的共和体制大会党要求左翼各党立即协商推荐共同候选人，但未得到响应。结果，左翼政党自行其是，先后提出四名候选人：法共元老杜克洛，社会党元老德费尔，统一社会党罗卡尔，还有托派阿兰·克里文。

在左翼分裂的情况下，争夺主要在两位右翼候选人——代理总统、参议院院长波埃和总理、戴高乐派领袖蓬皮杜——之间展开。第一轮投票结果，蓬皮杜得票43.9%，波埃23.4%，杜克洛21.5%，德费尔5.1%，罗卡尔3.7%，克里文1.1%。有意思的是：左翼四位候选人得票总数为31.3%，与1965年左翼共同候选人得票大体相当（32.2%）。但这次左翼选票分散，连第二轮都进不了，一事无成。第二轮，蓬皮杜战胜波埃当选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这次总统选举结果对左翼震动很大。社会党候选人仅得5.1%，使得党内惶惶不安。德费尔惨败，意味着老社会党的穷途末路，也意味着社会党排斥法共、走“中间”路线的幻想的破灭。党内要求革新，要求左翼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1969年7月，社会党改组，摩勒下台，主张对法共采取积极态度的阿兰·萨瓦里出任第一书记。党代表大会决定摒弃向中间开放的做法，

主张促进包括法共在内的左翼联合。大会宣称：“左翼联合是社会主义者的战略的核心。”

密特朗身处逆境，处之泰然。他埋头写作，思考探索。他对五月风暴进行反思，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整套行动方针。他深信，左翼在五月风暴中遭受严重挫折，主要由于左翼本身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稳定的政治力量，不成其为真正足以接替右翼政权的力量。左翼通向爱丽舍宫之路在于：（一）重建社会党，使之成为一个崭新的、强大的左翼政党。“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党，左翼就会失去正确方向，就不可能稳定。”（二）实现左翼联盟。这是战胜右翼“改变执政多数派、从而改变我国政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三）通过左翼联盟，壮大社会党力量，削弱法共，颠倒左翼内部的力量对比，使社会党在左翼内部占主导地位。

25年后，密特朗的一段自述非常露骨和透彻地阐明了左翼联盟的战略思想。“我一直认为，如果不把左翼政党团体和左翼工会团结起来，从算术上讲，在法国，左翼就不可能形成多数。但是，另一个条件也许更难：如果法共一直保持解放初期的水平，即法共作为左翼第一大党，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拥有全国28—29%的选票，而社会党只有10—11%的选票，那我们也将一事无成。何况，1969年社会党得票竟急剧下降到只占5%。所以，同法共结盟，首先必须改变两党的力量对比。”

其实，密特朗早就萌发削弱法共之念。1947年1月，他刚当上退伍军人部长，就碰上法国影响下的法国总工会闹罢工。连部长办公室也为罢工纠察队所控制。当时他就对部长办公室主任乔治·博尚说过：“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但是，把共产党的影响降低到10%（选票），那就不坏。”

密特朗在失意赋闲之际，撰写了《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于1969年总统选举后不久问世。这是密特朗重返政坛的信号。他首先着力树立自己的左翼形象，说明自己是如何皈依社会主义的，并对一些有损自己形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作了澄清，回答了政敌对他的非难，同时切中时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更鲜明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促进左翼联合的基础。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思考，他得出结论：“您问我什么是左翼？现在，左翼就是社会主义。”“问题不是在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自此，密特朗就社会主义不离口，而且调门越来越高。他宣称：“我们的目标不是使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是改善资本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为了全面阐述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塑造自己的左翼形象，他又于1970年出版《可行的社会主义》一书，主张采取合法手段，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张通过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对法国经济结构实行大规模改革；强调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乃是“民主”、“自

由”的社会主义。前社会党总书记摩勒对密特朗大谈特谈社会主义、以社会党先驱饶勒斯和勃鲁姆的接班人自居甚为不满。他在人前嘲讽道：“他只不过学了一些（社会主义）辞藻，就如此狂妄。”

如何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左翼联合？密特朗认为，不是恢复瓦解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那种各党仍保持独立性的、非共产党的左翼政党联盟已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应将左翼小党与社会党合并，组成一个新的大社会党。在领导权问题上，他以退为进，故意采取低姿态。他声明：“我将是新党的一个成员，但我不谋求任何职位。”其实，他系统地提出70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有朝一日接管社会党作舆论准备。

经过密特朗两年苦心经营，共和制度大会党决定与社会党合并。1971年6月，“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在巴黎附近召开，成立新社会党。出席大会的近1000名代表中，萨瓦里领导的社会党占800名；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只有97名，其他左翼团体67名。创建新社会党的中心问题，是由谁来担任第一书记。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密特朗居然当选为新社会党的第一书记。

其实，密特朗是有备而来。事先，他在社会党内部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得到该党两位实力派的支持，一个是社会党北方大本营——北部省委书记莫鲁瓦；另一个是社会党南方大本营——罗讷河口省委书记德费尔。这两个省委掌握了代表大会全部选票90719票中的21939票。两人都同党内实权人物摩勒有矛盾。密特朗高调门的社会主义，也获得社会党内激进派——“社会主义学习、研究和教育中心”的好感。

密特朗在代表大会上富有社会主义激情的演讲，可说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杰作。“是改革还是革命？我要说：革命。但愿人们不会指责我哗众取宠，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很可能出现这种指责。不过，我还要明确地说（因为我不愿隐瞒我的真实思想），在我看来，为真正的结构改革而进行的每时每刻的斗争也许就具有革命的性质……革命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首先必须与资本主义决裂……我要说，谁不同意与资本主义社会决裂，谁就不能加入社会党。”最后，密特朗动情地说：他的共和制度大会党的朋友们已牺牲一切，同他们所珍惜的过去一刀两断，以便加入社会党。对听惯了改良主义老话套话的社会党代表们来说，密特朗的讲话使人耳目一新，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决定性的斗争围绕着代表大会总方针决议而展开。密特朗提出的决议草案与原社会党领袖摩勒、萨瓦里的草案僵持不下。这不仅关系到今后党的方针政策，而且关系到党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党内各派系力量对比中，北部省委的态度举足轻重。省委书记、里尔市副市长莫鲁瓦明确支持密特朗；省委元老、里尔市市长奥古斯坦·洛朗同摩勒有多年的交情，动动摇摇。提案委员会成员都坐不住了，全都在会场上转来转去。摩勒和他手下的人围住奥古

斯坦·洛朗，竭力说服他支持摩勒—萨瓦里提案；莫鲁瓦怕他倒向摩勒一边，一连三次找洛朗出来单独谈话。最后洛朗表示，“你是省委书记，你应当对北部省的同志们负责。大主意由你来拿，我这就回里尔去。”德费尔怕他半途折回，特意一直把他送上车，才放下心来。

北部省委站到密特朗一边，大会形势急转直下。密特朗提案以 43926 票对 41757 票战胜摩勒—萨瓦里提案。6 月 11 日代表大会开幕之日，密特朗还不是社会党员，连社会党党证都还没有拿到，几天以后竟然当上了第一书记。密特朗在摩勒曾经待过 20 年的办公室里安顿了下来。老社会党让位给新社会党，成为 1905 年法国社会党创建以来重要的里程碑。密特朗则朝着爱丽舍宫又迈进了一大步。

法国舆论界对密特朗在三天之内摇身一变而为社会党第一书记，议论纷纷。有的说密特朗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能手；有的说密特朗不愧为老谋深算的政客；有的甚至说密特朗“劫了社会党总部”。密特朗在 1971 年 8 月 16 日对《新观察家》周刊的谈话中予以驳斥：“老谋深算？我倒确实如此。难道你们宁愿要一个心中无数的政治家吗？……精明过人？我倒想不精明些，不过，如果精明是取得值得欢迎的成功的王牌，那么精明又有什么不好呢？”

其实，密特朗当选为社会党第一书记决非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从 1965 年总统选举以来，密特朗已成了无可替代的左翼领袖，成了实现左翼联合的最合适的人选。老社会党一蹶不振，为密特朗提供绝好的机会。与其说密特朗依靠玩弄权术攫取第一书记职位，不如说他成功地顺应和利用了当时左翼急欲重振旗鼓的政治形势。

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积极促进左翼联盟的实现；法共也表示愿同社会党就共同施政纲领达成协议的愿望。两党立场的互相靠拢导致两党对话的恢复。1972 年 4 月，两党开始就制定共同施政纲领进行谈判。两个月后，6 月 27 日，双方就《共同纲领》达成协议，明确规定左翼在取得政权后所应采取的内外政策措施。随后，左翼激进党也参加进来，组成了左翼联盟，从而实现了左翼在高水平上的团结。自 1920 年 12 月 30 日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共产党与社会党以来，两党第一次实现了联合。密特朗心中有数：他已把爱丽舍宫的大门钥匙捏在手心里了。

《共同纲领》是两党妥协的产物，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某些重大政策主张的分歧依然存在，对左翼联盟双方也各有打算。这就决定了左翼联盟的发展还会出现曲折和反复。

法共企图通过左翼联盟摆脱孤立处境，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甚至指望在法国造成意大利那样的局面：共产党得 40% 的选票，而社会党沦为辅助力量。法共还把左翼联盟看作是同社会党的一种较量。法共总书记马歇在 15 年后透露：“签署共同纲领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就对此举提出不少批评，

并且确定了在左翼联合中不可逾越的界限。”马歇在向中央全会所作秘密报告中强调：“在根本性问题上，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存在着同大资本妥协、同阶级敌人合作的倾向”，必须同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作斗争。

密特朗则企图通过联盟约束和削弱法共，挖法共墙脚。6月28日，即《共同纲领》签订后的第二天，密特朗在维也纳社会党国际大会的致词中直言不讳：“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在法共占据的地盘上重建一个大社会党，以此来证明：在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有300万可以转而投社会党的票。”在当时强大的共产党和弱小的社会党联合的情况下，这可算是一句豪言壮语。6月30日法共《人道报》嘲讽道：“在我们看来，这种愿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嘲笑社会党第一书记是唐·吉珂德。

对密特朗个人来说，左翼联盟又是通向爱丽舍宫的必由之路。联邦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波恩接见密特朗时，对左翼联盟疑惑不解。密特朗的一番解说很说明问题：“按照你们的人口比例，如果您在德国八九百万共产党人，那么，您或者当不上总理，或者也会签署《共同纲领》的。”不言而喻，在有五百多万共产党选民的法国，要么密特朗永远当不上共和国总统，要么只得实行左翼联盟战略。密特朗心里明白，随着左翼联盟的突破性进展，爱丽舍宫已经在望了。

密特朗为了向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阐明《共同纲领》和配合即将来临的大选，于1973年发表《手持玫瑰花》一书。他断言，“60年代的重大转折，排除了战争和遭受入侵的危险，资本主义再次成为社会党人的头号敌人。”“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一小撮特权分子掌握着经济大权，从而掌握了其他一切权力……在法国实行阶级专政。”“因此，以消灭资本主义结构和解放被压迫者为共同目标的各党派，就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和新型社会的内涵达成一致，是顺理成章的。”

1973年3月国民议会改选中，左翼联盟显示了威力。总统多数派由上届的385席降至278席，其中戴高乐派得183席，比上届减少110席，不再单独拥有绝对多数。左翼联盟得175席，比上届议会增加一倍，恢复到1967年的水平。社会党力量上升尤其引人注目，第一轮得票20.65%，大大超过老社会党1956年的最高水平（15.2%），从而导致左翼内部社会党与法共（21.34%）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密特朗改变两党力量对比的第一步目标业已实现。

1972年社会党确定“手持玫瑰花”图形为党徽，象征劳动者幸福在手。

密特朗：《手持玫瑰花》，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3年版，第20—21页。

距爱丽舍宫一步之遥

1974年4月2日，密特朗正在他担任市长的希农堡一家餐馆用晚餐。餐馆老板急急忙忙走来，凑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声：“听说总统去世了。”几分钟之后，电台广播了讣告。蓬皮杜总统没能干满七年任期便猝然病逝。密特朗并不感到意外，驱车赶赴巴黎。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正等着他。

尽管蓬皮杜本人对病情讳莫如深，甚至对内阁成员也不吐露半点风声，但人们从他浮肿的面容，没精打采的神情和步履维艰的样子，不难看出他重病缠身。总统身患不治之症之说不脛而走。巴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清楚，蓬皮杜已病入膏肓。密特朗对“蓬皮杜之后”早有准备。他悄悄制订了竞选总统计划备用，免得临时仓促上阵。

蓬皮杜撒手西归，执政多数派一时群龙无首，发生内讧。左翼两大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则早已结成左翼联盟。第五共和国成立16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左翼可能接替右翼执掌政权的历史性机会。

入主爱丽舍宫是密特朗多少年来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他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4月4日，即蓬皮杜去世两天之后，他当着社会党领导人的面，表明了竞选的决心：“我好像走到了悬崖绝壁，而且非跳下去不可。”

社会党、共产党和左翼激进党未经谈判，一致推举密特朗为左翼共同候选人。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支持密特朗。法国两家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法共占主导地位）和法国民主工会联合会（社会党占优势）以及法国教师联合会也纷纷表示支持左翼共同候选人。顿时，在全国范围形成支持密特朗竞选的强大声势。密特朗的竞选口号响亮有力：“右翼：抓住政权不放了我的纲领：请你们把政权交给我。”

右翼各派系的头面人物早已把希望寄托在蓬皮杜的病故之上，准备接他的班，竞相充当候选人。几经周折，右翼最后剩下三名候选人，各不相让：共和民主人士联盟（戴党）推举的戴派元老雅克·沙邦-戴尔马、独立共和党领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财政经济部长多年）和前邮电部长、图尔市长让·鲁瓦那。

沙邦—戴尔马早在伦敦时期就追随戴高乐。巴黎解放时，曾任临时政府军事委员（部长）。1958年5月阿尔及尔军事暴乱前，任加亚尔内阁国防部长。他利用职权派其办公厅主任莱昂·德尔贝克以国防部常驻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身份在当地建立活动大本营和情报网，充当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的桥梁，参与策划军事暴乱，为戴高乐重新执政立下汗马功劳。历任国民议会议长和总理等要职。他自命为蓬皮杜之后戴高乐派的当然继承人。4月4日，

蓬皮杜的医生始终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他。蓬皮杜夫人1982年7月2日对《巴黎竞赛》画报的谈话中，否认蓬皮杜身患癌症之说，指出他系患沃尔丹斯特伦血症，直接死因则是痔疮大发作引起的败血症。

正当国民议会悼念蓬皮杜之时，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以期捷足先登。他得到戴党组织和元老派的支持。沙邦—戴尔马风流倜傥，行事不够稳重，曾离异并三次结婚，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心目中，私生活不无缺陷。当时报刊还揭露他在总理任内逃避所得税的丑闻。

吉斯卡尔·德斯坦出身名门望族。家族对他的政治生涯的影响虽没有像肯尼迪那么大，但仕途一帆风顺，与他的家族不无关系。他年轻得志，30岁继承外祖父的选区当上国民议会议员。36岁（1962年）当上权力极大的财政经济部长，前后达九年之久。总之，他是法国政坛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觊觎总统宝座已非一日。虽然当时他只是依附于戴高乐派、仅有50余名议员的小党——独立共和党的领袖，但是，他充分利用戴派内部矛盾，脱颖而出。加之，法国人在经历了年迈的戴高乐和病夫蓬皮杜两任总统之后，希望有一位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能人来治理国家。年方48岁、精明能干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相号召，对选民颇有吸引力。何况，他还得到金融垄断和大资本集团的全力支持。

戴派内部风云突变。以蓬皮杜生前亲信、内政部长雅克·希拉克为首的少壮派认为，“沙邦—戴尔马不是最佳人选。他没有一天不说蠢话，不做蠢事，他将狼狈不堪地结束竞选活动。”此人根本无法同左翼共同候选人密特朗抗衡，右翼应团结一致，支持足以击败密特朗的候选人，以免政权落入左翼之手。希拉克非但拒不支持本党候选人，反而拉出队伍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竞选形势出现戏剧性变化。

4月12日，希拉克前往财政部同吉斯卡尔·德斯坦密谈，两人当场做成一笔政治交易：希拉克允诺从戴党内部拉出队伍来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竞选；吉斯卡尔·德斯坦允诺，如竞选成功，任命希拉克为内阁总理。次日晚，希拉克纠集四位部长和39名国民议会议员发表“43人呼吁书”，要求右翼推举一名统一的总统候选人。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呼吁，意在迫使沙邦—戴尔马退出竞选，把吉斯卡尔·德斯坦推向总统宝座。43人集团异军突起，很快发展成为72人，声势浩大。沙邦—戴尔马连连叫嚷：“有人出卖了我！”4月16日，在戴党领导人和议员联席会议上，元老派声嘶力竭地高呼：“希拉克，叛徒！”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后希拉克对人说，他周围挤满了恨得咬牙切齿的人，“我甚至担心，我能否活着走出会议大厅。”

这次总统选举，候选人共有12名之多，竞争十分激烈。主要角逐在沙邦—戴尔马、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三人之间展开。总统选举形势瞬息万变。最初，民意测验显示，沙邦—戴尔马把吉斯卡尔·德斯坦抛在后面，进入第二轮与密特朗决战的呼声最高。密特朗一开始犯了一个不小的战略错误，把沙邦—戴尔马作为主要对手，殊不知吉斯卡尔·德斯坦利用戴党四分五裂的局面，得分节节上升，成为他的主要威胁。

5月5日，第一轮投票结果，密特朗得票为43.3%，高居榜首；吉斯卡尔·德斯坦为32.9%，居第二位。沙邦—戴尔马仅得14.6%，让·鲁瓦耶

为 3.2%，均被淘汰出局。乍一看，密特朗遥遥领先，似乎胜利在握。仔细一算，前景不容乐观。右翼三人得票总数 50.7%，超过半数。诚然，右翼能否弥合裂痕，一致对付密特朗尚属疑问。此外，极右翼和中间派候选人的选民去向未定，更增添了复杂因素。无论如何，第二轮选举势将是一场比分咬得很紧的争夺。

密特朗宣布竞选总统次日，有记者问他当选的可能性如何？回答是：“50 对 50，也许稍微不到一点。”5 月 3 日，即第一轮投票前两天，记者又要他预测当选的可能性。回答是：“50 对 50，大概稍微多一点。”密特朗在第一轮投票前夕的札记中写道：“我感觉我的名望正在上升。如果明天我能获得 46% 的选票，我在第二轮中将能稳操胜券；如果得 45%，那就会胜得比较吃力；如果只有 43%，那就麻烦了。我相信会有 45%。估计似乎过于乐观。

第一轮实际得票率略微高出他预计的最低点。当晚他从希农堡市驱车回巴黎时，对同车的挚友德格罗苏弗尔说：“我感到失望。但是，如果我们善于斗争，还是有可能成功的，总而言之，我的处境同戴高乐 1965 年的处境差不多。”

围绕左右翼两位候选人的决战，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和集结。希拉克在第一轮投票后率先表态，强调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总统多数派、蓬皮杜多数派的候选人，他“具备领导一个国家应有的一切条件”，将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戴派多数领导人也采取类似立场。沙邦—戴尔马既已落马，只得转而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以激进党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倒向右翼总统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竞选实力大大加强。左翼联盟和左翼小党则通力支持密特朗。一场左右翼旗鼓大致相当的实力较量开始了。这是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引人瞩目的新现象。

第二轮投票前，5 月 10 日，密特朗同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面对面的电视辩论，把竞选运动推向高潮。这是从美国移植来的新招。选民们未必参加五花八门的竞选集会，电视辩论则是非看不可的。不少犹豫不决的中间选民往往要等看完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才拿定主意。

密特朗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犹如头一回上场的斗牛士，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不免有点打鼓。一个显得老成持重，一个显得年轻潇洒。密特朗算得上能说会道，但比起口若悬河的对手，则略逊一筹。密特朗还有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在玩弄权术方面，是行家里手，但对经济问题则是一知半解。而当时法国正面临经济危机，经济是选民极为关注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临时抱佛脚，突击熟记专门为他制作的卡片，翻阅了他的经济顾问推荐的一些经济书籍。而经济问题正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拿手好戏。他以善于“理财”著称，自诩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财政金融问题的权威之一。他滔滔雄辩，记忆力过人，满腹经纶，一脑子经济数字，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在这位高

傲自信的专家面前，密特朗只能扮演穷于应付的学生的角色。有人形象地评论说，面对这架长着两条腿的电子计算机，密特朗显得才智枯竭，难以招架。

事后，密特朗对好友夏尔·穆兰吐露，吉斯卡尔·德斯坦甚至故意蒙人。当他说出几个事先经过核实的数字时，对于煞有介事地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卡片翻弄一下，一口咬定数字不对头，然后说出他所谓正确的数字。辩论继续进行下去，他看到对方放回桌上的卡片原来是张空白卡片。他想反驳，已经来不及了。

事过境迁。密特朗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对各自的得失都有自己的评说。密特朗似乎输得并不服气。他在5月12日的札记中写道：“好多人批评我回击对手过于缓慢，犹疑不决。有人甚至说，我几乎是一反常态……如果要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态，我会说，我是平静的……我一直是沉着冷静的。或许我的方式方法不对头。人们本希望我是个拳击场上的拳击手，而我却躲避短兵相接的搏斗！是怕挨打吗？哪里的话！对手是个劲敌，但是，谁会怀疑我缺乏必要的武器和技能呢？当时我想，我不是为此而来的。我经历过很多政治斗争，我懂得，以好斗的形象赢得胜利，那回味是苦涩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回忆录《政权与人生》中写道：他深知，面对面的电视辩论，“必须言简意赅，条理严谨，更需要动之以情，而不是晓之以理，尤其应当感人肺腑。”当密特朗以下层社会的独一无二的代言人自居，滔滔不绝为他们说话时，吉斯卡尔·德斯坦冲口而出：“密特朗先生，并非只有你才懂得感情！”他认为，多亏说了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他才得以当选总统。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我说的这句话使我赢得50万张选票。”正是这部分选票“确保了我最后的胜利”。

密特朗在电视辩论中失分，所幸尚无碍大局。民意测验显示，密特朗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平分秋色：50对50。在投票的前两天，5月17日，代理总统阿兰·波埃亲口告诉密特朗，根据各省省长的内部报告，预计密特朗获胜。这一权威性的预测，使密特朗深受鼓舞。他开始为执掌政权未雨绸缪。他请内定担任总理的社会党元老、马赛市长加斯东·德费尔拟定一张未来政府的名单备用。密特朗还派头号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前往联邦德国，与财政国务秘书密商，一旦密特朗执政后出现不利于法国法郎的投机活动，敦请西德政府动用马克提供支援。

法共也作好参加政府的准备。法共总书记马歇表示，法共不会对参政提出过分的要求。法共不要求外交、国防和内政这三个关键性的部长职位。“我们希望，法共真正参政，但是，在一个容纳各派力量的团结政府中，法共部

夏尔·穆兰，《挚友密特朗》，第243页。

密特朗：《秸秆与谷位》，第290—291页。

吉斯卡尔·德斯坦回忆录：《政权与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91年版，第228—229页。

长只占少数。这个政府将领导全国走上革新社会、加强民主和振兴民族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明确而有限的要求。”

5月19日，第二轮投票结果，使密特朗大失所望。吉斯卡尔·德斯但得票50.67%，险胜，成为自路易·波拿巴（1848年）以来最年轻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得票49.33%，以微弱的差距败北。密特朗一直深以为憾。事隔14年后，1988年3月16日，他对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吐露：“1974年要是没有通讯投票和海外法侨的选票问题，我本该当选的。当时我未能获胜，我一直感到遗憾。那时当选，正是时候，一切都会大不一样。”

当晚，德费尔悄悄地把政府名单付之一炬。密特朗夫人对丈夫说：“有二必有三，下一回定会成功。”这与其说是宽慰，不如说是预言。第二天，密特朗对竞选班子的成员们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已准备好领导这个国家了。我想我会成为一个好总统。然而，失败并不严重，不要泄气。可以断言，过不了多久左翼就会获胜。但是，下一次领导左翼取得政权的人将不是我，而将是新一代人，是诸位。”密特朗这番预言，只对了一半。七年之后，左翼果然取得了政权。不过，这位左翼总统不是别人，恰恰还是密特朗自己。

圆了总统梦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七年任期届满。新的总统选举定于1981年4月28日和5月10日举行。这次总统选举充分体现了法国两大派（左右翼）对立、四大党（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社会党、共产党）争雄的政治格局。左右翼内部都陷于分裂，四大党各不相让，各自提出本党的候选人。

左翼方面，社、共两党关系破裂。“左翼联盟”不复存在。1977年5月17日，社会党、共产党、左翼激进党就如何使1972年签署的共同纲领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迎接1978年大选举行会谈。社会党与法共在核武器、对外政策、国有化程度和社会福利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执。法共主张全部重写共同纲领，使之与法共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相接近，指责社会党“向右转”；社会党担心共同纲领调子过高会吓跑中间选民，只同意修修补补。9月23日，谈判宣告破裂。

导致破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共与社会党各有打算。在过去五年的历次选举中，法共连连失分，社会党则节节上升，法共发觉社会党通过左翼联盟挖走了它的选民。按密特朗的看法，“共产党180度转弯的首要原因，是它担心，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法国工人运动内部形成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社会党的变化。它担心一旦组成联合政府，更多地会实施社会党的纲领，而不是实施共产党的纲领。”社会党力图把左翼联盟破裂的责任推在法共身上，以便进一步争取法共选民。7月2日密特朗对友人的一席话充分反映了社会党的意图：“破裂已成定局。共产党想要破裂。但左翼舆论将认为，破裂的责任在法共方面。1978年议会选举我们不会取胜，但社会党得票将首次超过法共。”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密特朗的预言。

1978年3月议会选举结果，左翼获201席，而右翼获290席，继续控制议会多数。法共得票降至战后最低点，仅20.6%；而社会党得票上升至22.8%，首次超过法共，成为左翼第一大党。密特朗左翼联盟战略的第二项目标——改变左翼内部社、共两党力量对比，压倒法共，至此得以实现。

此次总统选举，法共和社会党自行其是，不再推举左翼共同候选人。1980年10月，法共代表大会一致推举总书记乔治·马歇为总统候选人，而1965年和1974年法共均未竞选总统。

社会党内不同派系之间勾心斗角，使推举候选人颇费周折。党内非主流派头面人物、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歇尔·罗卡尔早就跃跃欲试。他周游全国，向各地社会党组织发表讲话，进行游说。他不时在电视上露面，在全国范围树立候选人形象。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某种政治风格、某种过时的古董已经被人们所唾弃，”含沙射影攻击密特朗。罗卡尔在知识界和中间阶层颇有号召力，并得到一些有影响的左翼报刊的支持。他在党内的影响也急剧上升。党内滋长一种情绪：密特朗在两次总统选举中相继落马，1978年他又未能利用有利形势率领左翼力量夺取议会选举的胜利，且年事已高，那

就不妨让新人试一试。推举罗卡尔为社会党候选人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意测验多次显示：罗卡尔是可能击败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最佳候选人。

罗卡尔认为时机已到，于1980年10月19日通过电视抢先向全国宣布，他将充当社会党提名的候选人。不过，他有言在先：如果密特朗参加竞选，他就退出。前一天，罗卡尔特意打电话给密特朗通报自己的决定，探听第一书记的口风。密特朗老谋深算，故意不动声色地表示：“您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您的事。至于我，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其实，密特朗早已下定决心出马竞选。他已65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诚如他的一位心腹所言，如不参加竞选，“毕生奋斗都将付诸东流”。密特朗是个不肯认输的人。有人对他打算第三次竞选总统表示惊讶。他回答道，“我第三次逃跑才成功的。”“拒绝半途而废，意味着拒绝死亡。”不过，他不能贸然从事，首先得在党内认真对付罗卡尔的强劲挑战。

密特朗对亲近的人说，罗卡尔犯了一个错误，怎么能在全体法国人面前宣布他要求社会党提名他为候选人呢？“在党组织表明谁是候选人之前，任何自封的候选人都不是候选人。我认为，对党而言，他这样迫不及待地行事是不对头的。”密特朗自己则决意面向广大党员争取提名。他在过65周岁生日那天（10月26日）前往社会党的南方大本营——马赛，以参加“玫瑰节”为名，跨出争取提名的第一步。社会党元老、马赛党魁德费尔为他组织了有5000党员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密特朗对听众宣称：他是否竞选总统，“取决于你们……我要最大限度地考虑社会党人的意愿。”这是他向广大党员发出的最明确不过的信息：全党都来支持密特朗竞选。果然，不出几天，社会党绝大多数支部纷纷表态支持第一书记竞选。

11月5日，密特朗向一些亲信和助手吐露参加竞选的意向，布置分头进行活动。同时，他致函社会党指导委员会称：“响应各省党组织要求我充当社会党候选人的呼声，我谨将我的候选人资格提请党员表决。”1981年1月24日，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以将近84%的多数提名密特朗为唯一候选人，罗卡尔不得不退出竞选。密特朗当即辞去社会党第一书记职务。大会宣告若斯潘当选为“代理”第一书记。密特朗当场喊道：“为什么要‘代理’？”他坚定地表示，不论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再担任第一书记，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

右翼内部互相倾轧。1974年5月，希拉克因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竞选总统有功，被任命为吉斯卡尔的首任总理。两年多之后，两人由于政见分歧和权力之争反目，希拉克挂冠而去。这次总统选举，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率先于1981年2月7日推选党主席希拉克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希拉克担任巴黎市长多年，把这个闻名世界的“花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显示了出色的管理才能。自1974年12月以来，希拉克一直掌握着右翼第一大党——戴党的领导权。他年方49岁，是法国政坛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希拉克希图依仗戴派的雄厚实力，作为戴高乐衣钵传人投入竞选，与吉斯卡尔·德斯坦一

决雌雄，至少置后者于困境。戴派元老、前总理米歇尔·德勃雷对希拉克在上次总统选举中的“背叛”行为仍耿耿于怀，宣布将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同希拉克作对。

吉斯卡尔·德斯坦因总统职务在身，直到1981年3月2日才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他依靠“总统的党”——法国民主联盟的支持，利用总统的便利条件，争取蝉联。他预感到，希拉克参加竞选是个头痛的问题，势必使他受到左右夹攻，分散他的选票。他早就对希拉克说过：“如果您参加总统竞选，那我就必败无疑。”

这次总统选举，共有10位候选人参加角逐。主要的争夺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和密特朗三人之间展开。吉斯卡尔·德斯坦左右开弓，既攻击密特朗，又打击希拉克；希拉克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抨击则往往超过对密特朗的指责；密特朗认为，希拉克还太嫩，“他还缺乏能磨炼性格或是以摧毁性格的考验”，故不足惧。他把卸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作为主要对手，全力以赴。同时，充分利用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希拉克的矛盾，削弱对手，壮大自己。

密特朗抓住选民对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七年产生的厌倦心理，利用法国经济困难、失业严重而人心思变的情绪，鲜明地提出“另一条道路，另一个人”的口号，并以“和平、就业、自由”为纲，把社会党的内外政策主张概括为“110条建议”，作为竞选纲领。这个包罗万象的纲领几乎对每个选民都许了愿，谁都可以从中找到向往已久的东西，诸如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降低退休年龄、缩短每周工时、每年五周工资照付的休假、增加最低工资、提高最低养老金和家庭补助金、降低低收入的直接税以及振兴经济、扩大国有化、权力下放等等。

密特朗还及时推出《此时此地》一书，大造舆论。此书系根据他在1980年夏天同《巴黎晨报》记者先后进行15个小时的谈话整理而成。除了详尽地阐明他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集中火力抨击吉斯卡尔·德斯坦政权。他谴责吉斯卡尔·德斯坦实施“不得人心的人民君主制度”，“表面的民主掩盖着从独裁者的破旧货中接过来的货色”。大声疾呼：“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王朝！”“共和国万岁！”“七年，太长了！”密特朗的竞选班子甚至精心制作了一部名为《孤家寡人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电影，巧妙地把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竞选总统时许下的诺言与七年来法国的实际情况两相对比。每次竞选集会上，先放这部电影，为密特朗发表演说制造有利气氛。

密特朗的两个主要对手都比他年轻。吉斯卡尔·德斯坦比他小10岁；希拉克小16岁。吉斯卡尔·德斯坦奚落密特朗，称之为“过时的人物”。为了消除年龄劣势，密特朗煞费苦心编了一套说法，广为宣传。“判断一个人，要看他的思想，而不是看他的年龄。今天，社会主义还是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判断一个人，要看他的政治行动，而不是看他的年龄。我领导着法国最大的

政治派别，我对它进行了革新，使之适应现代的斗争。你们一个劲儿说老……也是对已故戴高乐将军的大大不敬。他再度执政时，已经 67 岁高龄，而过了 11 年他才离开政权！我多少引以为荣的是：我那么长的时间使右翼、金钱的主人、国家的当权者害怕我过去这样单枪匹马的人，害怕我今天这样自由的人，而无法将我打倒。”

为了改善竞选形象，密特朗请来了著名的广告设计师雅克·塞涅拉帮他“包装”。这位设计师为他拟定了一个动人的、合乎密特朗身份和年龄的竞选口号：“平静的力量”，还提醒密特朗不要老板着脸，为他设计了笑容可掬的形象。这位专家对密特朗说，“单凭您一张口就看得见虎牙，就决无当选总统的可能。”于是，密特朗锉平了虎牙。他还指出，密特朗原先穿著像个银行家，“应该改为左翼人士的装束”。密特朗更换了服饰。这位专家还教他在摄像机前如何做手势，如何摆大人物的架势，如何显得潇洒自在等等。密特朗一一照办。

1980 年 11 月，密特朗宣布参加竞选时，形势并不有利。民意测验预示，他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得票差距很大（23%对 35%）。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吉斯卡尔·德斯坦势将蝉联总统，而密特朗将在法国政治史上留下连续三次败北的记录。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以至相当接近。密特朗洋洋自得地说：“六个月以前，没有人不认为吉斯卡尔·德斯坦会连任。而现在，我也有可能当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1981 年 2 月，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在登长城时异常兴奋。情不自禁地快步而上。突然，他竟喘不过气来，只好止步坐下。他脸色苍白。他对随行的《新观察家报》周刊社长让·达尼埃尔说：现在这个时刻可真奇怪，“各种可能性”一个个不断地在我眼前展现。他让人数了脉搏，属正常范围。脸色也逐渐恢复过来。他便起身继续向上攀登，终于登上最高处。登高望远，长城雄伟的景色一览无遗。在从长城回北京途中，他对让·达尼埃尔说，他坚信在不久要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能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坚定了能战胜卸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信心。这也可算得是密特朗中国之行的一大收获。4 月 28 日第一轮投票结果，吉斯卡尔·德斯坦得票为 28.31%，居首位；密特朗为 25.84%，虽屈居第二位，但已超过战后社会党得票的最好水平（23.4%）。大约有一百万法共选民投了他的票。希拉克为 17.99%。马歇得票仅为 15.34%，跌到 1936 年以来法共在历次选举中得票的最低点，按选举法规定，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入决胜的第二轮。两者比分接近，大体势均力敌。鹿死谁手，主要将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关键因素是希拉克和马歇的态度。

马歇在竞选中既攻击吉斯卡尔·德斯坦，也攻击密特朗。他多次强调，密特朗与吉斯卡尔·德斯坦是一丘之貉。他在电视讲话中说：“真正的危险

是密特朗上台掌权并同右翼一起统治，继续推行现行政策，甚至变本加厉。”马歇的用意，显然是同密特朗争夺左翼选票，尤其是要防止法共选民在第一轮中转向密特朗。但是，法共由于在第一轮中惨败，只有在第二轮投票中助密特朗一臂之力，才有可能在总统新任期内占有一席之地。密特朗认为，在第一轮选举中，“一个政党想看看它所得的选票，重视它自己的声望，那是正常的。”马歇“为了损害社会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第二轮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为了争取法共在第二轮中转让选票，便大谈特谈左翼联盟。法国舆论称之为“死亡之吻”的策略，即拥抱对方以便扼杀对方。法共终于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密特朗。法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无条件支持密特朗。马歇说：“我们不能让右翼捡便宜，应该号召选民投密特朗的票。”一些左翼小党候选人也采取类似行动。

但是，这还不足以取胜，因为左翼候选人得票总数不足一半。密特朗必须把部分中间派选民和右翼中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人争取过来，方能稳操胜券。这样一来，希拉克的态度更加举足轻重了。

密特朗和希拉克虽分属相互对立的左右翼两大派，但有着一个奇特的共同愿望：把吉斯卡尔·德斯坦逐出爱丽舍宫。对密特朗来说，自然是为了取吉斯卡尔而代之；对希拉克而言，则是曲线取胜之策。他预料，社会党一旦取胜，定会好景不长。早则五年后的议会选举、迟则七年后的总统选举，密特朗将难以为继。那时戴党作为右翼第一大党，希拉克作为反对派领袖，将恢复右翼掌权的局面。

希拉克这一盘算并非异想天开。历史事实表明，五年之后，1986年，以戴党为主体的右翼夺得了议会多数，形成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和政府“共治”的局面，希拉克本人出任总理。至于他接替密特朗担任总统，只不过比他预期晚了七年。

密特朗与希拉克究竟是有谋而合，还是不谋而合？两人之间是否有过秘密接触？当时法国报界曾有过两人秘密会晤的传闻，但当事人均矢口否认。事过境迁，秘密会晤的内情才逐渐透露出来。

说来奇怪，密特朗和希拉克虽都在政坛混迹多年，但是，除了在个别官方场合见过面，从未结识。1980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即两人宣布参加竞选之前不久，经戴派议员、密特朗的朋友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和社会党“铁女人”（后任社会党政府总理）、利普科夫斯基过去的未婚妻克勒松夫人的精心安排，两人在克勒松夫人家共进晚餐。一开始，两人互有戒备，显得有些拘谨，说话不多。倒是两位牵线人老找点话题打破沉默。到用甜食时，谈话开始转入正题。希拉克说：“您是社会主义的化身。我嘛，是戴高乐主义的化身。”密特朗表示，“假如这次我不能当选共和国总统，那么，对我来说，事情就会变得有点麻烦，但最后还是不太严重，我已经把社会主义的得票率提高到49%，我在历史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话锋一转，密特朗就点出要害：“对您来说，假如德斯坦再次当选，那您就要作难了，我不希望处在

您的位子上。”散席后，两人意犹未尽，又在一起单独密谈，直至次日凌晨一时半方才分手。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外人自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通过这次会晤，两人互相进行了战略性的试探摸底。密特朗对希拉克晓以利害：如若吉斯卡尔·德斯坦蝉联总统，希拉克将难有出头之日。信息是最明确不过的了。希拉克则心照不宣。当年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对此事进行调查，查明两人确实会晤过，并认为，这次会晤证明，希拉克和密特朗为了阻止他连选连任而搞了阴谋。

第一轮投票后几天，密特朗派他的多年挚友弗朗索瓦·德格罗苏弗尔（后任总统府顾问）往见希拉克。这位使者直截了当地说：“弗朗索瓦·密特朗委托我向您申明：我们将保留两轮多数的选举制。”希拉克反问道：“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竞选纲领中不是主张实行比例代表制吗？”回答很明确：“把比例代表制列入竞选纲领，是为了取悦共产党。我可以向您保证，弗朗索瓦·密特朗无意实行比例代表制，无论是市镇选举，还是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制定的两轮多数制对右翼有利，比例代表制则对左翼有利。这一许诺全然是为了争取希拉克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一旦当选总统，密特朗就把它置之脑后了。

第一轮投票次日，希拉克的表态是耐人寻味的。他声明：“作为个人，我只能投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票。”至于党员和选民，“人人都必须凭良知去投票。”戴派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的基调同希拉克的立场吻合：搞掉吉斯卡尔·德斯坦才有出头之日，而这意味着先得选密特朗。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投左翼票”的主张。会后，戴高乐派左翼头面人物、前部长菲利普·德夏特等戴派有势力人士果然公开号召投密特朗的票。他们甚至利用党员登记卡上的地址给党员发信，强调必须让吉斯卡尔·德斯坦落选。希拉克事后解释道：党内有些坚决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人确实号召投密特朗的票。戴派选民中，也有一股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势力。“至于我，我可从来没有说过第二轮应该投密特朗的票。”不管怎么说，希拉克在决胜轮中拆了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台。这是有目共睹的。

对吉斯卡尔·德斯坦来说，希拉克的选票太重要了。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拉克选票的去向。他派总统府顾问让·塞里泽同戴党总书记蓬斯秘密接触，敦促戴派全力阻止密特朗当选。塞里泽明确表示：尽管保卫共和联盟不愿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但还是应该支持他。这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双方在球场上打了起来，但比赛一结束，双方又在更衣室里交换球衣了。

吉斯卡尔·德斯坦亲自给希拉克打电话，开门见山表示：“您昨天发表了声明，这样做不错。但您会承认，这样做远不够。”他邀请希拉克亲自出

席5月3日在巴黎庞坦门举行的盛大的竞选集会，为他捧场。希拉克支吾其词。过了几天，总统府秘书长雅克·瓦尔电话催询，希拉克仍然搪塞一番。5月1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又派秘书长将一封亲笔信交给希拉克，敦请他出席“第二轮投票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希拉克问道：“为何给我写信？”秘书长意味深长地回答：“为了立此存照。”希拉克决意不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对邀请信不予置理。

如果说，1974年总统选举中，希拉克背离戴派候选人沙邦—戴尔马，拉出队伍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奠定了后者的胜局，那末，这次希拉克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背后捅上一刀，为密特朗获胜铺平了道路。

密特朗胜利在望，但竞选形势变化无常，决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同吉斯卡尔·德斯坦面对面电视辩论这场重头戏必须唱好。他对亲近的人说：“打个平局就行了。这样，我一定会取得选举的胜利，不必过于担心。”他事先精心准备。辩论当天，他一直躲在巴黎寓所里反复阅读卡片资料，特别是把经济数字背得滚瓜烂熟。

电视辩论于5月6日晚8时半开始，大约有3000万选民观看了现场直播。当时笔者适在巴黎，得以目睹盛况。吉斯卡尔·德斯坦显得十分自信，甚至带有几分傲气。他似乎想重演七年前的场面：大教授考小学生。密特朗则沉着自若，说话的口气就像是未来的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想在经济问题上给密特朗出难题，这回密特朗却对答如流。吉斯卡尔·德斯坦突然问到西德马克的汇价，想使密特朗当场受窘。密特朗很得体地表示：电视辩论不是考试，他也不是小学生。不过，他还是准确地说出马克汇价数字。密特朗则抓住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弱点进行反击。卸任总统曾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郑重其事地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发给他的诡称苏联将从阿富汗部分撤军的电文。密特朗讥讽他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小小的电报投递员”，给选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唇枪舌剑，持续两个半小时，不分胜负。吉斯卡尔·德斯坦试图以电视辩论的戏剧性变化扭转不利形势的期待落空。

决定性的第二轮投票于5月10日举行。笔者当时去巴黎市内几处投票站转了一转，场面颇为热闹。选民络绎不绝，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长龙。看来，左右翼决战对选民很有吸引力，人人都想把自己的一票投向决定胜负的天平。外地投票站在下午6时关闭。

巴黎则延续到晚8时。晚8时整，电视荧屏将准时显示电子计算机推算的谁胜谁负的非正式结果，其精确程度达到小数点后几位数。笔者早就守候在电视机前，生怕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果然，晚8时整，电视台公布选举初步结果，密特朗得票超过51%，胜局已定。屏幕上立刻显示电子计算机画的密特朗大幅头像。

接着，镜头转向两个竞选总部。社会党总部人声喧嚣，雀跃欢腾。在大院里搭起的帐篷里，人们斟满香槟酒，碰杯庆贺。虽然下着蒙蒙细雨，总部

门前还是人潮汹涌，又欢呼又歌唱，有的还使劲挥动玫瑰花束。相反，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总部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早就摆在桌子上的香槟、食品无人问津。

过不多久，内政部的正式选举结果出来了：密特朗得票为 51.75%，吉斯卡尔·德斯坦为 48.25%。密特朗的得票率大大高于左翼候选人在第一轮得票率（46.79%），这是由于一部分中间选民和几十万希拉克的选民在第二轮转向密特朗。一位戴高乐派左翼的领导人亲口告诉笔者，主要是戴派左翼投了密特朗的票，这是密特朗得以当选的重要因素。无怪乎电视台的即席评论风趣地说：密特朗当选，与其说是左翼的胜利，不如说是右翼的失败。吉斯卡尔·德斯坦当着几个亲信的面咬牙切齿责骂希拉克：“是他打败了我。”七年前，密特朗以 35 万张选票之差败北；今天他以 106 万张选票的优势战胜同一对手，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统。

1959 年以来，密特朗一直担任涅夫勒省的一个小城市希农堡市市长。他爱说：“希农堡使我重新获得信心，我又恢复平静。我的政治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每次回希农堡，他总是下榻老莫尔旺旅馆，总是住七号房间。每逢选举，他总是在这里等待选举结果。1981 年 5 月 10 日，他也守候在这里，一语不发。助手们也屏息以待。下午 6 时 30 分，一位左翼记者前来送消息：根据初步估算，密特朗获胜。密特朗沉思一会，发话道：“保持冷静。这毕竟只是初步估算，等巴黎总部有确切消息再说。”7 时整，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电话报告密特朗：“您当选已确定无疑。”屋子里顿时活跃起来。密特朗松了一口气；“好啦！现在得准备下一步了。”他抓起钢笔埋头起草当选声明。密特朗夫人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正式结果一公布，电视镜头转向希农堡，密特朗出现了。他抑制着心头的兴奋和喜悦，用冷静的声音向全国发表讲话：“我将坚定地采取行动，以便在遵循我的承诺的情况下，使法国找到实现必要的和解的道路。有多少事情需要我们共同来完成。”

密特朗原先对五月有某种迷信，认为五月是个不吉利的月份。“几乎每逢五月都要出事。5 月 10 日，‘奇怪的战争’结束了；我父亲是 5 月 5 日去世的。恰恰在黎明前，漫长的黑夜夺走了他的生命。”政治上，1958 年 5 月，戴高乐利用阿尔及尔军事暴乱上台；1968 年 5 月，法国大乱，他那乱中夺权的计划宣告流产。想不到，如今五月却成了大吉大利的月份。密特朗没能当上第四共和国的总理，加当上了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当晚，他偕夫人驱车赶回巴黎，据司机说，密特朗夫妇兴高采烈，放声唱起《国际歌》来。

在巴黎，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巴士底广场，竟达 20 万人之多，欢庆左翼的历史性胜利。电视播放出人们载歌载舞、如醉如痴的动人情景。笔者驱车

上街，想去亲身领略这种感人场面和气氛。车到凯旋门附近，只见戴高乐广场上灯火通明，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只得弃车步行。满街汽车喇叭声和人群的欢呼声、歌唱声混成一片。午夜过后，下了一场暴雨，欢庆活动却彻夜未停。自 1944 年庆祝巴黎解放以来，巴黎还从未有过如此盛大和欢腾的群众场面。这个沉醉在欢乐之中的夜晚，被称为“密特朗之夜”。

密特朗夫人的姐姐偕姐夫本想前往密特朗的巴黎寓所祝贺，但凌晨 4 时，汽车被堵塞在戴高乐广场动弹不得，只好从车上给密特朗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妹妹。密特朗早就睡着了。经过几十年坚韧不拔的奋牛，经过几个月来的奔波，密特朗总算圆了久久向往的总统梦，美美地睡上了一大觉。

“密特朗之夜”是欢乐之夜，也是期待与忧虑交织之夜。既有欢腾雀跃，又有焦的不安。左翼群众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则如坐针毡，连夜转移资金。24 小时内，10 亿法郎外逃。法郎汇价暴跌。交易所股市猛泻。由于没有任何买主，证券交易不得不中断 48 小时。人们寻思：左翼总统究竟将如何动作？

明天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

第五章

新的起点

密特朗经过 23 年反对戴高乐和右翼政权的艰难曲折的斗争 终于当选第五共和国总统，当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用两个字加以概括：“起点”。这是 35 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的新的起点。

有两种不同的政治雄心。有的人要掌权，是为了完成一项他孜孜以求的事业，实现他所信奉的理想；有的人则是为掌权而掌权，为满足个人野心而掌权，密特朗属于那一类？不少法国人认为，戴高乐无疑属于前者，而密特朗则未必。尽管他曾长期在野，尽管他宣扬“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仍不妨将他归属于第二类。他退居反对派，是为了驾驭反对派，作为进入爱丽舍宫的敲门砖；皈依社会主义，不过是为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寻求道义上的依据和政治手段。密特朗自己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在 1994 年 12 月 14 日同《新经济学家》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个有过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人，如果有一种激情，那就是政治，而不是别的……打个比方，有的赌徒是为赌博而赌博；我可不是为赌博而赌博。政权，这是对我所处的社会施加影响的手段。是的，我对此感兴趣。”这就是说，密特朗掌权是为了“更换法国社会”。

1981 年 5 月 22 日，密特朗就任总统次日，同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马的一席话，清楚地表达了他“更换法国社会”的雄心：“我们要创造一种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使公正和自由一致起来……在我身后，法国决不会是以前的法国。……您过去要改造社会、改善社会、改变社会。我呢，我现在不是要改变社会，我要换个社会。”这就是说，要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别出心裁的就职典礼

5月21日9时30分，当选总统密特朗准时抵达爱丽舍宫，出席就职典礼。卸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照例在爱丽舍宫台阶上迎接新总统。两人随即在左右没有旁人的情况下进行权力移交。这并非纯粹礼仪性的，而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核心是移交总统独自掌握的国家最高机密。据吉斯卡尔·德斯坦回忆录所载，当时他掌握四项最高机密。最重要的乃是核秘密，他向密特朗交代了法美核合作的秘密。外界都知道，美国麦克马洪法明文禁止与任何外国分享核秘密，连盟国也不例外。美国一向反对法国建立独立核力量，拒绝提供任何核武器技术。事实上，从蓬皮杜任期内起，法美之间就存在着特殊的合作关系，但一直秘而不宣。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否定信息”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法国核专家定期向美国同行介绍某种研究计划，美方只向他们说明，哪些途径是行不通的，但不提供任何核秘密或核武器技术。这种合作机制至少表面上并不违反麦克马洪法，却能使法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少走弯路，节省时间和财力。吉斯卡尔·德斯坦继任总统后，法美双方决定继续保持这种特殊的核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移交给密特朗。接着，卸任总统又将按动战略核武器（战略轰炸机、陆基中程导弹、核潜艇携带的潜射远程导弹）的密码亲手交给密特朗。按照第五共和国宪法，总统是三军最高统帅，只有总统才有权下令动用核武器。这份密码，总统必须随时带在身边。后来，密特朗有句名言：“核威慑，就是我。”正因为他有按核电钮的密码在身。

两位总统还说了几句与国家机密无关的题外话。吉斯卡尔·德斯坦争取蝉联总统失败，情绪低落，表示当总统寂寞难耐，是“爱丽舍宫的囚犯”，其实也没有多少滋味，密特朗下放过挖苦对方的机会：“您在竞选运动中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您参加竞选。七年任期满后再参加竞选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次您不参加竞选，您就会在七年之后接替我。”不过，密特朗自己倒甘冒风险，七年不够，再来七年。这是后话。

卸任总统刚离开爱丽舍宫，一帮社会党员尾随不舍，又是嘘又是骂：“滚蛋！”“去你的！”过路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未免太拙劣了，简直是给正在宫内进行的总统就职典礼抹黑。社会党一上来就失了分。

就职典礼在爱丽舍宫内金碧辉煌的节日大厅举行。21响礼炮响彻云霄。宪法委员会主席罗歇·弗雷宣布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密特朗15708262票；吉斯卡尔·德斯坦14642306票，并将书面结果交给密特朗，作为确认当选总统的凭证。接着，按照传统，由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授予密特朗国家荣誉勋位勋章的宽大缓带。

只有共和国总统才能佩带这种缓带。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戴高乐的女婿、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阿兰·德布瓦西厄将军在第二轮投票前宣布，如果密特朗当选，他将辞去这个职位，因为他不能把最高荣誉勋位授予一贯激烈

反对戴高乐将军的人。于是，由新总管比阿尔将军授予总统。

密特朗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布，他不再是社会党领袖，而是“全体法国人的总统”，他将团结所有法国人“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我的行动准则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1981年5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他以履行法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为己任，宣称“一个伟大的民族当然应该有伟大的计划”，法国“可以为人类的发展带来希望的光辉”。这是同法国人一向怀有充当全世界“灯塔”的雄心相吻合的。

仪式完毕后，密特朗向主要来宾一一致意。一个动人的情景出现了：密特朗和孟戴斯—弗朗斯热烈拥抱。密特朗在他耳边说：“没有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细心的记者观察到（有照片为证），密特朗显然只准备象征性地与对方拥抱一下，而75岁高龄的孟戴斯—弗朗斯在拥抱密特朗时，却伏在这位新总统的肩上，激动得老泪纵横。左翼掌权的宏愿终于由比他年青10岁的密特朗实现了。

接着，密特朗乘坐敞篷汽车驶出爱丽舍宫前往凯旋门，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并点燃墓前的火种。从这时起，密特朗就算正式就职了。总统由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莫鲁瓦陪同，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缓缓行驶，两边人行道上欢声雷动。在这欢庆的时刻，新总理却无心观赏这激动人心的欢庆场面。他在为法郎贬值问题犯愁。从5月10日密特朗当选到21日就职这一天，几十亿美元的外汇流失了。单是前一天，法兰西银行为了保卫风雨飘摇的法郎就抛出了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卸任总理、经济学家雷蒙·巴尔认为，法郎贬值，势在必行。前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断言：

“密特朗不敢这样做。他没有这种勇气。”莫鲁瓦等不到回爱丽舍宫，迫不及待地在车上探密特朗的口气：“外汇储备枯竭。法兰西银行总裁对我说：法郎必须贬值。您还是认为不该贬值吗？”总统断然表示：“当然！我一直不主张贬值。否则，我们就要自食其言。”“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刚刚取得全国的信任就将法郎贬值。”

他向欢腾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任凭莫鲁瓦去嘀咕。

中午，爱丽舍宫举行盛大宴会，200多位国内外贵宾欢聚一堂，共庆第五共和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统就任。不料又出了煞风景的事。罗卡尔把莫鲁瓦拉到一旁，悄悄对他说：“要是不马上实行贬值，你将犯极大的错误。你会把法兰西银行的外汇储备耗得一干二净，到头来你还得实行贬值。”莫鲁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急忙去找新总统请示，得到的还是一模一样的回答。密特朗把政治考虑置于经济考虑之上：左翼政府头一个行动总不能是法郎贬值，决不能蹈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的覆辙。密特朗后来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解释道：“我反对任何贬值的做法。我不想在公众心目中留下左翼执政就意味着财政崩溃的印象。”再说，新总统也无暇顾及。爱丽舍宫外面还有一个别开生面的就职仪式在等待着他。

密特朗认为，作为左翼总统，单单有这两项仪式还不够，还得在人民群

众面前举行就职典礼。地点就选在位于拉丁区的“先贤祠”——法国民族精英的长眠之地。

下午6时，密特朗总统从卢森堡宫（参议院）步行穿过拉丁区，前往先贤祠。沿途尾随而行的人越来越多。马路两边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欢呼声和鼓掌声不绝于耳。在先贤祠广场前，巴黎交响乐团奏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更增添了庄严和欢乐的气氛。新总统在乐曲声和欢呼声中独自一人，缓步前进，挺胸凸肚，面容庄重，手持一枝玫瑰花。社会党领导人和总统的至亲好友手挽手列队远远相随。电视镜头转入先贤祠。密特朗仍然独自一人，在曲折回旋的地下室里，忽上忽下地转来转去，在三位贤人墓前敬献了玫瑰花。一枝献给社会党先驱饶勒斯，象征继承社会党的传统和理想；一枝献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统一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让·穆兰，象征以社会党为核心的全体法国人的团结；一枝献给19世纪40年代为殖民地奴隶的解放而奔走呼号的维克托·舍尔歇，表明新总统崇尚“自由”、“人权”，法国是第三世界的忠实朋友。这三枝玫瑰向全国和全世界表达了法国新总统信奉的价值观和政策意向。从电视上当然看不见为总统引路和递送玫瑰花的工作人员，只见到密特朗一人在先贤祠前和地下室里长时间独自行进，在法国人面前树立了“唯我独尊”的形象。

这场别出心裁的就职典礼，显示了新总统作为左翼的衣钵传人，继往开来。把他正在进行的事业与法国历史融为一体了。这自然是典型的、为密特朗树碑立传的典礼。

密特朗出任总统，结束了第五共和国延续23年的右翼掌权的局面，也结束了他本人长达23年的在野生涯。

密特朗就职伊始，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爱丽舍宫拜访他。富尔叹了一口气，说道：“真想不到！这个宝座本来该由我来坐的！”新总统回答说：“确实如此。”富尔接着说：“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话说回来，我绝对不可能当23年反对派。”

密特朗在人前爱讲这桩逸事，并且从中得到启迪：“搞政治嘛，就得楔而不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就是他终于圆了总统梦的秘诀所在。

社会党一统天下

密特朗在野期间，一贯猛烈抨击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他在表决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公民投票中投了反对票。他常说：“我没有投票赞成这部宪法。这不是我的宪法。”他曾断言：“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如果不是高于上帝，至少是仅次于上帝的主宰，”因此，“会使共和国滑向君主体制”。他谴责戴高乐“个人专权”；指责吉斯卡尔·德斯坦比之戴高乐“有过之而无不及”。1964年，他同当时的总理蓬皮杜在国民议会的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中声称：要以“自由和权力均衡”的体制取代“个人专权”的体制。他在总统选举前夕发表的《此时此地》一书中强调：总统任期“七年，太长了”。“七年的总统期限就遏制了民主的正常开展。一个由左翼选出的总统大概会自动放弃我们所揭露的做法。”他在竞选时提出的110条建议中，主张“总统任期减为五年，只能连任一次，或者任期七年，不得连任”，并主张扩大议会权力。如今轮到密特朗自己当总统了，他会废弃第五共和国吗？至少，他会第五共和国宪法进行重大修改吗？

不，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宣布：只要他在位，法国就没有回到第四共和国的危险，也不会创建第六共和国。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不是为我设计的，但这种体制对我是合用的”。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能自圆其说：这种体制“在我就任总统之前是危险的，在我卸任之后还将是危险的”。唯独他是个例外。于是，他原封不动地沿袭他所一再谴责的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为他所用。把竞选时许下的修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的诺言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七年任期内，他未对宪法的任何一条提出修改。他自我解嘲说：“我没有推出任何修宪措施。我从未感到法国人民会对修改宪法感兴趣。”不仅如此。密特朗明明说过：“如果七年太长，14年就更长了。”结果，他自己当总统当了七年还嫌不够，一连当了14年。法国历史上左翼曾两度执政，但都是短命的。1924年，“左翼联盟”执政不到一年，就被右翼轰下台；1936年，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也只维持了一年。密特朗的左翼政权之所以能延续14年之久，甚至在右翼两度夺得议会多数的情况下仍岿然不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巧妙地运用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结果。这是第五共和国的设计师、密特朗的老对手戴高乐万万没有料到的。

爱丽舍宫不是为密特朗设计的，但对密特朗也是合用的。

爱丽舍宫，其实并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宫殿，而是18世纪初由经营工商业的埃夫勒伯爵兴建的府第，取名埃夫勒大厦。他死后，国王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蓬巴杜尔侯爵夫人买下这座考究的邸宅，迁居于此，曾使埃夫勒大厦名噪一时。她谢世时，将它遗赠给国王。1773年，路易十五将它卖给金融家博让。13年后又由路易十六买回，归他的侄女波旁公爵夫人使用，改名波旁大厦。法国大革命后，这座宅第几经转手，最后改名爱丽舍宫。1805年，拿破仑的妹夫缪拉元帅买下此宫。他被封为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国王之

后，将爱丽舍宫赠予拿破仑。拿破仑和约瑟芬曾在宫内居住。1815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曾退避于此。1848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当选为第二共和国总统后，入主此宫。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称帝后，把爱丽舍宫改为皇宫。1873年麦克马洪任第三共和国总统后改为总统府。在密特朗之前，先后有18位总统任职于此。

戴高乐的办公室在爱丽舍宫二楼中央，从窗口可以看到花园里最美的景色。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没有使用戴高乐的办公室，也许是出于对将军的崇敬吧。密特朗头一天去爱丽舍宫上班，进了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办公室，转身就出来了。然后，他去了戴高乐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前坐定，说道：“我就在这里工作。”这倒是颇有象征意义的：日夜企盼的取戴高乐而代之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有趣的是，新总统头一天上班，发现爱丽舍宫竟处于瘫痪状态。48小时内，整个总统府连电话都不通。好不容易电话接上了，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拨错了号码，打到总统办公室来了。密特朗拿起听筒，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是哪儿？”

密特朗答道：“您在同共和国总统通话哩！”1981年7月2日密特朗同《世界报》记者谈话中透露了这桩趣闻。不过，在见报时删去了。密特朗去世后，《世界报》特意补登了这个插曲。

从入主爱丽舍宫的第一天起，密特朗心里盘算的，不是只呆七年，而是更长。5月25日，他同右翼“法国民盟”主席让·勒卡尼埃的一席话非常说明问题。密特朗洋洋得意他说：“瞧，我现在进了爱丽舍宫，我要在这里呆上七年。”勒卡尼埃轻描淡写地回敬一句：“是啊，这是您正常的任期。”言外之意，密特朗未必能做满任期。总统还击道：“您知道，我的身体非常好……大家都在谈论右翼跨越荒漠，我可以向您说清楚，荒漠里决不会有绿洲。”勒卡尼埃又刺了他一句：“我们并不害怕。右翼领导人还年轻。跨越荒漠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可不是一回事。”密特朗毫不示弱：

“既然您隐约提到我的年龄，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在法国当总统，得60岁开外，我正当龄。正是父辈或大叔的年龄。”从此，密特朗得了个“伯伯”的外号。

密特朗觉得爱丽舍宫太促了。他说：“这是欧洲最小的总统府。”他一度考虑将总统府迁至荣军院（拿破仑墓所在地）。经研究，认为太复杂，太花钱，只得作罢。密特朗不喜欢爱丽舍宫的总统套房，不愿整天被禁锢在深宫之内。早在1971年，密特朗买下了巴黎市区比埃弗尔路22号一幢17世纪建造的四层小楼。离巴黎圣母院仅一箭之遥。他宁愿每天去爱丽舍宫上班下班，调剂总统官邸的单调乏味，还可以躲避公务纠缠。他爱说：“我的任期长得很。”他仍然保持以往的生活习惯，起得很晚，早上10时才去爱丽舍宫。一路上，有时他还像往常那样，到书店转一转，甚至逛逛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悠然自得。他的这座小楼有“爱丽舍宫第二”之称。在四层阁楼上，

“鸽笼”是他的工作室。《巴黎竞赛》画报记者曾在此拍摄他摆着看书架式的照片。这位摄影记者说：“这是我拍摄过的大人物的最小的工作室。”工作室虽小，可总是自己的天地。

密特朗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是按第五共和国的惯例，一手指定皮埃尔·莫鲁瓦当总理。起用莫鲁瓦当首任总理，是密特朗和莫鲁瓦在竞选期间做成的政治交易。莫鲁瓦是老社会党的元老，社会党北方大本营——北部省委的实力人物，又是党内仅次于密特朗主流派的第二大派系领袖。历史上，莫鲁瓦曾在1971年重建社会党的埃皮内代表大会上给予密特朗决定性的支持，对密特朗一跃而为社会党第一书记起了重要作用。密特朗在《此时此地》一书中写道：“在他（莫鲁瓦）和我之间，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关系。我们共同重建法国社会党，而且是在一种相互信任的特殊气氛中进行的。”而今，莫鲁瓦又为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立下了新功。密特朗曾指责戴高乐“把行政权抓在自己手里，政府只不过是他的下属”。他甚至挖苦说：“总理是个高级办事员，但也只是个办事员，即总统的公务员而已。”一旦权在手，密特朗也如法炮制。组织容纳社会党各派系代表人物的新政府，事实上是密特朗一手操办的，莫鲁瓦只不过从总统手里接过了政府名单。发号施令的是密特朗，总理只不过事事照办而已。

密特朗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是在就任次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事先，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他形式上征询了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和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尔马的意见，但没有理睬他们的反对意见。改选议会的目的在于趁法国政局左转的势头所掀起的“玫瑰浪潮”，冲垮右翼控制的议会，并通过大选建立一个以社会党为主体的新议会。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左翼候选人选进爱丽舍宫的势头不会朝夕之间就停顿下来……议会选举会按选总统的步调进行”，必定会选出一个与总统相一致的议会新多数派。

密特朗果然如愿以偿。6月14日和21日两轮投票结果，社会党独家获得285席，比绝对多数还多出39席，可与1815年的“举世无双议会”和1968年戴高乐派的胜利媲美。密特朗赞叹道：“这样的议会，以后不会再有了。”法共只得44席，比上届减少42席；右翼两大党仅得150席，比上届议会减少一半。

这次议会选举结果，不仅左右翼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左翼占压倒优势，而且左翼内部的力量对比也大为改观。社会党得票近38%，而法共仅得16%，只相当于社会党的一半。至此，密特朗在1972年提出的、在夺取一大部分法共选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党的目标实现了。

议会改选的重大胜利，实现了总统—政府—议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党一统

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同年8月议会选举中，保皇派夺得全部402席中的350席。国王路易十八称之为“举世无双的议会”。1968年“五月风暴”平息后，戴高乐派在议会改选中夺得全部485席中的294席。

天下，从而使爱丽舍宫的新主人取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放手施展“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雄图大略了。

“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密特朗执政，既是他同右翼政权长期较量的结果，也是 80 年代初法国和西欧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

资本主义世界在走出 70 年代中期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不久，又于 1979 年底陷入一次新的经济危机。持续的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造成一种幻觉，仿佛资本主义已经找到解决其固有矛盾的出路，似乎“高速增长”、“消费社会”、“福利社会”将永世长存。经济危机无情地破灭了这种幻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其固有矛盾。人民不满现状，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怀疑，出现了强烈的变革要求。面对这种困境，当权多年的右翼保守势力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当年适应经济繁荣时期而得势一时的社会民主党福利主义也已失灵。于是，标榜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法国社会党应运而生。密特朗的胜利，在南欧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相继出现社会党政权，构成 80 年代上半期西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正是顺应人民强烈要求变革的潮流，以变革社会、振兴经济相号召而上台的。他出任总统，不是一般的总统或政府更迭。既不同于 30 年代的“人民阵线”政府和 50 年代的老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组阁，也不同于西北欧社会民主党通常取代右翼政党掌权，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重、人心思变的条件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一场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试验，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密特朗对内施政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搞所谓“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标榜走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从而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样板”。用密特朗的话来表达，“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它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先进’，更深刻些，但它显然与苏联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勃里埃对《快报》记者说：“法国人一向怀有充当全世界的灯塔的雄心。现在仍然如此。确实存在着树立一种模式的想法。这种模式将是全世界的榜样和所要遵循的道路。”把这番话作为密特朗倡导“法国式社会主义”样板的脚注是颇为恰当的。

西北欧国家长期盛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瑞典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橱窗”。1972 年 2 月 2 日，密特朗去瑞典同当时的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领袖帕尔梅长谈，主题是社会主义问题。帕尔梅对瑞典的“社会主义”模式津津乐道，强调瑞典社会民主党选择的道路，即便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至少是“最可靠的途径”。密特朗不以为然。他指出：“但是，你们没有触动生产结构，你们也没有打击大资本，没有触动大资本

的利润来源，因而也就没有触动它的真正的权力。”他还援引了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卢森堡电台同他辩论时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就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

“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突出以大规模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以区别于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

密特朗在 1981 年 12 月 10 日电视广播讲话中解释道：“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我想应该这样说：它在经济方面与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我们不仅要实现制止人剥削人的社会愿望，而且还要大大触动经济结构，要实行国有化和真正民主的计划化。”密特朗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只能以国有化为代价”。他批评战后初期戴高乐实行的国有化没有改变工人的地位，实质上是垄断资本的国有化。而社会党政府实行的国有化，则是要促进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要让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向着“自治”方向发展。

在政治上，“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则强调“民主”、“人权”，以区别于苏联模式。密特朗宣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继承了“1789 年革命的伟大原则”，也是“引导人类为争取各种自由而战斗的历史性运动的继承者”。“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同“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密特朗特别强调“自由”。他在 1983 年 4 月 11 日对巴黎《晨报》的谈话中指出：“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但我终于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体会到不带极权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代表了最高阶段的自由。而自由不应被限于大原则的范围，而必须落实到特定社会的、具体的经济、社会现实中去。我成为社会主义者，乃是为了更好地为自由而战斗。”密特朗还突出“政治民主”，宣扬政治上的“自由选择”和“多元制度”；“厌恶一切专政，无论是国家专政，或一党专政，或任何机构的专政”。

因此，密特朗申明他同苏联模式势不两立。1981 年 7 月 20 日，他对法国《问题》周刊记者谈话中强调：“没有比社会主义中的两大派——列宁派和勃鲁姆派——更加对立的了。我属于莱昂·勃鲁姆的传统，所以，我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协。”

密特朗说得很玄乎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消看一看密特朗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密特朗：《桔秆与谷粒》，第 40—41 页。

莱昂·勃鲁姆（1872—1950 年），法国社会党领袖。1920 年 12 月，社会党在图尔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主张加入共产国际，成立法国共产党。勃鲁姆拒绝服从多数。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少数派仍保持原来社会党名称。

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

早在 1971 年 6 月新社会党成立大会上，密特朗厉声谴责“金墙银壁”：“垄断，即广义上一切金钱的力量，是真正的敌人。我甚至要说，唯一的、无孔不入的敌人。金钱腐蚀一切、收买一切；

摧残一切，杀害一切；金钱毁灭一切。金钱甚至使人腐化堕落。”

密特朗上台后，对“金墙银壁”发起猛烈冲击，对法国经济社会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事先发出警告：“如果资本家进行破坏，我有言在先：我可不会满足于在（民族广场附近的）圣·安托万街搞示威游行。现在不是 1936 年。我有一部当年勃鲁姆所没有的宪法。我要运用宪法这个武器。”

改革集中在执政头一年（1981 年 5 月—1982 年 3 月）。大体可以归结为四大类。一是社会改革。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意向。其中包括对财产在 300 万法郎以上者征收“巨富税”，把遗产税从 20% 提高到 40% 等的税制改革和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措施，如增加家庭补贴 25%；增加住房补贴 25%；增加老年人补贴 20%；提高最低工资 10%；每周 39 小时工作制，并逐步递减至 35 小时；每年五周工资照付的假期等。二是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沿袭几百年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把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并以民主监督、自治管理、人民参政的原则改革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最重大的改革。三是改革司法制度，贯彻社会党所主张的“司法民主”和司法的“人道精神”。最重要的是废除死刑，取消审理“政治犯”的国家安全法院。四是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这是经济社会改革的重点和核心。

在法国，国有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法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第一次是 1936—1937 年人民阵线政府时期。当时为了应付紧迫的战争危险，将铁路以及施奈德兵工厂、雷诺坦克厂等 10 多家军工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是 1945—1946 年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法国经济，建立了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法兰西煤炭公司，把雷诺汽车公司、北方煤矿、法国航空公司收归国有。同时将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等五家银行和 34 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1981 年 5 月密特朗执政前，法国共有国有企业 84 家，公私合营企业 49 家。国有化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占工业营业额的 22%，占固定资本的 20% 和工业部门职工的 12%。密特朗上台后进行了法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国有化运动。

密特朗把扩大国有化作为实行“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手段和“同资本主义决裂”的主要标志。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社会党执政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总统七年任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有化法规。”同时，他又把国有化作为摆脱经济危机、振兴法国经济的一张王牌。他宣称：“我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将军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是，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

击力量。”他力图以大规模国有化为杠杆，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发挥国有企业的先导作用，促使经济回升，缓解敏感的失业问题。

根据 1982 年 2 月 11 日议会通过的国有化法律，政府以向私人企业购买股权并向持有人支付补偿金的方式（总数高达 510 亿法郎），将“巴黎—荷兰”和“苏伊士”两大金融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五家工业垄断集团以及 36 家大银行收归国有。对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和马特拉军火公司则以国家控股 51% 的方式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对洛林炼钢公司、北方炼铁公司则以所欠国家债务转为国家股份的方式实行国有化。密特朗满意他说：“这样一来，银行就不能同国家捣乱了。即便银行不给我们奉行的政策帮什么忙，至少不会起破坏作用。至于工业企业，应当向它们提供资金。这些企业都快破产了，应当挽救它们。”

连同原有的国有化企业，国家对银行系统的信贷控制高达 85—90%，国有化工业营业额占整个工业营业额的 42%，国有企业职工占工业职工的 23%，国有企业占全国固定资本的 53%，占出口额的 30%。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约 4000 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在西北欧各国中，法国国有化程度是最高的。

比之于上两次国有化措施，这次不仅规模大得多，深度也很不一样，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也强得多。上两次国有化主要涉及公用事业、基础工业和传统工业部门。这次国有化的对象则是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工、原子能、导弹、新型军用飞机等新兴或尖端工业部门，并触及金融垄断资本的主体。

密特朗宣告：“同资本主义的真正决裂开始了。”他认为，银行家是不会轻饶他的。他们还会作绝望的挣扎，甚至会要他的命。他对爱丽舍宫的助手们吐露这样的担心：“所有银行家都同我作对。要是他们还没有找到个把狂热的巴勒斯坦人来谋害我，就像干掉肯尼迪那样，我反倒觉得奇哉怪也了。”

扩大国有化，引起了法国垄断资本结构的某些变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人垄断资本，特别是使法国两家最大的新兴金融垄断集团——苏伊士集团和巴黎—荷兰集团解体。国有化措施触动了某些私人垄断资本集团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但并未损害整个私人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因为在保留全部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条件下，这种国有化毕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诚然，密特朗的经济改革比西北欧社会民主党要广泛和深刻些，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变革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并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种改革的性质仍然是改良主义的。所谓“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比较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一句话，密特朗的一系列

经济社会改革，乃是在资本主义框框内进行的一场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

密特朗是在法国经济危机深重的条件下实行改革的，并把改革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社会党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关键是能否把经济搞上去。经济社会改革的成败，也将取决于经济形势是否好转。

但是，密特朗通过改革摆脱危机、振兴经济的战略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恰恰相反，由于改革步子过快，摊子铺得过大，花钱太多，孱弱的法国经济无法承受，无异于给挣扎在危机之中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刚刚国有化的企业，不仅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本身效益不佳，未能在振兴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有些改革措施不切实际，带来不少新问题。资本家对改革进行抵制和反抗，大量资金外逃（估计约400—500亿法郎）。私人投资由于经济和政治双重原因持续下降。特别是，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处在危机之中，各国普遍实行紧缩政策，法国单独一家采取膨胀政策，通过大量社会福利措施和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消费和需求，结果本国经济回升有限（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3%），却刺激进口激增，外贸逆差扩大，黄金外汇储备大量流失（一年内减少700亿法郎），法郎地位疲软，从1981年10月至1983年3月，18个月内三次贬值。同时，改革和福利措施大大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预算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一年内物价上涨14%），失业人数从170万增至200万。

社会党政府低估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和法国经济本身的结构弱点，过高估计了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摆脱危机的作用，特别是过高估计了国有化的效能。经济政策严重失误，使原已境况不佳的法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使原先支持密特朗上台的选民感到失望和不满。

左翼政府的经济社会改革犹如一列超速超载行驶的火车，面临出轨的巨大危险。是不顾一切继续高速前进，还是痛下决心及时刹车？

对于改革的规模和速度，政府和社会党内部一直意见纷坛。以总理莫鲁瓦和经济部长德洛尔为代表的少数派，早就主张调整政策，放慢步调，“暂停”改革；多数部长头脑发热，主张改革加码。密特朗总统本人也贪多求快。他深信，必须迅速进行大规模改革，否则就会被捆住手脚，无所作为。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他在1982年新年祝词中宣布，“经济复苏已经到来。”因此，他一再否定放慢或暂停改革的意见。他洋洋自得他说，社会党政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社会进步，超过法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改革和社会进步。”1981年11月29日，即密特朗执政半年之际，经济部长德洛尔在卢森堡电台的讲话上明确表示：“必须暂停新的改革，对已经决定的改革则必须很好完成。”这一席话把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公诸于众。“暂停”，这是社会党人非常忌讳的字眼。因为“这使人马上联想到1937年2月13日人民阵线政府总理勃鲁姆宣布经济社会改革“暂停”。四个月后，6月21日，勃鲁姆政府被迫辞职。对勃鲁姆走过的法郎贬值——

暂停改革——被迫辞职的失败之路，社会党人心有余悸。在他们心目中，“暂停”似乎是“失败”的同义语。

密特朗总统对德洛尔的谈话十分恼火：“德洛尔搞什么名堂？干吗说这一套？”次日清晨，他在启程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在机场指示莫鲁瓦：“不像话！您是总理，必须尽快纠正。”莫鲁瓦内心同意经济部长的意见，他见了德洛尔只轻描淡写说了两句：“总统不同意您前一天的谈话，改革将不紧不慢地进行。”12月9日，总统在首次电视讲话中明确宣布：改革将在“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以“恰当的速度”继续进行。

“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列车越来越濒临出轨的危险，总理莫鲁瓦在密特朗执政一周年之际拟定了“刹车”计划。比“暂停”更进一步，实行“紧缩”，包括法郎贬值，冻结工资和物价，削减预算开支。密特朗把这个计划压了下来。因为6月初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将在凡尔赛召开，密特朗指望会议能协调西方经济政策，特别是促使美国在改变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方面作出让步，以缓解法国经济困难，从而避免实行不得人心的紧缩政策而断送了经济社会改革。他对总理说：“让我先开首脑会议，别的，以后再说。”

凡尔赛会议气派非凡，豪华异常。笔者曾多次以外交官身份前往现场了解会议情况，亲历其境，深感这种豪华排场同濒临深渊的法国经济很不协调。法国舆论对此亦有非议。但是，大事铺张的接待并没有打动美国总统里根，密特朗的投资落了空。

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谋求本国利益，实行高利率政策（高达20%上下）。高利率和随之而来的美元汇价不断上扬，导致法国等西方国家资金外流，投资萎缩，影响经济复苏，并使外贸逆差扩大。据计算，美元汇价每提高五生丁，对法国来说，就意味着，每年增加20亿法郎的外贸逆差。用经济部长德洛尔的话来说，美国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对法国经济的总影响相当于“第三次石油冲击”。但是，里根总统表示无意改变货币政策，无论在稳定美元汇率还是在调低利率方面均寸步不让。里根尤其不愿对密特朗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试验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认为这种试验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接受的。密特朗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美国坚持以邻为壑的经济货币政策给法国社会党政权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以致命的一击。事隔一年后，密特朗悻然回顾道：“我过高估计了美国人的善意。现在我不指望从里根那里得到什么了。”

6月6日，凡尔赛会议闭幕这一天，法国总统在凡尔赛宫最华丽的镜廊盛宴各国代表团。莫鲁瓦急不可待。宴会结束后，他把总统拉到镜廊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言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不马上采取他所建议的紧缩措施，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蹈人民阵线政府的覆辙，就会像当年勃鲁姆那样被迫下台。他央求说：“总统，给我开绿灯吧！”总统终于首肯了。他说，“左翼还是得人心的。我们的地位会下降一点，工会组织会抱怨，但我们能恢复过

来。我们肯定能顶住。”这番话不知是安慰莫鲁瓦总理，还是自我安慰。

凡尔赛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密特朗在记者招待会上特意强调：“我们奉行同一种政策。我们保持同样的目标。”不过，像一年一度的环法自行车比赛一样，“我们从平原这一段进入了山川这一段”，但目的地不变。

几天之后，6月12日，法郎再次贬值。次日，社会党政府宣布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从膨胀政策转向紧缩政策，冻结工资、物价四个月，限制社会福利开支，压缩财政赤字。在决走实施紧缩政策的内阁会议的末尾，密特朗给情绪低落的部长们鼓气：“我不大懂经济，也许比戴高乐将军懂得多一点。”而戴高乐执政几个月之内就在整顿财政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他强调，应该“随机应变”，“信心，就是一切”。

在密特朗心目中，紧缩政策只是短期的、过渡性的，随着经济回升，改革将继续进行。他对经济部长德洛尔说：“紧缩本身并不是目的。紧缩只是暂时的。”但是，事与愿违，第一批紧缩措施并未奏效，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四个月紧缩期满，莫鲁瓦又提出新的更为严厉的紧缩计划，密特朗发火了：“总理先生，我请您担任总理，不是要您奉行撒切尔夫人的（紧缩）政策。如若这是我的意图，那么，我本会让别人当总理。”“等过了市政选举再说。我希望法郎能支撑到那个时候。”为了人为地支撑法郎，社会党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先后向沙特阿拉伯和欧共体借款300亿和270亿法郎。

1983年3月6日和13日市政选举结果，左翼受挫，右翼取得明显的进展。在全国36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左翼失去七个，保住12个；右翼获得24个，其中希拉克在巴黎20个区实现大满贯。在全国221个人口3万以上的城镇中，左翼丧失34个，保住120个；右翼控制100个。这次选举虽是地方性的，但它是对执政21个月的左翼政权的一次全面检验，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选举结果反映了左翼和中间选民对社会党政权的失望和不满。

挨过了市政选举，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政府推出进一步的紧缩措施。莫鲁瓦总理无可奈何他说：“我不会在冰冻的路面上开车。”1983年3月21日，法郎第三次贬值。25日，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出台。包括压缩家庭消费650亿法郎（等于收回密特朗上台后给予的全部社会福利费用），增加税收，提高公用事业收费，限制个人出国旅游用汇等。密特朗认为，形势并不那么严重：“这一切都算不上悲剧；法国是富有的。如果我现在就说‘汗泪交加’，那么，一旦真的发生悲剧，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他还是做了自我批评。他对总理说：“不能把采取这些决定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责任在共和国总统……我感到肩负历史性责任。我引以为自豪。我要担当这种责任。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担当到底。”

从此，密特朗不再采取新的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措施。一场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就此偃旗息鼓了。反对派领袖希拉克曾预言：“社会主义试验超不过两年。”当时密特朗说：“他说得对。在法国，左翼掌权从未超过两年。我们要好自为之，使这一回与以往有所不同。”结果，还是希拉

克不幸言中。

这是密特朗执政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收起 70 年代初以来一再宣扬的“社会主义”政策主张，皈依经济的现实主义，其经济、社会政策的社会党色彩越来越淡化了。密特朗自我解嘲道：“我不把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奉为圣经。”“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密特朗的词汇中消失了。

好在密特朗总算没有步勃鲁姆后尘。经济社会改革失败了，而他在爱丽舍宫仍岿然不动。这倒要感谢他的老对手戴高乐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总统任期七年，这是雷打不动的。莫鲁瓦总理成了改革失败的替罪羊。1984 年 7 月 15 日，星期天，莫鲁瓦给在拉什度假的总统打电话，表明辞意。密特朗表示挽留：“干下去，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一起做。”莫鲁瓦又用电传发去辞呈，总统不再坚持了。7 月 16 日晚，莫鲁瓦前往爱丽舍宫向总统告别。两人都非常激动，甚至相对黯然泪下。莫鲁瓦辞出后，密特朗对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说：“这是我七年任期中最困难的时刻。”是的，莫鲁瓦的离去，标志着一场引人注目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试验最终收场了。

法共参政

在社会党取得议会选举的重大胜利的第二天，密特朗在巴黎寓所同亲信们共进午餐。他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试探他们对法共参政的态度。在出席午餐会的客人中，谁也没有对吸收法共部长入阁流露出热情，认为社会党议会绝对多数在握，毋需让法共参政。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您瞧，这回您又是为了照相才把几位共产党部长安排在您身边的吧？那么，总统先生，为您的照片担心吧！”

其实，对法共参政问题，密特朗早已胸有成竹。他在经济上进行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试验的同时，打算在政治上采取吸收法共入阁的步骤，但需视议会选举结果再作定夺。在选举前，他对法共参政问题故意含糊其词：“先让我取得胜利，其他容后再说。”1981年6月21日，议会选举结果揭晓的当晚，密特朗就指示莫鲁瓦总理着手组织包括法共部长在内的新政府。

法共总书记马歇在祝贺密特朗当选的信中就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准备承担自己的全部责任”，使变革得以实现，这表达了希望参政的意向。在组织左翼联合政府过程中，马歇通过总统府秘书长贝雷戈瓦向密特朗传话：希望像当年从莫斯科回国的总书记多列士那样，担任国务部长。爱丽舍宫派要员向法共领导人提出参政的具体条件：两党就政府内外政策达成政治协议；法共将取得与它在国民议会中的地位相称的部长名额；法共总书记马歇不得入阁。

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和法共总书记马歇率领各自的代表团迅速就政府内外政策的主要点达成协议。在对内政策上，两党将积极推行总统的“改革”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法共作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某些国际问题上的亲苏立场，向社会党的政策主张靠拢。6月23日，两党签订了《共同执政协议》。左翼联盟破镜重圆。

接着，两党就法共部长人数和具体职位进行讨价还价。法共一开始要求五个部长席位，社会党只同意给四个次要的技术性部长席位，不包括外交、财政、内政和国防部。法共力量削弱，只能听从社会党的安排。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法共第二号人物夏尔·菲泰尔芒任主管运输的国务部长，在礼仪上，其地位仅次于内阁总理；雅克·拉利特任卫生部长；马塞尔·里古任职业培训部长；阿尼塞·勒波尔任总理府负责人事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

1981年6月24日，四位法共部长前往爱丽舍宫出席两党联合政府的首次内阁会议。四位部长站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摄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这张被新闻媒介广为传播的照片无异于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法共在野34年之后再一次参政了。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47年5月，社会党人拉马迪埃总理将以多列士为首的五名法共部长逐出政府，当年的退伍军人部长密特朗，

法共在国民议会全部491席中占44席，不到1/10。这意味着，在44名内阁成员中，只能占四名。

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硕果仅存的见证人。现在，密特朗作为社会党总统，又把法共部长请了回来。

内阁会议开始，密特朗总统让国务部长菲泰尔芒坐在他的左边，象征着社、共两党实现历史上的第四次联合。密特朗强调，法共参政“符合法国人的愿望”，就像法国解放后戴高乐吸收法共部长入阁一样。密特朗告诫道：“政府不是各党代表的政府，即便不少政府成员是不同党派的党员。”总统这番话自然是说给法共部长们听的。菲泰尔芒当即表明法共将同社会党精诚合作的立场，强调法共部长将“本来团结和忠诚的精神工作”，将为“一次不应受到破坏的历史性机会”作出贡献。

既然社会党单独拥有议会的绝对多数，密特朗本来完全可以组织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为什么还要吸收法共参政呢？殊不知这正是密特朗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

密特朗在他身后发表的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透露，他当时考虑，是否吸收法共参政将取决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胜利的程度。“如果社会党取得绝对多数，我不需要依靠法共议员的支持，那我就会吸收共产党人入阁。否则，需要另作考虑。”正因为社会党单独占有绝对多数，密特朗才下决心让法共参政。这样，政治上既可收法共参政之利，又不致受法共的牵制。

密特朗让法共参政，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出于“左翼联盟”的战略考虑。60年代以来，密特朗依靠“左翼联盟”战略扩大影响，增强实力，最后战胜右翼掌权。他说：“从1965年起，我就是左翼联盟的化身。”“没有共产党人，我是决不会当选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道：尽管左翼联盟一直是艰难的事业，然而面对右翼，除了左翼联合一致外，别无他途。而且，左翼团结仍然是劳动群众所强烈企求的。社会党与法共联合执政符合左翼选民的夙愿，显示密特朗对支持过他的法共选民“履行政治和道义的义务”，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左翼政权的政治基础。

（二）借助法共力量实施改革政策。新政府将进行广泛的经济、社会改革，势必遭到私人垄断资本和右翼政党的抵制和反对。吸收法共参政，可借助法共及其领导下的法国总工会（会员240万）等群众组织的影响，保持社会安定。

（三）最根本的一条是通过联合，约束和削弱法共。这是密特朗的一贯思想。法共入阁后不久，他对一位老资格的戴高乐派人士说：“法国有两个人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一个是戴高乐，他是通过同共产党斗的办法；另一个是我，我是通过与之联盟的办法。”

尽管如此，当时法共入阁曾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戴高乐、拿破仑、路易十四和圣女贞德站在云端俯视着手持红旗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喊道：“天哪，法国会出什么事？”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惴惴不安的心态。

美国的反应尤为强烈，唯恐此例一开，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力

量雄厚的意大利效法。事先，密特朗派外长克洛德·谢松前往华盛顿，向里根总统当面说明，吸收法共参政这项内政方面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法国对盟国的态度会发生任何变化。里根放心不下，派副总统布什于6月24日，即左翼联合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之日，访问巴黎，摸清底细。

新政府名单公布前几小时，密特朗通过连接爱丽舍宫和白宫的“蓝线”（连爱丽舍宫的高级人士也不清楚何以称为“蓝线”，至少爱丽舍宫这一头的电传机并非蓝色）给里根发了一份电报，通报法国的意图和立场：“副总统布什到达巴黎之际，正值以莫鲁瓦为总理的新政府组成之时。这届政府代表1981年6月14和21日立法选举产生的新的议会多数派。民主得到充分的发扬。第二届莫鲁瓦政府将在我的领导下恪守法国的各项承诺……在安全领域，在大西洋联盟范围内，在经济方面，这些承诺都是明确的。”

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首次内阁会议刚结束，密特朗直奔接待厅会见布什。为了避免布什与散会出来的共产党部长迎面相遇，法方只得让布什从旁门进入爱丽舍宫。密特朗开门见山向布什说明：“决定政策的是我。我挑选同意我的政策的人入阁。我不接纳不同意我的政策的人。共产党的目标与我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共产党部长在政府内不是执行他们党的政策。我要把历史推向前进。”“我让共产党人在几个不会危害大西洋联盟的部门当部长。作出决定的是法国。这是我的政策。对联盟没有危险。”密特朗在作了强硬的表态之后，还现身说法，动之以情，说服布什。这番话无异于打开密特朗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值得全文照录：

“我加入社会党，丝毫不意味着我皈依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左翼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作为使共产党回到其真实水平的手段。”

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达到过高的水平，部分可以归因于该党在战争期间的英勇表现。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看，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时刻莫过于社会党超过共产党的时候。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局面：

对一个左翼人士来说，投有效票不再意味着投共产党的票。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投共产党的票。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将使他们丧失自己的特性，因为对所有决定，他们都同社会党人拴在一起。因此，他们能够吸引共产党人以外的选民就越来越少了。”“实话实说，从历史的观点看，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让共产党人参加政府，而是使得社会党在选举中获得比共产党更多的选票。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使共产党回到其真实的水平。他们将在政府中呆得很久很久。可是，当他们离开政府时，共产党的选票将降至10%。”

与此同时，密特朗还向布什明确表示，“法国是美国忠实可靠的盟国”，法美之间“有着不受临时事件影响的共同利益”。他愿同美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一卷（1981—1986），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巴尔：《总统》，第98页。

系，推进欧洲防务的共同目标，他还告诉布什说，法国同苏联的关系将比几位前任总统时期冷淡些，这不仅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法共参政的左翼政府内外政策的需要。

会谈结束后，布什在爱丽舍宫台阶上向记者说：共产党人入阁“肯定会引起法国的盟国的忧虑。”密特朗则用戴高乐式的语言回敬道：“法国的政策，现在是法国的政策，将来仍然是法国的政策。”

没有等布什离开巴黎，当晚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项公报：“共产党人进入法国政府将使我们作为盟国的关系在形式和内涵方面都会蒙受影响；共产党人进入任何一个西欧盟国的政府，亦复如此。”法国政府对美国干涉其内部事务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愤慨情绪。第二天，谢松外长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的声明是“令人吃惊和无法接受的”。密特朗很风趣地对记者说：“有人写道：‘里根发火了’。后来呢？里根打喷嚏了。后来呢？我可不会马上必恭必敬地立正。”“我并不考虑我的决定是否符合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口味。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人作出的反应，那是他们的事；这项决定则是我的决定。法国越是自由地作出决定，就越是受人尊重。”法美在法共入阁问题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两国关系一时呈现紧张气氛。

事态的发展证明，法共参政分管几个技术性部门，对政府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影响力，也丝毫无损于法国充当“美国的好盟国”。倒是法苏关系冷却了一阵。密特朗对苏态度强硬，原因之一，正是为了显示法共参政并不能影响他的政策。

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试验的失败和法国经济情况的急剧恶化，使左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中连连受挫。法共原想通过参政扩大影响，增强实力，结果反而承担了政府政策失误的后果。左翼联盟内部裂痕扩大。1984年7月17日，社会党人洛朗·法比尤斯接替莫鲁瓦组织政府，法共以不同意新政府继续执行紧缩政策为由拒绝入阁。历时三年的左翼联合执政局面宣告结束。

从1965年总统选举中法共支持密特朗充当左翼共同候选人起，19年中，法共同密特朗经历了合作—破裂—又合作—又破裂的曲折过程。即使在合作中也充满斗争。作为历史经验，法共是如何估价左翼联盟战略的呢？

在密特朗当选总统10周年之际，法共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法共议会党团主席安德烈·拉儒瓦尼回顾参政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法共的“根本错误”是采取了“共同纲领战略”。“我们出于好心，却搞错了。”密特朗当选后，“人们对他期望很高”，“共产党却削弱了”。

密特朗去世后，前法共部长夏尔·菲泰尔芒在1996年1月11日《新观察家》周刊撰文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密特朗“加速了法共的衰落，但他并非是法共衰落的根源”。法共本可利用联盟和参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加强自己的力量，然而，由于法共未能实行自身的革新，使党的纲领、结构、工作方法适应本国和时代的实际，从而使密特朗得以实现

在联盟中削弱法共的战略。

外交的社会党色彩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密特朗对内进行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在外交上不能不有所反映。谢松外长明确指出：社会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内政策在外部世界的反映，是内政的要求和内政的优先目标在国际上的体现”。

因此，密特朗的外交不能不带上浓厚的社会党色彩。更确切他说，带上先是浓厚的、后来逐渐淡化的社会党色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密特朗的外交政策与第五共和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不论外交政策的社会党色彩是浓是淡，本质还是戴高乐主义的。密特朗郑重声明：“我的政策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至少在精神上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法国外交政策基本上富有连续性，其方针和轮廓没有变。”他强调指出，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大政方针不应当随着总统更迭或议会改选而变更，“至少要四分之一世纪不变”，否则，就不成其为大国了。密特朗的政敌、戴高乐派领袖雅克·希拉克也说：“除了某些细节、我们的对外政策不仅在1986年3月前后（指左翼总统密特朗与右翼总理希拉克“共治”时期）存在连续性，而且在1981年之前和之后也一直存在连续性。”两个政见不同的代表人物说法完全一致。可见，密特朗尽管是社会党领袖，仍算得上是戴高乐主义的衣钵传人。

一个以反戴高乐起家 and 以实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己任的社会党总统，居然全盘继承戴高乐设计的政治体制，对戴高乐的外交政策也身体力行，这是第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外交上，密特朗的雄图大略同戴高乐的“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的信念是一致的。他不认为法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或中等国家中的佼佼者，而是全球性的小型超级大国。不过，他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榜道义原则，以“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替代戴高乐传统的民族主义。他把法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所谓“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就是试图树立一种将为全世界效法的榜样和遵循的道路。这是密特朗的雄图大略的最核心的东西，也是他心目中的法国大国地位和全球影响的最高体现。

密特朗把民族独立列为法国对外政策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就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而言，我们需要独立。”“法国外交政策拒绝任何命

1981年6月26日对法国电视一台的谈话。

1986年11月10日同巴黎《问题》周刊的谈话。

1987年3月12日在法国外交记者协会的讲话。

1986年11月17日同法国《现代价值》周刊的谈话。

1983年4月21日访华前对中国驻巴黎记者的谈话。

令。既拒绝美国的命令，也不接受苏联的命令。”他提出美苏“两个帝国主义”的论断，赋予维护民族独立的基本政策以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他把苏联说成是“军事帝国主义”，把美国说成是“经济帝国主义”。法国的独立政策既针对苏联（主要是安全方面的威胁），也针对美国（主要是经济上的威胁）。密特朗反对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组织经济防御，以利于在国内推行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改革，给抗美独立政策增添了意识形态色彩。而他反对苏联军事帝国主义，除了军事安全的因素，还有意识形态的成份，即“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对立。

“第三世界主义”突出地显示了对外政策的社会党色彩。这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延伸。社会党宣称自己“在国内是社会底层和穷人的代表”，“在世界上要为受压迫挨穷困的人们大声疾呼”。“法国为更加公平、更加尊严的社会而奋斗，不会停留在国境之内”。它在国内宣扬“同资本主义决裂”，搞“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延伸到国际上，主张改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在国内宣扬用掏富人腰包、提高穷人收入的“收入再分配”办法，消除社会不公平的改良主义思想，运用到南北关系，就是富国援助穷国的“道义责任”。社会党政府还奉行在国际范围发展“社会主义”的所谓“新国际主义”，宣布“支持进步的革命运动”，强调同第三世界进步力量联盟。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进行政治排队，对“进步国家”亲，对“温和国家”疏。

法国是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军火出口大国。社会党政府宣布不当军火商，强调军火出口“道义化”。密特朗在上台前夕声称：“对于法国，我有一个宏愿，这就是使法国由一个按人口平均是向第三世界出售武器的第一大国，变成出售食品和设备的世界第一大国”。莫鲁瓦总理执政伊始就郑重宣布：“法国决心不再保持我们所经常谴责的和不能容忍的军火商地位”。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说得更干脆：“既然我们能出售整套工厂设备，为什么要出售火箭？”法国健全的经济不应当有赖于充当“大炮商人”。

密特朗上台后第一次正式活动，是出席1981年6月5日巴黎国际航空展览开幕式。两年一度的国际航空展览是法国规模最大的武器展出，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从宇宙飞船、航天火箭到各式飞机、导弹、坦克等一应俱全。密特朗由国防部长埃尔尼陪同参观了展出。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出现了，总统在法国军用飞机上竟看不到什么武器装备。原来，这些武器事先或掩或藏或撤。国防部长特意说明：“像您所希望的那样，武器已经弄走了。”密特朗发火了：“荒谬！可笑！巴结过分！”新闻媒介议论纷纷。原来，总统特别参谋长为了迎合密特朗，给航展组织者打了招呼，结果弄巧成拙。不过，

1981年9月24日在爱丽舍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981年4月18日对法国《十字架报》的谈话。

1981年6月8日对欧洲第一电台的谈话。

这一插曲毕竟反映了社会党新政权不想当军火商的意向。根据军售“道义化”的精神，社会党政府制订了几条原则：第一，不向独裁政权、种族主义国家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提供武器，因为这些国家会把武器用于镇压的目的。第二，不向交战国或其政策直接威胁他国安全的国家出售武器，但是，经济上的需要，军火市场上剧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扩大法国政治影响等因素，使社会党政府在实践中以实用主义取代了道义原则。

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实惠和政治上的好处，新政府领导人很快就改腔换调了。莫鲁瓦总理说：“法国没有当军火商的使命，但是法国不能自行禁止出口军用物资。”密特朗宣称：“如果法国的军火工业局限于给法国军队供应武器，法国军队就不会拥有现在这样现代化的装备。”要是法国离开国外军火市场，美、苏和其他国家就会顶替它。于是，“我决定对军售开绿灯。”“一切经法国签署的合同，即使是不喜欢的合同，我都会予以履行。”

按照社会党政府的军售道义原则，当时应当停止履行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的军火合同。结果，在两伊战争中，法国继续向伊拉克源源提供军火，向伊朗也暗中出售武器。除了取消同智利、南非签订的、金额不大的合同，其余军火合同都兑了现。军事订货还不断增多。1976—1980年，法国在世界军火出口中所占比重为11.4%，1981—1985年上升为13.9%，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世界第三军火出口国的地位。

社会党色彩更鲜明地表现在人权外交。宣扬人权固然是西方国家外文的共同特点，而社会党的法国调门最高，尤为突出。如果说戴高乐树立的法国形象是独立的形象，那么，密特朗树立的是“人权祖国”的形象。大抓特抓“人权”的旗帜。“保护人权”列在密特朗竞选纲领110条之首。

社会党政府第一任总理皮埃尔·莫鲁瓦说得很清楚：“法国应当在一切领域重新成为自由的国家和人权的旗手。”密特朗当政的头几年，与国内进行大规模经济社会改革相呼应，对外大搞人权外交，宣称要在全世界捍卫人权。谢松外长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如果我们不在全世界捍卫人权，我们左翼人士怎么能在自己国家里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呢？”这就是说，社会党政府需要抓人权旗帜捞取政治资本来巩固国内的统治地位，同时把人权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把人权注入国与国的关系。法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有关国家的“人权记录”为转移。社会党政府合作部长让—皮埃尔·科特向记者透露：他每次出访第三世界国家，必先查阅《大赦国际年度报告》。他还强调，提供发展援助要更多考虑“人权”因素。

1981年10月20日，密特朗在墨西哥革命纪念碑前对人权外交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他大声疾呼：“向一切被剥夺言论自由、被迫害或被严刑拷打的男女致敬！他们渴望生活，他们要自由地生活。向那些被关押、失踪和被

1981年9月14日在高等国防研究所的讲话。

1981年9月8日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问。

杀害的人们致敬！他们仅仅要生活，要自由地生活……向那些没有权利的劳动者，向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向那些没有武器的抵抗战士致敬！他们要生活，他们要自由地生活。法国向所有的人呼吁：‘振作起来！自由必胜！’”

这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是在南北首脑坎昆会议开幕前三天发表的。不仅针对拉丁美洲，也是面向整个第三世界的“人权与自由”宣言。

1989年我国那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对华“制裁”的调门是最高的。法国政府不仅宣布冻结同中国的各级关系，中止两国间的政治往来，中止军事合作，而且敦促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法国在对中国实行“制裁”的同时，还纵容所谓“民阵”分子进行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干涉中国内政。

社会党在野多年，它的一套内外政策构想有不少“理想主义”成份。在实施中不免碰壁。况且，社会党标榜的道义原则，不少是哗众取宠。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实际行动往往同宣扬的道义原则自相矛盾。随着“法国式的社会主义”销声匿迹，与此相适应，外交上社会党色彩也趋于淡化。社会党政府始终热衷于人权外交，可算是个例外。

第六章

外交扫描

戴高乐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服务的。宪法赋予总统以控制外交的广泛权力。他有排除议会和政党的掣肘，放手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完全自由；他可以及时抓住国际形势的变化，迅速作出政策反应和采取对外行动，毋需经议会或其他国内决策机制认可。

密特朗执政初期，对外关系部长谢松在国民议会宣称：“法国有一项外交政策，这是独一无二的政策。法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制定的。议会则对这一政策进行监督……我领导的对外关系部则协助制定这一政策。”事实上，由于政府听命于总统，而议会只是总统的政治工具，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任何监督权，所以，外交大权一直由总统独揽。与前几任总统一样，外交依然是总统的“保留领域”，不容别人染指。即使在左右翼两度“共治”期间，密特朗仍把外交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评说密特朗的政绩，外交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领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密特朗执政的14年，正是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曲折的变化的重要时期。东西方关系从80年代上半期的紧张、下半期的缓和，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冷战终结，两极格局瓦解。密特朗将极大的精力倾注于外交。作为法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小型超级大国的总统，密特朗的外交活动范围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内容极其丰富多样。本书不拟全面论述密特朗的外交，仅选择若干重大国际事件和外交的某些精彩之笔，披露内情，透视密特朗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风格。

“圣地”行

1981年6月7日，晚8时许，刚上任两周的社会党政府对外关系部长克洛德·谢松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一位法新社记者电话紧急通报：以色列飞机刚刚袭击并摧毁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区、由法国帮助建造的塔穆兹核设施，一名法国技术人员不幸丧生。这是密特朗就任总统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国际危机。

盛产石油的伊拉克，由于它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以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就引起法国领导人的兴趣。从70年代中期起，法、伊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伊拉克一直是法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1975年9月，伊拉克总理萨达姆·侯赛因访问法国期间，希拉克总理原则同意为伊拉克建造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和一座石墨—瓦斯堆芯核电站。后一种技术有可能用于制造原子武器。以色列反应强烈。经权衡利弊得失，法国决定放弃为伊拉克建造核电站的计划，只提供实验性反应堆。1975年11月，法、伊签订关于建造以浓缩铀为原料的两座实验性反应堆的协定，总金额为15亿法郎。协定于1977年开始实施。1980年初，法国向伊拉克交付第一批核燃料（12公斤浓缩铀）。按工程进度，预期1981年夏，核反应堆即可开始运转。

法、伊核合作在伊斯兰世界十分引人注目，以色列尤为关切。1976年12月，法国政府宣布，尽管它没有参加核不扩散条约，它将遵守条约有关规定，对敏感材料的出口采取限制性政策。之后，法国一再声明，向伊拉克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纯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范围，法、伊核合作是在恪守国际协议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据法、伊秘密协定，法国还派遣技术专家常驻塔穆兹原子中心，以加强监督。伊拉克则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以色列一直认为，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很容易用于军事目的，指责法国听任伊拉克有朝一日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1981年5月14日，法国外交部的一份内部文件也承认，这两座实验性反应堆有着三重危险：高度浓缩铀可以直接用于爆炸目的；向伊拉克交付的总量达76公斤的浓缩铀，足够制造原子弹；浓缩铀还可用于制造钚等原子弹材料。况且，法国提供的反应堆功率达78兆千瓦，超过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的需要。考虑到这些危险因素，法国政府曾采取不少法律和技术上的预防措施，但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有效。

密特朗当选后不久，对外关系部即向他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尽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上届总统遗留的问题。为了稳住以色列，密特朗就任伊始就指示外长谢松告知以色列外长：法国将派遣专家向以方进行解释，并将以含能量较少的“焦糖”作为燃料以代替浓缩铀。以色列不理睬法国的建议，趁社会党政权立足未稳，偷袭塔穆兹中心，一座反应堆全部被摧毁，另一座严重

损伤。使法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谢松外长迅速作出反应，不仅对以色列轰炸进行谴责，而且宣称，以色列的行动将引起严重后果，并将改变法、以关系。法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根据对外关系部的指示，在发言中要求以色列赔偿培穆兹中心被毁的损失。以色列代表立即表示：“我们一分钱也不给！”

总统府秘书长皮埃尔·贝雷戈瓦电话告知谢松，总统同意他对以色列的谴责，但是，总统希望在进行谴责的时候，至少在目前，不要带任何感情色彩，也不要带有任何威胁的性质。言外之意，总统嫌外长的表态有点过火了。

总统对以色列轰炸的表态煞费苦心。如果谴责的调门过高，将会丧失把中东政策从重阿轻以调整为阿以平衡的回旋余地；如果谴责软弱无力，就等于没有履行国家元首维护法国利益的使命，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再说，新任总统第一次处理国际危机，如果处置不当，贻笑大方，后果不堪设想。密特朗表示，尽管法国对以色列怀有良好的感情，也要谴责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空袭，指责以色列领导人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要求对以色列人民进行制裁”。“我们仍然准备达成任何友好协议和任何和平解决，并在尊重重大原则的基础上，取得有助于法国同以色列的良好关系的解决办法。”

密特朗何以如此克制呢？这是同社会党和密特朗对以色列的基本政策和传统关系分不开的。

法国老社会党具有亲以色列的传统。在社会党国际内，法国社会党人一直同以色列工党保持密切关系，50年代中期，老社会党领袖摩勒任总理期间，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不断扩大，法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而与以色列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法、以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关系。法、英勾结以色列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合作更加紧密。法国甚至为以色列援建一座核反应堆和铀钚转化工厂，这个工厂是具有制造原子弹的潜力的。

老一代的社会党人往往对以色列怀有特殊感情。密特朗自称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作为抵抗运动战士，他对以色列怀有友好情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希政权迫害犹太人的事后补救和出自对纳粹残杀犹太人的恻隐之心。在野期间，他10年内曾五次以私人身份访问以色列，最后一次是1980年12月。

1967年6月5—10日，以色列向埃及、约旦、叙利亚发动进攻，在“六·五战争”中，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总面积相当于以色列本土的三倍。法国政府谴责以色列“重开战端”，决定对以色列实施军火禁运。戴高乐宣布：“第五共和国已经摆脱了前政权建立起来的同以色列的特殊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法国的中东政策从亲以疏阿转向亲阿疏以，法、以关系趋于僵冷。

密特朗在1981年竞选总统期间，曾公开指责过吉斯卡尔·德斯坦“引导法国奉行反以色列路线”。他宣称：“我站在权利这一边，因此，也站在一

个伟大人民的权利一边。”意思是说，他站在受阿拉伯国家包围、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以色列一边。他曾许下诺言，他当选后首次国事访问将出访以色列。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祝贺他当选的电文中发出访以邀请，密特朗在答谢电中表示接受邀请，“将在情况许可时”访问以色列。

密特朗就职不久就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我不会做任何有害于以色列生存及其生存手段的事”，并积极准备早日出访以色列。密特朗一心想修复法、以关系，以色列总理贝京却给他帮倒忙，来了轰炸塔穆兹核中心这一手。谢松外长断言，这是对密特朗的一次打击，致使他对以色列领导人的理想主义的看法因而大大动摇了。他认为，这是贝京背信弃义，从此，两人无法融洽相处了。

密特朗感到进退两难。他早已向以色列发出修复关系的信息，公开宣布了首先访问以色列的意向，如果按原定计划近期出访，不啻同意以色列对伊拉克的轰炸；如果取消访问，那就会恶化两国关系。经考虑再三，决定将以色列之行推迟到1982年2月。

可是，贝京还接二连三地给密特朗出难题。1981年7月，以色列大肆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和设在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吞并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密特朗不得不再推迟对以色列的访问。他只好把中东平衡术的顺序倒过来，先稳住阿拉伯这一头，再实现以色列之行。他的首次国事访问是1981年9月26日出访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以色列。

不过，密特朗并不因此改变对以色列的既定方针。1982年3月3—5日，密特朗终于对以色列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此前，谢松为总统的非同寻常的以色列之行作准备，出访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安抚。巴黎外交界都知道，谢松讲话容易“走火”。其实，他并非信口开河。他往往一语道破总统政策的实质，只是说话的时机和场合不对头。这回也是如此。他在阿布扎比宣称：“应该按照我们赞成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在以色列应该撤出的被占领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就触动了以色列最敏感的神经。贝京总理强烈指责谢松的谈话，并且以讥讽的口气教训法国：“不必为以色列的领土操心，还是忙科西嘉的自治去吧！”

密特朗相当恼火。他在2月24日内阁会议上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不指名地狠狠批评了谢松：“显然，现在有人企图破坏我们的中东政策。有人害怕我们的政策，力图缩小其影响。任何一句倾向阿拉伯的话，都会被看作是对以色列的敌视；任何一点支持以色列的表现，都会被看作是对阿拉伯的背叛。……我要提醒大家，外交上用语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改动一个字，甚至挪动一个逗点，都会被视为实质内容的变动。这就是我之所以尽可能少讲话的原因，以免授人以柄，以免给人以指责我们出尔反尔的口实。”他还告诫道：“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每块石头下面都有着一条蛇。不要冒冒失失地去翻动石头。”“从现在到我动身去以色列之前，有人千方百计地挑衅，以

期使我不能成行。一星半点的话都会被人利用。因此，我宁愿什么也不说，即使缄默本身也会被人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谢松还不解总统之意，还想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要求对北京对他的指责作出解释。密特朗不耐烦地说：“算了，现在别管它了。”

密特朗为了稳住阿拉伯国家，在访问以色列之前，特意亲自向记者公开声明：“我将在耶路撒冷讲的话，就是我在利雅得（沙特阿拉伯）讲过的，也是我在阿尔及尔、拉巴特（摩洛哥）和安曼（约旦）所讲的。我讲相同的话，即以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这个国家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正如它的历史和人民的勇气是举世公认的。”

3月3日，密特朗离开巴黎前往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法国总统访问以色列，这还是第一次。密特朗也是正式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位欧洲国家元首。追溯得更远些，自1251年法国国王圣路易访问圣地（耶路撒冷）以来，法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这座古城。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外交行动。事隔11年之后，密特朗回顾道：他上台之初，便决心“打破一种恶性循环，一项似乎成为定规的原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可以访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去不得。”

这次访问的高潮，是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这篇向120位以色列议员发表的讲话，其实也是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不啻是法国新总统向以、阿冲突各方的“亮相”，全面阐明法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密特朗对演讲稿一向有精雕细刻的习惯。这篇演说关系重大，更是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在飞往特拉维夫的总统专机上，密特朗埋头推敲讲话稿。抵达以色列后，当天日程排得满满的。国宴很晚才散。密特朗几乎彻夜未眠，悉心修改讲稿。他同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一起，一直搞到凌晨3时。这时，由对外关系部起草、经总统府外交顾问审阅过的稿子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有语句竟所剩无几了。清晨5时，密特朗又把谢松和阿塔利找来。他一边朗读讲稿，一边随手涂涂改改。其中关键性的两句话，足足推敲了20分钟才算定稿：

“比如说，以战士名义讲话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只要它拒绝承认以色列的主要权利，即生存权和安全手段，它又怎能指望坐到谈判桌上来呢？对话意味着每一方都能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对巴勒斯坦人和对别人一样，到适当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这段拐弯抹角的话，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当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拥有卫护其生存的军事手段的权利；以色列应当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祖国的权利。对以、阿双方来说，这两句话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正是密特朗全篇讲话的核心所在。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一卷（1981—1986），第173、174、178页。

1992年11月18日在法、以两国元首出席的“法国—以色列之家”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天已大亮，朝晖透进了贵宾的套房。同在野的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共进早餐的时间到了，密特朗只好放下手上的讲稿。整个上午，在日程安排的间隙，密特朗还不时拿出讲稿作最后润色。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的时间定在 11 时 35 分，讲话稿连打清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密特朗口袋里装着涂改得几乎难以辨认的稿子上了讲坛。记者们向总统助手索要讲话文本，总统新闻官员只好耸耸肩。

密特朗不紧不慢地戴上眼镜，这表明他不打算即席发挥，而是宣读那篇经过千锤百炼的讲稿。字字句句都很有斟酌，抑扬顿挫都大有讲究。全场鸦雀无声。

“不可取消的生存权利”属于以色列人民。“这种权利也属于你们周围的人民。我想到的当然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我希望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祖国呢？因为人们不能要求任何人放弃自己的特性；也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别人回答特定的问题。应当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权利同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尊重国际法结合起来，要用对话代替暴力。”

密特朗作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朋友”，而不是作为“调解人”或“仲裁者”，全面阐明了法国对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张：（一）按照联合国 242 号决议由阿、以双方直接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二）以色列享有在本国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利；（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应该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对话；（四）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中东将永无宁日；（五）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一个祖国，在适当时候，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战斗力量的代表，只有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拥有安全手段的权利才能参加中东和谈。

密特朗历来讲话只用法语，不用外语。这回却破了例。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两句口号结束他的法语演说：“以色列人民万岁！以色列各族人民万岁！”这后一句自然包括居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从来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在以色列使用过巴勒斯坦国的字眼。密特朗犯了大忌。坐在轮椅里的贝京总理怒不可遏。他不好直接指责贵宾，只好指桑骂槐，谴责谢松外长不久前在阿布扎比的讲话。他强调：“法国和以色列达成深刻一致的主要障碍，在于法国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原则。”密特朗不动声色。

密特朗苦口婆心，并没有打动贝京。贝京在会谈中表示，法国主张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是一个“可怕的设想”，以色列绝不容许建立巴勒斯坦国。贝京提出，愿向法国购买一套核设施；密特朗表示“将以重建塔穆兹核中心的同样条件”予以研究。以色列之行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不过，此行毕竟对修复冷淡了 15 年的法、以关系具有象征意义。

其实，密特朗并不指望此行取得多大具体成果。出访以色列，意在表明法国新总统改变前几任总统重阿轻以的政策，标榜在阿、以之间不偏不倚。

“法国的阿拉伯政策现在不是反以色列的，将来也决不会反以色列的；法国的以色列政策现在不是反阿拉伯的，将来也决不会反阿拉伯的。”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巴勒斯坦人拥有祖国的权利，则是密特朗玩弄阿以平衡的两大基点，使法国处于既是以色列的忠实朋友，又是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的最有力的辩护士的特殊地位。密特朗不仅明确提出巴勒斯坦拥有祖国的权利，而且第一次勾画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疆界的轮廓，即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密特朗之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一方面，为的是使阿拉伯国家容忍法国同以色列的重新接近，另一方面，在社会党内部，使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青年一代易于接受中东政策的调整。

密特朗玩弄阿以平衡本身并不是目的。对以色列的友情也不是无私的，而是积极插手中东和平进程、恢复和加强法国在中东的存在的一种手段。谢松外长说得很露骨：法国打算同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今后着手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时，这将是一张王牌”。法国的意图是取得在阿、以之间的中间人资格，成为唯一能同阿、以双方都说得上话、都能施加影响的国家，从而在中东发挥两个超级大国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这才是密特朗出访以色列的真正意图所在。

事态的发展表明，密特朗这一着是相当高明的。他既结束了1967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法、以之间的僵冷状态，又没有得罪阿拉伯国家，反而扩大了法国在阿、以间的回旋余地。密特朗对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说：“您十分重视荣誉，因而对那些为了结交新朋友而否定老朋友的人不能不加以蔑视。”这位国王对密特朗不忘老朋友表示赞赏。接着，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约旦等有影响的阿拉伯国家首脑纷纷表示对法国中东政策的信任。密特朗既结好以色列，又拉住阿拉伯国家，在阿、以间踩钢丝，显示了法国中东政策的新面貌。

给里根的“进见礼”

密特朗早就对美国心存疑虑。早在 1974 年竞选总统时，他曾担心，一旦当选，美国也许会像搞掉萨尔瓦多·阿连德那样搞掉他。美国对密特朗也很不放心。1981 年密特朗再度竞选总统时，里根派他的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向这位社会党候选人试探摸底。勒特韦克回到华盛顿报告说：“就外交政策而言，密特朗当选将对美国有利。此人决不会听任苏联摆布。”1981 年 5 月密特朗当选总统后不久，里根派他的好友、参议员保罗·拉泽尔特前往探听虚实。密特朗在乡间别墅款待他。拉泽尔特返美前对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克里斯琴·查普曼说，他将报告里根总统，“尽管密特朗同里根政治见解不同，但两人全都清楚地意识到各自的特性和各自渊源的涵义，他是一个可以与之共事的人。”

不过，密特朗吸收共产党人入阁，使里根焦虑不安，弄不清密特朗究竟想搞什么名堂。密特朗当面对美国副总统布什的一番解释，不能使美国政府疑团冰释。7 月 19 日，密特朗首次出席在渥太华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也是首次同里根会面。这乃是法美关系的微妙时刻。事有凑巧，密特朗手头正好有一份厚礼，可以作为给里根的进见礼，兴许能博得里根的好感。

密特朗当选总统前几天，一个法国人向本土警戒局递交一位苏联朋友的信，此人身居克格勃要职，表示愿意为法国“工作”。本土警戒局当然不敢轻信，唯恐这是苏联方面设下的圈套。经调查核实，此人系克格勃科技情报负责人，1965—1970 年曾在苏联驻法国使馆工作，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进行科技间谍活动。他同一个法国工业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向本土警戒局传递信件的，就是这个工业家。他主动提出为法国工作，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为了搞钱。他思想上向往西方的价值观念。后来他总共拿到 50 万法郎，同他所提供的情报的数量和质量两相对比，不成比例。法方准备给他更多的报酬，此人却无此要求。本土警戒局给他一个代号：弗拉基米尔·沃洛基阿，又称“费韦尔”。

“费韦尔”常常在莫斯科的超级市场里同法国驻莫斯科的一个外交官的妻子接头，把文件或微缩胶卷扔在购货的小推车里。后来由巴黎派去的一个特工人员接替她传递情报。几个月内，他向法方提供了潜伏在 16 个西方国家的 250 个苏联间谍的名单，3000 份货真价实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签署的文件和勃列日涅夫亲笔批注的绝密文件，以及苏联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窃取的科技情报。这些情报表明，苏联间谍已大规模打入美国军界—工业界，掌握了大量美国的尖端技术，如核潜艇消

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于 1970 年当选总统，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

朱利叶斯·弗兰德：《密特朗执政的七年（1981—1988 年）》，美国韦斯特维尔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98 页。

声推进系统的设计方案；巡航导弹的导航密码；航天飞机保护层冷却系统的情报等。负责此案的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事后说：“我们当时就像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金矿似的。”

密特朗就职后不几天，本土警戒局向内政部长德费尔报告此事。德费尔连忙把这起特大间谍案向总统汇报。鉴于此案至关重要，总统责成本土警戒局统一处理，其他情报机构不得插手，并指定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一人负责此案。密特朗并决定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让美国分享“费韦尔”提供的情报，以取得里根的信任。

7月19日，密特朗抵渥太华不久，马上在举行七国首脑会议的蒙泰贝洛旅馆的草坪上首次会见里根。美国国务卿黑格和谢松外长在座。里根显得颇为热情，但一开始谈及正题，里根就不那么自在了。他不时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卡片来，照本宣科，说不上几句就没有词了。于是，他就讲个笑话，或讲些他当电影明星时的趣闻，活跃气氛。

密特朗胸有成竹，当面送上“进见礼”。他向里根通报了“费韦尔”事件，并表示他打算将“费韦尔”提供的有关苏联间谍在美国的活动情报无保留地让美国分享。里根听了十分震惊，连连嚷道：“这可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一条鱼！”密特朗此举表明，尽管他让法共参政，对苏联的态度却是毫不含糊的，是坚定地维护西方利益的。这份进见礼使里根相信，法国左翼政府是共同对付苏联的可靠盟友。里根对手下人说：“我很喜欢他（密特朗）。”至此，法美关系度过了密特朗上台之初互有疑虑的日子。渥太华会议后不久，法国本土警戒局长前往华盛顿，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副总统布什一起制订了两国情报机构在“费韦尔”案件方面的合作计划。

密特朗头一次参加七国首脑会议，表现十分谨慎，人们说他像一个“新来的小学生”。他回国后在内阁会议发表观感说：“首脑会议不是一场表演，也不是作出决定的地方，而是一种有益的、富有教益的聚会。会议的效果要隔很久才能显露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向助手们吐露了对里根的印象：“热情、随和、讨人喜欢。他是个有诚意的人，思想简单，和普通美国人一样。他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即使不像尼克松和卡特那样了解问题，也还是可以同他进行讨论。”后来，他又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说起里根，用语相当尖刻：里根是个“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人。……不过，他一点也不傻。他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他的智慧所未能觉察的东西，他的秉性却能觉察到。”不管怎么说，密特朗同里根总算初步建立了工作关系。

1932年2月，“费韦尔”这条线突然断了。这是怎么回事？说法纷纭。

2月的一个晚上，“费韦尔”在莫斯科的某停车场附近停好车，同他的情妇在车上喝起法国香槟酒来。突然，车窗前出现一个身影，他认出是克格勃的一个同事。他以为此人跟踪他，看穿了他的秘密，立即跳下车来，用刀

子把他捅死。他的情妇惊恐万分，急忙逃走。他一不做二不休，追上去也将她捅死。接着便逃之夭夭。一小时后，他鬼使神差似地又回到犯罪现场，他的情妇竟没有死，当着警察直喊：“凶手就是他！”“费韦尔”当场被捕，并以凶杀罪被判12年徒刑，送往伊尔库茨克服刑。但是，里通外国一事并没有露馅。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提到，服刑使他不得不中止一件“大事”，这就引起了克格勃的疑心。顺藤摸瓜，查获他的叛变行为。他供认不讳。供词收尾的一句话是：“我的唯一遗憾，是我未能更多地为法国效劳，给苏联造成更大的危害。”1982年末，这个死不悔改的“费韦尔”被枪决。但据一个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人员说，“费韦尔”因民事案件被判刑，涉嫌间谍案，自杀身亡。

本土警戒局长对“费韦尔”之死持怀疑态度。他说：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枪决了。谁也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说：“费韦尔”的真实姓名没有公布，因为法国情报机构并不“绝对相信”他已死亡。密特朗走得更远，事隔数年后，他觉得“费韦尔”事件太离奇了，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简直是疯人的滑稽故事。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在我看来，结局太古怪了。我不再相信这些废话。这是苏联的诡计？或者，这是美国人搞的鬼，以此来考验我们？我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和谢松在渥太华向里根和黑格透露时，应该在他们面前显得更机灵些。”

不论“费韦尔”事件的内情如何，此事总算告一段落了。不料，一年之后，又出现不小的余波。

1983年1月11日，密特朗从法国驻苏使馆发回的一份电报中获悉，自1976年以来，克格勃破译了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全部密码电报，因为苏联特工人员在使馆使用的电传打字机里做了手脚。密特朗怒不可遏。当即决定采取报复措施，不然就会在苏联人面前示弱。他指示本土警戒局长参照“费韦尔”提供的间谍名单，把在法国特别活跃的苏联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假外交官开列一份清单，从中确定驱逐名单。密特朗认为，苏联方面不会作出强烈反应，因为“费韦尔”提供了这些人员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法方将驱逐苏联间谍的决定通知苏联驻法国大使尤里·伏隆佐夫。苏联大使当即表示强烈抗议。谢松外长为了让苏方吞下这颗苦果，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前往苏联使馆，会见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格勃驻法国头子，出示苏联特工人员窃取的一份爆炸性情报，对方看了一眼，理屈词穷。

4月5日，经密特朗亲自审定的47名苏联外交官和记者以间谍罪被驱逐出境。密特朗后来解释说：“在戴高乐时期，苏联外交人员——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超过200人，在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时期，增加到700—800人。当时就应当作出反应，才能受到俄国人的尊重。他们过去竟把我们看作是可以任其摆布的国家。”

4月6日内阁会议上，密特朗对苏方态度作了分析：“在最初的反应过

后，苏联会懂得我们的目的何在。要让他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在情报领域，有个规矩，给人抓住了，那就活该倒霉。这件事不会影响总体关系。说实在的，俄国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遭到难堪，真不是时候，因为安德罗波夫刚刚上台。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西方部署潘兴导弹给他们出的难题。”

“要么俄国人把我们当作对手，那末，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总的敌对形势中加上一点水；要么俄国人认为我们采取了明智的、均衡的立场，那末，相对而言，这件事也就无关紧要了。”

“俄国人必须懂得，我们有自己的政策……他们应该懂得，同他们打交道的人可不是软骨头。一旦他们懂得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也许从现在起到 1983 年底，两国关系就会好起来。”

不出密特朗所料，苏联的反应是很克制的。伏隆佐夫大使于 4 月 8 日向谢松外长递交抗议照会，声称法方“专横和狂妄的行动”将严重损害两国关系。但苏方将不采取“直接的报复措施”。两国间的贸易谈判照常进行。这样，法方为对付苏联对法国驻苏外交人员进行报复而准备的第二批驱逐名单，一直锁在总统的保险柜里没有动用。

密特朗说：“当我决定驱逐苏联间谍时，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要同苏联重开谈判……如果你想有一个和谐的局面，在特定的时刻，你得制造点紧张。”密特朗的盘算没有落空。半年多以后，1984 年 1 月，法苏两国外长就密特朗正式访苏达成原则协议。紧张的插曲过后，最高级会谈开始了。法苏关系又步入正常轨道。

密特朗对总统府的顾问说过：“戴高乐通向华盛顿的道路经过莫斯科，我嘛，我通向莫斯科的道路通过华盛顿。”密特朗正是先以对苏强硬取得里根的信任，然后回过头来，以法美关系为依托，修复对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密特朗给里根的进见礼和大批驱逐苏联间谍，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性演说”

1983年1月22日是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20周年纪念日。当年由戴高乐和阿登纳缔结的法德条约，集中体现了法德的全面和解与合作，规划了两国在外交、防务、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与协调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标志着近2000年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互相厮杀和敌对的历史告一结束，法德捐弃世仇宿嫌，进入友好合作的新时期。

密特朗总统于1月20日专程前往波恩，参加法德条约签订20周年庆典。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说。这篇讲话主要不是颂扬法德合作与友谊，而是要借此机会面向苏美和整个欧洲，在欧洲导弹问题上做一篇大文章。这是继以色列议会演说之后的又一出外交重头戏。这两篇演说，算得上是密特朗14年任期中外交的精彩之笔。

密特朗何以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德国联邦议院作为舞台来演这出戏呢？因为在左右整个欧洲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欧洲导弹的较量中，联邦德国是关键时刻的关键国家。

原来，密特朗上台时面临东西方关系的两大变化。一是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标志，70年代的缓和时期宣告结束；二是苏联部署大量SS—20导弹，打破了欧洲地区力量平衡。东西方关系进入了以欧洲导弹之争为中心的紧张对抗的新时期。密特朗称之为处于冷战时期与缓和时期之间的“极其紧张的第三时期”。

SS—20导弹是一种机动性很强的新型陆基中程导弹，每枚导弹载有3个核弹头，射程4500—5000公里，能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击中西欧所有的目标，误差不超过300米。北约没有在欧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没有相应的核武器可以与之匹敌。因此，苏联部署SS—20导弹，使欧洲战区核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在西欧看来，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战区核力量方面的“双重优势”，构成对西欧安全的严重威胁，并将使西欧面临苏联的政治讹诈。

为了对付苏联的战区核力量优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出了包括部署导弹和建议谈判两手的“双重决定”：敦促美苏尽快就中程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到1983年底仍不能达成协议，北约将部署108枚潘兴式导弹和464枚陆基巡航导弹，合计572枚。在西德部署220枚（其中潘兴导弹108枚），英国172枚，意大利80枚，比利时和荷兰各50枚，均为巡航导弹。

潘兴式系单弹头中程导弹，射程为1750公里，可以打到基辅、明斯克等城市，但不能打到莫斯科。命中精度比SS—20导弹高出10倍，误差仅30米。陆基巡航导弹相当于一种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射程2500公里，最大航程为四小时。其主要特点是能进行超低空飞行，沿不同地形保持在离地面80米左右的高度，雷达难以发现，且可中途改变航向，敌方难以判明它所针对的目标，命中精度略低于潘兴式导弹，误差约80米。

法国在欧洲中导之争中处于特殊地位。法国早已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并非美国导弹的部署国，而它自身拥有完全独立的、包括可以直接打击苏联本土的中程导弹的核武库。因此，吉斯卡尔·德斯坦对北约“双重决定”采取置身事外的超脱态度。他认为，法国不应参与不会在自己领土上实施的决议。法国私下支持北约计划，公开则宣布它与北约欧洲战区核武器的现代化无关。这样做，既维护了联盟的团结，又在东西方紧张对抗中在外交上留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并借以避免把法国核力量牵扯到美苏谈判中去。

在东西方围绕欧洲导弹问题紧张对抗的关键时刻，密特朗改变前任总统避免卷入欧洲导弹之争的超脱态度，转而积极介入，公开支持北约“双重决定”，并为推动北约部署计划的实施奔走游说。密特朗在《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这样做，背离了我国外交的传统立场。过去法国一直认为，由于它不在（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之内，当然同欧洲导弹问题无直接关联。我之所以支持北约双重决定，是因为我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不论法国的地位如何，不能对保持欧洲均衡所必需做的事情袖手旁观。”

7月3日，社会党政府上台伊始，外长谢松就在巴黎英美记者协会上宣布：法国“完全赞成北约盟国关于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密特朗总统也公开表态：苏联部署SS—20导弹“破坏了欧洲力量平衡。这种状况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必须追补军备以恢复平衡。然后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先部署，后谈判，把北约“双重决定”的侧重点放在部署上。

当时苏联对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加紧诱压，力图阻止北约部署计划的落实。西欧一些导弹部署国内部意见纷纭，实施部署计划遇到很大阻力。主要部署国西德本身不能拥有核武器，担心在其领土上积聚它所无权控制的核武器，成为核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西德也不愿让“导弹栅栏”把它同东德进一步分割开来。因此，对部署中导犹豫不决。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则迟迟不作是否接受部署美国导弹的决定，表示将根据美苏谈判的结果再作最后决定。与此同时，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蓬勃兴起，席卷西德、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部署国和其他西北欧国家。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达200多万，为战后几十年来所罕见。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美国在西欧部署新式中程导弹，给西欧各国政府，尤其是部署国统治集团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欧洲中程导弹的部署与反部署之争，不仅是一场核军备竞赛，而且深深牵动整个东西方关系、美苏欧三角关系以及西欧国家内部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密特朗选择了主要部署国西德公开介入欧洲导弹之争，为北约部署导弹大声疾呼，以期对动摇不定、意见纷纭的西德和其他部署国以有力的推动，从而使欧洲导弹的较量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

半个月前，总统府会同对外关系部为总统草拟了讲话稿。密特朗却放着不看。他说：“非等事到临头，我是无法动手搞演讲稿的。”1月13日，总

统动身去非洲访问。1月18日，到了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加蓬。在从利伯维尔到弗朗斯维尔横贯加蓬的火车上，密特朗的思路才转向欧洲。这时，离波恩之行只有两天了。他把讲话稿看了一遍，那不过是颂扬法德友谊的应时即景之作，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他把特别顾问阿塔利找来说：“我刚看了讲稿，根本不能用，实在可悲。请您转告巴黎。”

1月19日，照例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密特朗一心准备讲话稿，部长们说了些什么，几乎没有听见。内阁会议一结束，总统把国防部长、对外关系部长、总统特别参谋长和总统府的三名“秀才”召到办公室，他拿出在内阁会议上拟定的发言提纲让与会人员传阅。他指示：“我要一篇非常明确、非常有说服力的稿子。”要突出主导思想：“欧洲广大地区在对准自己的核武器面前，不应没有足以与之匹敌的武器。”国防部长建议把“零点方案”（苏联拆除已部署的SS—20，北约不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作为一种可取的选择加进去，密特朗不以为然：“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接着，总统府的三位秀才分头按总统拟定的提纲形成文字。密特朗看了，皱皱眉头说：“还是不行！不过，总算有个修改基础了。”三位秀才异口同声说：“谁知道总统想要发表一篇历史性的演说！”这才算真正领会总统的意图了。

当天晚上11时，谢松外长陪同总统到非洲走了一大圈之后，困倦不堪，正想熄灯好好睡上一觉，忽然爱丽舍宫来电话：总统有要事相商。谢松赶赴总统办公室，还是上午原班人马在场，密特朗让大家在办公桌前坐定，发起火来：“你们让我去念这么一篇稿子！这也称得上是演说？蹩脚货，十足的蹩脚货！我讲话嘛，总得讲出点名堂来才行。”发完脾气，密特朗抓起钢笔，逐段逐句逐字，边读边议边改，直到凌晨2时。密特朗嘱咐在场人员从头到尾再顺一顺：“早晨6点半交给我。”

1月20日，从巴黎到波恩的飞机上，密特朗还在埋头修改讲话稿。抵达波恩后，他直奔西德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的办公室，继续润色稿子。预定的开会时间快到了，议院大厅座无虚席。密特朗还不出来，急得科尔总理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不停地看表。

11时正，法国总统准时走上联邦德国议院的讲坛，发表“历史性演说”。他面对的是忧心忡忡、意见纷纭的各派议员。主要执政党——科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希望最好实现“零点方案”，否则，北约只得实施部署计划；科尔的盟友——自由民主党人对实施北约“双重决定”的态度模棱两可；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内，反部署这一派占了上风。第一次进入联邦议院的绿党（环保）坚决反对部署美国导弹。议院外面，反对部署核导弹的和平主义示威游行热火朝天。

密特朗从以均衡求和平的均势战略的高度，为实施北约“双重决定”大声疾呼：“法国只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想法：必须使战争仍然成为不可能，必须使那些想要发动战争的人不得不打消这种念头。”“法国的分析与信念，是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不管人们赞成也罢，反对也罢，只要存在着

力量平衡，它就依然是和平的保障……但是，依我看，维持这种平衡就意味着欧洲整片整片地区在对准自己的核武器面前，不应没有招架之力。我们认为，谁把赌注押在欧美大陆‘脱钩’上，谁就会使力量平衡发生问题，因而也就会使保持和平发生问题。我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脱钩’本身是危险的。”

“所以，必须明确重申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共同决心和团结一致，以便使谈判取得成功，这是不部署 1979 年 12 月‘双重决定’所规定的那些武器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呼吁：“德国朋友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年，让我们一如既往，长期共同寻求均衡、发展与和平的道路吧！”密特朗的讲话把西方内部围绕欧洲导弹的争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能否实施部署不是某一国的问题，而是北约联盟能否避免欧美战略“脱钩”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欧美关系的未来和欧洲安全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这番话，不仅是说给西德议员们听的，也是针对态度动摇、暧昧的其他部署国而发的，目的在于给有关国家政府鼓气，维护北约决定，以利于加强对苏谈判地位和冲破阻力实施部署计划。

这篇讲话引起各方强烈反应。第二天，1 月 21 日，科尔总理来巴黎参加法方庆祝法德条约签订 20 周年的活动，以满意的口吻对密特朗说：“我们的分析相同；苏联部署导弹使欧洲的军事平衡发生了问题。”针对科尔倾向于“零点方案”的想法，密特朗进一步说明：“报界没有弄清楚这一点：我并不支持华盛顿提出的‘零点方案’。我主张寻求美苏立场之间的一个中间点。我没有提到‘零点方案’。”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对法国社会党总统的讲话十分恼火，因为这将使该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丧失选票。这乃是密特朗意料中事。他在 1 月 26 日内阁会议上承认，他的讲话可能对西德大选产生影响，使之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利：“尽管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显然存在着友谊，但事关法国利益，我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就是说，法国不得将其安全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

如果说，里根对密特朗尚有一定疑虑，西德联邦议院的演说就使他完全放心了。里根致函密特朗，赞扬“这篇演说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感谢法国盟友的“极其珍贵的”支持，称赞这篇讲话是对西方安全的“重大贡献”，“在欧洲国家面对重大抉择显得无能为力，至少也是焦虑不安的时刻，您的讲话加强了大西洋联盟”。

苏联对密特朗讲话十分不满。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向法国对外关系部交涉。他责问道：“法国总统何以强调一旦谈判失败必须部署（美国导弹）？对苏美谈判人员这样讲是一回事，竭力说服德国人这样干则是另一码事。”他威胁说：“法国越是支持北约双重决定，人们就越难以理解为什么法国反

所谓欧美战略“脱钩”，是指当西欧遭受军事进攻时，美国不动用其战略核手段进行反击。也就是说，美国未必自动向西欧张开核保护伞。

密特朗：《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第 193 页。

对把自己的核力量计算在内。”不过，苏联无非口头强硬，对法国无可奈何。

法国并未对北约“双重决定”承担义务，本国领土不接受部署美国导弹，却如此积极支持和敦促别国部署，原因何在？

（一）恢复东西方均势，确保西欧的和平与安全。

密特朗说过：“关于东西方关系问题，我的立场很简单：要维护和平，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均衡的力量对比，在欧洲建立足够均衡的局面。因此，我将永远赞成维持这种力量对比所必需的东西。”他认为，苏联部署 SS—20 导弹，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而欧洲力量的失衡，有可能导致苏联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不战而胜”，即“使用威胁，通过谈判得到它即使打赢一场战争也未必能得到的好处”。这构成对所有西欧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法国不能置身事外，而应积极推动盟国实施部署美国新式中导，以恢复欧洲地区的核均势。

（二）拉住美国，防止美国与西欧“战略脱钩”。

法国认为，“苏联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使欧洲防务与整个大西洋防务脱钩。”把美国新式中程导弹引进西欧，不仅可以恢复欧洲地区核力量的平衡，而且有助于防止欧美战略脱钩的危险，从而增强美国核保护的可信性，以利于西欧的安全和东西方关系的稳定。

（三）拴住西德，以保持欧洲政治力量平衡和维护法国的安全屏障。

欧洲导弹的部署与反部署之争，焦点是西德。西德外受苏联诱压、内有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的牵制，其发展趋向引起西方盟国的疑虑，法国尤为敏感。谢松外长指出，“法国不是担心欧洲发生战争，而是担心 SS—20 导弹迫使西德作出让步，导致西德中立化。”如果西德在欧洲导弹问题上动摇、让步，等于承认苏联对西德外交、防务政策有某种否决权，等于含蓄承认西德的安全将更多依赖东方政策，而不是依靠北约。这就意味着西德可能松弛与西方联盟的关系而滑向和平中立主义。这不仅会损害东西方平衡，而且直接关系到法国的安危。因为一个积聚大量美国核武器的西德构成一道位于法国前沿的安全屏障。如果这一安全屏障崩塌，法国将暴露在同东方集团对峙的第一线，整个防务战略将为之改观。因此，公开支持西德内部主张部署美国导弹的势力，稳住西德，把它牢牢拴在西方阵营，是法国根本利益之所在。

1983 年 11 月，欧洲导弹之争导致东西方关系的一场新的危机。11 月 22 日，西德联邦议院以 286 票对 226 票通过科尔总理提出的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议案。密特朗赞扬科尔作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加不容易的抉择”。11 月 23 日，苏联中断了历时两年的美苏日内瓦中程导弹谈判。接着，又中止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欧裁军谈判。这就使得双方原有的谈判渠道均被堵塞。与此同时，美苏部署导弹升级。美国如期实施北约制定的部署计划，开始在西德、英国和意大利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作为反措施，苏联也加速在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 SS—22、SS—23 导弹（射程分别为 900 公里和 500 公里）。美苏剑拔弩张，东西方关系一度极为紧张。密特朗把欧

洲导弹危机称之为“继柏林和古巴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洲导弹危机持续了 16 个月之久。诚如密特朗所预期，部署美国导弹虽然引起短时间的紧张，但最终将促成谈判。1985 年 3 月，美苏恢复关于中程核武器的谈判，经过两年多充满曲折和反复的谈判，1987 年 12 月 8 日，美苏首脑签署了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三年内双方将在全球范围拆除和销毁（包括尚未部署的）全部陆基中程导弹和陆基中短程导弹。美国将销毁部署在西德的 108 枚潘兴式导弹以及在英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的 274 枚陆基巡航导弹。苏联将销毁 405 枚 SS—20 导弹。

以美苏中程导弹条约为标志，东西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缓和时期。用密特朗的话来说，东西方从对抗共处时期走向合作共处的时期。

血染贝鲁特

1982年3月密特朗访问以色列期间，贝京总理多次谈到以黎巴嫩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色列的威胁。他把大幅的军事地图摊在会议桌上，指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巴嫩出击的地点，暗示以色列将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密特朗劝他克制。贝京表示：“除非以色列受到攻击，我不会进军黎巴嫩。”密特朗回国后在内阁会议上以乐观的口吻说：“我的以色列之行使黎巴嫩避免了一起痛苦的冒险行动。”他还特地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通报同贝京会谈情况，强调以色列无意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巴勒斯坦人采取暴力行动，以色列将作出反应。

三个月后，1982年6月4日，以色列以其驻英国大使遭恐怖分子杀害为由，出动50架飞机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基地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炮兵和海军轰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装力量对以色列境内的加利雷地区进行还击。6月6日，以色列出动两个师的兵力，向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发起大规模海陆空立体突袭，美其名曰“加利雷和平行动”。

这时，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正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举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致电密特朗告急：“以色列开始进犯贝鲁特，在各条战线发起全面进攻，火力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总统先生，我谨请您救救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制止沙龙将军策划的对贝鲁特的破坏和屠杀。”密特朗当场通报与会各国首脑，全场震惊，唯独里根不动声色。两小时后，贝京总理致电密特朗并抄告里根，把出兵黎巴嫩说成是“合法自卫”，并宣称“将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向北推回40公里。”

密特朗的反应是谨慎和克制的。他表示：“法国毫不迟疑地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干预……我们从来是通过外交行动来维护统一、独立、主权、互助等原则。我们仅限于采取外交行动，因为这是我们应起的作用。”密特朗的底牌是：如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真是有限的，那还是可以容忍的。

事实上，以色列决不以在黎巴嫩向北推进40公里为满足。以色列这一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一是拔除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军事基地，消灭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并把叙利亚部队赶出黎巴嫩；二是控制黎巴嫩。以军迅速攻占黎巴嫩约3000平方公里土地，直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6月14日，以色列出动3万多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开始围攻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一万余名巴解战士陷于以军重重包围之中，寡不敌众，形势十分危急。密特朗十分恼怒：“贝京骗了我。他告诉我，进军不会超过40公里。”

从1920年到1941年，黎巴嫩曾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现在仍然是法国在中东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因此，法国十分关注黎巴嫩危机，并伺机插手。6月9日，密特朗在记者招待会上再度谴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同时重申以色列人民拥有生存的崇高权利。他表示法国无意卷入黎巴嫩战争，“在世界

上大多数地区，法国的政策不是充当宪兵，即使这种宪兵是以和平的名义进行干预。”不过，他还留了一条必要时进行干预的尾巴：“黎巴嫩合法政府的任何呼吁，法国将予听取。”

其实，美法已在秘密酝酿派遣包括美、法在内的多国部队进行干预。6月12日，美国国务卿黑格打电话给谢松，告以组织包括美、法在内的多国部队开赴贝鲁特的设想。总统听取谢松汇报后立即表示原则同意。但这支多国部队的组建、任务等问题尚待商定。

燃眉之急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被围困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解组织部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法、以意见分歧。以色列企图在黎巴嫩境内一举消灭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和瓦解巴解组织。美国予以支持。法国则主张削弱巴解组织，促其向“温和”方向发展，但不赞成对巴解组织逼之太甚，更不赞成置巴解组织于死地；法国多次强调必须使巴解组织继续存在下去，必须避免巴解组织武装力量被消灭在贝鲁特。如同谢松外长事后所说，“贝鲁特之战一开始，法国就希望用承认巴解组织在中东和谈中的政治权利换取其解除武装”。法国认为，即使消灭巴解武装力量，也只是“幻觉的胜利”，因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还会死灰复燃，而且会更加强硬，更易走极端，可能引起阿拉伯世界恐怖活动的新高涨。从长远看，巴解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对话者，任何真正的中东和平进程没有巴解组织参加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法国主张全力避免贝鲁特之战，拯救贝鲁特，拯救巴解组织，保存巴解武装力量，让其“体面地”撤出贝鲁特。

6月16日，密特朗在维也纳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会谈，他强调：“必须避免巴解组织在贝鲁特被消灭。没有阿拉法特，那就会更糟。绝望挣扎的人会占上风。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两位社会党领导人一致认为，阿拉法特是唯一能制止巴解组织内部的极端派的人，是唯一有代表性的对话者，他能够在时机到来时同以色列进行真正的谈判。密特朗在维也纳表示，被围困在贝鲁特的阿拉法特“完全可以到法国去”，他可以在法国会见谢松，还可以会见莫鲁瓦总理。

实际上，法国同巴解组织代表人物频繁接触，探讨巴解组织的出路。6月15日，法国对外关系部秘书长古特曼在黎巴嫩总统府会见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哈尼·哈桑。由于以色列狂轰滥炸，阿拉法特本人未能会见古特曼。哈桑表示，巴解组织将停止从黎巴嫩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交换条件是以色列撤出黎巴嫩。

6月19日，莫鲁瓦总理和谢松外长先后接见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这是法国总理第一次会见巴解组织领导人。莫鲁瓦表示，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在这种前景下，一切足以加强巴解组织政治地位的措施都是积极的。谢松在法国国民议会上说得更明确，

“巴勒斯坦人民应有以他们的名义发言的代表。对我们来说，这个代表就是巴解组织。不能使这个组织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时被消灭，不能使它有失体面。我们的观点同以色列和美国的观点完全不同。”

法国在力主让巴解在政治上继续生存的同时，力图迫使它由武装斗争转入和平的政治斗争的道路，最终实现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相互承认，为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开辟新的前景。谢松在法国国民议会说的下面这番话可以印证法国这一意向。“我可以在此证实，巴解组织已经同意从武装斗争阶段转入政治斗争阶段。今后的问题是将此付诸实施，以便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或者一个代表巴勒斯坦的实体——相互承认时实现和平解决。”法国同美、以在处置巴解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对法国来说，只有避免以军事方式解决贝鲁特围困战，方有插手的余地。法国企图利用其在黎巴嫩的传统影响和同冲突各方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有利地位，参与和促成和平解决，以便加强法国在黎巴嫩的存在和扩大在中东的影响。

6月24日，巴解组织向法国告急：以色列将在48小时内进攻贝鲁特西区。密特朗说：“进攻贝鲁特将断送黎巴嫩的未来，断送中东和平。”当天，他就黎巴嫩局势发表声明，正式提出：在贝鲁特西区及其附近地区作战的所有部队脱离接触，由黎巴嫩军队进行隔离。如果黎巴嫩政府希望的话，可由安理会主持下组成的国际部队予以协助；贝鲁特西区在联合国观察员监督下实行中立化；该地区的中立化将是不久举行和谈的先决条件。次日，法国向安理会提出相应的提案。美国对法国倡议表示震惊，认为此举是对以色列的“危险的挑衅”。由于美国行使否决权，该提案未获通过。

美、以虽企图以军事手段消灭巴解武装力量，但这并非易事。如强攻贝鲁特西区，将招致一万余名巴解战士和“阿拉伯威慑部队”的3600名叙利亚士兵的殊死抵抗，势必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激起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谴责。美、以逐渐倾向于迫使巴解武装力量在军事压力下缴械撤离黎巴嫩，分散到若干远离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安置。

6月29日，美国国务院第二把手伊格尔·伯格接见法国驻美大使，进行了重要谈后，标志着美国态度的变化。美国同意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政治对话者保留下来。巴解组织的消失将导致中东以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因为极端派组织将借机取代巴解总部兴风作浪。法国大使表示：巴解组织武装人员撤离贝鲁特应允其携带轻武器，而不是全部缴械，一是出于自卫和安全的考虑；二是使巴解组织不致太丢面子。美方表示可以考虑。接着，以色列也同意巴解组织提出的两项条件：允许随身携带轻武器；在黎巴嫩保留一个政治代表处。

但是，由谁来保障撤离？黎巴嫩政府及其军队过于孱弱，无法当此重任。于是，美、以、法趋向相互妥协，积极策划向贝鲁特派遣国际部队，负责处

理巴解组织武装力量的撤离工作。

这时，在阿、以之间“不偏不倚”并同巴解组织保持良好关系的法国，成了美国需要借重的力量。7月6日里根正式致函密特朗，要求法国参加以美、法为主的多国部队，其任务是保障巴解武装力量和人员安全撤离贝鲁特以及巩固黎巴嫩政府的地位。他要求密特朗放弃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应决议作为法国参加多国部队的先决条件，因为由于存在苏联的否决权，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谢松在来函译文上批注道：“此信表明，美国人很器重我们!!!”

7月10日，密特朗表示原则同意参加多国部队，但为了“师出有名”，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提出四项条件：黎巴嫩政府正式提出要求；巴解组织明确表示同意；明确多国部队任务；将多国部队置于联合国控制下，至少也要得到联合国的合作。

与此同时，法国不断向巴解组织作出政治姿态，显示同巴解关系不同寻常。莫鲁瓦总理邀请阿拉法特在撤离贝鲁特后来法国访问。密特朗于7月15日接见包括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的阿拉伯联盟代表团，这是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进入爱丽舍宫。密特朗对代表团说：“以色列犯了一个错误，它迫使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殊死的抵抗。相反，它本当谋求谈判，那么，巴解组织无疑是交战双方的一方的代表。我对这一战斗表示敬意。”

8月1日，以色列对贝鲁特进行连续14小时的猛烈炮击和轰炸，占领了贝鲁特机场。几发炮弹在法国驻黎巴嫩大使官邸院内开花，部分院墙倒塌。密特朗鉴于事态严重，发出指示：未经他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公开表态。“我不愿引起新的争论。”8月4日，以色列装甲部队突破贝鲁特西区。密特朗决定派遣一名高级军官秘密前往贝鲁特，同黎巴嫩—巴解组织委员会研究法国参与巴勒斯坦人撤离事宜。密特朗还打电话给里根，要求美国敦促以色列停火。与此同时，阿拉法特要求密特朗尽速向贝鲁特派遣法国部队，以解救处境岌岌可危的巴解组织人员。

法国先头部队400人，后续部队800人整装待发。以色列在黎巴嫩港口和海岸警戒，防止法国部队登陆。形势十分紧张。

几经周折，8月18日，有关各方终于接受了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贝鲁特问题的方案。根据该方案，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和叙利亚军队将从8月21日起开始撤出贝鲁特西区，由美、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监督巴、叙撤军。以色列同意多国部队进驻贝鲁特。由于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反对这一行动，多国部队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以书信形式给予多国部队以象征性支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

20日，密特朗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法国同意参加多国部队。次日，一支由350名士兵组成的法国先遣部队率先到达贝鲁特。8月26日多国部队部署完毕，其中包括法国部队900名，美国850名，意大利570名。在法国部队监督和保护下，巴解武装力量12000多人携带轻武器分15批撤出西贝鲁特，从海路离开黎巴嫩，分别前往八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威慑部队”的3600

名叙利亚士兵同时撤出西贝鲁特。阿拉法特于 30 日随最后一批人员乘船前往雅典。

事有凑巧，9 月 1 日，阿拉法特抵达雅典之时，正好是密特朗按预定计划正式访问希腊之日。谢松在飞机上建议总统在雅典国家博物馆举行招待会时会见阿拉法特。密特朗认为不妥：“不在现时会见，也不在外国会见。”如果阿拉法特明确承认联合国关于以色列生存权利的决议，他将在巴黎接见他。

多国部队在贝鲁特驻留期限原定为一个月，因提前完成监督和保障巴解武装力量撤出的任务，于 9 月 10—13 日相继提前撤离。

贝鲁特的悲剧至此并未落幕。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又紧随而来。

1982 年 9 月 14 日，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总部发生爆炸，该党民兵司令、新当选的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以色列借口防止杰马耶勒遇害事件重演和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当日晚攻占贝鲁特西区。巴解武装撤出后，10 万巴勒斯坦难民尚留在贝鲁特。以色列占领军切断西区的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与外界的联系。9 月 16 日，以色列唆使长枪党民兵进入难民营，进行了长达三天的大屠杀，估计至少有 1000—2000 人惨遭杀害。以色列政府对这次大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0 月 25 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在以色列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承认，是他亲自批准长枪党民兵进入难民营的。

密特朗获悉大屠杀消息后十分震惊，认为以色列嘲弄了国际社会，也嘲弄了他。他声明：“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的人，背叛了他们自以为为之服务的事业。国际社会应奋起反对这种暴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制止。”他私下说：“真作孽，本不该撤出贝鲁特。”

密特朗同有关部长研究大屠杀事件时却另有一种想法：“我们是否有一定责任？如果我们在大屠杀发生时留在贝鲁特，那就更糟，因为我们不能越出防区加以制止，人们会认为我们是有责任的。”他认为大屠杀系以色列所为。“同贝京什么也搞不成。他要的是一个以色列。我了解他。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和平可言。”谢松指出，法国对这一事件的责任问题迄今只字未提。总统说：“这不忙”。谢松又建议让对外关系部发言人对此表态。总统不同意：“我信不过发言人所说的话。”

美、法、意决定重组多国部队返回贝鲁特。9 月 20 日，密特朗宣布立即向贝鲁特派法国部队，其任务是保护平民的安全和促使人权得到尊重。9 月 22 日，法国先头部队返回黎巴嫩首都。国防部长和总统特别参谋长随同前往。1600 名法国部队陆续到达（后增兵至 2000 人），控制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通道。美国部队 1200 人，意大利 1000 人相继进驻贝鲁特及其郊区。

9 月 24 日，密特朗在内阁会议上说明法国部队何以重返贝鲁特。他着重指出：法国士兵可能会有伤亡，“没有无损失的战争，搞仲裁的不可能不中子弹。”这预示着法国部队在贝鲁特的险恶处境。

不出密特朗所料，在黎巴嫩内外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多国部队也成了袭击的目标。什叶派为了挤走多国部队，削弱西方对黎巴嫩的影响，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1983年10月23日凌晨，一辆满载烈性炸药的自杀卡车闯入贝鲁特法国部队驻地的九层大楼，楼房被炸塌，法军士兵58人丧生。几分钟之前，另一辆自杀卡车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炸塌，239人丧生。

密特朗在沉睡中被叫醒。他立即派国防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前往现场。清晨，他召集总统府助手们商议：“我打算去贝鲁特，你们意见如何？”他们为总统的安全担心：太危险，还是不去为好。有人肯定想谋害总统。然而，密特朗主意已定，为安全计，他决定当天晚间秘密前往贝鲁特。

临行前，密特朗向总统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作最后指示：“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总统府、政府、贝鲁特法军司令部都无需知道……在您确悉我已贝鲁特降落时，再通知莫鲁瓦总理、美国人和新闻界。”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把两个信封放在里面，笑着说：“如果我出了事，您知道东西放在这里，您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密特朗由总统特别参谋长等陪同离开爱丽舍宫。晚上11时30分，莫鲁瓦总理给阿塔利打电话探听总统下落：“总统在哪里？我要同他通话。”回答是：“对不起，皮埃尔，你不能同他通话，我无权告诉你其中缘由。”莫鲁瓦说了声：“我懂了。”

次日晨6时，阿塔利给在法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过夜的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打电话，问道：“莫尔朗到了没有？”对方一时没有同密特朗在抵抗运动期间用过的化名对上号，觉得莫名其妙。一连问了三遍，这才反应过来：总统安抵贝鲁特。

总统先在一排排棺材面前默哀，然后视察了挨炸的法军驻地大楼。总统对军事部署不当提出批评：怎么能让士兵们住在大楼里，而不是安置在掩体内。密特朗还会见了黎巴嫩新总统阿明·杰马耶勒，表示法国将永远忠于自己在黎巴嫩的“传统和义务”。

当晚，密特朗乘专机返回巴黎。在专机起飞的10分钟内，可能遭到从黎巴嫩地面发射的、由红外线制导的萨姆—7地空导弹的袭击。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亲自驾驶专机。游弋在黎巴嫩海面的“福煦号”航空母舰上的四架战斗机，在专机起飞时护航，以便吸引可能出现的萨姆导弹。密特朗一觉醒来，飞机已安全降落在巴黎近郊的军用机场。总统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贝鲁特之行，心情十分轻松。他在走下舷梯时故意问索尔尼埃将军：“飞机是您降落的吗？”回答是：“是的，总统先生。”密特朗开玩笑说：“这么说来，我们度过了今天最危险的时刻，我都不知道。”

密特朗安全返回巴黎后，对身边的人说起对死的看法：“长期以来，我

总觉得自己是不会死的。即使在战争中，我面对死亡，但并不感到害怕……我不是胆小鬼。勇气意味着制服恐惧，而不是无所畏惧。”这番话可以作为他的贝鲁特之行的脚注。

密特朗对贝鲁特的闪电式访问，受到法国政界和新闻界的一致好评。第二天的民意测验表明，84%的法国人赞扬总统的行动。在国际上也反应良好。美国不甘落后，随后，副总统布什也前往贝鲁特。

11月2日是亡灵日，法国当局在拿破仑墓的大院里举行悼念贝鲁特遇难士兵的隆重仪式。共和国总统将荣誉勋位勋章一一放在覆盖着国旗的58具灵柩上。法国决定对死难事件的罪魁祸首采取某种行动。密特朗说：“这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究竟谁是罪魁祸首？经多方侦查，此事系有伊朗背景的伊斯兰什叶派所为。

法国最高当局先是决定对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采取行动。法国特工人员企图以满载炸药的吉普车炸毁伊朗使馆的围墙，但由于点火器出了故障，没有成功。伊朗以关闭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商务处作为对这起未遂爆炸事件的报复。

几天后，11月12日，里根致函密特朗，要求法国同美国一起对贝鲁特爆炸事件采取报复措施。密特朗当即表示同意，责成两国国防部长予以落实。这次行动将“同时”进行，而不是法、美“联合行动”。

法美采取行动的时间预定为11月17日。16日晚，密特朗发表电视讲话，声称“罪行将受到惩罚”，为第二天的行动作舆论准备。

11月17日，行动的前一小时，美国人突然变卦。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通知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我决定，美国不参与这次行动。”密特朗勃然大怒。这简直是开玩笑。他指示埃尔尼：按预定计划行动，“现在我们不能后退”。

下午4时20分，八架超级军旗战斗轰炸机从黎巴嫩海面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黎巴嫩东部什叶派民兵的训练基地以示“惩罚”。10余名黎巴嫩什叶派民兵和12名伊朗顾问丧生。法国的报复行动招致国际舆论的指责，甚至英国、意大利、希腊等盟国也对“黎巴嫩暴力行动升级”表示不满和遗憾。密特朗在11月30日内阁会议上辩解说，“我们是针对明确的目标行动的。我们以此为限度。人们总会明白的。法国认为，任何罪行都应受到惩罚。”

法国的报复行动没有能改善法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处境，袭击事件续有发生。密特朗说：“我们没有理由再在黎巴嫩呆下去。”

自1983年底起，法国同黎巴嫩及其邻国接触，并同苏联磋商，酝酿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取代多国部队，以便体面地从贝鲁特脱身。1984年2月19日，法国在安理会正式提出相应方案，遭苏联否决。法国为了安抚某些反法势力，避免无谓牺牲和惹起国内政治风波，决定收缩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3月31日，继美、意之后，法军1250人全部撤离黎巴嫩，另派40名（后增

至 80 名) 军事观察员监督黎巴嫩各派之间的停火。 1986 年 4 月 1 日, 法国外交部宣布从贝鲁特撤出军事观察员。至此, 法国在贝鲁特的象征性的军事存在也消失了。

“帮戈尔巴乔夫一把”

每逢法国总统选举，各国驻巴黎使馆总得化很大力气预测选举结果，有猜对的，也有猜错的。1981年密特朗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的左右翼决战，尤为各方关注。据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尤里·鲁宾斯坦说，这一回苏联使馆猜对了。可是，苏联最高当局并不希望左翼领袖密特朗当选，倒是对右翼头面人物吉斯卡尔·德斯坦情有独钟。早在1974年总统选举时，在密特朗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对垒的决胜轮竞选活动刚开始之际，苏联驻法大使拜访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引起了轰动。不管苏方如何解释，很难不使人感到莫斯科希望吉斯卡尔当选。吉斯卡尔·德斯坦上台后，没有使克里姆林宫失望。他对苏表现软弱。密特朗指责他奉行“讨好”苏联的政策。1981年苏联对密特朗当选总统十分尴尬，预期法苏关系将出现阴霾天气。

密特朗上台后，果然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两国关系僵冷。从戴高乐以来，延续多少年的法苏特殊关系一度不复存在。社会党政府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宣布停止实施法苏首脑定期会晤，冻结高级政治往来。密特朗对苏采取强硬路线，首先是基于战略考虑和安全利益的决策。过去，法借苏抗美，是以美国拥有对苏军事优势或东西方力量均衡为前提的，而今以苏联部署SS—20导弹为标志，欧洲地区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西方的变化，从纠正力量失衡的需要出发，法国在战略上把联美抗苏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侧重反对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其次，密特朗宣扬“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社会主义的法国将把东西方关系放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标志之下。”法国突出意识形态对立，也有碍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加之，阿富汗事件等因素，法国对苏态度更趋强硬。第三是出于内政原因。密特朗和美、冷苏，借以消除盟国、特别是美国对法共参政和社会党政府推行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改革的疑虑。

1983年11月，美苏中程导弹谈判破裂，东西方出现新的紧张。法国对苏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密特朗公开表示，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处”。对法国外长几次三番说过的话，他概不认帐。他声明，法苏关系“并未冻结”。“我从未说过，只要苏联军队不撤出阿富汗，我就不访问苏联。我本人从未作过这样的声明。”如同谢松外长所说，法国的逻辑是：“恰恰是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当两个超级大国相持不下，互不对话时，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就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谋求在美苏间起缓冲或疏通作用。

在获悉西德联邦议会批准部署的时刻，密特朗看到美国在西欧部署中导已成定局，即让外长谢松告知苏联驻法大使，他准备前往莫斯科。1984年1月，正当欧洲导弹危机处于高潮之际，法苏两国外长就密特朗访苏达成协议。1984年6月20日，密特朗正式访问苏联，恢复了中断三年多的法苏首脑会晤，打破了社会党执政以来法苏关系的僵冷局面。同时，密特朗成为日内瓦谈判破裂后第一位同苏联领导人会晤的西方国家首脑，成了苏联的特殊对话

者和东西方的牵线人。这样，法国既显示了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又在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僵持中找到了有利于法国的平衡点。

密特朗抵达莫斯科的当天下午，就同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举行会谈。年迈体衰的契尔年科照本宣科，尽是一些指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老话套话。密特朗先是重叙法苏传统友谊，强调从历史上看，两国没有任何相互敌对的理由。他表示，法国将忠实于它在60年前和40年前采取的主动步骤。接着，话锋一转，进入正题。“在我看来，SS—20导弹简直是莫明其妙。把750枚核弹头对准欧洲，制造危险局势。请问：为什么把这些导弹对准我们？为什么？难道您以为我会发起疯来向你们发射导弹吗？真是荒谬绝伦！我宁愿既不要SS—20，也不要潘兴。但是，既然部署了SS—20，那就必须有同等的武器加以平衡。”契尔年科对这番话并不感到意外，没有作出强烈反应。最后，密特朗提出苏联最头痛的人权问题。“关于人权问题，必须完整地对待赫尔辛基协议。特别是，我知道，当人们提到诸如萨哈罗夫之类的问题，你们就非常敏感……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在尊重主权的情况下直言不讳。我提出萨哈罗夫和其他几个人的问题。契尔年科和在座的苏联人员顿时紧张起来。

晚上要举行欢迎密特朗的国宴，法苏双方都忐忑不安。苏方生怕密特朗在国宴讲话中公开谈论萨哈罗夫问题。宴会前，苏方将契尔年科的祝酒词法文本送交法国代表团，并特意说明，苏共总书记对原稿中严厉谴责在自由问题上对苏联说三道四的那些人的话，将略去不讲。信息是最明确不过的了：法国总统也别再提萨哈罗夫问题。密特朗在克里姆林宫的贵宾套房里召集助手们研究。他说：“要么我冒险点萨哈罗夫的名，但我的访问就有中断的危险，说不定明天一早就得回巴黎；要么我避而不提，访问仍按计划进行。”谢松外长主张谨慎从事。总统府的顾问表示，如果避而不提，那么“这次访问就完全失败了”。这句话点破了密特朗的心机。

国宴开始不久，契尔年科站起来致祝酒词，果然没有念事先分发的讲话文本中的两句话：“那些企图教训我们的人，只能使我们感到可笑。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接着密特朗讲话。他故意没有事先分发讲话稿，边讲边由译员译成俄文。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点了当时被软禁在高尔基城的萨哈罗夫的名。一时不知所措的译员急忙用法语问道：“总统先生，您真想把这些话翻译过去吗？”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是”。顿时宴会空气变得十分紧张。密特朗事后说，“眼看着就要触发外交事件。全场气氛冰冷得可怕。”据随行的法共部长夏尔·费特尔曼回忆，“契尔年科脸色刷白。苏共第三号人物阿利耶夫凑到我耳边说，‘还不如吉斯卡尔·德斯坦连任总统的好，。’”

不过，宴会还是照常进行。全场死一样沉寂。上过鱼子酱和冷盘后，气

指1924年法国赫里欧政府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4年戴高乐缔结法苏同盟条约。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一卷（1981—1986），第654—655页。

氛逐渐缓和下来。交谈又开始了。密特朗同坐在对面的契尔年科谈起苏联的农业歉收问题。苏联头号人物没精打采地说了几句，把歉收推在气候不好，说来年就会好起来的。忽然，坐在密特朗总统近旁的一个人说道：“大家老说形势大好，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在我国，农业一团糟。确实很糟糕。就像计划经济很糟糕一样。”那人又说道：“况且，从1917年以来，计划经济从来没有搞好过。其他事情也一样。”密特朗好奇地打听此乃何许人也，竟敢同苏联头号人物唱反调。此人乃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戈尔巴乔夫。密特朗记住了这个名字。事后说，“这是个非常杰出的人。”

法国总统问他：“我感到很奇怪，您怎么没有参加同我们会谈的代表团？”回答是：“总统先生，这不取决于我。”原来，戈尔巴乔夫深得契尔年科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就暂时失宠了。国宴散后，密特朗对助手们说：“看明天是不是把我们打发回去。”

第二天，密特朗一行没有被打发回巴黎。访问按原定日程继续进行。密特朗邀请契尔年科回访，事实上恢复了法苏首脑定期会晤。而密特朗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表明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显示他不是奉行“一种没有脊梁骨的外交”，捞取了一大笔政治资本。撒切尔夫人在6月25日枫丹白露欧共体首脑会议上祝贺密特朗访苏“成功”；里根总统也打电话表示祝贺。国内反对派也无隙可乘。

密特朗从对苏僵硬转为松动，原因何在？主要是法苏特殊关系是法国外交棋局中牵动全局的一个棋子，不能长期弃之不用。自戴高乐以来，法国一直奉行立足西方，在美苏间搞平衡的基本政策。如果一味靠拢北约和美国而同苏联长期僵冷，不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直接和经常的对话，就谈不上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不利于影响和牵制美国。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这一天，接替谢松担任外长的罗朗·迪马正好抵达莫斯科。他原本是为契尔年科回访巴黎作准备的，结果却建议密特朗来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总统犹豫不决。按当时法苏关系的状况，总统大可不必亲自前往。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和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密特朗均未参加。于是，他先是给予否定的答复。迪马又同总统通了电话，建议总统借此机会见一见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此人乃是“苏联整个领导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才能的人”。密特朗动心了。他想起上次访苏时戈尔巴乔夫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想同他重新会面。

3月13日上午，契尔年科葬礼在红场隆重举行。密特朗姗姗来迟。抵达红场时，参加葬礼的各国贵宾早已各就各位，足有20来排之多。法国总统作为西方大国的国家元首，照例应该站在第一排。可怎么挤进去呢？法国驻苏大使雷蒙（后来当了外交部长）急中生智，用站在那里的外国人士听不懂的俄语叫嚷着为总统开道，好不容易才让密特朗挤到最前列，站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旁边。

当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接见密特朗。他是第一个被接

见的西方国家首脑。戈尔巴乔夫开门见山，马上进行实质性谈话。根据法国档案记录所载，他强调，苏联领导人对苏法关系的想法依然如故，十分重视同法国的合作。但是苏联领导人也不是仅仅用“玫瑰色眼镜”来看待苏法关系的。他表示：“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在世界局势中肩负的责任，决心要为改善形势而努力。”在当前核军备引起的紧张形势下，“有必要采取措施，以便使现代世界不致滑向核灾难的深渊。”面对这种形势，“苏法两国的合作尤有必要。苏联方面准备在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采取新的步骤，促进苏法对话，以期找到停止军备竞赛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密特朗回溯了法苏传统友谊后表示，法苏虽分属两个不同的联盟，但法国在忠实于联盟的同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也是一个欧洲古老的 国家，希望同苏联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他申明，对契尔年科的邀请既是对人的，也是对国家的。人变了，国家依然存在，因而邀请仍然有效。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受邀请。

密特朗最后归结说：“我们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参加这次会见的迪马外长说：“那次接触很好。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密特朗回忆说：“一小时的会谈就足以使我相信，苏联换了一个时代。”“那是和一位生气勃勃的人的接触，相当热烈。他力图讲清道理，而不是感情用事。”戈尔巴乔夫对这次会谈印象也很好。“我们那天的谈话很重要。第一次个人接触就成了基于相互理解的关系的起点。我们马上就相互理解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性的，促使我选择法国作为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密特朗在3月14日内阁会议上谈了他的莫斯科之行：“在克里姆林宫，不再有人怀念契尔年科。看来，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比苏联领导机构的其他成员年轻得多。对他来说，他对其他政治局成员在年龄上占有优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将陆续死去。仅仅就此而言，即使没有加快演变进程的事态发生，戈尔巴乔夫只要等着死神来收拾他们，坐享其成就行了。”

“戈尔巴乔夫反复谈到裁军问题。这是苏联外交的重点。戈尔巴乔夫很可能谋求在某种程度上同法国接近。此外，葛罗米柯显得很讨人喜欢。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并不认为，这种和善的表现意味着放弃苏联推行了34年的外交政策。然而，在他的考虑中，法国的份量看来要比过去重一些。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这将视情况而定。他大概想寻找一些出路。就此而言，法国是合适的。”

苏联为了分化欧美和打开对西欧关系的局面，把拉拢法国作为对西欧外交的重点。1985年10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选择法国作为他上台后对西方国家的首次访问对象。这是1979年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以来，苏联领导

人首次出访西方。也是 1977 年以来，苏联首脑首次访问法国。

这次访问的最重要的日程是密特朗与戈尔巴乔夫的两次单独会谈。双方都直来直往，异常坦率。

根据法国会谈纪要，一开头，密特朗表示：“您执掌政权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您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您本人引起一种好奇心。我想这是一种建设性的的好奇心。”“我很乐意同您会谈。我讲话不带任何框框。”“我在每个问题上都很坦率……您是对立集团的领袖，但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们是两个主权国家。”

密特朗强调：“法国是以独立自豪的国家。我们保持采取决定的自由。”“我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我并不同意我们伙伴的一切倡议。我曾在美国国会的讲坛上批评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我对外空武器也毫无热情可言。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当然不想同美国搞紧张，但是，凡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任何问题，我都有自己的明确的见解。对您，我也是持这种态度。”

戈尔巴乔夫也表示希望直截了当地交谈。“我此行的唯一目标，是给法苏合作以新的推动，扩大两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有人说，我来法国是为了分化法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法苏首脑在两个问题上取得某种一致。一是双方很快在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上找到了共同点。戈尔巴乔夫说：“我想，美国确信自己仗仗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能够在空间竞赛中超过和压制苏联。过去，我们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而美国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这一切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这样下去，那就不可能有建设性的谈判，空间就没有任何遮拦了，谁领先就想动手。”密特朗表示：“我对里根说过：‘要是您迫使俄国人进行军备竞赛，他们会奉陪的，’”。他指出，美苏空间武器竞赛，“有双重危险。领先的一方，会情不自禁地利用其优势，担心对手领先的一方，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止。”他明确表示：“法国反对空间武器竞赛，而且法国不会参加进去。”戈尔巴乔夫对密特朗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大加赞赏，并想顺势拉拢法国、西欧一起反对“星球大战”计划：“您讲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阶段。在我看来，如果苏联和西欧之间没有共同谅解，如果我们不一起行动，里根政府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密特朗当然不会落入圈套。他表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它改变主意。它并不那么容易改变的。”

在不许西德染指核武器问题上，双方立场相同。戈尔巴乔夫对法德军事合作的发展表示不安，担心以法德混合部队为基础的西欧防务最终将导致西德掌握核武器。密特朗立即予以澄清。强调法德军事合作仅限于常规力量，不涉及核领域。他明确表示，“法国不能让德国分享核武器，否则将危及欧

里根于 1983 年 3 月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宣布美国将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苏联导弹打到美国本土前，予以摧毁。俗称“星球大战”计划。

洲的平衡，首先是同苏联的平衡。但是，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尤其是由于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双方在欧洲导弹问题上各执一词，特别是法国核力量是否纳入东西方核裁军谈判的问题上，双方分歧依然如故。法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将其核力量纳入美苏核谈判之中。戈尔巴乔夫企图将法、英核力量变相纳入核裁军谈判，建议由苏联分别同法、英进行核会谈，缔结单独协议，遭法方拒绝。密特朗说：“法国拥有一支防御性的核力量，大约有 140 枚核弹头，比苏联要少得多。”“同我们直接会谈吗？为什么不？不过，你们拥有在一刻钟之内毁灭西欧的一切手段。你们拥有的 SS—20 导弹比你们需要的还多。对我来说，这是生产过剩。”

访问结束时，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在苏联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会后，戈尔巴乔夫急切希望知道密特朗的反应。法国总统说：“您知道，我很喜欢这种记者招待会。我想，您也应付自如。”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几句话发自密特朗内心，是真诚的。他觉得，密特朗是一个言之有物的对话者。

这次访问，使密特朗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两人在哪些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哪些问题上各持己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倒是戈尔巴乔夫临别时寥寥数语，点出了巴黎之行的要害。10月5日上午，戈尔巴乔夫来到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向密特朗辞行。他把手放在密特朗的手上，眼睛动情地看着对方，说了几句心里话：“苏联需要自由和主动精神，苏联需要民主。不然，我们将一事无成。这需要时间。您一定要帮助我。”密特朗寻思：他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玩弄手腕？密特朗倾向于前者，认为应该认真对待。他把这番话转达给大西洋联盟的主要盟国，特别是美国总统里根。

戈尔巴乔夫此行标志着法苏特殊关系的基本恢复。在告别宴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法苏“已经恢复一年一度的首脑级定期会晤制度。”密特朗也表示，“恢复两国首脑定期会晤的传统是有好处的。因为不进行对话，不交流信息，会导致互不了解，这种情况我们看得够多了。”他宣布已接受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于来年访问莫斯科。

10月9日，密特朗在内阁会议上谈对戈尔巴乔夫访问的看法：“显然，戈尔巴乔夫先生谋求通过法国找到同欧洲接近的办法。这符合我们的愿望。对他来说，这是使美国付出高昂代价的办法。他急于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因而他关心的是不要卷入军备竞赛中去。”

“他会长期执政下去。他所表明立场，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经过几番接触，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印象甚佳。自担任总统以来，戈尔巴乔夫是最使他着迷的政治人物。密特朗认为，戈尔巴乔夫熟悉现代世界，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一卷（1981—1986），第 857—863 页。

密特朗：《论德国和法国》，第 17 页。

具有“新思维”，确实想搞“改革”，是一个西方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新一代领导人。密特朗公开赞扬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富有时代精神的人”，是一个“正视问题的现代人物”。当他看到苏联的“改革”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时，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持更加积极和肯定的态度。他明确表示，“我喜欢苏联的改革，而不喜欢莫斯科以往那种僵化的制度。”他断言，“苏联的改革是具有深远意义和具有胆识的创举。”表示“真心实意祝愿苏联改革成功”。

密特朗一直牢记着戈尔巴乔夫 1985 年访问巴黎时临别的一句话：“您一定要帮助我。”他简直成了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世界的辩护士，逢人便替戈尔巴乔夫说好话。1986 年 7 月 4 日，他同里根会谈时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个具有现代人的举止谈吐的政治家……他可望在位 20 年，但是，他在苏联体制中的地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稳固。他的前程取决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取决于导弹的数量。他的政治生命在此一举。应当在军事上作出让步，以便帮助他成功地发展经济？还是相反，应当迫使他进一步削减民用开支？我不是害怕危机的人，但我认为，将他推向失败的深渊是错误的。”几乎与此同时，密特朗对西德总理科尔说：“戈尔巴乔夫想使他的经济试验获得成功。他的问题是购买力问题。里根不懂得这一点。他想把俄国人拖垮，实际上却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打破框框。”

1989 年 10 月 25 日，密特朗在欧洲议会的演说中大声疾呼：“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自由领域里起着杰出的、历史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帮助他。……趁我们还能帮助他的时候，帮他一把。”

1990 年 1 月，密特朗访问匈牙利期间明确表示，“我想，他（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理由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一把，以期能看到他所面临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在另一个场合，当记者问他：“帮助”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因为他是苏联总统，因为他表现出有决心和真正的能力来改变苏联的制度和机构，显示了大兴自由和对话之风的意志，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继续这一事业不表示信任。当然，要敦促他别使人们失望。”这就是说，“帮助”戈尔巴乔夫，以防止苏联局势逆转；同时又要通过“帮助”，促使苏联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变。所以，更完整一些说，法国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一“帮”、二“促”。

密特朗不仅在口头上帮助戈尔巴乔夫，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助戈尔巴乔夫一臂之力。1990 年 7 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休斯敦会议上，以法、德为一方，以美、日、英为另一方，在援苏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美国反对马上向苏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强调苏联必须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才提供援助，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二卷（1986—1988），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3、109 页。

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90 年 1—2 月，第 44 页。

1990 年 3 月 25 日同法国电视一台记者安娜·森克莱尔的谈话。

并对援苏提出诸如苏联压缩军费、削减对古巴的援助等条件；密特朗强调，七国首脑会议不要进行鸡（苏联改革）生蛋（西方援助）还是蛋生鸡的争论，主张立即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而“不附带那些令人恼火的先决条件”。如若不然，戈尔巴乔夫垮台，后果不堪设想。

1990年10月2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总统府发言人宣布，法方表示愿“继续对苏联的改革提供最有益的支持和帮助”。双方签订了五项协定，其中包括法国向苏联提供50亿法郎的财政援助协定。事实上，1990—1991年，法国对苏援款共约200亿法郎（约合40亿美元）。

1991年7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伦敦会议上，再度出现对援苏的两种不同意见。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戈尔巴乔夫未必能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西方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的进度和规模应取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进度和规模。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既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方面已走得那么远，经济“改革”也是可信的，西方应在帮助苏联进行经济“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两者目标相同，做法不一。前者希图以经援压苏加速经济，“改革”；后者则主张以经援促苏加速经济“改革”。密特朗赞扬戈尔巴乔夫六年来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完成了决定性的变革”，西方应当帮助他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尽管未来的事态发展难以预断，“冒风险也是值得的”。他呼吁西方主要伙伴国从现在起就向苏联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而不要等待更多的演变的证据。

戈尔巴乔夫果然不负密特朗所望，他的“改革”，既断送了苏联，也断送了东欧。

密特朗与中国

密特朗可算得是同中国关系比较深的法国政治家。早在 1958 年 3 月，他同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等一起在法国国民议会建立了“发展法中关系委员会”。他先后以参议员、社会党领导人和共和国总统三种不同的身份访华。他说过：“这三次访华，我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我对中国的感情始终没有变。”

1961 年 1 月，密特朗作为参议员单独访华，历时三周。由于他对华友好，并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了她。毛主席在会见中指出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当密特朗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时，毛主席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究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那时，除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外，还没有一个法国政界人士受到这样高的礼遇。当时，密特朗刚刚经历了倒霉的天文台公园事件，几乎一蹶不振，连好多熟人、朋友都纷纷离他而去。中国最高当局非但没有冷落他，反而给予优渥礼遇，密特朗深受感动。

回国后，他在巴黎《快报》周刊撰文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时写道：“毛泽东把学说的严谨性同警觉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同联系实际、同具体经验相结合。他怀着建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的社会的强烈愿望。他把这个愿望同学说的严谨性相结合，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又不破坏这个社会的宗旨。毛泽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后来他又写了《中国面临挑战》一书，记述访华观感。他对中国新政权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深刻改造社会、消灭饥荒表示钦佩，“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一个软弱、腐败、四分五裂的帝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国家”。他的结论是：“中国正接近于重新崛起。”与这个结论相适应，他在法国参议院提出了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81 年 1 月 24 日，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提名党的第一书记密特朗为总统候选人。2 月 9—14 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邀请，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密特朗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强调，中国和法国都是世界均衡的因素，他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长征”表示美好的祝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密特朗后对随行的法国记者说，事隔 20 年后，密特朗再次访华，“对增进中国共产党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有益处的”。密特朗离开中国前对胡耀邦表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均衡方面”。“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1983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1961 年 2 月 23 日巴黎《快报》周刊。

密特朗对中国持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属于东西方关系的传统范畴，通常人们把美国、大西洋联盟、苏联、华约包括在这个范畴内。中国远远超出这个有点狭窄的概念。它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伙伴。中国也不属于南北关系的范畴，也不符合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历史和政治事实就是如此。”

1981年5月当选总统后，他对如何同这样一个独特的国家发展关系，一度举棋不定。执政初期，社会党政府把重振经济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对外政策方面，新政府着重推行“第三世界主义”。从这些方面着眼，在亚洲，法国首先盯着经济大国日本和作为“第三世界主义”三大支柱之一的印度。在制订对华政策中，从战略上考虑不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社会党政府觉察到中国在战略和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远非日本、印度所能比拟。用密特朗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因为它有着千百年文明史，以及这一文明史在当今政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像法国这个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遥远的西方国家一样，正如法国保持其活力及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一样，中国在我看来是一个决定性作用（我重复这个词）的伙伴。”因而，希望两国关系“更生气勃勃、更活跃、更稳定。”

密特朗执政头两年，中法关系不太顺当。除了法国没有把中国放在对外政策的应有地位外，还由于社会党政府突出人权外交，在一些问题上小题大做，把意识形态分歧带到两国关系中来，扰乱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1981年11月，法国外贸部长若贝尔访华。此人在蓬皮杜总统手下曾是个大红大紫的人物，当过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长。1973年蓬皮杜访华时，他是代表团主要成员。社会党政府派这样一位政治经济交融而又同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的部长来访，自然是投石问路的合适人选。若贝尔访华期间，我国公安部门扣留了与法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白天祥姘居的中国女子李爽。这纯粹是巧合。若贝尔却怒气冲冲地中断访问回国。他自以为忠实执行了社会党的人权外交，实际上做得太过分了，给社会党政府同中国的初次接触蒙上了阴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冷却下来了。谢松外长十分不满，埋怨若贝尔“为了一桩逢场作戏的恋情，搞坏了同中国的关系”。

不过，谢松自己在对华关系上也捅了不少漏子，特别是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在1983年先后在曼谷、河内以及其他场合大放厥词，说什么柬埔寨问题的实质不是越南侵略和占领柬埔寨，而是“中国和苏联在那里对抗”，中苏对抗是柬埔寨问题的“祸根”。说什么“如果没有越南对柬埔寨作出的重大贡献，柬埔寨民族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法国不但不支持柬埔寨的抗越爱国力量，不同国际社会一道对越南施加压力迫使其从柬埔寨撤军，反而一味讨好越南，发展对越关系，甚至提供财政援助。谢松辩解说：“不同越南对话怎

1983年4月28日答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台记者问。

1983年4月28日答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台记者问。

么能使它撤军。”他公然为越南开脱侵略罪责，影射攻击中国，遭到中国报刊的批驳。《人民日报》于3月30日发表题为《令人吃惊的论调》的短评，不点名地批评了谢松。顿时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气氛。谢松不得不于周末在巴黎郊区寓所紧急约见中国驻法大使进行弥补，声称记者报道失实，歪曲了他的本意。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多月后，1983年5月，密特朗以总统身分第三次访华。柬埔寨问题是中法双方国际问题会谈的中心。密特朗作了多次表态，冲淡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他在抵达北京当晚就公开表示，“法国对外国占领柬埔寨的谴责没有改变，不会承认外国在金边扶植的政权，今天不会承认，明天也不会承认。外国军队不全部撤出，柬埔寨问题就无法解决。”密特朗在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等领导人会谈中，强调中法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共同点。他说：“关于越南的扩张倾向，我们的分析相同；关于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我们意见一致；我们也认为，柬埔寨联合政府是抵抗力量的唯一代表。”“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金边政府；但我们没有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联合政府。”他表示，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行动？“对越南施加压力？那是理所当然。施加军事压力？法国不能这样做。我们既无此手段，亦无此意图。”他还表白，“我们并不鼓励越南。同越南保持外交关系不等于鼓励越南。”只要法国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法国同越南保持接触不是坏事”。

5月5日，密特朗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着重指出：“法国和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上有分歧。”两国的唯一分歧是：“中国承认民柬联合政府，而法国还没有承认。我们并不反对‘红色高棉’作为政治组织存在。我们只是担心他们重新使用他们曾使用过的方法来对待本国人民”。他还强调，承认不承认民柬联合政府并不是法中两国的本质分歧。

正如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梅尔马兹所说，密特朗总统中国之行是“活跃中法关系的新的转折点”。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法国把中国看作是它在亚洲的特殊伙伴”。一方面，法国从反对两极格局、推动多极化和保持世界多种力量均衡的战略出发，在政治上、战略上需借重中国；法国要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也需同中国协调。另一方面，法国急欲打入中国的巨大市场，谋求以良好的政治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关系。

80年代中期，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军工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高层政治往来频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先后正式访问法国。

1984年6月2日，我国总理为访问法国举行答谢招待会。按外交惯例，通常由东道国总理出席。密特朗总统打破常规，亲临中国驻法使馆出席招待会，以示对中法关系的重视。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与密特朗再次相逢。这位法国总统还像当年那样同我随便聊了起来。他还清楚记得，1961年1月第

一次访华时，冷得他够呛。从东北到深圳，一路上厚厚的皮大衣一直没有离身。当时宾馆设备比较简陋，南方没有暖气设备，严冬腊月室内室外差不多一样冷。

这以后，又有几次见到密特朗总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年团拜那一回。每逢新年，法国总统照例要在爱丽舍宫节日大厅会见各国驻巴黎使节。古色古香的巨大吊灯把金碧辉煌的节日大厅照得通明。使节们按到任次序排成马蹄形队形。密特朗总统先站在中央向使节们致意。副官把装着讲话稿的文件夹递给他。他漫不经心地拿在手上，并不打开。他不喜欢照本宣科，而习惯于在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的基础上临场发挥，显得潇洒自如。讲话完毕，总统挨个儿同使节一一握手致意。驻巴黎使节有几十个之多，总统一般只握握手就过去了。对重要国家使节，密特朗就说上几句。

那一次，我以临时代办身份出席。密特朗缓缓地走过来，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他笑吟吟地问了我个人的情况，说了一些对中国热情友好的话，并要我转达对我国领导人的问候。谈话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时间之长却超过其他重要使节，全场为之瞩目，还以为中法关系出现什么新动向。在紧接着举行的招待会上，不少使节主动上来同我攀谈，意在探听消息。其实，这只是密特朗对中国的一个友好姿态。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法国对华采取了“制裁”措施，两国关系进入中法建交以来最冷淡的时期。1990—1991年，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的高层互访和军事合作外，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逐步恢复正常。1990年12月21日，密特朗在接受我国新任驻法大使国书时表示，他一直重视发展法中关系，法中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长期以来，两国关系是好的。尽管出现一些问题，但从历史观点看，这算不了什么。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两国间加强对话是重要的。

1992年1月31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出席安理会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举行的午宴上，李鹏总理和密特朗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密特朗说，法中两国关系一向很好，只是在近两年来关系有些疏远了。其实，法中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不很多。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发展起来后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两国领导人认为，保持两国的高层来往，对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法关系刚刚恢复正常，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又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消极因素。

继法国向台湾出售6艘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后，法国达索等公司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于1992年8月与台湾签订了出售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装备空地中、短程导弹1000枚）合同。法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合同。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要求法国限期关闭驻广州总领事馆，搁置一些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中法关系再次进入一个困难时期。

1993年12月，法国总理特使访华，中法双方就解决法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关系所必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联合公报是对1964年1月中法建交公报的确认和发展，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如同密特朗所说：“前一段时间两国关系放慢了。现在我高兴地看到法中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我们要从现在这个起点出发，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第七章

左右翼“共治”

1986年是第五共和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的一年。3月国民议会改选结果，在全部577个议席中，社会党只获得216席，丧失了议会多数。传统右翼（主要是“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和“法国民主联盟”）获得291席，超过半数三票，取得议会多数。这就导致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相互对立的党派的政治派别的微妙局面。这是1958年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新问题。

左翼总统密特朗该怎么办？

由于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试验以失败告终和社会党政权治理经济无方，法国经济、社会形势日益恶化，左翼在大选中失利，右翼卷土重来，原是意料之中。早在大选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内部，不少人认为，一旦左翼丧失议会多数，总统应该以最体面的方式离开爱丽舍宫。总统最亲密的顾问阿塔利曾劝总统辞职：“右翼会把您的成就一笔勾销。您留在爱丽舍宫会使人们以为您同意对手的所作所为。您将失去灵魂，从而失去荣耀。”密特朗的挚友莫里斯·富尔给他出了个主意：“召开新议会，您提出辞职，并就总统任期缩短到五年一事举行公民投票。然后，您出场进行竞选活动。或者，你重新当选，你还是有机会当选的；或者，像当年戴高乐那样，在给法国留下一部新宪法的同时下台。”密特朗主意已定：左翼政权不能只是昙花一现，自己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旦议会选举失利，决不辞职。1985年10月密特朗访问巴西时，巴西利亚的一些知识分子会见总统时提及此事，密特朗明确表示：一旦历史的裁决不利于他，一旦这一天到来，谁也不能把他赶下台，他将自己决定自己如何行动。他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吧，由他们去吧！四座为之一惊。

议会选举结果揭晓，社会党败北，密特朗果然仍留在爱丽舍宫。在左翼总统与右翼议会对立的情况下，第五共和国体制能否延续下去？或者如何继续运行？这是第五共和国从未遇到过的尖锐而微妙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任命总理、组织政府。尽管宪法规定总统有权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选择总理，政府也无需经议会授权，但在右翼拥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总统如仍任命社会党人组阁，则无法取得议会合作，寸步难行，且随时有受弹劾而被推翻的危险。所以，总统只得从议会右翼多数派中选择总理。

在右翼多数派中任命谁当总理？密特朗曾考虑让戴派元老、前总理沙邦—戴尔马任总理，两人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曾在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和摩勒内阁共过事，关系不错。这样，“共治”可能会平和些。沙邦—戴尔马也乐意重作冯妇。不过，他发现希拉克不买他的帐，他不能凑够议会多数。密特朗对他说：“我不能冒险，挑选一个得不到国民议会授权的总理。”沙邦—戴

尔马也说：“我嘛，我也不能冒险，去领导一个上台一星期就下台的政府。”密特朗一度考虑请“法国民主联盟”领袖、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出山。在法国，卸任总统担任总理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而且尚有利用右翼内部矛盾之利。不过，“法国民主联盟”在右翼两大党内处于少数地位，吉斯卡尔·德斯坦也知难而退。

密特朗别无选择，只好召请“保卫共和联盟”领袖希拉克组织政府。他对助手们说：只得吞下苦果，让右翼最强硬的人组阁。他估计同希拉克“共治”，“弦会绷得很紧，但决不会断裂。”不过，密特朗这着棋还有其着眼于1988年总统选举的考虑：在“共治”过程中削弱这个右翼最强劲的对手，以利于蝉联总统。

希拉克意识到担任“共治”的总理有一定风险，曾私下建议让蓬皮杜时期的总统府秘书长、戴高乐派要员巴拉迪尔当总理，因为他不是党魁，密特朗更容易安排些。巴拉迪尔推辞道：“这个主意大谬不然，我不是当总理的材料。”他恳切地对希拉克说：“要么您取得成功，然后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要么您遭到失败，当不上总统。不过，在生活中，即使一无所有，那也不是永远一无所有。”希拉克指望在总理职位上做出成绩，以便为两年后竞选总统积累政治资本。

3月20日，希拉克组成右翼新政府。这样，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和政府“共治”的局面。

其实，左右翼“共治”这个解决办法并非密特朗的新发明。早在1983年9月16日，有影响的《世界报》在头版发表过一篇题为《两种诱惑》的文章，为“共治”未雨绸缪。此文出自爱德华·巴拉迪尔之手，并经希拉克审阅润色。文章问道：假如1986年议会选举结果右翼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将如何适应？结论是：左翼总统可以同右翼多数派“共治”，而无需修改宪法和触动第五共和国体制本身。“共治”的发明权属于右翼，密特朗不过是加以采纳，为己所用罢了。

左右翼“共治”是第五共和国特有的现象。法国历史上，实行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未曾有过。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英国亦未曾有过，也不会有。因为，在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下，当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同属一党（或党派集团）的通常情况下，总统集大权于一身，总理往往听命于总统，议会只是总统行使权力的工具。而一旦总统丧失议会多数，国家权力就部分地从总统转移到以议会多数派为后盾的总理和政府手中。这就导致“共治”。

尽管第五共和国体制本身潜伏着“共治”的可能性，但出现“共治”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力量对比。1958年—1981年23年间，总统一总理一议会多数均属右翼；1981年起，右翼的一统天下为左翼所取代，因而都不发生

左右翼“共治”问题。

剑拔弩张

左右翼“共治”的政治格局导致总统和总理的新的权力关系。如何重新划分两者的职权范围，改变以总统为中心的传统决策机制。这是“共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密特朗郑重声明：“我宁愿放弃职位而不愿放弃宪法所赋予我的权力。我决不会当一名降格以求的总统。”

“共治”双方都到宪法中寻找依据，以期使权力再分配对己有利。第五共和国宪法是按照戴高乐掌权的模式设计的。总统、总理的权力分野比较笼统、含混，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如宪法第五条规定：总统“监督对宪法的遵守。总统进行仲裁以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国家的持续性”。总统“负责保证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条约的遵守”。而宪法第20条规定：“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的政策”。总统和总理对宪法条文各取所需，以期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缩小对方的权力，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3月18日，密特朗召请希拉克组阁那天，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商谈的中心问题正是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配。密特朗开门见山，对希拉克说：“您赢了，您有个多数派，请您执政。”如何确定内阁成员？密特朗强调，外交和国防大权属总统，希拉克不能把这两个部长人选强加于他。希拉克承认总统在外交和防务方面的特权：“我们是戴高乐主义者，我们承认共和国总统在这些领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外交、国防部长人选应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希拉克提名吉斯卡尔·德斯坦或“法国民主联盟”头面人物让·勒卡尼埃出任外交部长。密特朗都认为不妥。吉斯卡尔·德斯坦身份太高，当外长有所不便；而“勒卡尼埃头脑里的外交政策观念与我完全不同”。作为折衷方案，密特朗提议由一位职业外交官担任。最后，双方同意由法国驻苏联大使让-贝尔纳·雷蒙任外交部长。此人曾在蓬皮杜总统手下当过外交顾问，但戴派色彩并不浓厚。密特朗不同意希拉克提名多数派内共和党领袖莱奥塔尔任国防部长，认为此人办事轻率，“在您我都没有觉察到战争的情况下，您的朋友莱奥塔尔说不定会宣战的”。结果，作为折衷方案，双方同意任命政治色彩不太浓的前工业部长、原子能委员会常务董事安德烈·吉罗为国防部长。

3月22日，“共治”内阁举行首次会议。40位内阁成员济济一堂，气氛却是冷冰冰的。密特朗面无表情步入会议厅，没有按惯例绕会议桌一周同部长们一一握手。密特朗在开场白中宣布：“从现在起，处理国家事务的责任就落在你们头上了；对某些问题，仍然由我负责。”希拉克表示：政府将遵循两项原则：尊重人民的意志，尊重宪法，特别是尊重总统的职权。会议结束时，总统也没有按惯例同内阁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密特朗对部长们说：“你们要想拍照，去照好了，我不去。”回到办公室，他对助手们说：“今天上午，我是单枪匹马，确实是单枪匹马。”他的印象是，他被一帮人包围着，其中60%的人是仇恨他的，80%的人是反对他的。

5月初，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美、英、法、日、西德、意大利、加拿大）首脑经济会议将在东京召开，这就给“共治”双方出了一道难题。按1975年第一次会议以来的惯例，每个国家均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由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陪同。以往，法国一直由总统率领代表团出席，总理不参加，这是第五共和国由国家元首直接控制外交政策的做法造成的。这回该如何处理呢？

希拉克认为，总统不拥有议会多数，不能完全代表法国。现任总理则是法国多数派的产物和代表，理应“决定并执行国家的政策”，在外交上应当同共和国总统平起平坐。何况七国首脑经济会议是一个以经济和贸易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会议，与政府的财政、经济事务关系密切，理应改由总理代替总统出席。密特朗则认为，外交大权一向属于总统的“保留领域”，总理则“执行由共和国总统沿袭或酌情指引的外交政策”。早在1985年7月10日，密特朗在驻总统府记者协会上发表讲话，谈及可能出现“共治”的前景时说过，他将保留外交大权。他坚决表示：行使外交大权是总统职务的最崇高的标志，是他居于政治体制中心的表现；他将寸步不让。“在议会多数派改变后，如果有人篡夺外交大权，那就是一场政变。”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先事关外交，且是西方最高级会议，当然仍应由总统代表法国与会。

希拉克退而求其次，要求与总统一起与会。密特朗表示，总理陪同出席无妨。“各有各的作用，可以相辅相成。但归根结底，法国对外部世界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希拉克与会，也给东道国日本出了礼宾安排的难题：按什么级别来接待法国总理？同七位首脑平起平坐？太高了；同部长们一般待遇？又太低了。经法、日双方煞费苦心的安排，希拉克以国内工作无法脱身为由，特意等到5月5日会议开幕当天下午抵达东京，避开了前一天晚上七国代表团团长的晚宴和5日上午七位首脑的小型会议，只参加全体会议。在会上，法国的同一个声音由两张不同的嘴巴表达出来。法国的“双头政治”首次在国际会议上体现出来。七国首脑会议闭幕后，各国首脑照例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拉克坚持要参加，密特朗不同意：“该由我解释法国的立场。就这么办，不能另搞一套。”可是，希拉克不愿让密特朗独自代表法国，非要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问题又来了：总理往哪里搁？他既不能在讲台上同密特朗平起平坐，也不能同代表团成员混坐在一起。结果，在讲台下面，给他单独摆了一把椅子。密特朗在台上以法国的名义讲话，希拉克在台下一声不吭，还是总统占了上风。

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创造了一个“双头政治”的模式。随后举行的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法非首脑会议等，无不如法炮制。

外交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双头政治”，但并非平分秋色。尽管外交决

策权不再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重大外交决策和外交行动需由总统和总理磋商协调，但外交大政方针仍由总统掌握。密特朗说：“对决定我国命运的决定负有最后责任的是国家元首。”密特朗的挚友、多次出任外长的名律师迪马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应属于共和国总统”。当然，在“共治”局面下，所谓最后决定权属于总统也是有条件的，即总理没有重大的反对意见。

双头控制的“共治”外交碰到的第一个严重考验，是1986年4月15日凌晨，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名，轰炸利比亚事件。11日，美国驻法大使求见总统特别参谋长，希望知道美国驻扎在英国的轰炸机能否飞越法国领空袭击利比亚。因为这样能缩短航程五小时，并显示盟国的合作。密特朗与希拉克通话，一致主张予以拒绝。次日，总统府给予美国大使否定的答复。当日晚，里根致电密特朗要求法国改变决定。密特朗通知正在象牙海岸访问的希拉克：13日晨回巴黎后即会商此事。结果，两人仍主张拒绝美机飞越领空，由密特朗答复里根。当天，里根总统特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求见希拉克，总理根据会商精神拒绝了美方要求，并强调戴高乐主义的独立原则。14日，密特朗接见美国特使，答复相同。总统还指出，利比亚不在北的地域范围之内，像法国这样的盟国无需参与这类行动。法国拒绝美国飞机过境事，顿时成了头条新闻。总统和总理尽管意见一致，却争着表明自己在作出此项决定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捞取政治资本。4月23日，希拉克在电视讲话中宣称，“对我作出的决定，总统确实反应相同。”密特朗指示总统府秘书长向总理府表示，总理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密特朗并授权总统府秘书长将有关情况透露给《世界报》记者，以撰文说明希拉克的说法是错误的。事过境迁，希拉克的外交顾问弗朗索瓦·比戎·德莱斯唐承认：“希拉克说‘我作出的决定’，有些夸大其词。他本该如实他说，我们作出的决定’，但是，他当时想自封为决策人。”

总统和总理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一，也偶有发生。最突出的事例是在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问题上。美国谋求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苏联导弹打到美国本土以前予以拦截和摧毁，形成一个保护美国的战略防御盾牌。美国企图依仗其经济和技术优势，在太空武器竞赛中占据上风，从而在战略上以反弹道导弹防御为“盾”，以核进攻武器为“剑”，做到攻守兼备，取得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是美国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和军事优势的重要步骤，也是美国谋求重新确立其在西方世界的军事、经济霸权和加强对盟国的控制的重要手段。

密特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法国的结论是：“‘星球大战’计划将损害而不是加强法国和欧洲的安全”。美国还以分享科技成果为诱饵，邀请

盟国参与研究，以便利用西欧某些工业、科技特长和人才为加速研制服务，进而将西欧纳入美国战略轨道。密特朗也拒绝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参加。

希拉克的想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密特朗的态度“过于消极”。他上任不久，找密特朗商谈“星球大战”计划问题，企图施加影响。他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计划，他全力支持，法国也以赞同为好。密特朗回答得很干脆：“总理先生，您是在向我提出辞职吗？”希拉克就不作声了。1986年7月，密特朗访问苏联期间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特意对此予以澄清。“在法国，有些人赞成星球大战计划，但是，根据宪法，最后决定权属于我。因此，我的立场就是法国的立场。”

虽然外交政策上的最后一句话属于总统，希拉克总理在参与外交决策和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拥有比历届总理大得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外交大权。总理通过他所掌握的政府机构，尤其在地区政策和国别政策的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摒弃社会党色彩。总理还掌握外交人事大权，强行撤换亲社会党的驻外使节多人，大幅度调整外交部高级文官，以右翼或接近右翼的人士取而代之。

总的看来，在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上，总统、总理基本上协调一致。关于出席首脑会议的礼宾安排之类的争吵或竞相出风头，捞资本，不过是无碍大局的插曲而已。“共治”双方以大局为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外以一个声音说话。经常周旋于两人之间的外交部长雷蒙说过：“在重大问题上还不曾有过困难。”这是因为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对外政策的大政方针方面存在共识，在“共治”局面下，对外政策仍保持连续性。正如希拉克总理所说，“在法国，在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因此，政府和总统之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不过，总统与总理争夺外交大权和互相牵制，还是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削弱了法国对外行动能力，妨碍在外交上采取重大的主动行动和创新的尝试。

防务一直是总统亲自掌管的领域。国防大权属总统，这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统帅，并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特别是，惟有总统有权决定动用核力量。“核威慑，就是我。”密特朗这句名言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总统国防大权在握的形象。

不过，宪法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宪法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政府掌管武装部队；总理对国防负责。希拉克理直气壮地宣称：“总理乃是国防的负责人。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我要在国防方面充分起到我应有的作用。”密特朗和希拉克政府在防务问题上的摩擦时有发生，既有权力之争，也有具体政策举措之别。不过，双方争执的结果，往往还是总统说了算。

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在防务方面存在“共识”，对保持法国核力量的有效性方面是一致的，但在主要发展何种战略核武器的问题上，总统和右翼政府

意见不一。80年代中期，法国战略核力量由六艘导弹核潜艇（每艘配置16枚M20式单弹头潜射导弹，射程3000公里）、18枚陆基中程导弹（配备百万吨级S3式导弹，射程3500公里）和携带AN22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组成。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法国战略核力量？

密特朗主张“绝对优先发展海洋核力量”！着重发展机动性强，且不易为敌方发现的导弹核潜艇。计划在80年代下半期改造四艘核潜艇，改为配置M4式多弹头潜射导弹（射程4000公里，每枚可携带6个弹头），并拟开始研制更先进的M5式潜射导弹（射程6000公里，每枚可携带10—12个弹头）。

希拉克和国防部长吉罗废止社会党政府制定的1984—1988年军事纲领法，代之以新的1987—1991年军事纲领法，其中规定发展S4式陆基机动导弹，分散部署在本土各地，使敌方难以摧毁，甚至主张取消改装核潜艇计划，将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S4导弹。

密特朗反对部署陆基机动导弹，因为这会使整个国土都可能遭受对方的核打击，而且“这将使法国人民的思想产生混乱，造成核弹在全国各地不停移动的印象”，甚至使法国人以为核弹就在自己家门口。他主张把突防能力更强的S4式导弹仍集中部署在阿尔比昂高原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内。密特朗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宣告：在战略核武器现代化问题上，“我要行使我的职务所赋予的权威”。他扬言，如果政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不惜与政府发生公开冲突，诉诸公众舆论。

总统与总理多次公开交锋后，于1986年10月15日进行面对面的摊牌。希拉克不好在防务问题上挑起政治危机，最后表示同意总统的意见。可是国防部长吉罗仍强调固定发射井易被敌方准确的核打击所摧毁，不愿放弃机动导弹计划。密特朗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拍了板：“在我的任期内，我不会同意在法国全境部署机动导弹。”希拉克出来圆了场：“那就让下任总统去采取另一种战略抉择吧！”这场较量终于以总统的胜利告终。密特朗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当我看到总理像他的前任一样，竭力推行我认为合适的政策，我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如果说，在外交和防务方面，“共治”相对风平浪静，那么，在对内政策上，却是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外交方面，希拉克分了总统一部分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双头政治”；内政方面，基本上是希拉克大权独揽，密特朗被撇在一边。密特朗上台标榜的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希拉克则大行“自由主义”。双方围绕新政府的各项反改革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有时甚至紧张到几乎要破裂的地步。

密特朗执政初期，进行了以国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希拉克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推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反改革措施。希拉克提出五年内对65家国有化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私有化，其中包括1945

年收归国有的兴业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总资产约 2500 亿到 3000 亿法郎。不仅使密特朗的国有化成就基本上化为乌有，而且部分勾销战后初期的国有化成果。国有化和私有化之争，成为“共治”局面下国内经济、社会政策矛盾的焦点，也是总统和总理较量的中心。

为了避免在议会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以加速推行私有化，希拉克促使右翼议会多数授权政府以政令形式实行私有化。密特朗私下一再表示，他将拒绝签署私有化政令。希拉克对密特朗的警告置若罔闻，企图依仗议会授权和内阁决定压总统就范。

密特朗利用 7 月 14 日国庆节向电视记者发表谈话的机会，将与总理的分歧公诸于众。他公开宣布，他决不会签署私有化政令，“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良心问题。我的职责是确保国家的独立和利益”。而私有化的结果将使一些企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他强调，应该由议会通过私有化法律，即使是“一项不合我意的法律，我会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法律”。密特朗此举意在表明，他仍然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权威性，并借此与政府的行动划清界限，不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

这是“共治”以来总统和总理第一次公开较量。希拉克是同总统对抗到底，还是被迫退却？右翼多数派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敦请希拉克辞职，不惜挑起政治危机，以期提前举行总统选举。7 月 14 日晚，希拉克打电话给密特朗，气势汹汹地表示：“我不能再作更多的让步。多数派已忍无可忍。”密特朗笑着说：“您对所有人都作了让步，惟独对我寸步不让。”希拉克问道：“那么，您想结束共治？”

密特朗说道：“我并不希望结束共治，”不过，“我早就同您说过，我不会签署将 1945 年的国有化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政令。我决不让步。”

希拉克威胁说：“有人敦促我辞职，以便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密特朗反击道：“请便吧，总理先生。可是，总统选举决不会提前。我可以解散议会。况且，我无意辞职。”最后，密特朗要希拉克三思而行。

密特朗对希拉克以辞职相威胁满不在乎。当时在场的总统府的顾问们看出总统很轻松自在。密特朗对他们说：“且看希拉克如何动作。此人一日三变，最终他会让步的。”“希拉克不敢冒议会改选的风险，因为比例代表制仍然有效。再说，他也不想重蹈 1976 年辞去吉斯卡尔·德斯坦手下的总理职务的覆辙。”

不出密特朗所料，希拉克果然悄然退却。他对手下人说：“我以辞职威胁密特朗，可他毫不在乎。大出我意外。”“我不想再有麻烦，不想同密特朗对阵。我们别坚持了。”于是，他将私有化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总统与总理的第一次公开较量以希拉克败退告终。密特朗以充分的法律依据，拒签政令，显示他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密特朗赢了一个回合，民望上升。

几经折腾，私有化法案终于经议会通过。最后，密特朗不得不尊重议会决定，违背自己的意愿，签署了这项法案。不过，这样反复的结果，希拉克政府花费了 106 天才得以将私有化法案付诸实施。

三年后，希拉克对这次较量进行了反思：“我没料到他会拒签。

我感到意外。我意识到，选择发布政令这一程序，我就犯了一个错误。这只能怪我自己。因此，与那些建议我大闹一场的意见相反，我不打算迎着冲突上。……我早就决定，只有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意见分歧，或者对抗，才能说明发生危机是有理由的。”密特朗则满意地回顾道：“希拉克还满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有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

另一次重大较量是围绕选举法改革展开的。戴高乐曾一针见血地道破选举法改革的奥妙：“任何政党都是仅仅从其本身的利益来看待选举法的修改的。”希拉克政府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废除社会党政府制定的、对左翼有利的“省级一轮比例代表制”恢复戴高乐制定的、对右翼政党有利的“小选区两轮多数制”，以期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能取得稳定的右翼多数，以取代目前的微弱多数。而且，这样一来，如果密特朗要解散议会，只会选出一个右翼占更大优势的议会。希拉克上台才两个月，便着手修改选举法，使总统手中解散议会这一武器失灵，不敢贸然行使解散议会的权力，从而大大加强右翼政府和议会同总统抗衡的地位。

希拉克试图在获得议会授权修改选举法后，以内阁会议通过的政令形式迅速予以实现。早在 4 月 9 日内阁会议上，密特朗就表了态：对于修改选举法的政令，“我打算好好行使我签字或不签字的自由权利。”希拉克仍按预定计划于 5 月 22 日以“政府承担责任”方式，让议会不经实质性辩论即通过授权修改选举法。社会党对政府提出弹劾，因票数不足，被否决。9 月，希拉克将选举法改革和重新划分选区这两项政令呈总统签署。当时正值巴黎恐怖主义活动高潮的“黑九月”，不到半个月，发生六起爆炸案，造成六人死亡，161 人受伤。巴黎到处都弥漫着浓重的恐怖气氛。密特朗表示，他不愿在法国人处于恐怖活动威胁下的时刻展开论战，他将“从容不迫地考虑是否签署”。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予以拖延。10 月 2 日，总统府宣布“应当坚持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方式由国民议会自己作出决定的共和传统”，拒签有关政令。这回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希拉克把政令改为法律草案，交由议会通过。密特朗最后还是签署了议会通过的法案。新选举法于 11 月 24 日颁布

皮埃尔·法维埃和米歇尔·马丹—朗朗：《密特朗掌权十年》第二卷（1984—1988），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55 年版，第 502 页。

以省为单位，根据各政党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议席。

全国划分为与议席总数相等的小选区。每一选区产生一名议员。第一轮，候选人需获绝对多数才能当选；第二轮，参加竞选的政党可结成联盟，获得相对多数者即可当选。右翼政党可在第二轮中结成反对法共或社会党候选人的联盟，夺取议席。右翼往往能获得大大超过得票比例的议席。

生效。

这两场较量充分表明，在对内政策方面，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属于总理。依仗议会多数派组成的右翼政府，得以同左翼总统分庭抗礼，并利用议会立法权推行总统所不同意的重大政策措施。总统几乎无可奈何。他至多只能略微推迟私有化的时间表，而无法阻止他所绝不同意的私有化的实施。他只能在程序问题上给修改选举法制造一些麻烦，但无法阻止总理废除社会党制定的选举法。

“共治”双方尽管不时剑拔弩张，多次进行激烈较量，有时甚至濒临破裂的边缘，但“共治”竟延续两年有余。《世界报》社长安德烈·方丹对“共治”作了很好的概括：左右翼“共治”，“犹如东西方之间的共处，即：不制造无法挽回的事件的一种共同决心；使危机与缓和交替发生的共识；无法达成持久协议的一种共同信念。”

“共治”之所以斗而不破，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力量对比所致。当时，社会党虽已丧失议会多数，但仍是议会第一大党；密特朗权力削弱，但其政治声望仍高居任何右翼领袖人物之上。右翼虽成为执政多数派，但仅有超过半数三票的微弱多数；希拉克羽毛未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尚待完善。左右翼各有短长，力量尚无重大失衡，双方尚不具备决战的条件。何况，法国多数选民希望维持“共治”局面，以期使左右翼相互制约，促使双方采取对选民较为有利的政策举措，总统和总理谁也不愿冒破裂“共治”的风险。密特朗以屈求伸，塑造顾全大局、以全民族利益为重的形象，以利争取民心。希拉克则需要争取时间，做出成绩，并在右翼内部树立当然领袖的地位。因此，双方都着眼于利用“共治”积累力量，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以期在1988年总统选举中一决雌雄。

密特朗和希拉克虽在法国政坛互为主要对手，但过去极少谋面，更谈不上共事。经过两年“共治”，双方都摸透了对方的短长。听听各自对对手的感受和看法是饶有兴味的。密特朗对法国《费加罗报》主编、《总统》一书作者这样描绘希拉克：“希拉克是个精力充沛、坚韧不拔、聪明伶俐、干劲十足的人。他是个好总理。他对国家深有了解。他懂得如何领导。但是，他缺乏主心骨，也许没有真正的个性。您瞧，他最终总是听信他手下走极端的人。”

不过，密特朗私下对助手们说起希拉克时，语冒要尖刻得多。他看不起希拉克，觉得此人很浅薄。“此人是一位骑士。他紧贴着大地前进，贴着高低不平的地面前进，看不到500米以外的地方。”“希拉克跑得很快，但不清楚他要去哪儿。”“希拉克一边上楼梯，一边考虑问题，一边跟人握手，一边讲话。他应该好好坐下来。”

希拉克同《费加罗报》主编、《总统》作者也谈起对密特朗的印象：“我

一直觉得密特朗似乎认为我挺不错。他往往以开玩笑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不时爱说：‘很可惜，您不是社会党人。’或者说：‘除了您，没有人能接我的班。’他马上笑着加上一句：‘当然，现在还不着急。下一回恐怕也还轮不到您。’”对密特朗这种好言好语，希拉克并未信以为真。“我不会上当。我念念不忘蓬皮杜总统一再对我说过的话：‘别信密特朗那一套。不论他对您说什么，您千万别信以为真。’……蓬皮杜总统对密特朗的评价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每当我同密特朗面对面谈话时，我总是拿定主意：别信他那一套。”

1987年12月10日，法国有影响的《世界报》的一篇文章透露，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总统与总理关系很糟糕。密特朗私下用“V”字开头的四个形容词评价希拉克：流气、粗俗、爱吹牛、摇摆不定。总统在同总理每周例行会晤时，主动解释说：“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希拉克半真半假他说了一句：“真太不像话！”密特朗接口说：“您知道，记者们总是随心所欲地乱写一气。”希拉克并不轻信：“不过，这篇文章似乎很有来头。这位记者从您身边的人那儿听到很多关于我的坏话。”密特朗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不会给您画像。我们老是沦为我们身边人的牺牲品。”不久，希拉克的亲信通过以揭露法国政界内情著称的“鸭鸣报”，同样以“V”字开头的三个形容词回敬密特朗：老朽、顽固不化、胡言乱语。不论记者的报道是真是假，这类趣闻也多少反映“共治”双方勾心斗角、寸步不让的情景。

两年“共治”，密特朗的得失如何？从社会党一统天下演变为左右翼“共治”，这自然是左翼总统处境窘迫的两年。但是，密特朗是一个善于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善于化不利为有利的人。两年“共治”，竟然是得大于失。

早在1985年秋天，总统就对右翼要员、大老板昂布鲁瓦兹·鲁谈起过“共治”的前景：“对法国人来说，共治将是在民主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对于我的历史形象，这也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还进一步解释，他何以如此乐观的原因：“如果像预期那样，右翼获胜，那我就将成为仲裁人，而仲裁人总是得人心的。法国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靠的堡垒。面对政府，我就成为保证民族利益和宪法得到尊重的人。难道还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吗？”在两年共处过程中，密特朗确实成功地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一种新的思想出现了：由于我，今天法国人觉得有了仲裁人。对那些属于我的职权范围的重大领域，我应当显示我的权威；对另一些次要的领域，我就应当行使仲裁权。”“凡是政府的决定可能危害法国的利益，或者可能有失公允，或排斥一部分法国人，那我有责任进行干预。”难怪前文化部长雅克·兰在电视谈话中公开称密特朗为“国父”。

事实上，通过“共治”，密特朗将社会党的选举失败转化为总统个人的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总统》，第285—286页。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总统》，第262页。

胜利。当总统因丧失议会多数而实权最小时，总统的权威性却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在履行宪法和掌握外交、防务政策方面。密特朗一方面巧妙地运用总统权力与右翼政府周旋；另一方面，采取“超党派”高姿态，塑造以大局为重的“全民总统”的形象，名望持续上升，从而，为下一阶段决定性的战斗——总统选举，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挽回颓势

“共治”毕竟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实质上是1988年5月总统选举的前奏。“共治”的两位主角将在总统选举中进行决定性的较量。不过，其中有个不确定因素：密特朗是否再度竞选？密特朗当时年纪已过71岁，比之年富力强的希拉克（57岁），年龄是个不利因素。何况，密特朗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忧：他身患癌症已经六年有余（参见本书第九章《国家机密》），再连任七年，身体顶得住吗？像他私下所说，会不会死在爱丽舍宫？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斯泰格教授也曾向总统进言：能活这么久就很了不起了，不要再竞选总统了。

密特朗早就放出空气，表示无意竞选蝉联。早在1986年5月16日，密特朗对亲近的人表示：“总有一天得习惯于过没有我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该当第二任总统……14年，太长了。”1986年10月30日，密特朗向新闻界宣布，他无意再度竞选总统。“所有人都要我表态。不，我不再当候选人了。因为我是共和国总统，我需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不想培育赖着不走的野心。”不过，他留了一个尾巴：“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证明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不想做这样的假设。”1987年3月29日，密特朗在电视谈话中重申，“我无意再度竞选。”1987年12月15日，密特朗对总统特别顾问阿塔利说：“我不想参加竞选。不过，没有一个社会党人能获胜。”他对右翼要员昂布鲁瓦兹·鲁表示：“竞选蝉联？您倒想想看，这不是发疯吗？不折不扣的异想天开！”然而，这些究竟是由衷之言，还是故布疑阵、迷惑对方？

希拉克时刻注视着密特朗的动静。许多人，特别是密特朗的一些朋友告诉他，密特朗迟疑不决。但他并不轻信。“我凭直觉观察，一直坚信他将再度竞选。”还是希拉克最了解他的对手。

果然，密特朗是故布疑阵、让人捉摸不透。他说：“捉摸不定，不是我发明的。捉摸不定寓于形势之中。”他的一位朋友挖苦说：“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向自己吐露秘密。他的左手是否知道右手要干什么。”随着选举日期逐渐临近，密特朗的口气变了。他对那位右翼要员鲁说：“您可记得几个星期前，我跟您说起发疯的事？好啦！我就要干这发疯的事啦！”对方将信将疑，“真的？”“是真的。要是我离开这儿（指爱丽舍宫），那就死期不远了。我想尽量推迟死亡的来临。”密特朗对社会党领导成员克洛德·埃斯蒂埃表示：“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促使我竞选，那就是雅克·希拉克的所作所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本不愿在七年任满后再任一任，但对右翼有利的形势迫使我改变初衷。”1987年7月11日，密特朗在拉什乡间寓所召集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等少数亲信开会，要他们按他将参加竞选的假设进行工作。他说：“如果说，谁可能取胜，那就是我。这就是我参加竞选的根本原因。要是我认为另外一个人，包括罗卡尔，能够取代我赢得选举并保持

政策的连续性，我就不竞选了。”

这些还不是密特朗谋求连任的全部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迷恋权力。一旦大权在握，岂肯拱手让人。再说，19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如果不是由他亲自来主持这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国际象征意义的重大庆典，岂非一大憾事。

1987年11月，密特朗召集未来竞选班子成员布置任务。他明确表示：“现在还不到公开宣布的时候。不过，我可以对你们说，我将成为候选人。务必请诸位保密。”在正式宣布竞选之前，密特朗还得解决他的党内老对手罗卡尔的问题。

罗卡尔早就到处放风，这回他非竞选不可，并且悄悄地开始了竞选活动。早在1986年10月，他就对总统特别顾问阿塔利表示：“无论如何，我要当总统候选人。即使密特朗参加竞选也罢。”“我当候选人同密特朗并不矛盾。”阿塔利传话给总统。密特朗说：“他爱怎么于就怎么干。”

1987年10月16日，罗卡尔又对阿塔利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竞选。很显然，我不可能当选。在第二轮，我可以把选票转让给密特朗。”这实际上是给密特朗的一个信息。阿培利果然又传话给总统。密特朗听后耸耸肩说道：“罗卡尔进行竞选活动已有两年了。这回他总不能说妨碍了他。但是，要是我不竞选，他将被击败。这是明摆着的。真可惜。”

这回，密特朗不是“硬”处理，而是“软”处理。用拉拢的办法促使罗卡尔就范。1987年12月4日，密特朗请罗卡尔到爱丽舍宫共进午餐。这可是个不寻常的举动。总统开门见山：“我主意已定。我将全力以赴。”他解释之所以再度竞选的原因是：对希拉克和他那一伙的刻骨仇恨。“我要他们滚蛋！我要亲自把他们打垮。”这将置罗卡尔于何地呢？密特朗话锋一转，用颇为神秘的口气对他说：“您应当作好准备。在我获胜之后，有不少人可以起重要作用，让我直说吧，在我心目中，您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属意于您。”信息是最明确不过的了。密特朗要同罗卡尔作一笔政治交易：许诺罗卡尔出任总理，换取罗卡尔放弃当总统候选人。罗卡尔心领神会，多少怨恨顿时置之脑后了。多年的党内对手终于携起手来了。

事后，罗卡尔故意向总统特别顾问表示：“1981年（总统选举时），我同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不和的；今天，我感觉到同他同舟共济。如果让我当总理，我会接受的。如有可能，最好是总理兼教育部长。如果只让我当教育部长，我是决不会干的。”从此，罗卡尔为密特朗竞选奔走效力。密特朗称赞他在竞选运动中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还有一件事使密特朗放心不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1987年12月23日，对吉布提的正式访问结束后，总统一行去埃及度假。密特朗坚持要去西奈攀登莫伊兹山，手下人不想去，医生也持保留态度。他还是说服大家去爬山。总统和随行人员冒着凛冽

的寒风，爬了 3000 级台阶和一条陡峭的小径，终于登上了“圣峰”。密特朗在山顶眺望山下一望无际的沙漠，沉思良久。下山时，他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手下人看出了总统内心的秘密：他考验了自己的体力。他挺住了。他决心再度竞选总统。事后，他对手下人吐露：登山三小时，他觉得健康状况完全可以胜任第二个七年任期。

一切安排妥当。密特朗于 1988 年 3 月 22 日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再度角逐总统职位。这本是一项意向声明，却充满了火药味。“共治”两年来憋在心底的怨气一齐冲口而出：“我希望法国团结。如果法国落在那些不能容忍别人的人、那些企图攫取一切的党和那些对我国实行统治的小集团和帮派手里，那么，社会将会四分五裂，根本无社会团结可言了。”

次日，内阁会议前，总统和总理进行例行会谈。两人进行了激烈交锋。希拉克气鼓鼓地指责总统：“您昨晚说的话是辱骂我。”密特朗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两年来，您的所作所为有时也是侮辱了我。”希拉克以抗议的口吻说：“您把我说成是小集团的头头，我决不能接受。”密特朗寸步不让：“您想方设法同我过不去，我也不能接受。”

这次总统选举，共有九名候选人。主要是密特朗、希拉克和巴尔（前总理、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之争。

这一回，密特朗不能像 1981 年那样，高唱社会主义了。他也拿不出什么实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来夸耀。靠什么来竞选呢？将近两年的“共治”，倒帮了密特朗的忙，有助于他重振声望。特别是得以超越左右翼界线，树立“超党派”的“全民总统”的形象，以全体法国人的“团结者”的姿态参加竞选。他竭力淡化社会党色彩，收起了“与资本主义决裂”、“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宣称决不会回到“1981 年模式的社会主义”，强调“全国团结”和“政治开放”，以争取中间派以至一部分右翼选民的支持。

密特朗别出心裁，以“致全体法国人民书”代替竞选纲领和宣言。他闭门谢客，精心撰写长达 59 页（打字页）的信，详尽地阐明了他内外政策主张和种种许诺；宣布既不再搞国有化，也不再推行私有化；强调经济投资优先，教育投资优先，欧洲投资优先和社会投资优先，以振兴法国经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

舆论界对此信的评价不高。同总统过从甚密的记者阿兰·杜阿梅尔称之为“褪了色的玫瑰”。密特朗大不以为然。在爱丽舍宫记者早餐会上，密特朗对他说：“过去我为社会党纲领作序时，人人都叫嚷起来，说我是不负责任的革命者。现在我淡化我的色彩，您又指责我背叛。这不符合逻辑。”他进一步解释说：“说我变了，这不对。我的信念依然如故。但是我体会到，现实比政治意志强。瞧，1982 年我们把信贷机构国有化了，结果，对我们又有何用？我们并未因此增加一丝一毫的权力。”不论怎么说，1988 年的

密特朗不再是 1981 年时雄心勃勃、“社会主义”色彩很浓的密特朗了。

1988 年 4 月 7 日，200 万份《致全体法国人民书》问世。两家巴黎报纸和 23 家地方日报在广告版上予以刊登。与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密特朗时代”的招贴画相互呼应，形成巨大的宣传声势。

希拉克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国”，要把法国建成“欧洲头号经济强国”。为此，他主张增强企业的活力，继续实行私有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加强教育和培训，振兴法国经济。他许诺提高家庭补贴，减少失业。

巴尔提出《振兴法兰西方案》，要把法国建成“高工资、高就业和货币坚挺的国家”。主要举措也是减少税收，扩大就业，改革教育制度，救济“新穷人”。

三位主要候选人在外文和国防的大政方针方面是一致的。社会经济政策也没有重大区别。在法国经济低增长、高失业局面持续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三家的纲领不过是同一曲调的变奏，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高招。

由此可见，这次总统选举与 1981 年有很大不同。当时是一次对左、右翼纲领、政策的抉择，也是要不要变革法国社会的抉择。这次总统选举的最重要的特点则是：左右翼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意识形态分野淡化。主要不是纲领、政策的抉择，而是对人的选择。候选人个人的素质、形象、政治影响是决定性因素。

密特朗、希拉克、巴尔三角争斗，形式上自然是两位右翼候选人同密特朗对垒，前者处于 1:2 的不利地位。但实际政治生活要复杂得多。希、巴口头上高唱团结，骨子里你死我活。第一轮投票，希、巴之争超过与密特朗之争。因为密特朗第一轮可独得 1/3 以上的选票，遥遥领先。希、巴则比分咬得很紧，首先要力争第一轮出线。因为只有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方能进入第二轮决胜。希、巴决不是和谐的二重唱，而是地地道道的“兄弟阋墙”。3 月 26 日，希、巴会晤。巴尔在会谈结束后对记者说：会晤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希拉克对巴尔说：“您已经落在后面了。如您行事得体，我们还能赢。但是，如果您还是既攻我又攻密特朗，那我们就输定了。”巴尔回敬道：“您对我也无所不用其极。”希拉克满不在乎他说：“这是搞政治嘛！”巴尔气愤他说：“您有的是钱，好多钱。您有权，大权在握。我们有自己的荣誉。我可不能当牺牲品。”

密特朗则坐山观虎斗，并利用希、巴矛盾，使之相互削弱。这样，无论两人之中谁出线，都将处于得票起点低的不利地位。总统府秘书长将希拉克派诋毁巴尔的材料交给巴尔的顾问。巴尔对密特朗表示“深切感谢”，并表示“同总统有某些共同点”。密特朗、巴尔联手对付希拉克的用心昭然若揭。

希拉克早在 1988 年 1 月中旬就宣布竞选。巴尔于 2 月 8 日参加竞选，起步较晚。他以寓言“龟兔赛跑”中的乌龟自喻，以示沉着稳重、锲而不舍，后来居上。两人各有特点，互有短长。希拉克手里有两张王牌。一是有组织严密、能量甚大的戴高乐党的全力支持。二是有两年政绩作为政治资本，有总理职权可资利用。政绩虽谈不上辉煌，但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改善社会治安方面有所建树。对缓解经济困难也取得一定成果。执政两年还加强了希拉克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希拉克的主要弱点是：不够稳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给人以“将才”而非“帅才”的印象。笔者当时正在巴黎，追踪研究总统选举。各方人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希拉克是个出色的市长（巴黎市长），是个称职的总理，但未必是个杰出的总统。巴尔形象颇佳，老成持重，讲话得体。他作为有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困难之际，也不失为一张好牌。颇得金融界、知识界和中、小企业和中间阶层选民的支持。但是支持他的法国民主联盟，组织松散，群众基础较差。而竞选总统没有政党的有力支持，这是个致命的弱点。

4 月 24 日第一轮投票结果，密特朗得票 34.09%，希拉克 19.94%，巴尔 16.54%。希拉克得票同 1981 年相仿。他叹了口气说：完了。希拉克夫人也很泄气：“应该把话挑明，很大一部分法国人不喜欢我丈夫。”密特朗对顾问们说：“右翼将因分裂而完蛋”。“正常情况下，我会获胜。”他讥笑希拉克费了那么大力气，花了那么多钱，成果却如此之小，“够他心痛的了。”不过，希拉克还要拼命作最后的冲刺。首先，他期待在面对面的电视辩论中出现奇迹，取得突破性进展。密特朗采取低姿态。他私下说：“我辩论不过希拉克。希拉克对这类事情兴趣极浓。然而，话又说回来，七年才有一次，还是应该试一试。这是法国人期待观看的一场马戏表演，即使对选票不起作用也要试——试。”

4 月 28 日晚，3000 万法国人在电视机前收视了两位对手长达两小时十分钟的辩论。笔者也早候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密特朗沉着、冷静，一副总统气派。口口声声称呼希拉克为“总理先生”，使希拉克处处显得矮他一截。希拉克火了：“我得向您说清楚，今晚，我不是总理，您也不是总统。我们是两个地位平等的候选人。让法国作出判断。因此，请允许我称呼您为密特朗先生。”密特朗风趣地回答说：“是啊，您说的有道理，总理先生！”

密特朗的战术应用非常成功。不管辩论什么问题，密特朗和希拉克总不在一个档次上。法国选民觉得密特朗比希拉克强，事后，总统的一位顾问对他说：“今晚您没有赢，但您不会输。希拉克怎么也没法使自己从‘总理’跳到‘总统’。”第二天民意测验结果表明，42%的法国人认为密特朗是电视辩论的优胜者；33%的人认为是希拉克占上风。

希拉克输了这个回合，还不死心。他利用政府职权，在竞选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戏剧性行动。5 月 5 日，在第二轮投票前两天，被恐

怖主义组织关押在黎巴嫩达三年之久的最后三名法国人质回到巴黎。希拉克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主持了欢迎仪式。法国选民从电视上看到三名人质同家人团聚的动人场面，十分激动。这会不会影响他们手中选票的去向？笔者同各方人士接触中听到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人质问题是个牵动千百万法国人心的敏感问题，希拉克这一手也许使选举形势发生意外变化，密特朗获胜可能没有多大把握了，至少两人的比数差距将会缩小。另一种意见是：法国选民不是傻瓜，希拉克这一手太露骨，未必能捞到多少选票，对选举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一位接近总统府的记者勒诺给总统特别顾问阿塔利打电话，问道：“希拉克玩这么一手，会不会使他当选？真糟糕！”密特朗正好同阿塔利在一起，他大不以为然。对阿塔利说：“这不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放心吧，法国人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们知道这一着是有意安排的。”他甚至认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种阿拉伯式的骑术表演，说不定还会使我在5月8日选举中多得半个百分点哩！”

5月8日晚，密特朗一家人和主要助手都聚集在希农堡等候选举结果。晚8时整，电视屏幕显示密特朗获胜。密特朗以54.02%对45.98%的优势战胜对手，成为第五共和国通过普选连任的第一位总统。宾主高举香槟酒庆祝胜利。孩子们抬来一个金字塔形的大蛋糕，上面刻有“密特朗时代”几个大字。一位助手凑到当选总统眼前低声说道：“总统，真令人高兴。”总统并不喜形于色，沉着脸说道：“我对获胜并不感到高兴。但是，我对阻止希拉克当选感到满意。”接着，他前往希农堡市政厅发表当选声明。开宗明义一句话：“法国人民要求团结。这是总统的义务。”团结，这就是这位“全民总统”的基本纲领。

当晚，密特朗从希农堡市乘直升机返回巴黎。他对手下人说：“重要的不是我当了总统。这个，七年来我就是总统。重要的是，我重新当选了。这将深刻改变我国的政治面貌。”

根据事先达成的交易，罗卡尔出任总理。5月9日，密特朗在爱丽舍宫召见罗卡尔，“约法三章”：“如果我选择皮埃尔·贝雷戈瓦当总理，人们会说，是我控制政府。这就有很多不便之处。要是我让您当总理，人们会说，总理是自行其是的。不过，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我们得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密特朗还强调：“您越是多操心法国的事，您就越发是一位好总理，将来您当总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您越是多管社会党的事，您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密特朗何以起用难以驾驭的党内老对手罗卡尔呢？除了出于竞选的实用主义考虑外，主要是两人的政策思想趋于接近。罗卡尔属于社会党右翼，倾向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80年代初密特朗实行的激进社会民主主义不合拍。如今“褪了色的玫瑰”与罗卡尔趋同。密特朗正需要罗卡尔来推行第二

任期的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密特朗再度竞选期间强调要“向中间开放”，以扩大统治基础。而罗卡尔在中间派中颇有影响，是实行“开放”的合适人选。果然，罗卡尔吸收了15名非社会党人入阁，其中四名是右翼和中间派的知名人士。两年后，密特朗自己也承认，他任命罗卡尔为总理，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最合适。”

罗卡尔内阁正式组成后，密特朗叮嘱总统府秘书长让-路易·比昂科和阿塔利：“现在与1981年不同。你们要让政府放手工作。不要以我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对部长们指手画脚。

有三个领域例外：外交、防务和巴黎总统工程，爱丽舍宫可以过问。”

1988年5月10日，总理府进行接交仪式。罗卡尔与希拉克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老同学。两人私交不错。希拉克郑重其事他说：

“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当弗朗索瓦·密特朗对你表示友善时，你千万别信他那一套。”罗卡尔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他正在准备给你一下子。我是领教够了。每当他对我客客气气时，他总是在搞什么鬼名堂。”罗卡尔显得挺尴尬，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他内心还是感谢老同学的忠告。

不过，新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右翼以三票的微弱多数控制的议会，如若不改变这种局面，政府随时都可能被推翻。最初，密特朗企图拉拢某些中间甚至右翼议员改换门庭，以恢复对议会的控制，但未成功。于是，总统只好铤而走险，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依仗密特朗重新当选的冲击波，社会党获得575席中的279席，比前一次选举增加61席，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右翼两大党获261席，丧失了多数。共产党获27席。在社会党与法共未能恢复左翼联盟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依靠不稳定的议会执政。但总算避免了再度“共治”的局面。

密特朗终于挽回颓势，改变了位高权轻的窘境，再度成为拥有广泛权力的总统。

重演“共治”

1993年，法国国民议会五年任期届满。3月21日和28日改选结果，以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和法国民主联盟为主体的右翼反对派大胜，获全部577个席位中的485席，占84%的压倒多数；执政的社会党惨败，丧失198席，仅获54席，左翼总共仅93席。希拉克汲取上次“共治”教训，未再度出任总理，意在避免在经济衰退条件下，冒执政而无所建树的风险，超脱“共治”，改善形象，积蓄力量，以便全力以赴，为竞选总统作好准备。3月29日，密特朗任命右翼属意的保卫共和联盟要员、前财政与经济部长爱德华·巴拉迪尔为总理，从而导致左右翼“共治”的重演。

密特朗任期内两度“共治”，是社会党政绩不佳，丑闻迭出，威信下降的直接政治后果。社会党先后执政12年，治理经济无方，特别是未能缓解严重的失业问题。1992年10月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首次突破300万大关，比社会党上台时（130万）翻了一番多。此次选举社会党得票锐减（—15%），说明选民纷纷抛弃了社会党。从国际因素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西欧左翼政党普遍受到冲击，这一国际现象加剧了社会党的失势。

历史现象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这次“共治”的具体条件与上次不尽相同，具有新的特点。上次“共治”时期，左右翼力量大体相当。右翼在议会仅有三席多数。社会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尚能与右翼一争短长。此次左右翼力量悬殊，社会党一败涂地，总统政治上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上次社会党受挫，而密特朗个人尚有一定威望。而今密特朗声望已一落千丈，在“共治”中处于孤立和软弱地位。1981年开始的“密特朗时代”已趋于终结。

在新的力量对比下，右翼更加咄咄逼人，利用议会压倒优势，造成“逼宫”声势。希拉克声称：“密特朗辞职，举行新的总统选举，这符合法国的利益，”甚至一些社会党人也认为，总统与其进行艰难的、屈辱的和无法容忍的共治，不如辞职的好。密特朗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郑重宣布：不打算在1995年第二任期届满前辞职。他在社会党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我将同各位在一起。我不会被孤立；我不会让人关在捕鼠器里面；我也不会任人宰割。唯一的限度，就是我的健康状况。”逼富不成，右翼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总统权力。希拉克扬言，总统掌握外交的历史，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密特朗既不愿自动下野，也不愿当徒有其名的国家元首。他至少想抓住外交、防务这两个“保留领域”不放。3月29日，他在宣布新总理人选时明确表示：“我将监督我国外交事务和防务政策的连续性。”

这次“共治”还有个新因素，那就是新总理巴拉迪尔。此人不苟言笑，总是穿着合身的英国牛津式三件套西服，气度潇洒，一副典型的“老法国绅士”气派。他喜怒不形于色，处事谨慎持重。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国家正经

历着经济、社会危机，他不想再增添什么政治危机。他把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国内问题上，把振兴经济、缓解失业作为“绝对优先”的任务，期望作出成绩，为1995年竞选总统创造条件。

地位虚弱的密特朗总统，对巴拉迪尔也和善相待。他表示，将“不带武器、不带盔甲，心境坦荡地”面对第二次“共治”。他公开称赞巴拉迪尔是“可以与之讨论问题的领导人”，“为人严谨。经常能提出一些使我感兴趣的思想。他具有国家领导人的水平。”他的“气质也许能使共治更平和些。”同时，密特朗自1992年9月动前列腺癌的手术后，体力日渐不支。他不得不减少工作量。他尽量减少接见客人的次数和时限；送呈的文件往往不加批示就退回去；讲话稿也不再仔细阅改。不过，他时常在巴黎有名气的饭馆露面，向公众显示自己的存在。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治”比较平和。密特朗对一位亲信说：“除了危机时期，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某种两党治理的局面。”

不过，“共治”平和毕竟是相对的，化解不开的矛盾是绝对的。总统和总理每周在爱丽舍宫会面两、三次。巴拉迪尔对人说起会见的印象：“他不太找我的麻烦。不过，他总有怨言。”“总统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搞不清。”1993年11月，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几位作家，谈到“共治”时，确实流露出“人们以为共治挺顺利。其实，共治比人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尤其是共治全然缺乏想象力。10年以后，人们会发觉这一点。”他还埋怨巴拉迪尔“正在执行我从各方面讲都不赞成的政策。我不赞成拿许多社会福利成果开刀。”

除了内心深藏的不满和怨恨，公开的争斗和较量也在所难免。围绕暂停核试验问题的争吵即是一例。1992年4月7日，密特朗致函各核国家首脑，通报法国决定暂停当年计划进行的核试验，并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其他核国家“提供榜样”，推动核裁军进程。自1966年以来，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至少进行了150次核试验。密特朗提出暂停核试验，目的在于在国际核裁军中争取一定主动，增加外交回旋余地，并缓和同历来反对法国核试验的南太国家的关系。这一策略做法，并不表明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和坚持核威慑战略的基本政策有什么变化，后来密特朗进一步声明，在他总统任期内，法国不会恢复核试验。他希望做个“和平老人”。

右翼政府对暂停核试验有严重保留。1994年2月23日，国防部长莱奥塔尔同总统大唱反调。“为了使法国核武器现代化和获得模拟试验的能力，进行核试验是必要的。”“无限地暂停核试验，从‘暂停’的意义上讲是矛盾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5月5日，总统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军界、工业界、科技界以及部长、议员等各方人士200多人，就法国核政策发表重要讲话，重申在他任期内，法国将不恢复核试验，5月10日，巴拉迪尔还是不把总统的决定放在眼里，声称法国从未排除根据国际形势“重新恢复核试验的可能性”。密特朗岂肯退让，当晚，通过电视，将分歧公诸于众。他强调，

在是否恢复核试验的问题上，他同政府“存在重大分歧”，但决定权在总统。如果出现总统与政府和议会严重对立的局面，他将提交法国人民裁决。防务政策方面的最后一句话毕竟属于总统，政府只得暂时忍让。

一波平息，“共治”又进入风平浪静的航道。1994年7月18日密特朗第二次动前列腺癌手术住院期间，他请巴拉迪尔代为主持内阁会议。本来不一定非得这样做。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总理主持内阁会议只有过三次先例。密特朗这一举动，显示对巴拉迪尔的尊重和信赖。他在人前吐露：“将来对我作为总统表示应有的尊敬的人，那就是巴拉迪尔。罗卡尔或希拉克都未必如此。”这话倒很有预见性。密特朗临死之前，巴拉迪尔曾去探望过他。密特朗叹息道：“在我手下当过总理的人中间，只有巴拉迪尔来看过我。”这是后话。

然而，过不多久，风浪又起。1994年8月30日，巴拉迪尔对《费加罗报》记者发表题为《我国的外交政策》的谈话，密特朗很不高兴。问题倒不在谈话的内容，因为谈话文本早已送呈总统过目。使密特朗不快的，是文章的题目个人色彩太浓了。巴拉迪尔仿佛以法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自居。密特朗感到，他动手术的一个多月里，巴拉迪尔抓外交太多了。“我刚离开一个月，有人告诉我，现在另外一个人当了总统。乱弹琴！”密特朗很快进行反击。他对助手们说：“如果不作出反应，我等于不存在了。”

密特朗决不容许外交大权旁落。9月1日，他特意把参加使节会议的法国驻各国大使召集到爱丽舍宫，郑重声明：“外交事务属于我的职权范围。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我最重要的职权的一部分。我要十分明确地保持行政权力的划分，因为事关维护共和国和民主。”但巴拉迪尔置若罔闻，在这些大使面前又大谈政府在外交上的所作所为。密特朗十分恼火，对亲近的人说：“有人说，巴拉迪尔亲身经历过蓬皮杜的病情，表现不错。我觉得他表现不那么好。”于是，他于9月8日向《费加罗报》主编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发表谈话，指责巴拉迪尔利用他休养的时机，将原来由总统掌握的领域——外交占为己有。密特朗表示重新掌握外交大权的决心。关键性的一句话：“谈不上两个总统并存。事实上，总统只有一个。”

与第一次“共治”一样，这次“共治”也是着眼于1995年总统选举的过渡。所不同的是，密特朗已不可能亲自出马来竞选了。要说密特朗还有什么牌可打，利用右翼裂痕也许算得上一张。他原是采取抬高巴拉迪尔、贬低希拉克的手法。随着巴拉迪尔羽毛渐丰、名望日高，成了各方看好的总统候选人，密特朗便改变了做法。他希望巴拉迪尔和希拉克两雄相争，为社会党候选人提供可乘之机。

1993年12月，密特朗接见议会多数派领导人之一夏尔·米荣，他挑拨说：“去年我动手术之后，巴拉迪尔为我祈祷，但愿在提前总统选举的情况下，希拉克不来接替我的位子。希拉克也点蜡烛祈求上帝，要是我猝然病逝，别让巴拉迪尔入主爱丽舍宫。”

密特朗笑着添上一句：“我这个人福份还真不浅：我的两个对手都祈求上帝保佑我不死。”送客人到门口时，密特朗说：“我们说定了：我接见您，纯属私人性质。”客人问道：“干吗跟我讲这些？”

回答很有意思：“有人对我说，您在这儿是代表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

不言而喻，既然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代表，不妨把这番话既传给巴拉迪尔，又传给希拉克。

1994年初，巴拉迪尔在民意测验中的名望直线上升，而希拉克的名望却节节下降。密特朗故意向希拉克表示：“我不喜欢人们把我们第一次共治说成是剑拔弩张。您很清楚，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要让人透一透这个信息。”

除了使巴拉迪尔与希拉克相撞，密特朗还有一张牌：前总理雷蒙·巴尔。他多次秘密接见他，并在人前备加赞许：“在右翼人士中，唯有巴尔够得上担任总统。”1994年7月14日国庆节谈话中，他甚至公开说：“我很钦佩雷蒙·巴尔。他会是一位很好的总统。”总之，他想尽量把水搅混，以便从中渔利。

1995年总统选举中，希拉克和巴拉迪尔这两位“30年挚友”成了势不两立的劲敌。结果，巴拉迪尔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希拉克在决胜轮中以52.8%对47.2%的比分，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五任总统。总统、政府、议会两院均为右翼所控制，以右翼的一统天下结束了左右翼“共治”。

第八章

走出“雅尔塔”

战后，欧洲一分为二、分别由美苏控制的“雅尔塔”格局，是没有法国参与的情况下，由美苏一手包办的。法国一直耿耿于怀。“打破雅尔塔”，一直是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上的长远目标。法国虽然承认战后形成的东西欧划界而治、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对峙的现状，但不认为雅尔塔格局是不可改变的，反对死抱住雅尔塔秩序不放。多极世界的战略思想在欧洲的具体运用，就是打破作为两极格局的集中表现的雅尔塔格局。密特朗在野时就说过：凡是“西欧的爱国者”，都有一个宿愿，那就是：“摧毁雅尔塔”。就任总统后，他又多次阐述这种思想。“任何可能走出雅尔塔的东西都是好的。”

1989年11月9日，东德当局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东西德边界，数以百万计的东德人潮水般涌向西柏林和西德。柏林墙的倒塌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顷刻间“雅尔塔”格局土崩瓦解。这是密特朗所始料未及的。不过，密特朗终究实现了“走出雅尔塔”的宿愿。

密特朗认为，这究竟是祸还是福，尚难逆料。他就柏林墙开放发表的声明中强调：雅尔塔体制瓦解“只能使像我这样一直满心希望走出雅尔塔的人欢欣鼓舞……但是，我们走出原有的体制，而我们看不清新的平衡。这意味着，事情会变得更好，但也可能变得更困难。”

确实，欧洲旧格局的瓦解，既给法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法国提出了新的挑战。最严峻的挑战来自德国统一的前景。

密特朗与德国统一

柏林墙开放这一戏剧性事件，把长期搁置的德国统一问题一下子提上欧洲政治日程的首位。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密特朗所没有料想到的。事隔六年后，他承认：“历史把我们搞得手足无措。”

法德在历史上曾长期互相敌对，多次兵戎相见。仅从1870年普法战争算起，70年间，两国三次大规模交战，巴黎两度遭德国占领。法国一直把德国看作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雄欧洲的劲敌。如何约束德国以维护法国的安全和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是法国外交的头等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分为二，不仅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法国的最大威胁，增加了法国的安全感，而且使法国得以在政治上始终保持高于西德的地位，从而确保法国在西欧的政治大国地位。德国重新统一，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改变法德力量对比。统一的德国不仅将进一步确立其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政治上也将逐渐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德国变大了，相形之下，法国变小了。法国原先建立在德国分裂的基础之上的、谋求充当西欧盟主的打算势将落空。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有句名言：“我太爱德国，以至我愿意有两个德国。”这句话深刻而生动地刻画出法国人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心态。

密特朗作为国家元首，不管心里怎么想，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表态是冠冕堂皇的。早在柏林墙倒塌前四个月，7月27日，密特朗就公开表示，德国统一，“这是所有德国人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渴望统一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统一只能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不过，密特朗内心深处可不是这样想的。1989年10月2日，他对总统府的顾问说：“谈论德国统一的人什么也不懂。苏联决不会答应。德国统一意味着华沙条约的结束，这，您怎能想象呢？再说，东德是普鲁士，它不愿受巴伐利亚（指西德）的统治。”

11月3日，密特朗同西德总理科尔在波恩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他在身后发表的回忆录《论德国和法国》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个德国记者突然向密特朗提问：“您害怕德国统一吗？”或者由于麦克风声音太低，或者由于译员漫不经心，翻译没有跟上。站在密特朗身旁的科尔急了，赶忙凑到密特朗耳边轻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让所有人听到您的回答。”第二天，西德《世界报》描绘当时的情景：科尔仿佛面对一道很难的考题，“他仔细听着，显得十分紧张，似乎给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出的这道题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不好答的。”密特朗自己也感到，如果回答不当，将会引起难以估量的后果。他落落大方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不应当放在害怕或赞同的范围内……重要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决心……不，德国统一并不使我害怕。历史摆在那儿，我顺应历史。”他重申：“德国人渴望统一，是合情合理的，只

要他们愿意统一，只要他们能够实现统一就行。”

后来，密特朗一再援引这两次表态，证明他对两德统一颇有先见之明，所持态度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他自己在《论德国和法国》一书中也承认，尽管他的表态是明确而积极的，德国人还是怀疑他并非出于真心，以为他骨子里总想阻挠德国统一。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猜疑？除非他采取一项能打动德国人心的戏剧性行动，那就是在科尔第一次访问开放了的柏林墙时陪同前往。这种想法是很诱人的，而且不难做到。但考虑到法国的其他伙伴国以及日后形势演变的复杂性，他觉得只能让德国人自己去庆祝柏林墙的倒塌。

密特朗最初的几次表态，言简意赅，暗藏的含意比明说的话重要得多。说统一是“合情合理的”，并不是说统一可以任意实现；“和平、民主”这两个限制词，体现了自始至终统一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保障“和平”，意味着必须以解决五大难题为前提，即：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当前应由联邦德国予以确认；对德国负有特殊责任的四大国——美、苏、英、法应就向统一的德国移交权力达成协议；德国放弃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德国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之内；德国确认它在欧洲共同体内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先决条件，当时密特朗自然不好明说。

柏林墙开放后，密特朗虽然认为德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估计实现统一还得有好几年时间。随着德国统一进程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向前推进时，法国口头上依然支持德国统一，行动上却力求延缓统一进程。

法国企图借助各种国际力量、首先是利用苏联进行牵制。密特朗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从思想上、政治上一点儿也不反对德国统一”。但是，“俄国人在战略上、历史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利益使得他们眼前不可能考虑德国统一问题。他暗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他就可能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他在同《华尔街日报》的谈话中透露：戈尔巴乔夫曾对他说过：“宣布德国重新统一之日，也就是一纸简短公报宣布某一位元帅取我而代之之时。”

1989年11月28日，科尔总理在西德联邦议会突然提出实现德国统一的“10点计划”，事先没有同西方盟国和苏联磋商，甚至也没有同他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主席、副总理兼外长根舍研究过。10点计划的关键的一点，是单方面提出了东西德统一的主要方式和步骤：“我们还愿意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发展德国两个国家间的联邦结构，目标是在这之后建立一个联邦。”10点计划的出笼，不啻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统一是两部分德国人自己的事，别的国家，即便是盟国，都无权干涉。

法国自然喷有烦言。密特朗私下对手下人说：“他事先半点风声也不露！根本没有向我谈起过！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戈尔巴乔夫会大发雷霆；他决

雅尔塔会议确定，并由彼茨坦会议议定书重申，战后德国与波兰以奥得—尼斯河为界。

密特朗：《论德国和法国》，第32—33页。

不会允许这么干的。办不到！我毋需出面反对，苏联人会出来反对的。您想看，苏联人决不会接受一个大德意志国……在欧洲统一取得很大进展之前，科尔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密特朗于12月6日匆匆飞往基辅，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工作会谈，协调两国对德国统一的立场，想借苏联制约科尔。密特朗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目前形势每日每时都在给我们出难题。我希望同您一起，本着最诚挚的合作精神来度过这一严重的时期。”他强调，“科尔‘10点计划’打乱了事情轻重缓急的次序”，“您我应当协调一致对待这个问题，并保持密切联系”。戈尔巴乔夫表示深有同感：“这正是主导思想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戈尔巴乔夫埋怨科尔事先不打招呼，径自提出德国统一计划。“我认为，‘10点计划’就像闯进瓷器店的一匹大象。”密特朗附和说：“我们事先也一无所知。我提到1963年法德条约。根据条约，我们本该事先沟通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戈尔巴乔夫强调，今天欧洲的现实已为赫尔辛基欧安会协议所确认。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都是联合国会员国。东欧发生的变化并未改变这一现实。密特朗也表示，“两个德意志主权国家”应当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双方一致认为，现在谈论德国统一尚“为时过早”。

戈尔巴乔夫的结束语说得最透彻不过了：“请帮助我避免德国统一，否则，我将被一个军人所取代；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将对战争负有罪责。这难道不正是西方利益之所在吗？一切人为加速统一进程的做法统统都应当予以排除。我昨天对根舍说，科尔的10点计划同我们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是矛盾的，太快了，这有碍互相了解。这简直是‘独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根舍说：‘甚至希特勒都没有用过这种语言’。”

基辅之行，当时曾招致舆论界的非议，指责密特朗企图同戈尔巴乔夫联手阻挠德国统一。密特朗一直耿耿于怀。他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录中特意为此行辩解。他指出，“我想同戈尔巴乔夫主要谈谈德国问题。这里，那里，人们竟大惊小怪，我要说，人们甚至表示愤慨。我从来不把基辅之行神秘化。我认为，就德国问题同戈尔巴乔夫对话，乃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戈尔巴乔夫和我实话实说，德国统一向这两个欧洲大陆国家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俄国和法国的谅解和协调是欧洲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这条教训从来没有被否定过。当时欧洲面临的困难使显示这种谅解和协调尤有必要。访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举行晚宴，除了我和罗朗·迪马外长，还有四位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出席。当我们告辞时，这四位乌克兰领导人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一件礼物——哥萨克彪形大汉的陶瓷塑像，对我说道：

‘乌克兰的士兵不会永远离开战场，总有一天要重返疆场的’。说

着哈哈大笑起来。” 戈尔巴乔夫精心安排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如果德国人一意孤行，苏联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密特朗让苏联出面阻挠德国统一，看来是颇为高明的一着。

12月8日，欧共体12国举行首脑会议，商讨加速欧共体一体化建设问题。依据法、苏、英联手对付德国的思路，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外单独会谈，取得共识。密特朗向她通报了基辅会谈情况，强调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比预料的更为强硬。

撒切尔夫人说：“科尔根本不懂得欧洲对德国统一有多么敏感……”

德国越来越想统治欧洲，我们得经常会晤来抵销德国的力量。必须做到不让德国统治欧洲。”她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两张从英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欧洲地图。一张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疆界；另一张标明1945年确定的疆界。她指着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说：“德国人会把这些地方拿回去，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密特朗接口道：德国统一进程加速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对根舍说过：‘我们是朋友和盟邦，但是，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正在使我们准备法、英、苏联合对付德国的新的同盟，如同1913年那样。你们将有9000万人口，但苏联将转向我们，你们将被包围’。”

密特朗顺势强调：“法国和英国应当建立类似1913年和1938年的特殊关系。”撒切尔夫人表示颇有同感：“如果让德国人控制局势，那么，它就将统治东欧，如同当年日本统治太平洋地区那样。在我们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其他国家应当联合起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密特朗在对付科尔加速德国统一方面又找到了一个知音。

12月16日，密特朗风尘仆仆地前往加勒比海的法属圣马丁岛同美国布什总统会晤。密特朗表示，“德国统一是件正常的事，但是，同苏联的问题不好解决。”“戈尔巴乔夫非常坚决，他不能接受德国统一。他说，‘要是德国人染指边界，那我的话就不灵了。’他希望人们帮助他放慢统一进程。戈尔巴乔夫反对统一。我并不反对统一，但我同意他的想法，应该慢慢来。”布什问道：“由于沃尔特斯大使的谈话给人以加速统一进程的印象，您是否认为美国似乎过分赞同统一？”密特朗回答说：“是的。太过分了。贵国大使提出了一个统一日程表（五年），连科尔也不敢这么做。”“你们显得比科尔还着急。这将损害东西方关系。”布什解释说：“沃尔特斯错了。我很抱歉。我已经指出，美国正式立场并非如此。我们不反对统一，但我们要谨慎从事。”密特朗强调，欧洲国家眼看一个强大的德国将重新出现在欧洲的心脏，无不感到惴惴不安。德国统一进程必须是“和平、民主和渐进的”，主张让科尔放慢统一步伐。

密特朗认为，归根到底，德国统一进程是延缓还是加速，关键不是哪一

密特朗：《论德国和法国》，第95—96页。

雅克·阿塔利：《工作日志》第三卷（1988—1991），第368—370页。

个国家的态度，而是东德的局势。如果东德能够顶住，科尔就不能不放慢统一步伐。他对手下人说：“我应当到东德去……你们看着吧，这些普鲁士人（指东德）会顶住巴伐利亚人（指西德）的。他们不会听凭对手吞并的。”12月20日，密特朗亲赴东柏林，作为西方三个战胜国的第一个国家元首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消息传出后，西德舆论哗然。法新社驻波恩特派记者报导说：“西德人担心密特朗阻挠德国统一。”西德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问道：法国总统是不是“给科尔总理背后捅上一刀”？有影响的西德《世界报》把密特朗比作梅特涅，指责他企图“倒转联盟”，联合苏联对付德国，科尔总理本人也对密特朗此行惶惶不安，生怕法国总统先于他前往东德，不得不打乱日程，匆匆赶在密特朗到达前24小时访问东柏林。科尔还建议同密特朗一起从勃兰登堡门穿越柏林墙。密特朗予以拒绝。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是德国人之间的事，我毋需参与。科尔没有把10点计划通知我，他拒绝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现在他倒想让我来使他对东德的控制合法化。太过分了！他不能指望我会中他的圈套。”

密特朗知道，东德领导人指望他公开、明确地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行前，外贸部长克勒松夫人报告总统，东德外贸部长向她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反对派在内，期待着法国总统“强调民主德国的主权”。密特朗同东德领导人会谈中有针对性地着重谈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的问题，表示东德方面“可以确信法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法国对“民德作为主权国家继续存在感兴趣”。

21日，他在莱比锡大学发表演说，盛况空前。礼堂里座无虚席。礼堂外面人头涌动，密特朗请他们进来。顿时，走道上，讲台前，全挤满了人，但仍然容纳不下，只见窗台上也爬满了人，外面还站着黑压压的人群。密特朗宣称：两个德意志国家都是“拥有主权的”。“德国统一首先是德国人的事。只有自由的、开放的、民主的选举才能知道东西两部分德国人的愿望如何。让德国人说出他们想怎么做。”他表示相信，“东边和西边的德国人都是成熟的。”22日，他在东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表白说：“我不是那种阻挠德国统一的人。我要说，德国人民的意志应当表达出来，他们的意志必定会实现。”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密特朗在基辅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紧接着访问东德，意在稳住东德政权，延缓德国统一进程。密特朗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他声明，“与报刊一再报导的相反，我无意推延势在必行的德国统一。”

1990年1月初，东德不少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德国统一。密特朗私下说：“科尔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他对我说，他没有做什么，但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以缔结“神圣同盟”著称。

密特朗：《论德国和法国》，第110—115页。

是，他背着我加速统一进程，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哩！”过了几天，他又说：“必须使德国统一的步伐放慢，否则，有可能把戈尔巴乔夫轰下台，而俄国将军们会来柏林恢复秩序。这难道是科尔所企望的吗？”对科尔加速统一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密特朗认为，德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德国统一只能设法延缓，终究无法阻止其实现。因而，他在竭力拖延的同时，力求未雨绸缪，筹划制约统一后的德国的机制和确定德国必须遵守的国际规范，在统一的先决条件上大做文章。在他所列举的五个先决条件中，法国坚持最力的是其中两项：一是德国必须承担尊重欧洲现有边界的义务，特别是奥得—尼斯河线应当作为德国东部边界永远确定下来。二是德国应当以明确的方式承担加速欧共体一体化的义务。

1990年1月20日，密特朗在伦敦同撒切尔夫人共进午餐时谈得很透彻：“我不对德国统一说不。那是愚蠢的，也是不现实的。我看不出在欧洲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挠德国统一。今天苏联是否有能力这样做，我也没有把握。倒不如目瞪口呆地接受它，同时把德国统一同欧洲建设和保证尊重边界联系起来。”撒切尔夫人请密特朗共同商讨法英联合对付德国的条件。密特朗表示，他不愿意以欧洲建设换取空洞的法英联盟。他认为，欧共体进一步一体化是制约德国的更为有效的办法。

早在1989年11月2日法德首脑会晤中，密特朗就向科尔明确表示，德国统一“不能损害和平和欧共体”，“欧洲建设有助于实现德国统一”，据科尔事后向西德联邦议院透露，密特朗曾同他达成协议，法国支持科尔统一德国的努力，而把德国统一作为“加快实现欧共体一体化的催化剂”。密特朗催促科尔信守诺言，尽速实现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强调德国统一问题不能代替共同体建设问题，两者应当同步进行。12月1日，密特朗对西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很舍说得更露骨：“要么德国统一在欧洲统一之后实现，要么你们将面对法、英、俄三国联盟，这将以战争告终。如果德国统一在欧洲统一之后实现，那么，我们将助你们一臂之力。”12月8日，在法国提议下，欧共体首脑会议最后公报强调，要把德国统一问题置于欧共体一体化建设的前景之中。

法国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将德国统一与欧共体一体化挂钩呢？法国在推动欧共体一体化发展的背后，一向隐藏着以联合为名、行限制德国之实的深层战略考虑。利用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欧共体制约德国，这是密特朗对德战略的基础，也是他的欧洲战略的基础。他希图趁德国变得不可驾驭之前，以欧共体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共同防务的综合机制牢牢拴住德国，从而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而不致使欧洲成为“德国的欧洲”。

密特朗1989年11月5日对总统府顾问说得很清楚：“一个统一的德国将给欧洲带来双重危险，原因在于它的实力，还因为这将导致英国、法国、苏联结盟。这么一来，21世纪肯定会爆发战争。为了消除德国统一将造成的

危害，我们必须迅速缔造欧洲。”他还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同货币的欧共体，这样我们就能控制住德国。”

科尔意识到，德国“历史上有一些劣迹。这部历史使人们对我国始终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只有在德国的上空盖上一个共同的欧洲屋顶，才能消除这种恐惧感。”德国对进一步推动西欧联合表现积极。因此，密特朗与科尔殊途同归。法德分歧则突出地表现在德国的东部边界问题上。

雅尔塔会议确定，战后德国与波兰以奥得—尼斯河为界。这意味着德国丧失东部大片土地。东、西德曾分别同波兰签订协定，承认这条边界线。统一后的德国是否继续承担这一国际义务，则是个新问题。科尔总理对德波边界问题态度暧昧，不愿在德国统一前正式确认奥得—尼斯河线。他在柏林墙开放后几小时在西柏林宣称：“作为西德人，我曾承认同波兰的边界，但是，我没有资格以整个德国的名义说话”。他在德国统一“10点计划”中，只一般提及无条件尊重每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避免具体涉及德波边界。2月15日，科尔同密特朗会晤时，表示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应由未来的德国当局解决。3月1日，科尔宣称，要由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签订边界条约。次日，科尔又通过其发言人表示，联邦德国准备同波兰草签边界条约，条件是波兰重申1953年关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声明继续有效，并以条约形式确保德裔波兰人的权利。科尔的立场招致波兰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欧洲邻国的疑虑，担心统一后的德国抱有领土野心。

德国现有边界包括东方边界在内不得变动，这是法国一贯的政策。戴高乐在1959年3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在我们看来，德国的两部分重新统一，成为单一的、完全自由的德国，乃是德国人民的正常命运，只要它对其全部现有边界不再提出异议，并同意有朝一日融合到为了合作、自由和平而根据条约组成的整个欧洲组织中来。”密特朗沿袭这一传统政策。他认为，在欧洲，边界问题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把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置于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的优先地位。他公开批评科尔：“我确实认为，德国人在保证边界问题上过分拖延，迟迟不前。”

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5月，密特朗曾先后与科尔进行八次会晤，密特朗每次都要求科尔对东部边界作出明确保证。“应当由您来表明同波兰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即便对好多德国人来说这是痛苦的。”而科尔每次都重复同样的借口：联邦德国不能对一个应由统一的德国处置的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统一后的德国议会总有一天会就边界问题表态……您不能要求我现在就这样做。”

密特朗对科尔在东部边界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疑虑重重。他对手下人说：“科尔从来不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如果这样说，意思本来很清楚。而他老是用‘德国人民的统一’这种说法，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科尔要把居住在波兰西里西亚的德国人或生活在捷克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包括在内？每次我要他把他的想法说清楚，他总是含糊其词……但是，如果他老是让人捉摸

不透，那他是在玩弄危险的把戏。对欧洲的未来而言，这种提法是个根本性问题。不要忘记，1937年欧洲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于是，密特朗在国际上大造声势，对西德施压。早在1989年12月6日法苏首脑基辅会晤中，密特朗就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35国会议，以确保欧洲战后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建议。12月22日，密特朗在东柏林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德国人应当有自知之明：不能在边界问题上耍花招。”1990年3月5日，密特朗同访法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杜布切克会谈，双方主张尽快签订一项“国际协议”，以确认奥得—尼斯边界线的“不可变更性”。1990年3月9日，正当波兰和联邦德国围绕边界问题激烈争吵时，法国政府邀请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和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访问巴黎，明确支持波兰关于德国应无保留地确认现存德波边界的立场。

密特朗在同雅鲁泽尔斯基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全面阐述了法国对德国东部边界的立场：“法国认为，奥得—尼斯河线，即德国（今天的东德）与波兰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任何不明确表明这一点的声明都是不足取的。法国支持波兰的要求，以便奥得—尼斯边界的这种不可侵犯性由一项国际协定予以宣布和确认……我希望尽速谈判这项协定，无论如何，要在两个德国统一之前开始谈判。我们认为，波兰参与有关它的边界的全部谈判是正常的。”科尔的助手指责法国人“比波兰人还波兰人”。

1990年4月25日，在法德首脑会晤中，在密特朗一再敦促下，科尔终于同意在美、英、法、苏四大国与两个德国商谈的范围内，以一项国际条约确认奥得—尼斯河界线的不可侵犯性。延续半年之久的法德争执总算告一段落。会后，密特朗高兴地说：“紧张没有白费。河水重新流入河床。”法德合作关系度过了暴风雨而安然无恙。

1990年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科尔，表示同意由两个德国自由决定统一的方式、时间表和具体步骤。双方声明，只有德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苏联将尊重德国人的决定。密特朗怒不可遏：“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搞的？他对我说，他将坚决顶住，结果一让到底。科尔给他什么好处作为交换？大概是多少亿马克吧？”

德国统一势不可挡。但究竟如何实现统一，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德国统一首先取决于两德本身，特别是取决于东德事态的发展。关于两德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社会制度和政权结构等，完全是属于两个德国的主权范围的事。这就是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但是，德国统一是牵动欧洲全局的敏感问题。德国一分为二是战后国际安排的结果，德国重新统一必然需要作出新的国际安排。关于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联盟和军事力量问题、德国边界和柏林问题等，都需要通过一定范围的国际谈判来解决。这就是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采取何种方式来协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这也颇费周折。1990

年初，密特朗指示迪马外长，由外交部会同总统府提出相应方案。迪马上呈总统的报告中强调，鉴于德国统一日益迫近，尽速由美、英、法、苏四大国与两个德国进行某种国际谈判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商谈或谈判不能由法国公开倡议。不然，将会使德国舆论哗然，并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事情变得更加难办。如果由一位德国领导人向四大国（美、英、法、苏）提出，那就大不一样了。”密特朗认为，“4+2”的方案是独一无二的好主意，重要的是，“必须避免由美、苏两家商谈统一问题，而把我们排除在外。”迪马获悉，美国国务卿贝克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他向西德外长根舍试探，他是否愿意出面支持四大国同两个德国共同商谈的想法。如若同意，法国和其他三大国将顺势进行安排。根舍表示赞同。2月2日，戈尔巴乔夫致函密特朗，同意由四大国同两德共同商谈德国统一问题，“我认为，我们共同全神贯注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避免必然会损害欧洲的震荡，这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

2月10日，根舍声明，联邦德国希望召开有法、英、美、苏和两个德国参加的会议。“我们将同对德国拥有权力和负有责任的四大国一起着手解决我们的统一问题。”2月13日，北约和华约讨论“开放天空”的外长会议期间，苏联正式同意“4+2”方案。美、英、法、苏四国和两德外长商定：先由两德商讨有关统一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再由两德外长同四国外长讨论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这样，关于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的国际谈判机制就启动了。西德强调，德国统一问题首先是德国人民行使自决权的问题，然后才是四大国同两个德国讨论“外部问题”，因此，顺序应是“2+4”，而不是“4+2”。于是，改称“2+4”谈判。

“2+4”谈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联盟归属问题。苏联一开始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应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反对德国留在北约。美、英、法三国则反对德国中立化，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成为北约成员国。这是东西方分歧的焦点。迪马外长宣称，法国之所以反对德国中立化，“因为这是关系到法国安全的问题。……法国总是希望周围有可靠的盟国。一个中立化的德国将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欧洲的中心。”法国之所以力主重新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主要是想利用北约在军事上政治上拴住德国，特别是防止它发展成为独立的军事强国，危害欧洲和法国的安全。

在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联盟归属问题争执不下的情况，密特朗于1990年5月25日去莫斯科工作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内外交困，“改革”导致政治动荡加剧，经济困难加深，苏联解体已露端倪，东欧剧变更使戈尔巴乔夫一筹莫展。密特朗行前在内阁会议上说：苏联“已不再拥有心理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影响德国事态的发展。他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对手下人说：“戈尔巴乔夫还会要求我抗拒德国统一。要是我认为他能顶得住，我会乐意这样

做的。但是，要是戈尔巴乔夫在三天之后就把我甩掉，我干吗要同科尔吵架呢？这么一来，我就会被完全孤立起来。”

到了莫斯科，他发觉戈尔巴乔夫几乎变了一个人，不再是往日沉着、自信的戈尔巴乔夫，变得激动、烦躁。戈尔巴乔夫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破坏世界政治和战略平衡，这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西方坚持德国应是北约成员国的要求，就可能迫使苏联重新考虑它对整个欧洲安全进程的态度。他颇为得意地援引了他同美国国务卿贝克的一段对话作为佐证：“我曾问过贝克：‘你们能同意让德国参加华沙条约吗？’回答是：‘德国不愿意，而且美国反对’。我说，‘那好。同样道理，我也反对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时，密特朗刺了戈尔巴乔夫一句：“贝克本应当这样回答：“我不愿作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联邦德国早就是北约的一员，而且，它就要吞并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听了就激动起来，在桌子下面直跺脚。密特朗劝苏联同意让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因为“北约的军事作用可以用来制约德国，免得让德国自行其是”。

在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出人意外地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同时参加北约和华约的建议。密特朗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德国参加两个联盟？谁也不能理解！为何不冷静地提出另一种选择呢？统一后的德国只参加北大西洋联盟，而不参加北约军事组织。”也就是法国模式。其实，密特朗并不认真，他只是对戈尔巴乔夫虚与委蛇。会谈结束时，密特朗说了实话：“我相信，关于德国留在北约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会让步的。我不愿意孤立。”

6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向密特朗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戈尔巴乔夫向他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同时加入北约和华约的建议，被他拒绝了。最后，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应该让德国人自己作出决定，实际上是变相同意德国留在北约。作为报偿，美国向苏联提供一笔经济援助以解燃眉之急。戈尔巴乔夫通知密特朗：“不管您喜欢不喜欢，统一后的德国有朝一日将成为北约成员国，如果它愿意的话。”密特朗对手下人说道：“瞧，我不是说过吗？戈尔巴乔夫在我面前充好汉，一转眼，他对美国人全都让步了，为的是换取几块美金。幸好我没有把他的当真，我没有表示反对让德国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

在苏环节节退让下，特别是1990年7月15—16日科尔访苏，戈尔巴乔夫终于吞下统一后的德国可以留在北约这颗苦果，消除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的最后障碍。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西德以巨款向苏联“买”得了统一。科尔口袋里装着法德联合提议欧共体向苏联提供的150亿美元贷款（主要是西德出钱），还有6月21日西德向苏联提供的50亿马克政府担保的银行信贷。9月10日，西德又同意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以补偿苏军在东德留驻和撤出的费用，以及30亿马克的直接财政援助。密特朗读完德苏达成协议

的电讯说道：“瞧！戈尔巴乔夫一再要求我们对科尔寸步不让，而他自己，全部放弃了，无疑是为了换取几个马克。”

1990年9月12日，两个德国和四大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1952年前的五个州正式“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裂40多年的德国终于以西德和平地吃掉东德的方式实现了统一。

密特朗私下评论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一个新的德国诞生了。这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民主国家，羽毛尚未丰满……人们将静观其行。必须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德国的现实是欧洲的现实组成部分。”

科尔给密特朗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对密特朗“支持德国人的自决权和促进统一进程”表示感谢，并作了一系列许诺：德国将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它将加速欧洲建设；它将尊重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和主权，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边界，今后德国决不向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重申德国不生产、不拥有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如此等等。密特朗对手下人说：“科尔总理是真诚的。如果假他以时日，他会做这一切。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身后又如何呢？所以，必须挂住德国，趁科尔还在台上，把德国溶化在欧洲政治联盟之中。否则，咄咄逼人的德国——这回是巴伐利亚的，而不是普鲁士的德国——将会再度威胁欧洲和平。”聊聊数语，道出了法国对德国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和法国对德政策的真谛。

“欧洲联盟”的建筑师

1994年7月14日，巴黎举行传统的庆祝国庆阅兵式。这一天，密特朗度过他在14年总统任期中最后一个国庆节。突然，一支由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士兵组成的欧洲军团出现在从香榭丽舍大街滚滚向前的阅兵队伍里。德国兵走上香榭丽舍大街，不禁使法国人想起1940年6月14日纳粹德国部队兵不血刃、开进巴黎的一天。这种回忆至今仍然使许多法国人感到痛苦和屈辱。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电视上老泪纵横地诉说道：50年后，人们竟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再次听到德国兵的皮靴声。

其实，邀请欧洲军团参加国庆阅兵式，乃是出于密特朗的精心安排。他想在卸任之前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他的西欧联合政策的强烈的印记。他也借此发出一个包括西欧共同防务在内的“欧洲观念”的强有力的信号。他说：“欧洲军团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出现，会给欧洲建设以新的推动。”

“从久远的年代起，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作为议员就响应欧洲共同体的‘奠基人’的号召，出席了在海牙举行的、由丘吉尔主持的、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盛会。那是1948年。”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不渝地为完成这项当代历史性的雄图大略而努力。”

密特朗回忆录《论德国和法国》一书中的这几句话，表明他是个老资格的“欧洲派”。如今，欧洲建设的奠基人都已先后作古，密特朗成了新一代欧洲建设的旗手。密特朗执政14年，外交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作为“欧洲联盟”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对推进西欧经济、政治、防务和科技联合所作的重大贡献。

密特朗上台时，接手的是一个停滞不前的10国欧洲经济共同体。80年代初期，西欧经济衰退，民族利己主义抬头，欧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加剧，在涉及共同体深化和扩大的一系列问题上争吵不休，西欧联合进程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1984年上半年，法国担任共同体主席，着手重新启动西欧联合进程。密特朗强调，推进西欧联合的政治意志是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基础。他大声疾呼，“如果欧洲建设不前进，欧洲就有自行毁灭的危险”。呼吁“10国欧洲从争吵中摆脱出来，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与此同时，密特朗积极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妥协方案。为此，他立即任命他的挚友罗朗·迪马为新的欧洲事务部长。他对迪马说，“你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谈判是很在行的。那么，你就动手去干吧。我任命你为欧洲事务部长，我们一道设法使欧洲摆脱困境”。他还亲自出马，半年之内，同共同体成员国首脑进行将近30次双边会晤，促使各方立场接近。6月，共同体首脑枫丹白露会议终于就长期争执不下的改革农业共同政策等经济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使共同体摆脱了长达四年多的内部危机。密特朗得意洋洋地宣布：“现在共同体不再存在任何有待解决的争执了……当然，今后还会有别的争执，生活就是这样。”

枫丹白露会议是 80 年代西欧联合进程的一个转折点。1985 年开始，西欧联合取得长足进展。1985 年 1 月 1 日，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正式成员国，共同体从 10 国扩大到 12 国。7 月，联合发展尖端技术的“尤里卡”计划正式诞生；从 1985 年起，在西欧联盟框架内，西欧主要国家之间在防务安全问题的磋商协调开始制度化；1986 年 2 月，共同体外长会议通过《单一欧洲文件》，决定在 1992 年年底之前建立 12 国统一大市场；与统一大市场计划配套，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也进行了酝酿和筹划。这一系列新的进展为 90 年代西欧联合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在望的新形势，为西欧联合的飞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密特朗在 1989 年 11 月 23 日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强调，新的事态使他坚信，“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将是整个欧洲成功的主要因素。”“共同体将成为欧洲大陆未来的唯一吸引中心”。为此，共同体必须加速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密特朗还认为，德国统一的前景使共同体一体化建设更加紧迫，共同体一体化与德国统一至少应该同步进行。

在具体步骤上，法国主张，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走向一个更高阶段相适应，必须建立起欧洲政治联盟，以经济一体化推动政治一体化，又以政治一体化促进和巩固经济一体化。密特朗强调，只有建立一个“政治欧洲”，才能“为正在露头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一个答案”。

如何推动西欧联合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法德轴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欧联合的发动机。密特朗—科尔这一搭档，虽然个人关系远不如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施密特紧密，但工作关系还是颇有成效的。虽然德国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给法德关系带来了新的复杂因素，密特朗和科尔在德国统一的进度和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的不可侵犯性等问题上明争暗斗，但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都需要把共同体一体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89 年 11 月 2 日，即柏林墙开放前几天，在法德首脑会晤中，密特朗就向科尔明确表示：“东欧事态应当促使我们加速和强化共同体一体化的步伐。”“欧洲建设会有助于德国统一。如果德国在联合的欧洲内实现统一，苏联就不好反对。德国问题将用欧洲的磁力加以解决。”科尔表示同意：“绝对应当实现欧洲联合，从而使德国问题不成其为问题。”

1990 年 4 月 19 日，密特朗和科尔联名致函欧洲理事会本届主席爱尔兰总理查尔斯·豪伊。中心思想是：推动欧共体一体化实现一次质的飞跃，从筹组中的经济货币联盟扩展到政治联盟。信件建议欧共体“在经济、货币及政治方面协调一致”，“制订和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共同的安全政策”。信件还提出明确的时间表，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应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这就是说，这一天不仅建立原先计划中的统一内部大市场，而且加码同时实施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从而大大加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

欧共体从 50 年代中期建立以来，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贸易集团。60 年代

初，戴高乐筹组六国政治联盟以失败告终，政治一体化进程进入低潮。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末，曾酝酿或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政治联盟方案，但均不了了之。在这 30 多年的时间里，欧共体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合作机制。但这种政治合作主要是磋商和协调性质的，不涉及各成员国的决策权。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不够经常，也不够完善。总之，欧共体远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实体。法德联合倡议是在新形势下的一次新的尝试。

欧共体首脑都柏林会议 6 月 26 日公报宣称，12 国首脑决心在世界和欧洲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继续有力地推动共同体的发展，以便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脑会议还原则认可政治联盟的倡议。

在雅尔塔格局瓦解和德国统一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密特朗将西欧共同防务置于突出地位，主张进一步加码，把共同防务问题纳入政治联盟的范围。密特朗的战略意图是：把加速深化西欧联合作为欧共体在构筑欧洲新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手段，而“深化”的关键是超越经济一体化，制定和实施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最终建立西欧独立防务体系，从而使欧共体从经济共同体向经济、政治、防务等多种功能兼备的实体转化，进而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成为独立的一极。这自然是一个崭新的倡议。

西欧联合犹如三级火箭：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到军事一体化。经济这一级早已直上云霄，政治这一级故障不少，军事这一级则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触动的“禁区”。密特朗一直力求带头冲破防务合作这一“禁区”。早在 1984 年 5 月，他在对记者谈话中，主张“扩大欧洲自主地确定其独立与安全的手段的能力”，以便使西欧联合“具有真正的含义”。1985 年 5 月，他在欧洲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欧洲的命运只能是被别人瓜分和分裂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欧洲共同防务和安定”既是“极其困难的”，又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冲破这一“禁区”？80 年代，密特朗采取了迂回前进的办法，即从法德双边防务合作入手，带动西欧防务联合。1988 年 1 月 22 日，在法德合作条约签订 25 周年之际，两国首脑签署了成立法德防务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作为法德条约的补充，并决定在当年组成法德混合旅。混合旅规模为 4200 人，法德各占一半。这是西欧国家在北约以外建立的第一支联合部队。密特朗强调，这支部队将成为“欧洲防务的胚芽”。

在欧洲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形势下，密特朗试图从正面冲击防务合作这一“禁区”。

1990 年 12 月 6 日，密特朗—科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应当扩展到所有领域”，“政治联盟应当包括一项真正的共同安全政策，并最终导致共同防务。”法德并建议，欧共体与西欧联盟挂钩，关于政

西欧联盟。1954 年由法、英、德、意、荷、比、卢七国组成。80 年代中期，在法国推动下，成为七国讨论防务问题的论坛。

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应“研究西欧联盟如何同政治联盟建立明确的组织联系，以及西欧联盟如何最终能成为政治联盟的一部分，并为政治联盟制定共同的安全政策”。

同年12月14—15日，欧共体首脑会议把加快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确认把欧共体逐步转变为“欧洲联盟”的意志，并就建立奉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取得共识，就建立以发行单一货币为最终目标的经济货币联盟达成一致意见。经济货币联盟条约谈判进展较快，政治联盟条约谈判则停滞不前，特别是在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共同防务问题上，各国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为了对谈判施加影响，1991年2月4日，“迪马—根舍倡议”进一步阐明了法德立场。两国主张通过政治联盟发展共同的安全政策，并以最终实现欧洲共同防务为目标；强调要是没有共同防务，欧洲政治联盟建设将是不完整的。西欧联盟应成为欧共体政治联盟的防务组织。

为了给政治联盟谈判以新的推动和促使即将举行的共同体首脑会议达成协议，1991年10月14日密特朗和科尔联名致函欧共体主席国荷兰首相，就政治联盟的核心部分——共同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对拟议中的条约文本提出具体建议，为政治联盟定下基调。主要内容是：（一）欧共体政治联盟的目标是奉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共体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最终应包括共同防务。（二）建立政治联盟与西欧联盟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西欧联盟成为按欧共体政治联盟指示行动的防务组织。（三）现有法德混合部队应予加强，以便成为未来欧洲部队的核心。

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包括《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欧共体将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最终实行共同的防务政策。（二）西欧联盟是欧洲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负责制定和执行联盟在防务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三）条约确定最早于1997年1月1日，最迟不超过1999年1月1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发行单一货币，从而解决了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的关键性问题。

《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西欧联合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欧共体开始从经济实体向政治实体过渡。密特朗宣称，这项条约不仅是本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是“为下一世纪作准备的”。

法德紧密合作和联合推动对促成欧洲联盟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法国又起了主导作用。密特朗不愧为欧洲联盟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如同英国《泰晤士报》所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密特朗都算得上是他所处时代的最有影响的欧洲人之一。”

第九章

宫墙内外

铭刻在巴黎的印记

巴黎素有“花都”之称，雍容华贵，独步西方。其实，巴黎之所以独具魅力，首先由于它是文化艺术古都。自从12世纪末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定都巴黎以来，历代帝王大都在巴黎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人们也许对他们的身世和政绩不甚了了，但对他们留下的街道、建筑、艺术珍藏和名胜古迹无不啧啧称羨。正如雨果所说，“伟大的建筑，就像高山一样，是几个世纪的产物。”令人心驰神往的巴黎，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密特朗总统雄心勃勃，不仅要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打上“密特朗时代”的烙印，而且要在巴黎铭刻“密特朗时代”的印记，青史留名。11项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总统工程”，便是密特朗执政14年的历史见证。自路易十四以来，密特朗是兴建各种人文景观和文化艺术殿堂最多的国家元首。

1981年9月24日，密特朗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亲自过问了奥赛博物馆、拉维莱特科学博物馆和拉台芳斯工程的进度。我希望这些工程将来在显示城市建设风格的同时，也显示现代美学。”他还同时宣布了扩建卢浮宫的意向。

这三项工程并非出自密特朗的倡议。他的前任吉斯卡尔·德斯坦早有此计划，但未动工。

奥赛博物馆，是由位于市中心的、废弃的巴黎—奥尔良车站改建而成，正式名称为“19世纪法国文化与艺术博物馆”。其中汇集了19世纪印象派大师的杰作，最为引人注目。奥赛博物馆已于1987年落成开放。每日参观者排成长龙不绝。当时笔者作为外交官，沾了外交使团的光，优先入内，免受长时间伫候之苦。

拉维莱特科学博物馆，系在巴黎屠宰场旧址兴建，于1986年3月揭幕。密特朗比原计划增建了音乐厅和一个巨型不锈钢圆球。远远望去，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圆球，犹如天文馆的圆形屋顶。圆球里面是个偌大的立体电影厅，放映巨幅半球形银幕电影。观众犹如身临其境。当银幕上出现探索太空的镜头时，你也就飘飘欲仙；遇有山峦起伏、深山峡谷，你就像乘坐直升机一般，遨游其间，饱览奇妙的景色；遇上急流险滩，你不由得捏一把汗，提心吊胆地在一叶扁舟上顺流而下。若是你有几分害怕，那就不妨闭目养神，躲过那些过分惊险和刺激的镜头。

拉台芳斯工程则被密特朗作了重大变动。拉台芳斯是巴黎规模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摩天大楼群，位于巴黎西北近郊，离凯旋门正西方向仅二三公里。这个地区的建筑很有特色，全部机动车辆均在原先的地面上，而盘旋曲折的

步行街道和喷泉林立的游憩广场均系临空构筑而成。行人却如履平地，绝无悬在半空的感觉。

不过，拉台芳斯虽然高楼林立，但尚群龙无首，缺乏一项统率全区的工程。密特朗认为，上届总统确定的设计方案，是“一座使人无法看到美好远景的玻璃大厦”，毅然予以否决。决定通过国际招标，重新选定方案。他说：“竞争就是一种保证。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审美观强加于人。处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若是还像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那样行事，多少有点困难了。”结果，名不见经传的丹麦建筑师奥托·冯·斯普勒凯尔森设计的巨型大理石拱门方案中标。密特朗把它列为总统工程的重点之一，作为纪念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200周年的建筑物。

这座比凯旋门高两倍、与香榭丽舍大街同宽的大拱门，犹如鹤立鸡群，屹立在鳞次栉比的玻璃摩天大楼中间，向东眺望与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同一条直线上，形成一条新的风景线。乘电梯登上拱门顶端，巴黎风光尽收眼底，与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庞然大物于19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之前，如期竣工。同年7月15日，美、英、法、德、意、日、加拿大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此举行，故有拱门会议之称。

1982年3月9日，总统发表公报，正式宣布卢浮宫改建工程、法兰西图书馆、巴士底歌剧院等八项巨大工程，将陆续上马。其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卢浮宫项目。

卢浮宫原是中世纪存放王室档案和珍宝的城堡。经历代帝王陆续改建、扩建，17世纪末时才大体形成现有的规模。1793年起辟为博物馆。卢浮宫收藏的艺术品多达40万件。但是，由于展室面积有限，展品仅占全部馆藏的3/5。卢浮馆藏画达15000件，但展出的不过2200件。加之，卢浮宫严重缺乏必要的现代化服务设施，既无停车场，又无自动电梯，更没有同博物馆配套的图书馆、电影厅、视听中心、休息室等设施。为使那些长期沉睡于仓库、暗室的艺术瑰宝重见天日，为使卢浮宫更添魅力，扩建势在必行。但是，卢浮宫是法国的国宝，如何扩建却大费周折。

密特朗说过：“我的第一个真正的工程是卢浮宫项目。”他亲自实地察看不下20次之多。何以如此重视呢？因为，他认为，“改建卢浮宫要十分小心。卢浮宫乃是巴黎的心脏，是我国历史的心脏。我希望一种胆识与尊重溶为一体的、纯正、有力的建筑。”他打算打破常规，不采取通常的投标竞争方式选定设计方案，而是由总统亲自指定建筑师负责设计。为巴黎和法国历史的动外科手术，自然非同小可。那末，该请哪一位高明的建筑师来主刀呢？密特朗选中了世界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并亲自提出一项要求：这座蜚声全球的博物馆只能有一个参观入口。

笔者在华盛顿时，曾有机会参观华盛顿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先只有西翼，后来扩建，在东侧又建了一个馆，为东翼，正是贝聿铭设计了这个博物馆玻璃和钢结构的东翼，获得了一致好评。密特朗参观后大为赞赏。

卢浮宫改建，非此君莫属。卢浮宫管理委员会主席受命征询一些国家博物馆馆长：“如果您想改建您的博物馆，您将选择谁担任设计师？”除一人外，异口同声的回答是：“贝聿铭”。密特朗选中贝聿铭，决非偶然。

贝聿铭对动这个至关重要的外科手术，既审慎又大胆。卢浮宫不仅是欧洲最著名、最宝贵的博物馆，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华盛顿现代艺术博物馆无法与之相比。贝聿铭充分意识到这个担子的分量。他表示：“我不动卢浮宫。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传统的含义。”他把所有参观通道和服务设施都建在地下，包括一个可容 1000 辆小汽车和 50 辆大轿车的地下停车场。他对主体设计提出了独到的思想：“卢浮宫的中心应该是拿破仑的庭园。那里是人们必须到达的地方。但是，你到了以后，应该做什么？你就进入类似地铁车站的地下空间吗？不，你应该受到某种大空间的欢迎。那空间应该宽敞，应该明亮，应该一望而知它的用途。”根据这一设计思想，贝聿铭别出心裁，大胆提出在拿破仑庭园中间建造四座大小不等的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方案。他认为，“金字塔是建筑上最稳固的形状。”玻璃金字塔本身是透明的，它不会遮挡卢浮宫的外观。由于玻璃金字塔的反光作用，使其本身变得至关重要和令人感兴趣。

这个设计方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化界、艺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大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来自古埃及的金字塔，不伦不类，与卢浮宫的精美的古老风姿格格不入。不仅如此，许多反对派议员也群起而攻之，猛烈反对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金字塔”，并且借反对玻璃金字塔而攻击密特朗和社会党政权。他们把玻璃金字塔称为“弗朗索瓦法老金字塔”，指责密特朗只顾为个人树碑立传，胡乱改建法国的国宝卢浮宫。这场建筑设计方案之争，竟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密特朗力排众议，坚持这种既有胆识，又尊重历史的设计方案。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政敌、巴黎市长希拉克倒帮了他的忙。希拉克本人对艺术十分爱好，有相当的鉴赏能力。他在观看玻璃金字塔的实际体积模型后，表示不反对这一设计方案。反对派的非议，才算慢慢平息下来。

1994 年笔者有机会旧地重游。玻璃金字塔早已建成开放。和埃菲尔铁塔一样，已经成为巴黎人的骄傲。我先在金字塔边的偌大的喷水池边小憩。环顾四周，但见蓝天白云之下，在阳光照耀下，堂皇凝重的卢浮宫与明亮夺目的金字塔交相辉映，古典式的美与现代化的美完美无缺地融为一体，令人赏心悦目。博物馆入口处的金字塔高 21 米，由 666 块镶嵌在铝合金框架上的、特制高强度、高透明度的玻璃组成。乘自动电梯下到离地面数十米处，确实有“受到某种大空间的欢迎”的感觉。宽敞的地下走廊通向展厅主楼，人流四散，不像过去那样局促拥挤。陈列室也比过去亮堂多了。展出的艺术珍品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贝聿铭的设计别具一格，古韵今风交融，堪称一绝。给巴黎心脏的这朵奇葩增添了异彩。密特朗正可算是“慧眼识英雄”，知人善任。

密特朗为总统工程倾注了很多心血，化费了大量时间。他亲自选定设计方案，亲自察看选址，亲自力争高达 300 多亿法郎的预算。他把建筑模型放在办公室里，不时揣摩端详。他亲自接见建筑师贝聿铭和有关人士问这问那。他甚至亲自关注建筑物的诸多细节。他细心检查为卢浮宫金字塔特制的玻璃质量；他在办公桌上堆了不少建造拉台芳斯大拱门的大理石样品；他甚至为巴士

底歌剧院的座椅挑选面料。

密特朗在上台之前就表明了雄心：“我们能否成功地把我们的文化在空间和实物上铭刻和雕塑出来？我将全力以赴。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化，也要看它在建筑上所取得的成就。”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自豪的。历来被执政者当作在全世界扩展影响的重要手段。巍峨壮丽的总统工程无疑有着双重含义：“既是密特朗执政的纪念碑，又以其现代美学与传统风姿融合的“密特朗风格”，丰富了巴黎建筑和艺术宝库，为古都巴黎锦上添花，并借以弘扬法兰西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显示“法国的伟大”。

“ 国家机密 ”

普通人的健康是个人财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则是国家最高机密。

密特朗患病之说，由来已久。早在 1971 年密特朗出任社会党第一书记不久，就盛传他身患致命疾病。用密特朗自己的话来形容，谣传“就像蝴蝶似的满天飞”。这一年，下台的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放风说：“瞧密特朗那脸色，不出两年准得归天。”密特朗的脸色乍一看确实有点异样：白中泛青。笔者在 60 年代初见到他时，就有这种印象。也许天生如此。密特朗重病缠身的传闻竟然历数年而不衰。他的政敌巴不得死神早日降临在他头上。1972 年，密特朗在社会党《团结》周刊上用讥讽的笔调写道：“《一分钟》报（极右翼周报）的好好先生们已经在我的床前做临终祷告了。”1977 年，密特朗又不得不在《团结》周刊上很风趣地辟谣：“年复一年，在报刊编辑室里，在巴黎的社交筵席上，谣言不胫而走，一直传到外省，说得活灵活现。硬说我得了一种什么神秘的病。谁都知道，越是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倒正是无中生有。”1981 年 5 月，密特朗当选总统，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左翼总统。在这个法国政局变动的节骨眼上，盛传新总统竟身患不治之症。法国人对七年前蓬皮杜总统猝然病逝记忆犹新，对密特朗的病情，自然十分敏感。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顿时成了巴黎社交界的热门话题和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当时，我在外交活动中也从不同渠道获知类似的传闻。有的人绘声绘色，似乎有根有据地列举种种细节，证明此事属实。

法国总统拥有采取内外一切重大决定的权力。总统的健康自然成为牵动全局的政治问题。新总统患病之说流传如此之广，密特朗不得不亲自出马予以澄清。他破例公布最新体检结果，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他还允诺每半年将体检结果公之于众，以增加透明度。这一来，谣传就渐渐销声匿迹了。有人虽疑窦未除，但也无实据可言了，眼看密特朗连年正常履行职务，甚至七年任期尚嫌不足，连选连任，再来七年。人们心头的疑团也就渐渐消散了。

1992 年 8 月，关于密特朗病危的谣传甚盛，8 月 8 日，西德法兰克福和伦敦交易所传出消息：“密特朗猝然病逝，引起巴黎交易所股票行情暴跌。密特朗正在拉什乡间寓所休假，闻讯哈哈大笑：“好啊！我能让股市暴跌！”不过，这也可算是空穴来风。一个月后，9 月 11 日，密特朗做了第一次前列腺癌外科手术，总统病情大白于天下。密特朗离开爱丽舍宫后不到八个月，终因前列腺癌不断扩散，医治无效，于 1996 年 1 月 8 日逝世。不过，密特朗究竟何时得的癌症？当初的传闻是否事出有因？这还是个谜。谜底很快揭开了。密特朗逝世后几天，从 1981 年到 1994 年，一直担任总统私人医生的克洛德·居布莱向报界透露，他在 1981 年 11 月就告诉总统，他患有癌症，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里。但总统对他说，这属于“国家机密”，要他严守秘密。居布莱撰写的《重大秘密》一书，于 1 月 17 日问世，详细披露了已故总统的病情秘密，舆论哗然。该书首版 45000 册，出版当天就销售一空。

法国法律明文规定，医生不得泄露病人的病情秘密，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密特朗夫人和子女向共和国检察官状告这位私人医生，指控他透露密特朗的病情，违反了医疗保密条例。一些医界同行也指责居布莱此举有碍医德。《重大秘密》一书出版次日，即被巴黎高等法院勒令禁止发行，理由是：该书“侵犯了前总统密特朗的家庭和私人隐私”，“违反医疗保密法”。这是非同寻常的举措。密特朗在他的两届总统任期内，禁止对出版物进行追究，以保障言论自由。不过，法国一家咖啡馆已将《重大秘密》一书全部输入国际电脑网络互连网络，全球电脑网络友都能从中查阅这本法国禁书。

这场风波说明，居布莱医生并非信口雌黄。只是他本不该这样做。特别是总统病情属“国家机密”，更不该泄露罢了。

事情是这样的：1981年10月，密特朗总统去墨西哥参加南北首脑坎昆会议之前，感觉背、腿疼痛，走路有点一瘸一拐，浑身很不舒服。回国后，总统的保健医生们进行会诊，初步认为，可能是前列腺炎。为了掩人耳目，总统于11月7日（星期六）乘坐私人医生居布莱的老式汽车，悄悄前往瓦尔·德·格拉斯巴黎军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没有摩托车开道，也没有警卫车。总统入院后，隐姓埋名，冒用院长托马将军的妻舅阿尔贝·布洛的姓名。一切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结果确诊为前列腺癌，并已扩散。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热衷于探听总统隐私的《巴黎竞赛》画报，独家披露了他秘密前往这家医院诊治的消息。该报声称：“目击者说，总统面色青中泛黄，行走困难，不过还没有到动用担架或坐轮椅的地步，至少总统拒绝这样做。”不过，由于前一阵关于总统患病的传闻太盛，这篇报导反而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

居布莱医生不敢把检查结果如实告诉总统，只暗示有癌变的可能。密特朗不信，指定著名泌尿科专家阿道夫·斯泰格教授复查。11月16日，这位专家证实了这项诊断，对总统直言不讳：“我有责任不隐瞒真相。您患有前列腺癌，并已扩散到骨头里，扩散相当严重。”这对刚刚当上几个月总统的密特朗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情不自禁地连连喃喃自语：“我完了！”顿时脸色刷白，垂头丧气。斯泰格医生安慰道：“病情还有办法控制，只是总统必须严格根据医嘱认真接受治疗。密特朗嘱咐两位医生：“别告诉任何人，连密特朗夫人也别告诉。总统的亲人都蒙在鼓里。只有密特朗的情妇安娜·潘若是少数知情人之一。达尼埃尔在密特朗去世后对《快报》记者说，她在1991年才知道丈夫得了癌症。有一天，密特朗痛得厉害，才以实情相告。

居布莱医生私下问斯泰格：总统还能活多久？回答是：“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几个月就完了。病人一般平均可活到三年。”居布莱骗总统说：有可能活五年，不过，实际情况比这好得多。

事有凑巧。三天之后，11月19日，巴黎销售最广的《法兰西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几年来，密特朗一直在巴黎郊区犹

太城的一所肿瘤医院治疗。该报一位素以消息灵通著称的记者打电话给总统特别顾问阿培利：“我不要求您予以证实。我只是向您说明：我们非常清楚，总统现在接受里昂军医院知名的肿瘤专家某教授的治疗。要是您能同总统通话，请转告他：用不着再隐瞒了！”阿培利回答道：“总统就在办公室，我马上去告诉他。”密特朗听后，满不在乎地说：“这些谣言像是要把我宰了当祭品。也像是用巫术在我的照片上扎针。谣言总有一天会把我……但是，这一回还做不到！”

密特朗原先许诺每半年发表健康公报。这时使自己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12月份得发布第二个健康公报了，该怎么办？密特朗对居布莱医生说：“无论如何，不能泄漏。这是国家机密。”他强调说：“我们得说清楚，您必须严守秘密。”于是，只好弄虚作假，每半年照例发布总统健康状况良好的公报。这种满纸谎言的公报竟发表了22次之多。

有一次，差点儿例外。1990年6月，草拟健康公报时，总统一度想透点风。他对居布莱医生说：“8月份，我可能决定引退。按这种设想，您得在我的健康问题上透点风。我一旦引退，我们将把全部情况说清楚。但是只能到那时才行。”居布莱根据总统的意图拟了健康公报稿，透露总统极度疲劳，原因不明，需要休息和进一步检查。总统对此表示满意，“这样一来，事情就清楚了。透明度的许诺也兑现了。人们无法指责我隐瞒什么。”居布莱将公报稿交给爱丽舍宫发言人于贝尔·韦德里纳，他看后立即去找总统府秘书长让-路易·比昂科。后者又把总统府顾问米歇尔·夏拉斯找来。三人急得团团转，异口同声表示反对：“决不能发表。这将是一枚炸弹！”居布莱向总统报告，他的主要助手不同意发表这样的公报。总统嚷了起来：“拿大主意的是我呀！”不过，公报还是作了重大修改，推迟到7月份发表，公报委婉地提到总统“血沉加快”，但没有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至于密特朗何以一度萌发引退的念头，至今还是个谜。

总统的“国家机密”保守得很好。外界固然对总统病情一无所知。连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们也全不知情。总统特别顾问阿培利在《工作日志》原稿中曾写道：“1981年12月，总统对我说，他得了癌症，他完了。”过了几天，“总统又对我说：‘医生们是笨蛋。他们搞错了，我没有得癌症’。”《工作日志》第一卷发表时，根据总统的意见，阿培利把这几句话删去了。

1983年4月，又传出总统患不治之症的消息。当时，内克尔医院住院部罢工。一些医生向法新社提供了一个“特大新闻”：他们掌握了总统的癌症病历。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心中无底，闻讯十分焦急，赶紧去找居布莱医生问个究竟。居布莱泰然自若地回答：决没有那回事。因为他心里明白，总统病历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万无一失。那么，所谓总统的癌症病历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医生把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哥哥罗贝尔·密特朗的病历当作总统病历了。罗贝尔·密特朗正好也患的是前列腺癌。

除了向国内公众保密，还必须严防外国情报机构刺探总统的病情。负责

贴身治疗的居布莱医生知道，1970年蓬皮杜访问美国时，中央情报局窃取了总统的尿样。化验结果，得以成功地监测到法国公众尚一无所知的蓬皮杜病情。在密特朗出国访问期间，治疗不能中断。居布莱格外小心谨慎，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1981年12月，治疗刚开始不久，总统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清晨5时，总统私人医生挟着一个小巧的医疗箱悄悄溜进总统卧室，把输液器勉强挂在床顶的一幅油画的框架上，给总统输液。不久，总统出访伦敦，居布莱仍如法炮制，后来索性用衣架改造成吊架，随身携带，使用方便，并免于引起怀疑，凡总统外出访问，居布莱总是把密特朗使用过的一切医疗用品统统收拾起来，放在一只上了密码锁的手提箱里，带回法国销毁。他还仔细地将密特朗用过的梳子、牙刷之类进行特殊处理，不留痕迹。他总是紧紧跟随着总统，甚至跟着上厕所，随手冲刷尿迹。

治疗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密特朗自我感觉良好，仿佛已经痊愈了。他对私人医生说：“现在也许应该告诉公众，我曾经患过癌症。我许诺定期发表健康公报，真是作茧自缚。总有一天，我们得披露真相。”不过，他终究没有这样做。

1992年9月，病情急剧恶化，非动手术不可，再也瞒不住了。出院时，记者问密特朗是否打算提前离开爱丽舍宫，他以挖苦的口吻回答说：“没有理由这样做。我想，医生并没有去掉我的大脑叶，因为我脑子并没有病。”在病情“曝光”之后，密特朗故意表现得依然能正常履行职务的样子，顶住要他辞职的压力。1992年9月22日，即动手术后仅11天，他不顾医生劝告就去爱丽舍宫上班。当天，他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还同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谈了话：“实话实说吧。瞧，我一直活得好好的！谁也不能怀疑。”第二天，他同德国总理科尔进行了长谈。第三天，星期三，他亲自主持例行的内阁会议。部长们见总统虽面有倦色，但依然精神抖擞。

实际上，密特朗痛楚万分。手术后两个月，1992年11月25日，密特朗访问以色列、约旦后返回巴黎途中，在总统专机上，密特朗夫妇同《新观察家》周刊社长让·达尼埃尔等共进午餐。达尼埃尔问总统，动手术以来感觉如何？密特朗凑到他的耳边说：“开了刀，又是这么一大把年纪，后果可以想见。实际上，就像有人给我在血管上扎了一刀，似乎血在一滴一滴地慢慢往外流。唯一的希望是血别流得太快。”

关于他可能引退的种种猜测，反而促使他忍着病痛，超负荷地工作，更加坚定了干到任期届满的决心。密特朗夫人对《巴黎竞赛》画报记者说：“面对死神的挑战，弗朗索瓦处之泰然。表现了极大的冷静、沉着和勇气。癌症病痛反复折磨他，但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他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实际情况确实如此，1993年1月23日，他拖着病体前往遭受水灾的地区视察。他公开表示：“要是我停止工作，那就完了。停止工作就意味着死亡。”

动了一次手术之后，病情仍继续恶化，非得再次动手术不可。这次手术

吉凶难卜。密特朗私下对《快报》记者流露了这种心情：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很快补充上一句：“我有过美好的一生。我在历史上扮演过角色。我已 77 岁高龄，我死而无憾。”

1994 年 7 月 18 日，密特朗动了第二次手术，历时四小时。但效果极差；因为他的肾功能已日趋衰竭。密特朗夫人当时正在另一所医院作心脏外科手术，只有安娜·潘若守在病床边。她对居布莱医生说，“该创造奇迹才好。”手术大夫表示，只能尽力而为。

手术后第二天，密特朗吐露自己的心声：“我不怕死，但我喜欢活着……不过，死神总是来得太早。”7 月 23 日，密特朗出院时说：“我知道，弄得不好，我会一命呜呼的。”“我的任务尚待完成，那就是法国人选我时交给我的任务……希望我能活 10 个月，甚至更长些……最重要的是，但愿我能坚持到任期届满。”

第二次手术后不久，9 月 8 日，密特朗出现在柏林夏洛腾堡宫前，同科尔总理、梅杰首相和美国国务卿一起，检阅了最后一批撤离德国的盟军部队。9 月 12 日，密特朗又故意在电视上露面。一讲一个半小时，向国人表明自己思路清晰，体力不错，并不像某些报刊所渲染的，他已奄奄一息。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些人有什么权利要我辞职？我蔑视他们。对他们的意见，我只一笑置之。”

居布莱在《重大秘密》一书中说，“1994 年 11 月，我认为弗朗索瓦·密特朗已无法履行他的职务。他已不再履行法国人选他时所委托他的职责。那时期，他的工作日程是在床上度过的。他上午 9 时 30 分或 10 时来爱丽舍宫，一直躺到吃中饭……送呈的文件老不签发，呈递国书的要求没有下文……他已不再工作，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病。吃中饭时他才起床，然后又睡午觉。有些日子，他一整天都不见任何人。”

可是，总统的助手们断然否定这种说法。前总统府秘书长（1991—1995 年）韦德里纳明确表示，“我可以证实，密特朗总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一直能够履行他的职责，直至任期届满。”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安娜·洛韦戎说法相似：“密特朗总统一直充分履行他的职务，直至任期届满。”当年巴拉迪尔政府外交部长、现任法国总理阿兰·朱佩也公开表示：在他任外长期间，从未发现密特朗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

密特朗企盼的第二个七年任期届满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了。1995 年 5 月 17 日，他终于心安理得地离开爱丽舍宫：“我毫无遗憾地离开，就像我来时一样平静。”他仿佛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静候死神降临。

过了几天，5 月 22 日，他同 14 年来一直报导爱丽舍宫新闻的法新社记者皮埃尔·法维埃共进午餐时说：“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能坚持到任期届满，尽管在最后几个星期里，有时是很难熬的。至于下台以后的失落感，我倒一点不担心。”

密特朗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病夫治国”近 14 年之

久。有的法国人对密特朗的过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表示钦佩；有的则对总统一再欺蒙选民表示愤慨，把“国家机密”斥之为弥天大谎，对他的人品颇多非议。

密特朗病故后，他的哥哥罗贝尔·密特朗于1月9日晚在法国电视一台发表谈话，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他声称：“总统的病治疗得最糟糕不过了。”他身患同样的癌症，“本可以像救活我那样救活总统”。他透露，总统身边的四五位医生对治疗方案意见不一。他曾建议请外国专家给总统诊治，但得到的回答是：“无此需要。”次日，密特朗夫人率子女发表公报，对为密特朗治疗的医生们表示充分信任和衷心感谢，“以正视听”。总统的主刀医生阿道夫·斯泰格声明，密特朗总统被确诊身患癌症后，“就得到根据最新科学成果进行的治疗”。他强调，“法国并非落后国家，不是非求助于外国医生不可。”究竟谁是谁非，法国报刊议论纷纷。不过，密特朗既已作古，争议亦是无济于事了。

清理历史旧帐

第二次手术后，密特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对记者说：“谁都不能说，六个月后我还活着。”他决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两面作战：顶住病痛；洗刷过去。

他常说：“应当在生命的尽头，对一个人的一生进行全面评价。”他宁愿在有限的日子里监造留给历史的塑像，而不愿在身后，让那些居心叵测的雕塑家去随心所欲地塑造。

过去几十年中，密特朗对大学时期和供职维希这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偶有涉及，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认为，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清理历史旧帐，让国人面对他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主要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本书，一次记者采访，一次电视谈话，把历史真相捅开了。

1993年，皮埃尔·佩昂出版了一部30年代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组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创始人之一马丁的传记。他在写作过程中，接触到不少有关密特朗的材料。这年5月19日，他前往爱丽舍宫，求见密特朗，希望总统提供帮助，以撰写《密特朗的青年时代》一书。重点涉及密特朗大学时期、维希时期的一些历史敏感问题。过去，法国政界对密特朗的这段历史有过种种传闻，也不乏指责和非难，但是，从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专著。以往的密特朗的传记，也没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佩昂表示，将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去伪存真，阐明历史真相。总统同意了。他表示：“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将帮助您。”总统不但先后七次接见佩昂，追述当年经历，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而且提供私人档案和大量信件。他还提供很多知情人的姓名、地址。他甚至亲自敦促某些知情人会见这位作者。他对这些亲朋故友说：“我、我们，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而且我们问心无愧。”

1994年下半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问世。封面非常引人注目：一张从未公之于众的照片——维希国家元首贝当接见密特朗。作者以翔实材料和确凿的事实证明，密特朗在大学时期是一个十足的右翼青年，并非像某些传记作者所渲染的那样，年轻时就倾向于左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并非从战俘营逃回法国就很快成为抵抗战士，而是有一段在维希供职的阴暗历史。大量书信、文章表明，他的思想、观点同贝当宣扬的“民族革命”、建立“新秩序”如出一辙。知情人异口同声认定：“当年的弗朗索瓦是个贝当分子。”

法国人见到书后感到非常震惊。原来共和国总统并不是那么令人尊敬。当年戴高乐被贝当缺席判处死刑，密特朗却在同贝当握手。不少人问道：“要是这张照片在1981年公布，密特朗还能当上总统吗？”

左翼人士更感到尴尬。30多年来，左翼的头号人物原来是个贝当分子。“30年来，我投票支持他。我将时间、信仰奉献给他。殊不知他却根本无信

仰可言。他从右跳到左，因为他看到这是通向政权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左翼人士比较普遍的反应。

其实，照片风波并非始于1994年。密特朗的政敌对照片早有所闻。这张照片好几次差点公之于世。1965年总统选举期间，戴高乐的内政部长罗歇·弗雷拿到这张照片，如获至宝。他马上召见熟知维希政权情况的专家雅克·德拉律，出示照片，要他调查核实。德拉律找到当年参加接见的雷蒙·布朗什，证实照片是真的。不过，此人说明，那时他同密特朗等人共同组织为战俘募捐大会，傍晚，贝当接见，历时仅几分钟，几乎只有拍照的时间。弗雷听完汇报后说：“用这张照片整密特朗是不光彩的。”戴高乐得知此事后表示，他要凭自己的威望，堂堂正正地取胜，而不愿翻对手的历史老帐，决定不将这张照片用于竞选招贴，也不公之于众。

1984年，当时未能参加会见的另一位战俘互助中心的领导人让—阿尔贝·鲁塞尔写了一部回忆录，准备用这张照片做插图。手稿送到爱丽舍宫征求同意。总统府答复：“出书可以，发表照片不行。”正是他，把这张照片提供给《密特朗的青年时代》一书的作者。

面对《密特朗的青年时代》一书的轰动效应，密特朗泰然处之。他觉得这部书写得不错：“既忠实，又严谨。”“我觉得比我的政敌说得要好。”“皮埃尔·佩昂在他的书中，把事情解释得相当清楚。人们只抓住我1942年在维希度过的几个月。其实，那只是个最起码的职位。没有任务，没有委任，没有权威，也不属于公职。”全国议论纷纷，乃意料中事。他因势利导，亲自出马为自己辩解。

他竭力淡化贝当接见一事。”接见只不过是谈募集寒衣的结果。不过，这同元帅设法争取社会救济组织的好感有关。”他申明：“贝当要我们去见他……我们同贝当的关系仅止于这次简短的会见。”那次会见的照片，“富于刺激性的形象，歪曲了事实真相。”

1994年9月8日，密特朗对《费加罗报》主编发表谈话，从总体上，对其青年时期的历史污点进行辩解：“在动乱的年代里，当一个人还年轻的时候，很难作出抉择。我还算是摆脱了困境。拿那些只有时代背景才能解释的错误来评价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不过，人们对政治家总是什么也不能原谅的。”他还正式否认关于他在30年代同极右组织有牵连的传闻：“我从来没有同极右组织套过近乎。我这样做，曾冒了很大的风险。”

四天之后，1994年9月12日，密特朗又在电视谈话中表白：“如同所有法国人一样，我在1942年搞不清维希政权是怎么回事。”不过，他的电视谈话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谴责维希政权的话。“如同大多数法国人那样，我进行了探索；如同少数人那样，我找到了我应当走的道路。”“大多数年轻

巴黎《新观察家》周刊，1994年9月14日；巴黎《问题》周刊，1994年9月17日。

巴黎《新观察家》周刊，1994年9月14日；巴黎《问题》周刊，1994年9月17日。

人从左开始，以右告终。而我，恰恰相反。”“我是一个转变缓慢的年轻人。但也有压根儿不转变的年轻人。”他强调自己的经历，是“一个右翼青年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历程。”

他郑重声明：“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做过丢脸的事。”“我在维希待了多久？实际上只有几个月。没有负什么责任，没有什么任务，所得薪金，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今天最低工资的2/3。”

在这次电视谈话中，密特朗澄清了大学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第一次承认，在大学里，他一度加入过“火十字团”。“半个月之后，我感到厌烦了，甚至觉得这个团体有点‘鱼龙混杂’。于是，我就没有呆下去。”他还承认，“战前，我参加过一次反对外国人流入法国的示威。我错了。”这是他唯一认错的地方。

密特朗的一些大学同学说，他参加过“火十字团”的青年组织——“国民志愿军”。将近60年后，密特朗终于承认确有其事。“当时我觉得拉罗克上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种种言论同人们对他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他既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反犹太分子……我为他所吸引。我参加过国民志愿军在圣日耳曼大街‘小泉’咖啡馆举行的几次集会……”为了证实他的论断，密特朗还提到拉罗克上校后来参加了抵抗运动，并遭纳粹德国流放。不过，他认为，拉罗克上校毕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右翼人士。

密特朗对长期以来议论纷纷的“法兰克战斧”勋章问题，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承认曾获得这枚勋章。“在那种年头，在所难免。本来人们想让我在授勋仪式上正式接受这枚勋章，而我当时已去伦敦，我是一批人中间的一个。我觉得维希竭力拉拢诸如战俘互助中心、红十字会等社会福利组织。我佩戴过法兰克战斧勋章，这是确确实实的。这是个花招。这枚勋章使我到处通行无阻。我头一次从战俘营逃跑时，我还佩戴过纳粹的党徽哩！”

显然，老谋深算的密特朗企图利用佩昂这本书了结他在大学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段阴暗的历史。他提供协助，进行配合，为的是尽可能对此书施加影响，不致使自己的政治形象受到过分的损伤。密特朗无疑想抢在别人在他死后低毁他之前，争取主动，在法国人面前塑造这样的形象；他是一个无可隐瞒的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

然而，密特朗两次出面表白，并没有消释人们心头的所有疑团。对不少有争议的人和事，舆论界仍颇多非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密特朗同前维希政府警察头子勒内·布斯凯的关系。人们认为，从中不难看出密特朗对维希政权的思想感情和态度。

布斯凯曾任维希警察局秘书长。1942年7月16—17日，布斯凯按照法

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作者皮埃尔·佩昂的谈话，见该书第33—34页。

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青年时代（1934—1947）》一书作者皮埃尔·佩昂的谈话，见该书第295页。

西斯德国的要求，出动 9000 名警察在德占区和非占领区大肆搜捕外籍犹太人，将 13000 名犹太人（其中 4000 人为儿童）集中到巴黎冬季赛车场交给纳粹当局。对这一震惊全国的迫害犹太人事件，布斯凯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949 年巴黎最高法院审理布斯凯在维希任职期间的累累罪行，但几乎未涉及迫害犹太人问题。结果，布斯凯被判处五年徒刑，随即又在“曾积极参加并帮助地下抵抗运动，反对德国占领当局”的名义下，得以赦免。

有人问：赦免布斯凯，当时身为部长的密特朗是否曾从中干预？密特朗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当时让一保罗·马丹证明，布斯凯曾经给抵抗运动帮过大忙，并提到我也可证明。”他还暗示，马丹的地下抵抗活动受到过布斯凯的保护。马丹何许人也？此人曾任维希政府警察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曾向密特朗领导的地下抵抗网提供大量情报。当年密特朗是通过马丹结识布斯凯的。1954 年密特朗出任内政部长，让马丹当部长办公室主任。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马丹临死时说过：“我一生只有两个知己：勒内·布斯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可以说，马丹是密特朗与布斯凯之间的联系人。

布斯凯被赦免后，进入法国著名财团东方汇理银行，不久擢升为副总经理，并跻身于很多东方汇理银行控股的公司的董事会。密特朗同他一直保持联系。有些历史学家怀疑布斯凯在 60 年代曾资助密特朗竞选。1983 年底，布斯凯等三人去密特朗巴黎私邸赴晚宴，第一夫人亲自掌勺接待。有一回，总统特别顾问阿塔利去密特朗就餐的一家巴黎饭馆找总统，他见总统正同前维希警察头子共餐，不禁大吃一惊。密特朗小声对他说：“他可是帮过大忙的人。”1986 年，迫害犹太人事件又闹得沸沸扬扬。以追查纳粹分子和法奸著称的大律师塞尔日·克拉尔斯费尔德以残害人类罪控告布斯凯，审理此案的司法程序从此开始。直到此时，密特朗总统才断绝同布斯凯的来往。

但司法程序一直停滞不前。有关审理人员抱怨说：“好多年里，政府当局一直在拖后腿。”总统反对以残害人类罪重新审理此案。他在 1994 年 9 月 12 日电视谈话中说得很轻巧：“布斯凯当时的地位同冬季赛车场事件有直接牵连。我嘛，我不是法官，我没法说，是确有其事，还是并无其事。但是，我是总统，直到他去世，我没有再见过他，他也从未见过我。”记者追问，总统是否干预过？密特朗承认：“我指示有关各部停止这类审讯。”

密特朗在 1994 年 5 月 31 日同佩昂的谈话中，对布斯凯作了全面评价：“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狂热的维希分子……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我觉得他是个和善、直率的人，有时甚至有点粗暴。我同他见面感到愉快。他同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毫无干系。他是个很重友情的人。”

密特朗清理历史旧帐，引发了左、右翼知识分子向他提出历史帐单。关于密特朗的书充斥出版界，大多是揭露他的“阴暗面”的。1995 年 6 月，密特朗同《快报》记者谈话中表示：“噢！我早就不读这类书了。……这种

书多得不得了。好多是指责我的。不过，指责过头了，反倒使我觉得无所谓了。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想方设法贬低我或败坏我名声的书，其寿命恐怕比我的寿命还短。”他又说：“我希望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而且人们认为这种印记是有用的，而不是相反。”

密特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为自己洗刷。他的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的很多篇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争议的经历。他否认自己是贝当分子。“我嘛，我知道，当年有人投敌，有人抗敌。我是抗敌的。”“我看出贝当政权反复无常，因循守旧，以及它反动和危害的一面。因此，我很快改变态度。”“我不在维希体制之内。我不是维希的官员，而是合同人员。我没有向维希政府宣誓效忠。”

他还批驳别人对他的种种指责。“确切地说，这些指责究竟何所指？由于我没有从 1940 年起就成为抵抗战士？而那时，我还在德国战俘营里呢！由于我在维希身居合同人员的‘高位’？而我拿的薪水还不如现在的最低工资。由于我呼吸了几个月维希的空气？而别人吸得鼓鼓的，却没有损伤一根毫毛。由于菲利普·贝当接见过我足足二十分钟？而这不过是由于我给战俘们作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奉献，再说还有两位伙伴在场，其中之一被流放到德国，死于异乡。由于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今天我一个字也不否认。由于我接受了法兰克战斧勋章？而战俘互助中心和战俘救援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全都接受了这种勋章。当然，我本该仔细考虑颁发勋章的用意何在；维希当局企图在敌视它的人们中间进行拉拢。而我把勋章看作是便于地下活动的护身符。我错了。这是一种判断的错误，我承认这一点毫无困难。有人说我是维希政权的‘显贵人物’，这可使我大吃一惊。”“我说过，戴高乐毫不犹豫地將好多货真价实的维希显贵人物重新安排在他手下工作，有的甚至当了他的部长，谁都觉得无可指摘，谁都满不在乎，谁都不抱怨。对我却如此苛求。这种区别对待，倒是值得恭维的。”

第一夫人

达尼埃尔·密特朗出身于一个无神论者、信仰社会主义的教师家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自然是“天生的左派”。与密特朗从右演变到左不同，她一辈子属于左翼。当了第一夫人，她依然是个埋头苦干的社会党活动分子。至今，她还说：“我，左派是我的基因。我没有碰到过任何问题。”

达尼埃尔上过女子中学。1944年参加毕业生会考时，发生了本书前面所说的“照片事件”，不得不中断考试，同密特朗一道隐匿起来，未能获得中学毕业文凭。结婚后，她成了密特朗的“贤内助”。她总是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家庭生活，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使他能专心从事政治活动。他说过：“我竭尽全力，要让弗朗索瓦生活得惬意。”她曾想当密特朗的秘书，进了秘书学校。但速记、打字那一套没有学下来，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她对装订书籍发生了兴趣，想到装订能帮助丈夫写作，专门进修了装订技术，从此，密特朗写书，她装订。后来又为亲友们装订。装订慢慢成了她的某种专业。195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法国，签名用的贵宾留名簿的装订，就出自达尼埃尔之手。

达尼埃尔不光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而且还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密特朗和达尼埃尔，一右一左，思想上不免发生摩擦，但未酿成大的冲突，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密特朗进入这个或那个右翼政府当部长，达尼埃尔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要求密特朗作出解释。回答是：“法国不是铁板一块。法国既不是清一色的左翼，也不是清一色的右翼。如果不设法稳住一部分右翼，那就将一事无成。”随着密特朗逐步左转和退居反对派，两人思想方向趋于一致。

达尼埃尔时时关心密特朗的政治活动。在节骨眼上给他提个醒，影响不小。1981年5月，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夕，密特朗胜局已定。达尼埃尔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不要为胜利所陶醉：“弗朗索瓦，你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右翼在选举中败北，它也决不会将政权拱手让人。”

有人认为，密特朗从右到左的演变过程中，达尼埃尔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否属实，局外人自然很难判断。不过，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1972年曾经对女作家埃莱娜·维达说过，达尼埃尔有时比他还左：“他觉得我在政治生活中太保守了。”他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古兹一家是富有吸引力的，非常爱国，不信教，坚定的共和派，左派，非常左。”“古兹一家道义上一丝不苟，信仰和行动坚定不移，当然对我有影响。这个同我所生活的法国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法国，有许多美德。”

密特朗在野23年间，特别是当他处于低谷时，达尼埃尔一直竭力卫护丈夫。1959年“天文台公园事件”发生后，许多朋友纷纷离密特朗而去。达尼埃尔认为，这才是识别谁是真正的朋友的时候。那就是“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弗朗索瓦的人”。事隔30多年后，她还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从来没有丝

毫怀疑。”她很重友情。对在逆境中落井下石的朋友，她是决不宽恕的。当《法兰西晚报》就天文台公园事件攻击密特朗时，她对丈夫说：“皮埃尔·拉扎雷夫是你的老朋友，他领导的《法兰西晚报》怎么不为你说话呢？我去找他。”一见面，拉扎雷夫说道：“小达尼埃尔，在这困难的日子，你好吗？你知道，我们是同你站在一起的。弗朗索瓦碰到了一件倒霉事。我们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一直受我们信赖的，但是……”达尼埃尔马上冲口而出：“再见吧，皮埃尔。我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如果你信任他，就没有什么‘但是’。”说罢，扭头就走。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理拉扎雷夫了。这桩逸事充分体现了达尼埃尔的性格和为人。

当了第一夫人，达尼埃尔仍保持谦逊、朴实的特色。她常说，“是弗朗索瓦当选，不是我当选。”她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出风头，而愿意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在当夫人和干自己的工作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密特朗夫妇商定，总统一般工作宴请、工作访问，她都不参加。只有在有必要代表国家时才出面。她陪同总统进行国事访问，也不愿做单纯的陪衬，而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了解实际情况。每次出访，她都认真阅读东道国的有关书籍、材料。参观访问，不局限于上层夫人间的活动，而注重实地参观和接触各方面的人。平时，在爱丽舍宫，她衣著很朴素，但正式出访穿戴很讲究。她认为，这不是她个人的事，而是代表国家的工业和艺术水平，事关民族尊严。1983年5月，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当时正值法国财政经济困难，社会党实行“紧缩”政策，其中包括劝告法国人不要去国外度假，以节约外汇，并且限制每人每年只能兑换2000法郎的外汇（不足250美元）。第一夫人为节约国家开支，临时取消随团出访，以示同国人同甘共苦。

作为第一夫人，她不参政，尤其不卷入爱丽舍宫内部的权力之争和人事纠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嘛，我生活在爱丽舍宫之中，而又超脱爱丽舍宫。”不过，有时她对国家大事也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见解。1986—1988年左右翼“共治”期间，她对《星期日报》记者谈话中指责右翼政府“胡来。弗朗索瓦则有自己的政策”。密特朗在记者追问下，表示不同意达尼埃尔的作法：“今后不该发生类似事情。”达尼埃尔大不以为然。过了几天，密特朗就改口了，公开表示“同意”和“赞赏”夫人的行动，“我要说，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达尼埃尔在爱丽舍宫有自己的天地。由近20名秘书组成的工作班子，主要来自社会党，也留用了一些前总统夫人的秘书。秘书处分设四个组，分别处理法律、住房、失业和其他事务（残废军人、老年人、外籍人）。每天处理来自法国和全世界的书信100多件，大部分涉及贫困、失业、家庭不幸、人权等问题。所有回信她都亲自过目。她的秘书处有爱丽舍宫“卫星”之称，既保持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又保持与基层的联系。或派助手实地处置问题，

或责成有关部门解决，第一夫人班子有一条严格的纪律：不准滥用权力。她自己表白说：“我同部长们的关系可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朋友关系。我并不要求特殊照顾。谁也不能说‘总统夫人要这要那’。总统夫人什么也不要，只求恢复人们应有的权利。”

除了秘书处的日常工作，达尼埃尔还积极参加国内国际的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人权”的活动。密特朗上台之初，她就明确表示：“我可以遵守爱丽舍宫的规定，但是，我不想放弃我作为全国和国际上人道主义组织的一个成员应进行的活动。”她痛恨世界各地“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痛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同情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人民，乐于帮助任何向她求助的人。她说，“干事情总是要冒风险的。怎么办呢？难道对这些不公正的事，能永远袖手旁观吗？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世界，就不会无动于衷。”

1986年，第一夫人创建了人权组织“法国—自由”基金会，自任主席，以在全世界范围卫护人权和自由权利为己任，活动范围主要在第三世界。以“人权”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件，时有发生。1989年，她不顾中国方面多次交涉，执意接见达赖喇嘛。她辩解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法国—自由’基金会是完全独立的！”她似乎忘记了，她毕竟是总统夫人，她以“人权”的名义，对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有关国家使节纷纷向法国外交部交涉、抗议，使外交部很伤脑筋。有一回，外交部长向总统反映，密特朗表示，他管不了“法国—自由”基金会的事。达尼埃尔还同“无国界医生”、“世界医生”等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保持联系，不时在爱丽舍宫会见有关人士。

达尼埃尔创建了援助第三世界的人道主义组织——“6·21协会”。按她的说法，协会取名为“6·21”，是因为该组织创立于一年中白日最长的一天，象征着希望、温暖。协会所要做的事，就是给人们带来希望、自由。协会为“失踪者母亲协会”提供支持；

为缺医少药的国家的人们提供医药；为一些国家的儿童筹集教育器材；向公众披露每一桩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事件。

达尼埃尔特别关注中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同社会党传统和密特朗的政策分不开的。法国社会党利用社会党国际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影响，以“左翼”形象插足中美洲。密特朗接过社会党国际提出的“介乎卡斯特罗（古巴）和皮诺切特（智利独裁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口号，把中美洲作为推行“第三世界主义”试验场。法国通过在政治上支持、军事上援助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求在中美洲动荡的局势中起独特作用。达尼埃尔在1980年9月加入了从社会党派生出来的、关注世界热点问题的“国际团结”，积极投入支持萨尔瓦多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政府活动，支援尼加拉瓜桑地诺新政权。她充分利用第一夫人的有利条件和广泛的国际联系，开展高层活动，支持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声援受拉美独裁政权迫害的人士。

密特朗夫人今年 73 岁，1994 年 7 月 15 日动心脏外科手术时几乎送了命。她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是意外的“礼物”。她的工作热情不减当年。密特朗去世后，她接到 1.8 万封信，需要一一处理。1996 年，为纪念“法国—自由”基金会创立 10 周年，她出版了回忆录《自由谈》，其中谈到生，谈到死，而更多是回顾她同密特朗 51 年的共同生活。她曾要密特朗为这部回忆录作序，回答是：“干吗不？不过，我得先拜读才行！”但他没有来得及拜读、作序就离她而去。对达尼埃尔来说，这也是一大憾事。

密特朗夫妇的家庭生活，并不像过去传闻的那样美满、和谐。密特朗是个风流人物。对年轻女子独具魅力，时有外遇。达尼埃尔是个脾气很犟的女人。不管别人怎么说，她总是按自己性子去做。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她倒善于忍让。她在回忆录中承认：“年复一年，我感到恼火。但我并不觉得过分难受。”密特朗去世后，她在答《快报》记者问时表示：“会生活，就得考虑到生活中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他就是这么个人，我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烦恼。说实在，我与他的共同生活是极其富有激情的。我有过感情的创伤。但是，全都平复了。”有人说，密特朗夫妇后半辈子的结合，更多是政治上的结合，而不是感情上的结合。实际上是各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互不相扰。看来，此话有一定道理。

“第二家庭”

达尼埃尔·密特朗承认，密特朗是“一个很能勾引女人的人”。有人甚至说，密特朗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权力；二是爱女人。他的风流韵事是不少的，其中要数“第二家庭”最为引人注目。

1994年下半年，离总统任期届满不到一年了。密特朗已病入膏肓，看来在世上的日子不太多了。可是，他还有一笔“孽债”未了。这段时间里，他不时带着一个20来岁的少女在巴黎公共场所露面。有时一起在有名的饭馆里共餐，其乐融融。好事的记者悄悄猎取珍贵的镜头。这年11月，法国最畅销的画报《巴黎竞赛》刊出密特朗和他的私生女玛扎丽娜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记者菲利普·亚历山大推出《无法辩护》一书，把密特朗的“第二家庭”捅了出来。这个爆炸性新闻顿时成为法国人饭后茶余的热门话题。不过，这并不使密特朗感到意外。事实上，《巴黎竞赛》画报事先已跟总统打过招呼，而密特朗未加阻止。他倒并不生气，笑着对亲近的人说：“私生女，多难听的字眼！干吗不干脆称之为密特朗的女儿呢？”他还得意地说：“说实在，这不失为一种美谈。”密特朗夫人也心平气和地对《巴黎竞赛》记者说：“我早知道。这是他和她之间的事。不过，请放心，在未来的年月里，不会再有那么多名叫玛扎丽娜的妙龄少女了。玛扎丽娜，这名字多美呀，您说对吗？”密特朗夫人还对《周末报》透露：“弗朗索瓦担心报刊披露这个消息会使我难受，因为当时我身体很不好。我安慰他说：‘别担心，这只能使你同我更靠近，因为这时候，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提起玛扎丽娜，说来话长。早在60年代的某一天，密特朗在大西洋岸海水浴疗养地奥塞戈同克莱蒙费朗的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皮埃尔·潘若打完高尔夫球，一起去参加他的私人招待会。潘若的女儿安娜·潘若也在场。密特朗和安娜一见倾心。当时安娜是一个年方18岁的纯情少女，在巴黎卢浮学校攻读博物馆专业。安娜的一位女友说，“这是安娜绝无仅有的一次热恋。她18岁上邂逅密特朗，便以终身相托。”从此，两人经常在巴黎幽会。

法国社会对男女关系是很开通的。但是，法国的富有家庭却是相当保守的。潘若对女儿同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有妇之夫保持暧昧关系，很不以为然。何况此人又是同右翼为敌的左翼头号人物。但也无可奈何。

1974年，玛扎丽娜出世了，10年之后，1984年1月，密特朗才正式履行了承认他女儿的手续。他当着公证人的面立下了字据。当时他向公证人声明，他希望在他死后才把字据交给玛扎丽娜。潘若一家不让密特朗进门去看望他的私生女。只准他差人把她接去会面。

密特朗夫妇膝下有两子，依仗父亲的势力，一个当上了总统府顾问，一个当选为国民会议员，但两人均属平庸之辈。而玛扎丽娜长得酷肖乃父，聪明伶俐。她像母亲那样，颇有艺术天赋，又像父亲那样，酷爱文学。她给密特朗带来极大的感情上的慰藉，深受密特朗钟爱。她学习成绩优异。一天，

安娜·潘若被叫到学校去。校长对她说：“您的女儿学习很出色，但喜欢撒谎。”因为当同学问玛扎丽娜，父亲是干什么的时，她回答说：“我爸爸是共和国总统。”

1988年密特朗竞选总统时，14岁的玛扎丽娜身着印有“密特朗一代”字样的T恤衫，和很多年轻人一起，参加竞选集会，向熙熙攘攘的人群散发投密特朗一票的传单。中学毕业后，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名牌大学录取。同时在巴黎大学哲学系注册。密特朗视玛扎丽娜为掌上明珠。他几乎每天都要给玛扎丽娜写信。他说：“我为她感到自豪。她不仅聪明，而且美丽。”

安娜·潘若是个聪颖、谨慎、朴实的女子。从卢浮学校毕业后进入奥塞博物馆工作，专攻19世纪雕塑艺术。出版过多部专著，如《奥塞博物馆的雕塑艺术》，《德加的雕塑作品》，《弗朗索瓦·蓬蓬》和《蒂伊勒里公园》。她熟知巴黎的每一座雕像。据说，根据她的建议，巴黎所有美丽的雕像都重新修饰过。她现任奥塞博物馆雕塑部主任，潜心研究雕塑艺术，从不涉足巴黎社交场合。她业余时间，一心扑在女儿身上。1981年5月21日，密特朗总统上任那一天，他在去先贤祠前，先来到安娜的住处，倾吐衷肠，紧紧地拥抱她，然后才去出席那场别出心裁的就职典礼。这可算是密特朗就任总统的一个有趣的插曲。

密特朗当了总统后，把母女俩安顿在隶属于总统府而又离爱丽舍宫仅一箭之遥的邦利街11号的一所公房里，由总统的两位挚友——总统府顾问、玛扎丽娜的教父弗朗索瓦·德格鲁苏弗和企业家帕特里斯·佩拉悉心照料。“第二家庭”一直秘而不宣，但经常受到特别的照顾。玛扎丽娜进知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学习，是爱丽舍宫干预的结果。有一天，她骑马不慎受伤，由总统府保安部队负责照料。

随着密特朗年事日高和病势危笃，对玛扎丽娜的钟爱也与日俱增。总统在巴黎公众场合，不避人耳目，时常把她带在身边。玛扎丽娜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那天，密特朗带她到巴黎上流社会人士经常光顾的一家有名的饭馆用餐，祝贺她学业有成。密特朗宴请至亲好友，有时也让她作陪。有一回，密特朗在总统府宴请一位挚友，玛扎丽娜也在场，但未介绍她的身份，客人以为是密特朗的孙女。当她直呼总统“爸爸”时，客人未免大吃一惊。密特朗甚至将她引入总统的对外活动，在欢迎日本天皇的国宴等正式场合露面。玛扎丽娜的男朋友，是摩洛哥驻瑞典大使的儿子，密特朗“爱屋及乌”，也把他当作自家人看待，甚至安排他参加总统出访外国的代表团。总之，总统有意逐步使他与爱女的关系半公开化。

第一家庭与第二家庭从不谋面。密特朗两次手术住院时，两个家庭的成

埃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和雕塑家。

弗朗索瓦·蓬蓬（1855—1933），法国雕塑家。

员都想方设法避免迎面相见。不凑巧，有一次安娜母女偏偏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了密特朗的儿子让—克利斯托夫·密特朗。后者在人前说：“只要父亲不对我谈起这位姑娘，那么，在我眼里，她就根本不存在。”密特朗离开爱丽舍宫，住在政府提供的弗雷德里克—勒普莱路9号的高级套房里，安娜·潘若和玛扎丽娜陪伴着他。达尼埃尔·密特朗则留居原先的寓所。双方互不相扰。

不过，密特朗不愿把这笔“孽债”带进坟墓里去。他要在谢世前让他的“第二家庭”走出阴影。特别是为他的爱女的前程着想，让她取得密特朗家庭合法成员的身份，得到她应有的一切。因此，与其说是《巴黎竞赛》画报和记者亚历山大揭了总统的隐私，倒不如说密特朗有意适时了却他一桩多年来的心事。他重病在身，执意要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把政治的、历史的、私人的老帐统统还清。

达尼埃尔·密特朗对丈夫移情别恋，表示谅解。她在1996年2月29日答《快报》记者同时表示：“我知道，在法国，在世界上，假装循规蹈矩的不乏其人。应当允许有这样的情形：某个人可以爱一个人爱得很深，而多少年之后，他又爱上另一个人。”对种种风言风语，“我早就打了预防针。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在乎。谁要是诽谤我所爱的人，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至于玛扎丽娜，“那是他的女儿。父女俩长得一模一样。弗朗索瓦十分钟爱她。她很讨人喜欢。”

在英国或美国，一桩风流韵事往往会断送政治人物的前程。在法国则不然。历来法国帝王和达官贵人少不了这类艳事，当今共和国总统又何妨？

第十章

最后的旅程

1995年5月17日，卸任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台阶上辞别了新总统雅克·希拉克，告别了呆了14年之久的总统府。好不容易地拖着病体坚持到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心满意足了。密特朗说：“14年足够了。好的和坏的表现，时间都足够了。……所以，我毫无遗憾。我不会含着眼泪离开爱丽舍宫。”不过，一想到绝症缠身，他又不免有点心酸。他说：“我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我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但显然不会太久了。”他对一位记者吐露了心声：“您希望上帝对您说什么？我想，他会对我说：‘呵，你终于来了！’但愿他能加上一句：‘欢迎你！’”

不过，密特朗并非消极等待死神降临，不如说，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时光。他说：“我在慢慢滑下去。可是我情不自禁地紧紧拉住自己。我有过十分美好的生活，不愿轻易死去。”7月初，他对《快报》周刊发表长篇谈话，充满着生的乐趣。“我欢快地呼吸着初夏的空气，我遥望天空的多彩的颜色。几乎一切都使我感到兴趣。……我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我不想虚度为数不多的日子。”“思考，写作，寻亲访友，到世界上美丽的地方去观光，或是旧地重游。”来日无多，而他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呵！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卸任以后，密特朗重新过起“无官一身轻”的生活。他悠闲地在拉丁区漫步；在塞纳河边逛逛旧书摊；陪玛扎丽娜看电影或去画廊转一转；甚至同玛扎丽娜一起去威尼斯旧地重游。他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倒不完全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嘲笑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我寻思，他是否意识到他已不再是共和国总统了？”

尽管病痛折磨着他，但他总不愿把自己看作病人。凡是多年沿袭下来的生活中的重大活动，依然雷打不动。50年代以来，每逢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50天），密特朗一家总要回达尼埃尔娘家的老屋里度假。星期天一早，全家照例去攀登临近的索吕特雷山。密特朗当总统后，也年年如此。只是多了一大群尾随而行的记者，把家庭聚会变成了“索吕特雷朝圣”。密特朗辞别爱丽舍宫不久，圣灵降临节来临了。四天前，密特朗刚做了插输尿管的手术。他不顾医生的劝告，照样去爬索吕特雷山。到了半山腰，他已精疲力竭，只好停了下来。“我真想一直爬到山顶。可是，我仿佛全身紧紧裹在一个小汽泡里。这是全身麻醉的缘故。”不过，他还自豪地说：“四天前，我做了全身麻醉。可是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密特朗就是这么个人。

10月初，美国前总统布什邀请冷战结束时掌权的四位国家领导人——密特朗、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和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去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聚会。密特朗的医生不同意他远行去大西洋彼岸，他还是执意要去。西德总理科尔还在台上，没有被邀请。五位下台的政治人物，大谈特谈德国问题。密特朗兴致甚浓，因为“这是我心里最牵挂的问题”。从美国归来，他非常自信和满意。他爱在人前说：“瞧，我刚刚作了一次长途旅行。”

密特朗富有文化素养，酷爱写作。生前曾发表过13部著作。撰写回忆录，是最后旅程中的头等大事，他用颤抖的、不大听使唤的手，歪歪扭扭地一字一句写下去。有时一天能写上几页，有时只能写上几行，有时甚至被迫搁笔，躺在床上，他还不断构思、润色。他明知这将是一部完不成的回忆录，仍乐此不疲。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

去世前一个月，他把《新观察家》周刊社长、老朋友让·达尼埃尔请去。说起写作事，他兴奋地说：“我不会口授。我从来不想学打字；对现代化电脑，我更是一窍不通。要是我没有笔触纸张的感觉，我就不知道该写什么，甚至连思路也凝固了。我有足足三个月不能写字，由于手痛得厉害，手指不听脑袋瓜的指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在最后的时光里，唯一的欢乐就是我又能写字了。一旦我能重新开始写作，我就一刻也不停了。”在离开爱丽舍宫到去世这八个月中，他一共留下了500多页回忆录手稿。

他的遗著的出版商说：“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6年4月，密特朗的两部遗著《未完成的回忆录》和《论德国和法国》问世。前者采取同巴黎《环球》月刊主编乔治—马克·伯纳蒙谈话的形式。

密特朗总统任期末期，随着报刊纷纷披露他的隐私和进行种种非议，不少朋友疏远了他，而《环球》依旧支持他。密特朗深受感动。他对主编说道：“我并非人们描绘的那样的人。50年来，我受够了戴高乐分子的怨恨；右翼决不会宽恕脱离他们的阵营的人。我要向您细细说明，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表白道：“我是无辜的，也许，有点蠢……但我绝对不是盖世太保。人们对我的指责，好多是夸大其词，好都是大而化之。我要解释清楚。”

于是，从1994年5月起，以每星期六谈话一次的进度进行，一直延续到1995年11月28日。谈话记录稿由密特朗亲自细细审阅修改。有时甚至改得面目全非。有的段落甚至反复改写四五遍。密特朗总共审改了380页，尚有40来页未及修改。这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涉及维希时期的有争议的经历。其余部分涉及他生平受到攻击的人和事，包括泄漏国防机密案和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以及他同戴高乐、孟戴斯—弗朗斯的关系等。这部回忆录犹如一幅历史自画像，又仿佛是历史面前的辩护书，力图澄清一生的疑点。

《论德国和法国》是外交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全由密特朗一字一句写成。最初打算以《从柏林到巴格达》作书名，因为该书主要就柏林墙倒塌后的对德政策、海湾战争、“欧洲邦联”等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和想法。由于死神过早降临，只完成“德国统一”部分，着重说明：所传他试图阻挠或拖延德国统一之说，纯系无稽之谈。他临死前对亲近的人说：“再活六个月就行了。”对未能完稿表示遗憾。

这两部书，不像是遗言。笔调年轻、有力，同他去世前几个月心力交瘁的境况形成鲜明对照。濒临死亡边缘的密特朗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正在为卷土重来而写作。他仿佛对法国人说：我还在这儿，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剑也一直握在手里。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要战斗。这两部书的问世，使人想起密特朗生前爱说的一句话：“历史会给我以公正的评价。”

精心安排的退场

密特朗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一丝不苟地安排身后的一切，甚至自行安排生命终结的日程。政治上，他精心清理历史旧帐，免得玷污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私生活上，他将“第二家庭”公之于众，免得留下后遗症，最后，他一步步安详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1995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密特朗身体虚弱不堪。他要活动活动身子，得由两个人架着才行。然而，近10年来，每逢圣诞节，他总是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邀请，带着玛扎丽娜和她的母亲安娜·潘若，前往埃及上阿斯旺度假。这年5月，当密特朗离开爱丽舍宫时，穆巴拉克特意打电话告诉他：不管当不当总统，他愿意来埃及，都会受到欢迎。埃及总统将一如既往，给他提供方便。穆巴拉克动情他说：“别忘了，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好朋友。”盛情难却，去还是不去？将多年的习惯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半途而废？

密特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活一天，就要像往常那样，过正常的生活。外出远行，表明他不向病魔低头，要战斗到底。他不顾医生的劝告，还是照样乘坐穆巴拉克提供的专机去上阿斯旺过圣诞节。他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远行。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再一次看看尼罗河和阿斯旺的宁静的景色。”“死在尼罗河，也可算是死得其所。”

按惯例，密特朗下榻瀑布饭店二层237号总统套房。丘吉尔曾在此下榻。密特朗不顾旅途劳顿，还是像往常一样，走上尼罗河边的平台，一直走到栏杆旁，不过，这一回，由两个人搀扶着，步履艰难。他兴致勃勃地再一次领略他所熟悉的尼罗河风光：生活多么美好！他依依不舍，多么愿意多看几眼！不一会，他只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套房去了。

圣诞节那天，天高气清，风和日丽。正是游尼罗河的好天气。他和家人、友人登上游轮，顺流而下。他躺在甲板上，沉醉在迷人的风光之中。当他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观赏尼罗河的美景时，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了。回到旅馆，他已精疲力竭。以后几天没有再出旅馆大门。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拄着手杖、让人扶着才能走动。他几乎整天待在房间里，甚至用餐也在房间里。”他分秒必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撰写回忆录。

12月29日，密特朗返回法国。他又偕夫人及儿子、孙女以及几位至亲好友，一起去朗德省拉什乡间寓所过新年。这也是多年的习惯。围着大长桌吃年夜饭，密特朗谈笑风生。但是，家人和亲友心里都明白，这是密特朗最后一次过新年了。晚宴的气氛既热烈又凄切。密特朗和大家一起看了新总统希拉克的新年电视讲话。密特朗评论说：“我深知，这类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得不坏，虽然长了一点。”11时30分，密特朗告退了：“时间不早了，我不想等到新年的钟声敲响。新年好，再见！”餐厅里一片沉默。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元旦那天，亲友们陆续辞去，密特朗深情地一一挥手告别，

仿佛就此永诀。前文化部长雅克·朗颇有预感地对夫人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按惯例过完两个节日，密特朗觉得对这个世界已不再有任何企求和留恋了。该是结束生命的时候了。除夕晚上饱餐一顿后，元旦那天，他就不进餐了。达尼埃尔劝说道：“你要是不吃饭，身体就好不起来。”密特朗沉默不语。达尼埃尔回忆说：“那时候我就领会他的意思了。他主意已定。1996年1月2日，他返回巴黎后，就不再进食，每天只吃点饼干和喝几杯从埃及带回来的红茶。他对来访的一位友人说：“我已经解决了死的问题。我不再害怕死了。”他对医生说：“死，我倒不怕。但是，对我身后的事，我想得很多很多。”1月5日，密特朗给穆巴拉克一封亲笔信，对他在阿斯旺受到盛情款待表示感谢。这是他生前付邮的最后一封信。1月6日，他问私人医生：如果除服用止痛药外，中止治疗，会怎么样？回答是：他将会在一至三天内死去。密特朗当天就停止治疗。不见任何人，连妻子，儿子，孙女也一律不见，身边只留下私人医生让-皮埃尔·塔罗一人。他说：“那些爱我的人是不会见怪的。那些见怪的人是并不爱我的。”他还嘱咐把卧室的窗帘全都拉上。他要独自平平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家属和亲友都尊重他的意愿，全都待在书房和客厅里，不进入他的套间。不过，有时他还是破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他又见了玛扎丽娜和她的母亲安娜·潘若，见了达尼埃尔和大儿子让-克里斯托夫。不过，没有说多少话。“我已准备好死，心理上已作好准备。”

1992年9月，在第一次动手术之前，密特朗就立下遗嘱，以防不测。除了葬礼等细节，主要是财产继承问题。按现行法律，全部财产应由达尼埃尔继承。夫人在世期间，儿女无权继承，除非死者援引特别条款。“第二家庭”曝光后，密特朗于1995年底又为玛扎丽娜追加了遗嘱，将他心爱的东西留给她。密特朗年轻时就爱好逛书店，也常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淘古本。他上前线时，对他妹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照看我的书。”他一生收藏极丰，包括很多作家全集的善本。他把珍贵的藏书留给富有文学细胞的玛扎丽娜。他一一开列详细目录，他在遗嘱中写道：这些书“并非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他还指定玛扎丽娜照管他的全部版权，包括著作、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等。玛扎丽娜从而成为密特朗精神财富的正式监护人。

玛扎丽娜在答《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时表示：“我父亲委托我负责他的精神财富，我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因此，我当密切注意使他的著作受到尊重和发扬光大。具体说来，他的著作和手稿的出版或再版、必须获得我的同意。同样，他的录音、录像带的发行，也必须经我同意。这决不是某种‘新闻检查’，而是要人们尊重父亲的思想。”玛扎丽娜不负重托。1996年2月，法国《世界报》报导，希拉克总统希望颁发荣誉勋位勋章“民主化”。玛扎丽娜立即投书该报指出：密特朗总统早在1981年就作过类似指示。第一次扮演了乃父精神财富监护人的角色。

密特朗生前积极筹办类似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密特朗研究所，收藏个人档

案文件，诸如工作日志，文件手稿，经他精心修改的讲话稿，文件批示，与各国政府首脑的来往信件、私人书信等。遗嘱规定将 100 万法郎遗赠该研究所，并指定生前挚友、前外交部长迪马为该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密特朗不愿用“基金会”这个名称，以免与达尼埃尔的“法国—自由”基金会混同。他亲自选定生前好友和亲密助手 13 人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并由小儿子吉尔贝·密特朗和玛扎丽娜作为家属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1996 年 4 月 11 日举行首次管理委员会会议。玛扎丽娜第一个到场。依次接待长辈和老人们，特别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密特朗有意突出玛扎丽娜的地位和作用。

临终前两天，密特朗请老朋友、前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鲁斯莱来到床前，宣布请他担任遗嘱执行人，并负责同爱丽舍宫联系安排葬礼的细节。随后，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三页葬礼细节，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上书“遗嘱”两字，交给私人医生。遗嘱规定，在家乡雅尔纳克的圣皮埃尔教堂做一次弥撒，然后安葬在他祖先的合葬墓里。不致悼词，不摆花圈，只需在墓前放两束花。一束是茶色玫瑰花，一束是紫色和黄色的鸢尾。他的灵柩由前总统的六名贴身警卫抬往墓地。不许记者进入教堂和墓地。安葬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但不举行国葬。他甚至选定了哀乐的乐曲。

去世前一天，1 月 7 日，星期六，他还打算继续写点回忆录，但已力不从心，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躺倒在床上，死亡越来越临近了。密特朗自幼受天主教的熏陶，这时宗教观念忽然又在他脑海里冒出来了。他相信临终圣事。塔罗医生正好精于此道。他为密特朗敷圣油，口中念念有词，为这位前总统做了临终圣事。整个晚上，他都拉着私人医生的手，时断时续地说话。拂晓时，只听得轻微的喘息声了，密特朗的手还是热的。突然，手凉了。密特朗平静地安息了。享年 79 岁。这时是 1996 年 1 月 8 日清晨 8 时 30 分。

在密特朗的遗体跟前，两个家庭第一次汇合在一起了。达尼埃尔主动把安娜·潘若找来。说道：“显然，您和我们同样悲哀。”两位妇女并排向密特朗遗体告别。

三重葬礼

密特朗逝世，在法国举行了三种不同的追悼仪式：巴士底广场“普通法国人”的悼念；官方组织的巴黎圣母院的安灵弥撒；密特朗老家雅尔纳克的私人葬礼。这三重葬礼的总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刚刚离开人间的密特朗本人。

1月10日晚，巴黎下着毛毛细雨，仿佛哭丧着脸。天空一片漆黑。探照灯的巨大光束照亮了矗立在巴士底广场上的密特朗巨幅照片。数万人穿着雨衣，打着伞，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标语牌、没有口号（只有眼泪和回忆。此起彼伏的哀乐声和密特朗生前的录音演说，划破沉寂的夜空。15年前，也在这个广场上，也是下着雨的夜晚，他们如痴如狂地欢庆密特朗当选总统；如今，他们都老了一大截，带着儿孙前来志哀。风风雨雨15年，从狂欢到哀伤；从期待到失望；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到面对冷酷的现实。巴士底广场又一次目睹了人间沧桑。

1月11日上午，巴黎圣母院的安灵弥撒和雅尔纳克的葬礼几乎同时进行，电视屏幕分成两半，同时进行现场直播。这倒是别开生面。覆盖着法国国旗的灵柩由专机从巴黎运到科涅克。屏幕上显示在机场为前总统遗体举行的隆重仪式，护送灵柩的车队由摩托车开道浩浩荡荡从科涅克前往雅尔纳克。安灵弥撒在圣皮埃尔教堂举行。这座教堂曾是密特朗父母举行婚礼和密特朗本人受洗礼的地方。宗教仪式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仅仅是死者 and 家属的事。只有家属和少数亲友在场。共和国总统顿时成了普通的雅尔纳克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生前曾大事宣扬“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密特朗，死后居然还得做弥撒安灵，不免有些令人费解。对无神论的广大左翼群众来说，更是感到意外。不过，密特朗在遗嘱中明明写着：“做一回弥撒亦无妨。”做完弥撒，响起了贝多芬的《欢乐颂》，灵车仅由家人和至亲好友伴送至墓地，途中在阿贝尔—盖街22号密特朗故居前停留片刻。密特朗和外祖父母、父母安葬在一起。墓穴的正面用金字刻着：

弗朗索瓦·密特朗 1916——1996 叶落归根。这是密特朗自己的选择。他深深眷恋故乡故土。他在1994年写道：“我的政治生涯促使我背井离乡。然而，我从未真正离开过雅尔纳克。”密特朗祖先的合葬墓里只剩下一个墓穴。

密特朗一度打算另找墓地，以便同达尼埃尔合葬。最后还是决定单独葬在本乡本土。

播放葬礼场面时，电视观众看到一个颇为奇特的镜头：在密特朗的灵柩前，密特朗夫人及两个儿子和孙女同密特朗的私生女玛扎丽娜和她的母亲安娜·潘若站在一起。这是两个家庭的成员首次一起在公众前露面。也是安娜头一回公开亮相。驱散私生活的最后一抹阴影，这正是密特朗的遗愿。他生前未能办到的事，要在身后来实现。灵柩进入墓穴后，密特朗夫人搂抱了玛扎丽娜。这是葬礼的最后一个动人的镜头。

365 采访密特朗葬礼的美、英记者，对两个家庭公然同时在葬礼上露面，感到十分震惊。他们认为，这种场面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在英国则会成为耸人听闻的丑闻。法国人却不这样看。葬礼后，《巴黎竞赛》画报作了一次民意测验，86%的法国人认为，两个家庭同时出场是件“好事”。不少法国人还认为，第一夫人毕竟是一个气度非凡的人。

同日中午 11 时，盛大的安灵弥撒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从戴高乐、蓬皮杜到密特朗，这已形成第五共和国的传统。希拉克总统和政府成员以及议会领袖全体出席。应邀参加的还有各界知名人士约二千人。来自 171 个国家的代表，包括 61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吊唁。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总理科尔。这位身材魁梧的德国人，伤心得不能自持，竟当众潜然泪下，一连三次取下眼镜擦掉泪水。而他并非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一位德国总理何缘对一位法国总统的去世如此伤心呢？人们也许可以从他在 1992 年 1 月电话中对密特朗说的一番话里找到解释。“弗朗索瓦，恕我重复一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你我，没有我们两个，欧洲建设现有的成就是决无可能的，决无可能的。”

雅尔纳克的私人葬礼结束后，仁立在墓地外面的人群排着长龙，手持玫瑰，默默地到密特朗墓前志哀。顷刻间，原先摆在墓前的一束茶色玫瑰和一束紫色和黄色的鸢尾淹没在大堆大堆的玫瑰花之中了。“密特朗时代”告終了。

尾 声

1981年5月11日清晨，即密特朗当选总统次日，一个巴黎人打开窗子时大声嚷道：“啊！总统是社会党人，艾菲尔铁塔还在老地方！”他的邻居在阳台上听了惊讶得叫了起来：“那怎么会呢！”这是刊登在5月12日有影响的法国《世界报》头版的一幅漫画。这番对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法国人的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热切企望“变”；一种是寄望于万变不离其宗。15年过去了。回头来看，还是头一个巴黎人说得对。左翼总统执政14年，艾菲尔铁塔果真还在老地方！法国还是那个法国；法国社会还是那个社会。

密特朗上台时有一句豪言壮语：“在我身后，法国决不会是以前的法国。”然而，预言没有应验。密特朗自己承认：“我未能按我的意愿从结构上改变（法国）社会。当我被置于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上时，时运不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工业世界陷入1929年以来未曾遇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一直延续下来，正好现在结束。在这样的条件下，想按自己的意愿推行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他深深体会到，“现实比政治意志强”。于是，只好知难而退，收起“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过，密特朗毕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在法国和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密特朗够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将在法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或“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其实，无数事实证明，“盖棺”往往未必能“论定”。尤其是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公允评价，少说也得隔上10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现在来全面评价密特朗自然尚为时过早，这里用得着密特朗常说的一句话：“历史将会作出评价”。那么，就让历史去评价吧！附 录

密特朗年表

1916年10月26日	诞生于法国夏朗德省雅尔纳克城。
1925年	入昂古莱姆圣保罗学校当寄宿生。
1934年	入巴黎政治学院法律系学习。
1938年7月	获法律与文学双学士。
9月	编入第23殖民步兵团服兵役。
1939年9月3日	英法对德国宣战。
	随第23殖民步兵团开赴马奇诺防线。
1940年5月10日	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绕过马奇诺防线进攻法国。
6月	受伤被德军俘虏。

1941年12月	从德国战俘营第三次逃跑成功。
1942年3月	维希政府合同人员。
6月	转入维希政府战俘署工作。
10月	贝当接见密特朗等战俘“互助中心”负责人。
11月	辞去维希政府职务，转入地下抵抗活动。
1943年2月	“皮诺-密特朗”地下网即“全国战俘抵抗联盟”组成。
11月15日	秘密前往伦敦。
12月	在阿尔及尔先后会见戴高乐和吉罗。
1944年3月	三大战俘抵抗组织合并组成“全国战俘与流放人员运动”，任指导委员会成员。
8月	被戴高乐任命为法国临时政府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
10月27日	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1945年4月	同达尼埃尔·古兹结婚。
7月	任“全国战俘联合会”副主席。
1946年11月	参加“民主社会抵抗联盟”。
1947年1月	当选为涅夫勒省国民议会议员。
1948年7月	任退伍军人部长。
1948年7月	任新闻国务秘书。
1950年7月	任海外领地部长。
1953年1月	任负责突尼斯事务的国务部长。
6月	任驻欧洲委员会部长级代表。
11月	当选为“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
1954年6月	任内政部长。
1956年1月	任司法国务部长。
1958年6月1日	在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戴高乐上台。
11月	竞选国民议会议员失败。
1959年4月	当选为参议员。
10月15日	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
1961年1月	以参议员身份访华。
1962年11月	重新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1964年	《不断的政变》一书问世，猛烈抨击戴高乐政权。
1965年9月	任“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主席。
12月	首次作为左翼共同候选人竞选总统，败于戴高乐。

1968年6月	辞去“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主席职务。
1971年6月	当选为新社会党第一书记。
1972年6月	社会党、共产党、左翼激进党签署《共同施政纲领》，结成左翼联盟。
1974年5月	再次作为左翼共同候选人竞选总统，败于吉斯卡尔·德斯坦。
1977年9月	左翼联盟破裂。
1981年2月	以社会党领袖身份第二次访华。
5月	第三次竞选总统获胜。
1983年5月	以法国总统身份第三次访华。
1986年3月	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共治”。
1988年5月	再次当选总统。
1993年5月	左、右翼再度“共治”。
1995年5月17日	离开爱丽舍宫。
1996年1月8日	在巴黎逝世。

